

第四种权力

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

晁爱宗 等著



民族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 21 世纪

第 四 种 权 力

——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

管爱宗 等著

民族出版社

1999 · 北京

责任编辑：卓么加

责任校对：娄晓阳

封面设计：简东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咎爱宗等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0

ISBN 7-105-03602-8

I. 第… I. …咎 II. ①新闻工作—舆论—监督—中国②
新闻工作—法治—研究—中国 IV.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686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昌平百善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7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21.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发行部电话 64211731)

目 录

■序一 我们的基本立场	卢跃刚(1)
■序二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余 杰(5)
■序三 世纪末的沉思	骆 爽(9)
■呐喊无声胜有声——写在前面的话	曾爱宗(12)

第一章 法治必行

——非“法”新闻引发官司

1 迎接新闻法治时代	(16)
2 舆论监督,势在必行	(20)
3 记者的法制保障	
——新闻体制改革及舆论监督、司法公正	(24)
4 寻找真实	(34)
——批评报道招致开除公职	(36)
——一笔与“老虎”的较量	(37)
5 新闻官司	(43)
——打赢官司的一步	(44)
——侵害谁的权力	(45)
——材料失实谁负责?	(48)
——照片引发的是非	(51)

第二章 新闻正义

1 包国军假新闻案的背后	(55)
--------------------	------

2	艰难的采访·····	(60)
	——云南电视台记者采访遭围攻·····	(60)
	——掌权者“守土有责”·····	(63)
	——不宜夸大新闻舆论监督作用? ·····	(65)
3	保护自己·····	(66)
	——批评的不是时候? ·····	(66)
	——《焦点访谈》记者襄阳被打内幕·····	(67)
	——自由撰稿人反腐被捕·····	(74)
4	正义属于谁·····	(78)
	——新闻承受的尴尬·····	(79)

第三章 中外新闻洞察

1	何为先于一切的目标·····	(87)
	——从《焦点访谈》与《南方周末》想到的·····	(87)
	——新闻立法,来一次深呼吸·····	(87)
	——从审批制到登记制,路有多长·····	(91)
	——第四种权力:舆论也需要监督吗? ·····	(95)
2	点破美国精神·····	(97)
	——杰斐逊:对自由的困惑与坚守·····	(97)
	——自由与安全,哪一个更重要·····	(100)
	——自由的界限在哪里:诽谤罪与隐私权·····	(103)
	——报道权利与公正审判·····	(109)
	——永远的先驱者普利策·····	(113)
	——恩怨难辩:新闻与情报·····	(114)

第四章 职业化进程与良知

1	势利记者批判·····	(117)
	——现在的记者形象·····	(118)
	——真正的无冕之王·····	(120)
	——人民记者是不是无冕之王? ·····	(122)

——“钱”途光明 正义无踪·····	(124)
——并非历史的笑话·····	(125)
2 焦点问题:中国一年仅有 365 个? ·····	(127)
——新闻岂能靠策划创收·····	(128)
——记者不要途神话·····	(130)
——美国记者与政府的关系·····	(131)
——记者要学会报道·····	(132)
3 体制内记者和“内参”外的声音 ·····	(134)
· 新闻人语:你怕不怕警察 ·····	(139)
· 体制外的“记者”吐真言·····	(141)
——自由撰稿人之正义·····	(144)
· 对舆论监督的可操作性的质疑·····	(146)
——如何避免官司“骚扰”? ·····	(149)
——文责谁负·····	(149)
——专家比记者看得更清楚·····	(150)
——历史上的光荣与梦想·····	(153)
——寄给新闻界的真实声音·····	(155)
——想生存发展,就要把自己变得丑恶? ·····	(156)
4 怀念 80 年代的新闻·····	(161)
——深入采访不容易·····	(163)
· 新闻要讲清什么 ·····	(164)
——也能工作在别处·····	(165)
——不要逼记者制途新闻·····	(166)
· 让记者“跑”起来·····	(167)
——敢为市场的“清道夫”·····	(168)
——办报与市场·····	(169)
· 反应迟钝为哪般·····	(170)

第五章 改革尖兵

——发现名记者

- 1 《南方周末》记者勇敢 (174)
- 2 良知死了吗? (175)
- 3 记者与作家都是干嘛的? (181)
 - 《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和“法 (183)
 - 卢跃刚岂止是“记录历史”? (189)
 - 不了了之的新闻透视:法律面前的交锋 (194)
 - 良知与没有良知的较量:指控权力犯罪 (195)
- 4 为民请命的新华社记者 (202)
 - 猪头税里出政绩 (203)
 - 从邓州谋杀村民案到郑州“大肚子”信箱 (204)
 - 解国记身世 (206)
- 5 直面人生的戴煌 (206)

第六章 近代报人报业

- 1 启蒙派报人:王韬、梁启超及其他 (213)
- 2 革命派报人和报纸 (220)
- 3 元老记者于佑任 (225)
- 4 “无冕之王”血谏民国——昨天的名记者 (230)
 - 杨乃武鲜为人知的“文字之祸” (230)
 - 1939年的“国际间谍案” (231)
 - 蒋介石“永不录用”的陈德徵 (232)
 - 陈其美被杀 (233)
 - 《苏报》案:邹容屈死狱中 (234)
 - 邵飘萍被枪决 (235)
 - 报界老板史量才死于非命 (238)
 - 大公报之“尖兵” (242)
 - 为了新闻而付出生命者 (244)

第七章 “权力”的异化

1 记者的生财之道	(245)
——我是一个记者	(245)
——你的金钱,我的新闻	(246)
——不是我不明白	(248)
——红包的历史	(254)
——你的道德在哪里?	(255)
——出场费:中国新闻记者到底值多少?	(256)
——呐喊:仅仅有喊声是不够的	(259)
——他山之石比较硬	(263)
——追寻清水源头	(266)
——西方新闻人的原则是自由主义	(266)
——公开“天机”:广告是靠不住的?	(274)
——舆论监督部门更需舆论监督	(275)
——有偿新闻到何时?	(279)
——穷则思变	(281)
——中国记者的收入状况	(282)
2 假新闻势不可挡	(283)
——又是一个小保姆的故事:新三毛的传说	(283)
——现代术士如何水变油	(288)
——气功师有了“喉舌”	(289)
——“打假”新闻与新闻打假	(293)
——刘晓庆与克林顿的×级关系	(295)
——谁来给体育传媒打假	(296)
——自由撰稿人靠假名扬天下	(300)
——长城集团集资丑闻臭了新闻界	(302)
——假新闻公然煽情	(308)
——一年之中大跌眼镜	(311)

——假的就要“严打”.....	(316)
第八章 暗箱操作 内幕曝光	
1 曝光“老大”	(318)
——硕鼠大口侵吞 2140 亿资产	(318)
——剥去亚洲第一大站的华丽外衣	(323)
——提审“铁老大”和电信业	(326)
——亿元偷漏税成了难言之隐?	(330)
2 官场风云	(337)
——组织部长:有钱能使磨推鬼	(337)
——糊涂法官制造《新闻法》.....	(339)
——好大喜功与南京长江大桥“结缘”.....	(342)
——首例因《焦点访谈》曝光而引发雇佣杀人.....	(344)
——骗官买官案骇人听闻:堪称当代“官场现形记”	(346)
——“国家曝光”不仅仅是遏制腐败.....	(348)
3 拍案称奇	(357)
——新疆一民女与《人民日报》公堂“较量”.....	(357)
——张金柱带来的连锁反应.....	(367)
——医院真相:一位七旬老人眼中的医德医风	(373)
——医院不知“夜的黑”.....	(374)
第九章 开放时代	
1 世纪末死守高尚的权力	(381)
2 打开天窗说亮话	(382)
3 天理民心——看谁赢在最后,笑在最后.....	(385)
写在后面的话:说,还是不说?	(387)
附 媒体亲近总理	
——海外学子致朱镕基公开信.....	(389)

序一 我们的基本立场

卢跃刚^①

我想,所有的编辑记者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采访和写作?我们的基本权利是什么?我们的新闻写给谁看?在一个社会生态环境中,舆论究竟代表谁的利益?怎样才能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怎样才能逼近社会真实?

在一个常态社会中,这些问题可能不是问题,即使有问题,可能也只是技术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有人说我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行动特征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并在这种行动中搞出一些为世人瞩目的举动来。严格地讲,我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我的理想主义标准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即为了坚持某种信仰或理念,不惜断头洒血。

回忆起来,我的包括新闻报道在内的非虚构文体采访与写作,其认识和判断,首先是人性的,其次是常识的。这种新闻判断的标准在一些人看来,属于小儿科级别,甚至有公然“骂人”的感觉。别人怎么看,别人有什么深奥的理论,我不管。我的真实感受便是如此。我的大量的非虚构文体写作便是这个标准:是否符合人性?是否符合常识?这种追问,构成了我新闻判断和非虚构写作的基本出

^① 《中国青年报》名记者。

发点,构成了我一切文体写作的基本出发点。这种追问,构成了我认识社会的基本出发点,构成了我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在我看来,一切问题,一切现象,一切理论,一切行为,只有还原到最基本的层面上才能看清楚,才能作出你认为是正确的选择,并心甘情愿地去为你的选择承担责任。

我曾经说过,我写《大国寡民》(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直接的动因是人性的,不是理性的。当我去黄河岸边找到被烽火村的恶霸用硫酸毁容毁身的民女武芳时,当她毫不顾忌地撩起衣裙给我看疤痕时,我被震撼了。我如果不亲眼看见武芳,我不会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写那篇引起至今都没有了结官司的报道,不会历时两年,用40万字的篇幅去追寻案例的来龙去脉,去追寻酿成这场人间惨剧的社会原因。我坚信任何人,任何一个尚有人性、良知未泯的人都会有我一样的反应。

我的朋友、《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柳白)最近出版了一部书《尊严——从黑发告到白发》(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书中的主人公李裕芬是重庆市的一个普通市民,一个早年丧夫、与独生儿子相依为命的母亲。十几年前,她的独生儿子被无端抓进重庆市公安局大渡口区公安分局新山村派出所,并被活生生打死。这位顽强的母亲,为了安抚儿子冤死的灵魂,为了捍卫母亲的尊严,为了捍卫生命的尊严,为了向社会讨回公道,十几年状告不已,满头青丝已成白发。陈宗舜用了10年的时间跟踪此案。10年,对于一个记者意味着什么?陈宗舜是孝子。他写《尊严》,不仅是为了李裕芬这位苦命的母亲,更是为了他的母亲,更是为了天下人的母亲。

我的“忘年交”朋友、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他被流放到北大荒,在冰天雪地里唱着“贝加尔湖,我的母亲”,与命运抗争,与邪恶抗争。他被“平反昭雪”后,笔锋更健,写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作品。前不久,他为了一名普通的农村干部的冤屈,由老伴搀扶着到河南果访。这名村干部后因枉法被判处死刑,他又联

合北京的记者、作家、律师和一些老同志著长篇报道声讨。

他们的行动深深地鼓舞着我，并赢得了我的尊重和景仰。关于新闻，关于舆论监督，关于记者，关于《第四种权力》一书的作者，我们都有很多交流。大家始终坚持的仍然是人道主义立场。

尊重人性，尊重生命，尊重普通人的基本情感。这既是人性，也是常识。

理解常识，还有一个层面，即《宪法》层面。

一般地讲，《宪法》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所规定的原则，是生活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全民共识。一切政府，一切政党，一切公民，遵守《宪法》以及由《宪法》而派生出来的各种法律法规，似乎是一个不争的常识。可是，我们发现，这个常识至今仍是个大问题。我们发现，现实生活中，许多有权有势的利益集团并不把《宪法》看在眼里，或者视若无物。他们倚强凌弱、有恃无恐地侵犯公民权利。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宪法》的稳定性问题。既然有了这部《宪法》，我们就应该去捍卫它。在没有相关法律的情况下，捍卫《宪法》，等于捍卫我们的权利。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拿着《宪法》主张自己的权利，却被毫无顾忌地蹂躏，成为现代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页。那时，“圣旨”大于《宪法》。《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的生命安全，遑论黎民百姓？历史的教训太惨痛了。而作为“喉舌”的新闻媒体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助纣为虐，落井下石。

我们只要翻开报纸的合订本，便会得到一个历史常识：脑袋应该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这甚至不是历史常识，而是生物常识。

还有许许多多常识问题，难以备述。

坚持人道主义立场，恢复常识判断，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所谓的“舆论监督”似乎才有意义。我想说的是，“舆论监督”的权利，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宪法》和公众赋予的，有着深厚的现代社会的法理基础。“舆论监督”有没有法理是一回事，承认不承认法理

第四种权力

又是另外一回事。对此,我们不敢抱太乐观的态度。

是为序。

1999 年 1 月 5 日

序二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余 杰^①

每当我经过中央电视台东门的时候，无一例外地会看见门外排着长队，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是来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反映情况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衣衫褴褛，满脸悲愤，大约是遭受了巨大的冤屈。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手里拿着厚厚的材料，甚至还摁着几十个、几百个群众的手印。他们当中还有个别人举着标语横幅，例如“生命不止，告状不已”等等，他们把所有希望寄托于《焦点访谈》。他们相信，假如《焦点访谈》报道了他们的事情，那么转机就会出现——即使是那些被拖延几年、几十年的冤假错案，也有可能得以平反。然而，《焦点访谈》每天只能报道一件事情，以中国之大，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因此，上访的群众大多是失望而归。

为什么群众对《焦点访谈》这样一个电视栏目寄予如此巨大的希望呢？原因不外有两个：第一，《焦点访谈》在当今习惯于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瞒和骗”的新闻界，是一匹敢于直面假、丑、恶的“黑马”。《焦点访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了群众真切的呼声。当我一大早挤在公共汽车上的时候，经常听到旁边的妇女们在津津有味地谈论昨天晚上《焦点访谈》的内容，连声说“真解气！”而群众

^① 北京大学青年学者。

看重《焦点访谈》，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有“通天”的功效。朱镕基总理就很爱看《焦点访谈》，还建议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也看。在前不久朱总理对中央电视台的视察中，他破例给《焦点访谈》题字，一般情况下他是从不题字的。其中，有这么两句“舆论监督”、“群众喉舌”，可见总理心目中《焦点访谈》的分量不轻。所以，地方官员们对《焦点访谈》颇有些“谈‘焦’色变”。一旦被《焦点访谈》曝光，自己的乌纱帽就有可能不保。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除了上访群众以外，还有另外一大群人围着《焦点访谈》转。他们是地方官员及其驻京代表。他们通过种种公关活动，竭力使《焦点访谈》不要播出曝光自己的节目。请求有背景的显赫人物给节目组打招呼，或者寻找中央电视台有关领导进行拉拢，一切手段都用上了。他们奔波的辛苦甚至不比上访的群众轻。这也从反面看出了《焦点访谈》的威力所在。

官员们毕竟有所“怕”了，《焦点访谈》专门针对他们种种无法无天的行为。然而，在欣慰之余，我想，我们在赞赏《焦点访谈》记者们胆识的同时，对这一现象难道不应该作更深层的思考吗？

第一个层面的思考是：《焦点访谈》不能代表我们的整个新闻界。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的新闻界鸦雀无声，《焦点访谈》才得以脱颖而出。仅有《焦点访谈》来为 12 亿人“主持正义”是远远不够的。那些官员们连一个《焦点访谈》也嫌多，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但是对老百姓来说，有两个、三个、十个、一百个《焦点访谈》都不嫌多。只有一个《焦点访谈》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为什么其他的电视、广播、报刊不能有《焦点访谈》的锋芒呢？为什么其他的传媒不能说出老百姓的心声呢？如果我们的所有传媒都能够像《焦点访谈》一样拥有“曝光”官员们丑行的自由，那么那些官员们还能有所欲为吗？

《焦点访谈》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还停留在“象征”的层面上。它的成功之处，也恰恰是中国新闻的悲哀所在。只有一个

《焦点访谈》节目的中国新闻界是不幸的。什么时候官员们从害怕《焦点访谈》变成害怕整个新闻界,那时整个社会就走上正轨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和作家科拉尔早在19世纪就深刻意识到,一种基本的自由即新闻自由的法律地位与整个政治体制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说过:“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政府。”另一位著名学者邦雅曼·贡斯更是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一切公民的、政治的以至司法的保障都会变得虚幻不实。新闻自由是公民的惟一安全保障。”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就把新闻自由视为最基本的自由之一。在此后的一个世纪当中,宣言中的条款塑造着那些通过写作或行动来支持新闻及言论自由的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在美国,保护新闻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几乎发展出一整套哲学思想来。这些捍卫新闻自由的观点都是从血与火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我看过一本介绍美国水门事件的书,美国的各大传媒争先恐后地对黑幕进行报道,是新闻记者们在抢新闻,而不是群众拼命把新闻塞给新闻界。记者们为了获得一个新闻线索,可以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在一个拥有新闻自由的社会里,谁对焦点问题进行最早、最深入的报道,谁就能够拥有广大的读者,谁就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是新闻依赖人民,而不是人民膜拜新闻。这就与我们中央电视台门前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很难想象美国CNN的门前会围上潮水般的人群。

因此,我在向《焦点访谈》致以敬意的同时,希望整个新闻界都像《焦点访谈》那样大胆、甚至比《焦点访谈》还要大胆,舆论监督就真正成了现实。

第二个层面的思考是:为什么群众相信《焦点访谈》,而不相信地方政府、不相信公检法机关、不相信律师呢?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政府、司法机关、律师才是切实为公民解决问题的值得信任的力量,其次才是新闻机构。《焦点访谈》兼有了以上所有部门的职

能,既是政府公务员,又是执法人员;既是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又是社会“良心”的代表。它能够承担如此沉重的使命吗?

《焦点访谈》充当的其实是受苦受难的人民抓到的“救命稻草”的角色。不管这根稻草是不是真的能够救命,他们也抓在手里,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赖了。我们有庞大的各级政府,庞大的公检法系统,庞大的律师队伍,但是人民还是去找《焦点访谈》帮忙。难道政府部门、公检法系统和广大律师们不感到尴尬吗?一个小小的电视栏目居然从他们那里夺取了民心,简直就像是一个黑色幽默小说。

需要《焦点访谈》的中国是有病的中国。《焦点访谈》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悲哀。在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里,新闻仅仅是新闻而已。公民不必通过新闻来获取“正义”的感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着每个公民的权利,一旦他们的权利被伤害了,他们就通过制度来为自己讨一个“说法”。政府完成政府自己的职能,司法机关完成司法机关自己的职能,律师完成律师自己的职能,新闻也完成新闻自己的职能,一切分工都井井有条的,各自管好各自领域的事情。这才是常态的社会。许多中央电视台门外的群众,实际上是想打官司的,他们却不知道官司怎么打,或者不信任法院。而他们更不对律师寄予希望,所以《焦点访谈》成了他们惟一的目标。我们能够指责他们的“愚昧”吗?我们的官员、我们的法官、我们的警察、我们的律师,难道能够问心无愧吗?

我们毕竟有了一个《焦点访谈》,这是巨大的进步。到了我们拥有无数的《焦点访谈》的时候,那将又是更加巨大的进步。而到了我们不再需要《焦点访谈》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建立起了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的制度的时候。

真正的权力是不能撒手的,对于拥有“第四种权力”的记者来说更应该这样。

序三 世纪末的沉思

骆 爽^①

几天前,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谈起新闻出版业的状况时说:“是个人就能当编辑。”现在面对这一部同样由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精心推出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我想这话是否可以变为:“是个人就能当记者。”

曾经读到一则报道,讲的是打记者的事件,打人当然是违法的事儿,新闻舆论也一边倒地站在自己人一边,不过当时记者在被暴民询问身份时的回答很耐人寻味。问:“你哪个单位的?”答:“省报的。”

也许这种说法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却有一丝疑问:那个省有那么多报纸,何以此记者敢自称是“省报的”,是不是他所供职的那家报纸在省里一报独大,故可以堂而皇之地简称为“省报”,人们也可以心照不宣地知道他是那家报纸的神仙?

我在为这类记者挨打而悲哀的同时,也为这类记者的素质而感到脸红。他是我们的同类,代表着我们的一种死亡模式。

“第四种权力”近年来确实有加强的趋势。在开放的大气环流下,新闻监督的呼声也在高涨。据我观察,中国是一个重历史而甚于新闻的国度。历史可能是暧昧的、模糊的、风化的、久远的,新闻则要求是透明的、清晰的、快速的。我觉得秦时的赵高是玩历史和

^① 《中国青年》资深编辑。

第四种权力

新闻平衡的第一位高手，嬴政死后，他们密不发丧，用鲍鱼（《孔子家语六本》：“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来掩盖君王尸体的臭气。几年前，我对此事写了一首小诗，有句如此：“他们封锁消息几月之久，说是给了历史学家以新闻自由。”

新闻能得以进化为“第四种权力”，能在其他权力的掌握控制下得以成长起来，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极大进步。杰斐逊说：“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里。”《第四种权力》一书也讲到杰斐逊本人在确立新闻自由原则时的贡献，他甚至不惜忍受政敌对他的各种攻击和批评。自由同时也意味着代价，但是人类会以最小的代价来赢得最大的福祉。

然而权力正如大江大河，既能够灌溉、航运，也会泛滥成灾。当权力的监督功能很弱的时候，必定是权力的其他功能很强之时。前几年流行一则“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话。这既可能是腐败分子对我们新闻界正义之士别有用心的污蔑，也可能是善良民众对新闻界的败类义正辞严的嘲讽。因为，腐败分子最害怕记者来曝光的，而一般百姓又害怕那些耍特权、打秋风的扰民记者。

想到后一种记者，我就不由地想到了“第四种权力”的图腾膜拜物——记者证。按说，这个盖着鲜红戳儿的东西，本应作为记者为民众代言的良知象征，但是，在一些人手里，这东西却成了搞腐败的通行证和护身符，行则小车，住则宾馆，食则大菜，玩则小妞，拿则红包，都是被鼓吹、被报道的单位提供的，这些“老记”确实是和“老妓”没什么区别了。原西德《镜报》的老板在把原东德的一些报社兼并之后，到原东德的报社作过一番视察，他特别奇怪那里的记者喜欢在办公室里猫着，编发统一的所谓新闻，而不是出没在事发现场。同时，这些养尊处优的“老记”们，也一个个同样地把记者证的红皮小本本当个事儿似的。如果“第四种权力”可悲地沦落到这般地步的话，那么这种权力最好还是终身剥夺的为妙。

权力只有在被制约的时候才是安全的，同样也只有在被正当

运用的时候才是公正的。我觉得当记者的特权被一步步削弱的时候,可能才是记者的监督权力一步步增强的时候。

世纪末是中国各方面的改革要进一步深化的时候,目前无论是法学界、经济学界、文化界,呼唤深化改革的声音愈趋强劲。作为新闻界同仁来讲,也自当为新闻界的开放摇旗呐喊。“第四种权力”得到认可和恰当运用的前路漫漫,既需要立法来保障新闻正义、新闻监督的可操作性,也需要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市场经济是催化新闻开放的东风和雨露,在公平、开放的竞争体制下,新闻业的那些南郭先生、那些办公室记者、那些红包记者,应该有混不下去的理由和结局了。这些人的存在,是挡在新闻从业人员奋发向上道路上的石头。“是个人也能当编辑”、“是个人也能当记者”的神话,应该终结在传统的新闻“大锅饭”里。

记得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中曾说,没有三权分立,就没有宪法。同样,我也可以说,没有“第四种权力”,就没有新闻正义。当世纪末的我们正在为富饶、尊严、权利而跋涉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去沉思这一切。

最后,我想特别提一下《第四种权力》的几位年轻作者——晁爱宗,是目前京城报刊界正在崛起的新锐,高巍、许知远、徐晋如都是北大的青年才俊,序二作者余杰是北大“抽屉文学”的创作高手,作品《火与冰》与《铁屋中的呐喊》名扬海峡两岸。我作为一位在京城混迹了12年的老编辑,他们的作品我都编发过,而且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希望为祖国的全面开放和全面现代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也相信,即将来临的21世纪,这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将在中国的文化界、新闻界有一席之地。在我看来,《第四种权力》一书还有一些粗糙的地方,但这本书的创意和写作的青春激情,都是令人感动的。但愿世纪末的这种青春激情,能促使“第四种权力”之花开得更健康、更灿烂。

1998年12月14日

呐喊无声胜有声 ——写在前面的话

答爱宗

—

发往兰州西的列车，夕发朝至。恰好，列车要通过一个道口，护栏划过来首先把行人挡在了路边，对列车和行人来说，双方都很安全。但情况并不全是这样，像绿灯行红灯也“行”（即人们司空见惯的闯红灯）一样，有人就越过了护栏，他以为火车既然还没到眼前，他还有机会先过去，是的，他的结局正如他的判断一样，他过去了。于是又有第二个人跟着要冲，第三个人跟着要闯，对比不幸的第二第三第N个人，第一个人总是幸运者，第二、第三或第N却是永远的不幸者。而且，第一个人是始终幸运的人，因为无论成功，无论失败，“第一”是永远无法有别人替代。然而，遗憾的是，第二、第三、第N都无足挂齿，因为他们永远属于追随者。

要记住，幸运者永远总是少数，而失败者总是永远的多数。

我想起来这时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新闻，但是这样的社会新闻一般只会出现在明天的晚报上，因为除了凤凰卫视（据我所知），中央和地方的TV都睡觉了，而不愿睡觉的吴小莉、杨澜、许戈辉等喜欢在晚上主持有创意的节目，而她们的新闻我看不到，因为我不愿打开电视机——打开也没用，因为我没住在带星级的宾馆。于是，我就当新闻没有发生。

“新闻没有发生”，其实，新闻时刻都在发生。好人好事，坏人坏事，想发生的，不想发生的，都在发生，我们呢，也都应该关注，在这样的夜晚关注任何事件的发生就是对新闻最大的支持。

我们需要新闻的发生，更需要新闻的传播。于是，我们推出了这本关于分析新闻实践与理论的通俗著作《第四种权力》。我们的本意是新闻界力量太弱小，禁不住些微的风吹草动，这样不好，这不利于新闻事业的创新和发展。所以我们追求公众意义上的正义，所以我们要面对封杀或刁难而自卫，自卫才能站稳脚跟，才能迈开步伐。接着就是冲破封闭、向往光明式的反击，反击什么呢，反击改革路上的阻力，反击视新闻为敌的对手，反击挡住公众视线的“黑手”。未来的日子里，掌握“第四种权力”的新闻记者们再也没有也不愿有什么真正的“敌人”，我们有的只是真正的对手，我们不想打败任何人，我们只想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实，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我们有说话的权利，有说话的义务，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因为你不能封住新闻的嘴巴，不就是一个个嘴巴嘛，顶多会咬一口，说不定是亲吻哩。不可怕，新闻监督就是治病救人，咬一口也是为你好，不然你早就病得一命呜呼了。

我监督你，是因为我爱你，是相信你早晚会好。

我不监督你，是因为我不爱你，是相信你早晚不会好。

你，或是单位，或是个人，或是其他，你拥有你的今天和明天，但你不能不接受公众或民意的监督。

二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突然发现，“舆论监督”和“第四种权力”成了热门词汇，电台、电视台、因特网、报纸、杂志竞相研究和讨论如何开放“舆论监督”和新闻界如何勇于行使“第四种权力”。

我国首宗新闻单位获检察院支持抗诉法院案开庭的消息被新闻界广泛报道。1998年11月11日《广州日报》第一版报道“《工人

日报》四年前败诉不公道”，1998年11月11日《羊城晚报》一版报道“新闻官司抗诉案审理昨日未完今日继续/法庭激战八个钟头/控辩双方唇枪舌剑”，1998年11月13日《南方周末》一版报道“舆论监督屡屡吃官司/检察抗诉声援新闻界”。《南方周末》记者郭国松这样写到：“屡陷新闻官司又屡遭败诉厄运的新闻单位，终于破天荒地获得检察机关抗诉。”1998年4月10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受命对此案的一审判决提出抗诉，认为“福田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违背事实真相，确有错误，申诉人撰写、发表的批评文章所述确有根据，基本属实，《工人日报》发表该文，主观意图是对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的错误现象进行批评，干预社会生活，端正社会风气，进行舆论监督，是行使新闻批评权力的正当行为，既无侵权的故意、过失，又不违反法律。”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新闻单位被告案中首次获得检察院抗诉的司法先例，因此，一批司法界人士和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各省市新闻单位在内的37家新闻单位派记者旁听了当天的庭审。由于舆论监督透明化，《广州日报》的报道更加详细，如一审法院违反程序等。接下去，1998年11月13日《南方周末》用半版的篇幅“特别关注”新闻舆论监督。讲的是被包围的《焦点访谈》，说：北京新闻界的人都知道，中央电视台门前经常排着两个长队：来自全国各地向《焦点访谈》反映情况的群众是一队，向《焦点访谈》“公关”不要播出有批评他们当地干部内容的节目的又是一队。《焦点访谈》的同行确认，至少有70%的节目播出前被“公关”，其中不少“公关团”在记者刚到采访地就出发了——多么可怕的“出发”！要知道，新闻并不是孤独存在的，舆论监督单位自己也要被监督。评论家刘洪波认为“新闻要防‘两手抓’”意思是指记者们在抓新闻的同时要防止被“公关团”的人抓到。

“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撬起来。”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如是说。“给我空间与运动，我就可以造出宇宙来。”法国科

学家笛卡儿这样声称。

媒介也应该显示自身的威力与作用,但媒介也有很多无奈和难言之隐。尤其是碰到张口“我就是法”的检察官、法官、警官,权力之间,握有“第四种权力”的记者们能占上风吗?但我看到当前新闻媒介竞相关注和报道新闻官司,很高兴,这预示着我们的舆论监督是对公众负责的,这证明我们是处于一个呼唤法治时代到来的转折点。凡是没有达到向新闻监督部门公开自我的权力机构,请听我大声地说,“请不要从政”,“请不要掌握权力”。我也请记者朋友记住,一定要向前看,开放自己,改革自己,大浪淘沙,风里来,雨里去,成长自己,迎接明天。

再者,本书的特色是具有“比新闻更生动的内幕,比内幕更深刻的见解”。我们相信本书倡导的“第四种权力”其影响将更加持久,冲击更有力度。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本书由《中国青年报》名记者卢跃刚先生作序,他欣然动笔,令我感动;还有多年的老朋友余杰和京城资深编辑骆爽,我们既是兄弟又是朋友,他们对本书的支持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而且还作序一篇,令我感激不已。我还要提一下,本书由咎爱宗策划,《北京工商管理》负责人李宗亭先生和我来自浙江的朋友们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我牵手的朋友和理解我创业的亲密爱人娄晓阳完全忘我地给予全面的支持。本书执笔者有咎爱宗(负责通篇稿件)、高巍、许知远、徐晋如,我等均为新闻战士,今日和明日都将拼搏在新闻的战场上。

新闻界,今天,明天,在21世纪,任重道远!

1998年11月10日凌晨1时

第一章 法治必行

——非“法”新闻引发官司

当有“无冕之王”之桂冠的公众传媒记者面对铁与血的事实，恶劣到背叛了公平、公开、良知与正义的时候，情况将使前面的情况更加危机。这将是一个国家与民族走向没落的不祥之兆。

曾经沧海难为水，上穷碧落下黄泉。中国新闻业，一路摸爬滚打，一路嬉笑怒骂，如今终于不胜艰难地走到了一个世纪的末日。

1999年，当您回眸四顾，可曾深深地感到良心的碰撞与呼啸？

职业记者约瑟夫·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这是对新闻工作者最准确最朴实的定义。

“目击真实”注定是记者最高的使命，“报道真实”也就是记者最大的尊严。因而，新闻同样需要进入法治轨道，接受法律的制衡。但是，对于一个历来缺乏法治的传统大国，新闻又如何真正体现“法”的精神？

1. 迎接新闻法治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整整运作了20年。20年，天翻地覆。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经历了沧海桑田、脱胎换骨般的深刻变迁、发展，带给12亿中国人以罕见的机遇和条件，使中国这个古老衰败的国度继1840年鸦片战争以

来,重新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与此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急剧转型,必然在原有体制、构造上形成新的“制度缺陷”、“制度真空”,因而导致了道德价值失衡、地区差距悬殊、国有经济实体腐败、社会治安恶化、国企陷入困境、分配制度不公等新的矛盾,进而出现了滥用行政职权、司法制度腐败及传统监督机构“失灵”乃至媒体“失控”等严重问题。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越来越强烈要求新闻媒体起来承担社会责任,以现代舆论监督的力量去补充司法监督、立法监督、行政监督等的不足,以便更好地营造开放的空间。

但新闻自身正陷入旧体制与新环境的交锋之中,它是否可能或者是否有能力真正肩负起社会责任,按照改革开放发展的要求实现其舆论监督的功能呢?

很显然,新闻必须走法治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其健康、正常地行使自身的舆论监督功能。

新闻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具体地说,就是保障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了解情况、表达意见的权利,保障新闻媒体正当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和评论权;同时依法限制滥用自由的行为,规定新闻媒介对于泄密、误导、干涉公正司法审判、刊播虚假信息 and 广告、进行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保障性的法制规范是新闻媒介进行舆论监督、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前提之一。法治使规范具有了统一性、确定性、强制性和权威性。无法可依,只靠行政指导和政策调整,规范笼统模糊,充满弹性,就会经常出现因领导人、时间、地点和部门的不同而被随意解释的情况。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国目前的新闻媒介无不隶属于各种各样的党政、社会团体等单位、部门,不但很难以公众媒体的姿态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经常和制度化的舆论监督,而且很容易成为主管主办部门昭显政绩、隐恶忌医的自我宣传、自我

保护工具。

但是,自 80 年代初即开始的新闻立法提议,到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新闻出版立法的步伐,时至 20 世纪末的今日,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依然无影无踪、光听雷声不见雨点?问题究竟何在?

最主要的一种说法是担心新闻立法会不会削弱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据称这一说法成为怀疑、抵制新闻立法的关键障碍所在。

实际上,新闻是为人民服务的,而党和政府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机构。再说,新闻立法始终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并最终体现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及意志,新闻立法只能是对党的领导的加强和支持。

当今世界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不对新闻实行法治的。英国、美国等国家属于普通法系,对新闻实行的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判例或议会通过的法案中;法国、德国等国家,新闻法律则以成文法典的形式存在。那么,中国的新闻立法将如何进行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有监督与批评政府人员的权利,那么,中国目前 2000 多家公开发行的报纸、7000 多家期刊、3000 多家电视台、1000 多家广播电台、500 多家出版社是否也实行“粗放经营”?公民或法人是否有创办报刊、电视、电台、出版社等新闻媒体的权利与义务?

且看一看中国“新闻人”的真面目:

1997 年 1 月至 6 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对全国 10 个省、183 个中央及地方新闻单位的 2002 名记者、编辑等进行了不具名抽样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全体中国新闻工作者(有一半是中共党员,五分之一是共青团员)月平均收入为 1137 元,高于同期全国城镇职工人均 817 元的水平。但是,在不同城市,记者月收入达 9000 元(隐性

收入高达数万元),也有记者月收入却在100元以下,相差竟达200倍!三分之一的人承认有灰色收入,有时候一笔红包可以达到3000元以上。

调查同时显示,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确实普遍存在。具体表现是:利用自己的版面或节目拉赞助;接受被采访单位的招待用餐;利用职务为自己单位联系广告业务并从中提成;接受新闻来源单位的赠送礼品等等。

说起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理想,明显具有中国特色,依次为:以促进社会改革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不畏强权、直言进谏;做革命事业(应为公众监督机制)的螺丝钉。

该调查最后还显示了一组令人吃惊的数字:18.2%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承认,从未或者很少读新闻研究与业务刊物;36.5%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承认,从未或者很少读作为思想充电的各种社会科学类刊物;68.2%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承认,从未或者很少读境外报刊;84%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承认,从未或者很少看美国CNN的新闻……

事实是如此的残酷——一方面,中国新闻“是以客观地报道事实为主,还是以更好地宣传政策为主?”、“是上传下达,还是真正体现公众意志?”;另一方面,中国新闻工作者队伍本身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已经面临着一次来自体制内部的深层次改革和清除。

由此看出,中国新闻多么需要进入真正的法治时代!

只有进入新闻法治时代,新闻媒体才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真实迅速地反映各种社会焦点问题,警醒决策层和全社会面对和思考矛盾;只有进入新闻法治时代,通过新闻媒介的公开参与、沟通、判断及引导,才能使社会各利益群体相互磨合,增进理解和宽容;只有进入新闻法治时代,充分的信息流通和舆论监督才可能为现存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的社会舆论基础和社会心理准备;只有进入新闻法治时代,整个社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能

进一步公开化、法制化、秩序化、规范化。

正所谓封闭无新闻,改革开放的中国在谋求与世界接轨、同步发展以及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其新闻体制改革和新闻立法也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关键时刻!

我们呼唤着,并拭目以待……

2. 舆论监督,势在必行

改革的实践证明,加强舆论监督,从现在起,甚至从改革一开始,就是十分必要的。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它可以包括对党务、政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施政活动的监督,以及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这里所谈的舆论监督,是就其狭义来说的,指运用传媒对各种腐败现象、腐败行为、腐败分子的监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旭培在《中国改革报·时代周刊》撰文认为,舆论媒介的运作特点,使它适宜于担当监督重任。一是新闻媒介的运作具有及时性。传媒抓到“蛛丝马迹”,就可以及时亮出,然后穷追不舍。国外很多贪污、受贿案就是由传媒发现线索及时报道而暴露出来的。二是新闻媒介的监督具有公开性,常使搞腐败者来不及遮掩,就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公诸报端之后,就能引起全社会的注意,知情人就可能有勇气向新闻媒介和司法机关披露内情,提供证据;而腐败者的幕后疏通打点活动也容易被阻断。

但是我国媒介在这方面的功能始终没有很好地发挥过。80年代,我国媒介在端正党风中进行了强化报纸批评的努力,以批评“渤海二号沉船事件”、“商业部长吃客饭”、“一些中央国家机关干部上班迟到不能容忍”等名篇见诸报端,后来又在反官倒中发挥了监督作用,都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90年代后,由于各种原因,批评报道大为减少。在人们千呼万唤舆论监督的情况下,1992年以来中央电视台的舆论监督有所加强,它的《焦点访谈》节目成了全

国人民最爱看的节目,因为这个栏目的许多批评专题都很有力,切中时弊,以至于在中央电视台门前,常常是一大早就有一大群人站在那里排队求见,请求中央电视台派记者去采访报道他们那里的违法、腐败和民间冤情。许多专家、记者和北大学生曾目击现场状况,无不为之动容。但是作为整个新闻界来说,舆论监督仍是弱项的局面远未改变。

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强调舆论监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道中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他指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全国人大负责人对美国传媒人士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证人民更加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让他们更多地通过新闻舆论对政府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对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西方有些东西也可以借鉴,如新闻舆论监督。”这位负责人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说,“我每天看《焦点访谈》,大家都爱看这个节目。”1997年春天朱镕基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讲话中,更是多次称赞《焦点访谈》。1998年12月1日,全国人大负责人就中国新闻立法回答了德国《商报》驻京记者的提问。12月2日新华社发出全球电讯。这位名为思立志的德国记者问:“人大的主要工作是立法,有一项立法从媒体来说很感兴趣,就是《新闻法》,因为新闻工作人员需要知道允许他们做什么,不允许他们做什么,什么事情是禁止的,不了解这种情况会产生一些麻烦。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该负责人答:“我们将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改革开放20年来,在我们新闻界、舆论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可以说开放度、自由度相当大,但是我们还要告诉新闻工作者,不要做一些不切实际、甚至是歪曲性报道,这样做我们不赞成,因为它违背了新闻的职业道德,而且会误导人民。新闻自由的原则应该遵循,但是

第四种权力

个人自由不能妨碍他人自由,这一原则也应该遵循。新闻自由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我们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焦点访谈》对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以及不良社会现象曝光很尖锐,这种情况以前是没有的”。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正式开播,从这一天起,舆论监督的形象印在了人民群众的心里。随着《焦点访谈》每晚7点38分的准时播出变得清晰、明确,甚至高大起来。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央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视台,除青海台、西藏台外,共开办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节目60个;全国31家省级党报都设有热点、焦点类栏目,有30家报纸的这类专栏是每周一期,不定期的有28个专栏。在中华大地上,舆论监督正在迅速升温。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光春1998年11月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说,“舆论监督是新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工作。改革开放以后,舆论监督工作进一步加强,形成了如今的舆论监督热”。

讲到舆论监督的艺术,徐光春提出,搞舆论监督,光靠激情不行,要讲原则,讲策略,讲艺术,讲方法。具体地讲,一要坚持真理,出以公心。要有纯正的工作动机,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不徇私情,公正公平。二要服从大局,改进工作。要把党和国家的大局放在心上,着力于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三要实事求是,把握好度。事实一定要搞准确,绝不能搞虚的假的;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把握好分寸,注意发稿的数量和密度,选择恰当的发稿时机。四要服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把道理讲清楚,讲准确,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训人,不整人。五要字斟句酌、严密无隙。避免因措辞不当,表述不妥,被人握住把柄,做反面文章。六要有法可依,有据可查。从工作之初,就要有“吃官司”的准备,千方百计做到自己监督的内容符合法律、有根有据。七要积极引导,善始善终。要把监督向好

的方向引导,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要把监督的结果告诉读者和观众。

新闻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旭培认为:“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我们何以迟迟不能充分利用这个世界法治国家都拿来用以反腐败的利器呢?”是担心没有经过权力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查实,弄不好会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吗?传媒在行使舆论监督的使命时,是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损害当事人的名誉,轻则道歉、罚款,重则负刑事责任(如故意诽谤,情节严重者)。1987年《民法通则》实施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传媒从整体上说,已基本上掌握了批评的技巧、分寸,我国的法院处理各种新闻官司的案例也逐渐多起来了。

曝光太多,自然有人恐慌。难道是担心腐败揭露多了,会影响社会安定吗?事实是腐败本身才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传媒不断地与腐败作斗争,像啄木鸟不断地啄去树木身上的害虫一样,乃是消除妨碍社会健康正常运行的积极因素。如果听任腐败因素不断积累,在社会不满程度超过一定数值的时候,任何导火线都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开端。及时披露腐败,消除腐败,不怕揭露腐败——这就是社会的良性运行;不敢揭露腐败,社会越腐败,越害怕揭露腐败,最后因腐败导致社会大动荡——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规律。在我们深信我们社会腐败的一面不占主流,正气能压倒邪气的时候,赶紧拿起舆论监督的武器,与腐败的人与事作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的是远见卓识和对未来的责任感,不能搞政治上的短期行为,不可追求暂时的平安无事。如果错过加大反腐败力度的时机,就有可能进入上面所说的“恶性循环”,那时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应该认识到,要加强舆论监督的力度,确实应该考虑让群众有个适应的过程,以便减少和消除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但也要看到,群众的承受力也不是一

第四种权力

成不变的。过去我们总是担心物价调整最敏感，群众对物价的涨浮缺乏承受力，还担心工人下岗、干部低聘等社会很敏感的问题。但是经过改革和不断的调试，群众在这些方面的承受力都在增长。现在大家都认识到，物价的变化，人员的流动，这都是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增加对腐败的披露，开始可能会在一些人身上有点副作用，但只要我们能反复向干部群众宣传舆论监督是传媒的社会使命和应该具备的运作特点，群众就不会因为多披露了几个贪官或不法分子，就觉得国家没有希望。关键是要坚持下去，久而久之，人们就会习以为常，安之若素，使舆论监督进入正常的运行轨道。

实事求是地说，腐败现象在地方和基层表现得更加突出。因此，地、县级报纸，组成由党委、人大、报社等各方人士参加的编委会，加强报纸的舆论监督功能，这对于监督下层、防止腐败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法律范围内给予其一定的自由，可使舆论监督充分一些，让基层的某些问题及时披露出来，以便尽快让省里知道，让中央知道。一旦出些偏差因其发行范围有限，影响不很大，容易补救……。孙旭培先生的这番话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1998年1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副总编陈小川撰文说《焦点访谈》太累了。按朱总理说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焦点访谈》名副其实，但是也不能太过厚望，一年天天为民请命主持正义，顶多播360期节目。更何况还有三、四成的节目播的是全国典型、文明地区一类。若碰上死猪不怕热水烫的人，声称自己是法院院长要“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媒体也奈何他不了，怎么办？只有公正的司法体制保证，才是靠得住的。到时候，“焦点访谈”们就不必那么累了。

3. 记者的法制保障

——新闻体制改革及舆论监督、司法公正

1998年10月31日，北京翰林阁图书有限公司举办“新闻监

督与司法公正”专题研讨会,与会各界人士在充分肯定“法院公开审判,允许新闻界介入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的同时,也就与此相关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1998年11月2日《北京青年报》发表记者孙丹平、韩冬记录、采写的“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专题研讨会所有发言。1998年12期《中国律师》进行了全景报道。

一个时期以来,司法制度改革已在我国提上日程,有的法院开始尝试允许电视直播庭审实况。这一新举措体现了增加司法公正性、推进舆论监督的愿望和努力,然而也引起了争议。一些人士认为,新闻监督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公众法律意识;另一些人士则担心,诸如以电视直播的方式公开司法,是否会影响法官独立、冷静地判案,从而偏离法律?

《南方周末》专栏作家、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贺卫方说:“最近开始的对庭审进行实况报道的尝试被许多人视为司法走向公正的一个象征。许多传媒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中国司法史和新闻史上的一个创举,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尽管从事和参与这项里程碑式直播的人们具有最善良和真诚的动机,并且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然而,作为一个从事司法制度研究的学者,我感到电视直播法庭审判的复杂性似乎被人们忽视了。在一些国家,法庭是迄今为止对镁光灯排斥最严厉的一个场所。通常报纸对报道法庭场景所用的图片都只能是法庭速写师提供的速写画,而不是照片(法庭之内不许拍照),电视直播就更是一桩难以实现的事情了。另外,直播过程还要受到法官严格的监控和各种苛刻限制,例如不能够允许陪审团成员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中,镜头不得对准当事人的笔记,等等。既然直播有利于实现公民的知情权,有利于对司法权的监督,有利于公民法制意识的养成,而对这三个有利于,为什么许多国家都要对电视直播施加那么多的忧虑呢?

“司法程序的特殊性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一起案件的审理是主审法官与律师、检察官以及当事人、证人等细致而严谨的合作

工作过程。法庭是当事人双方利益相互冲突的场所,律师们需要一丝不苟地展开自己的论证,法官需要全神贯注地对庭审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作出及时而权威的回应。这里有唇枪舌剑式的激烈交锋,有层层剥笋般的细密分析,时而慷慨激昂,时而针落地而可闻。总之,这是一个与实验室中的试验或病房里的会诊相类似的过程。监督固然可以,但如果使用的方式具有干扰色彩,则势必会对法庭秩序以及相关程序带来负面影响。镁光灯刺眼的光芒,摄影师不停地走动,还有当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同时被成千上万公众注视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或激发的‘做秀欲’,都会妨害庭审过程的庄重与严谨,进而妨碍案件的公正审理。

“就一般社会对法官的监督而言,电视直播所能起到的作用更为有限。因为电视至多可以告诉观众法庭上发生了什么,而难以挖掘影响司法决策的各种背后的因素。例如,当一个案件实际上是由电视观众看不到的某些人(例如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们)作出最终决定的话,直播庭审过程对于监督司法权行使又有多少意义呢?至于抑制司法腐败,直播庭审过程更是无济于事。我们很难设想,一个法官会在电视镜头前明目张胆地违反司法伦理准则。恰恰相反,他完全可以在表面上做到无可挑剔——摄像机能够‘直播’的毕竟只是表面现象”。

北京大学法律系陈端洪说:“我想提醒人们,庭审不是做秀,新闻媒体应当被拒于法庭之外。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为了司法公正。之所以说简单,是因为谁都期望司法公正;而且赞成实况报道的人正是把这种做法看成是实现司法公正的监督力量。惟其如此,问题也就复杂了,复杂在于人们对实现公正的方式和对司法活动的特殊本质认识不同。

“赞成者认为实况报道满足了民主社会评判公务活动的一个原则——公开,让社会公众了解了一种国家权力的运作,可以评议,有参与感。由于司法腐败现象严重,人们以为对庭审曝光可以

防止幕后交易。

“但是，实况报道损害了一个重要的司法原则——司法独立。司法是理性判断的过程，要想公正就必须有一个好的司法环境，这里所谓的‘好’，一个重要的准则是独立。现在大家都喜欢谈司法独立，但独立于什么呢？司法应独立于其他权力机构，独立于社会。把司法过程等同于议会民主辩论是一种看似合理其实曲解了司法本质的期望，其结果必然是使司法变成做秀，对法官心理造成坏的影响。我不是主张司法不要公开。但我们应当探讨以什么方式公开才能无损于司法的独立性。我在国外也多次旁听过案件的审理。旁听没有限制，但旁听纪律很严格。法院外经常可以看到记者围住当事人、律师提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在庭审时完全没有现场的录像，电视报道只有手绘的画像。另外，最重要的也许是案卷的公开，一个案于审得公正与否，是对还是错，感兴趣的可以去查阅，而且每个案于的案卷都可能成为法学院教学的材料”。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范愉说：“司法公正有赖于新闻监督，司法独立与新闻言论自由具有同等价值。新闻监督不能干预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意味着不受包括新闻、舆论在内的任何外在因素的干预。历史上因社会舆论压力或影响导致的错案屡见不鲜。新闻监督本身不能解决司法公正问题。在法制建立过程中，司法独立应优先于各种外在监督，以避免对司法机制自身的破坏，但在司法公正普遍受到怀疑时，对监督的作用和价值可能产生过高期望。现实中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的矛盾，以及新闻监督触及司法独立的可能性和实际结果，确实并存着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这种现状将持续一定时间，司法机关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加强抗干扰、维护司法独立的能力是最根本的，当前应加强这方面的宣传”。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院长王振清说：“直播庭审在目前中国法律意识还比较薄弱的情形下，能起到一定的普法作用。新闻监督司法还应考虑另一方面的问题。我们从长期的封建社会走过来，社会需

第四种权力

要一种终极权威。长期以来,这个权威是某个领袖、某个伟人,他们的话被奉为信条。在摆脱封建意识的过程中,不能再找这样的权威了,但社会又不能没有权威,将来的权威就是法律。没有它,这个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但现在非常遗憾的是新闻监督不能不要,因为存在司法腐败,监督对腐败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尊重这种监督。但也要看到这种监督是如何执行的。最近一些报刊频频以重要位置刊登一些诸如“这个法官毫无人性”的文章,这样去宣传法制,如果宣传过了头,那就是对法律权威的严重挑战。任何社会都需要有权威,若这个权威被打掉了,那社会还剩下什么?所以新闻监督一定要掌握好一个度,需要规范一下,也要正视一下新闻腐败干扰司法的问题。

“司法腐败问题是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比如说公开审判,一个办公室有时有三个离婚案件同时审理,谁来关心法院软硬件环境的建设问题。美国一个法官有6个助理,可以集中精力审判,现在我们一个陪审员每年最高要完成300多件民事案件,不少同志累得轮流在医院住院。现在无端评价中国法官的人太多了。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老人来法院起诉,有人骗他钱,但拿不出证据,被法院驳回。结果这人挂着“冤”字大牌在法院前抗议了一个月。而新闻记者则以“天下没有讲理的地方”为主题大做文章。实际上,如果社会对法院不够理解,那干脆就借鉴国外的做法,将法院神秘化,也就好办了。在国外,法官一般是不与公众见面的。过去我记得有这么一个要求:未终审案件,新闻单位不要评价,面现在很多记者全然不顾。很多案件本来法院可以很好处理,但新闻舆论左一阵风、右一阵风,必然会对司法公正产生影响。法官也是人,他有心理压力。

“法院必须有一套监督机制以解决它出现的问题。这套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能起到重要作用的,特别是对个案性操作。现在我们搞公开审判,避免暗箱操作,有积极意义。如果仅仅依赖公开

审判解决司法中存在的所有问题,既不公平,也不可能”。

河北省高级法院的景汉朝说:“新闻监督应当加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这首先是公开化的要求,中国要走向一个法治国家,必经途径是公开化,尤其是司法活动的公开化,其次是大众的知情权的要求,如果新闻不介入就难以保证。三是新闻自由的要求,新闻自由是一个宪法原则,任何一个国家追求民主就要倡导新闻自由。

“新闻监督如何来规范?在加强新闻监督的同时要处理好新闻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两者都是宪法原则,但可能存在冲突,这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在我国,新闻自由不得侵害独立审判的权力,一个国家得有一个社会权威,任何一个冲突得有最终的裁判者,在法治国家这项权力给予了司法机关。如果法官、法院的地位树立不起来,就会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司法机关要保持公正,必须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扰。

“以上是就宏观而言。再从微观上看,具体怎么报道?报道要客观、全面,不能偏于一方的材料和观点;新闻报道对诉讼过程的案件不得评论,尤其不得对是与非进行评论。为什么呢?(1)司法程序非常复杂,法律上所讲的事实与完全的客观事实是两码事,不是法律专家,很难从法律角度对案件作出是与非的评论。(2)新闻部门没有必要的调查手段,从而无法掌握全部事实及判断其真伪程度。(3)新闻部门在诉讼过程中没有权力判定案件的是与非,因为诉讼程序启动以后,判定是与非的权力只属于司法机关,国家已将各种权力分割了。(4)我国新闻部门所发表的意见,老百姓往往认为这是党的意见,国家的意见。(5)从新闻评论的最终效果来考虑,现在的状况:一是新闻评论的事实与结果大相径庭,二是新闻评论误导了社会舆论,给法院的判决造成巨大的压力,可能出现错判。第三,新闻要作深度报道,不仅报道现象,也得报道原因。

“但现场直播庭审对法官和司法活动的神秘性确有破坏作用。

第四种权力

法官作为特殊人物,司法活动作为特殊活动,职业本身要求法官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公众不能对法官了解过于详细。许多国家就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法官和社会的接触,许多社会活动不允许法官参加”。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江必新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尤其在司法腐败比较严重时,引进新闻监督的‘阳光’是件好事。舆论监督在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传媒作为‘第四种权力’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强化,但这种权力有无可能被误用,有无消极作用?”舆论监督纳入法治轨道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非法干预新闻自由的行为或对传媒施加压力的行为越来越多,新闻自由迫切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与其他任何权力一样,舆论监督权同样有被滥用或腐化的可能,事实上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因此我们既要保护新闻自由,又要防止对权力的滥用,一个理想的舆论监督法制必须在保护和防范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

“对新闻自由的保护,不仅在于一般地确认自由,更重要的是合理地确定自由的边界,即根据传媒的内在规律和新闻理性,确定哪些属于自由的禁区;不仅在于允许传媒可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捆住不法干预之手;不仅在于明令禁止干涉或妨碍新闻自由,更重要的是对于干涉妨碍者追究法律责任。

“新闻监督滥用的防范,不仅需要传媒高度的自律,而且需要有效的他律。传媒应当追求新闻的正当价值,而且应当注意各种价值之间的平衡,防止可能出现的价值偏向。传媒不仅要注意正确的舆论导向,而且还应当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编辑记者态度要客观,尤其是应当公平地对待当事人各方。法律应当为传媒设定合理的禁止性规范和明确的法律责任。只有高度的自律和有效的他律,新闻监督才会有生命力,才能真正发挥有效的影响”。

北京中凯律师事务所的李江说:“为什么要讲司法公正?因为

存在着司法腐败,但分析这种腐败,不能脱离中国国情。新闻监督也要放在当前中国经济市场化、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新闻的作用。其实新闻本身没有任何监督功能,新闻只是中介、是大众传媒工具。新闻监督并不是来自于新闻本身,而是来自新闻背后所要表达的民愿。这是政治社会化的公开性要求,也是这一进程中公民知情权、议论自由权的客观需要。

“在现阶段谈论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时,讨论是否有新闻腐败还为时过早。因为在中国走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中,新闻监督到底监督什么?是不是就是开庭以后的现场直播,恐怕不是。我想新闻对司法监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它的活动,二是对它的人员(主体)。将司法审判活动的客观表现形式,以及在实现司法活动过程中作为主体的法官个人或组织一些不正当的因素及行为,通过新闻的方式披露于社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一方面促使司法机关自律,另一方面也能促使相应的监督机关把握好对司法机关的制约,这样新闻监督的功能便发挥出来了。目前,对法官本人及司法活动本身,新闻能否披露以及披露的程度和方式,不应该限制,应该最大限度地披露。新闻的功能就是将司法机关在行使其职权活动中正当的和不正当的行为都加以披露,促进执法的公正和社会的进步。如果说这样有可能影响法官的执法能力和判断能力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怀疑是否法官抗干扰能力太弱了。如果法官只对法律负责,任何的干扰对他来讲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新闻舆论的压力会影响司法公正的说法,在现阶段至少是不现实的,从理论上也站不住脚。关键的问题是,新闻监督不一定就带来司法的公正和行政的廉明。目前亟须深化的是,在保证新闻自由的前提下,要进一步解决对舆论监督所反映的问题深层次追究和处理。在问题披露了以后,要利用国家现行的法律监督机制把这个问题继续追究下去,有一个良好的结果,那么,这才是我们国家舆论监督发挥作用的时候”。

北京君泽律师事务所的徐炳说：“80年代司法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党政干预。90年代以来，司法腐败则成为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要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因为司法是社会的免疫系统，司法的腐败就是将这一免疫系统完全破坏了，那社会就没治了。所以有人讲“司法是社会良知的看守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指出：司法腐败是各种腐败中最严重的。计划经济时代，两家企业发生纠纷是由上级行政机关仲裁解决，现在则是法官说了算，法官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作用超过了市委、省委书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官的责任会越来越大，从另一方面说，腐败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这将破坏政府、社会和人民的形象。从当前中国国情看，新闻应当并可以对司法公正起到监督作用，即便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在现阶段特殊情况下，它给老百姓提供了表达意见的途径，也是暂时可行的”。

北京中信律师事务所的周虎说：“新闻监督是一般性的监督，不是作为一个监督机构，不是一种职责和工作”。从监督关系看，谁是监督者，谁是被监督者，必须分清楚。新闻舆论界对司法界的监督，举个例子可以说明。美国的一个州有很多鹿，几年前人们将狼消灭了，于是鹿奔跑无力开始变肥，脂肪增厚，抵抗病菌的能力也降低了，大批的鹿开始死亡，这时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放进去几只狼，去追赶鹿。舆论界、新闻界就是狼，司法界就是鹿。如果说要和狼商量，换个追的方式或者追到哪里就别追了，这协议很难达成。对于新闻界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以前，我国记者或新闻界的定位不清楚；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在《焦点访谈》节目组中讲了几句话。第一是舆论监督，不是舆论导向；第二是群众喉舌（区别于以前所说的另一种喉舌论）；第三是政府镜鉴；第四是改革尖兵，以前新闻工作比较被动，现在则比较主动。这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新闻舆论界独立的地位和身份。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新闻和舆论的定位，应该会比较清楚了。”

北京《中国律师》杂志社刘桂明说：“在现代法制发达国家，新闻监督已成为一种谁也无法漠视、谁也不敢小看的监督力量。于是，在某些国家有‘第四种权力’（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之说。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新闻监督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发挥的能量也非常微弱。说起电视直播庭审过程的议论纷纷，我以为这是正常而可喜的现象，说明国人都在用一种冷静、智慧的眼光重新审视诸如公开审判、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及司法体制改革等重大社会问题。所谓司法公开，主要就是体现在公开审判制度。而公开审判，就是指法庭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必须公开进行。而所谓公开，一是允许公民自由旁听，二是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然而，就是这个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公开审判，到了某些地方要么是秘而不宣，无可奉告；要么就是对公众与记者的某种‘恩赐’。我想，一个真正按法律程序公开审理案件的法庭，是不会拒绝记者采访和报道的。推而论之，如果没有真正新闻监督的介入，很难甚至不可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保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受到的干扰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干扰。新闻监督的介入，有利于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法官，也有利于这些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抵制方方面面的干扰，并加强司法裁决过程的独立性。同时，也可使社会各界了解，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为了司法公正所付出的努力和探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新闻监督可以帮助法官排除干扰，解除负担，真正成为司法独立的促进者。作为正义与公正的化身，法官的公众形象实际上就是法治的形象。新闻监督可以有效地约束产生在法官队伍中的司法腐败。诚然，保障司法廉洁、消除司法腐败，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还需要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和健全法官的管理制度。而新闻监督作为一种无形的权力，可以对司法腐败起到遏止和透明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机关报《中国经济时报》总编室主任张剑

荆说：“简单地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新闻监督之后怎么办。如果新闻报道没有得到当地政府和领导的重视，问题仍然解决不了。《焦点访谈》为什么较好地发挥了新闻监督的作用和效果呢？就因为中央领导的重视。所以讲中国目前的新闻监督太多了，那是无稽之谈，是对我国的监督现状不了解。第二个问题是新闻是不是一种权力，我想应该说是。但这种权力与其他三种权力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强制性。明确了这一点后，对新闻监督就无须害怕。而在当前，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范围是不够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徐迅说：“就中国媒介的现状而言，公众司法界以及新闻界自身对媒介力量的承受能力都很脆弱。确实存在媒介的定位问题，即媒介究竟是做什么的。现在很多媒介人都有这样的误区，把‘喉舌’、‘工具’、‘导向’这些作用看得非常重要。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功能应发生很大的变化。媒介首要的功能应该是传播，其次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公民议论的权利，这些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这种功能的转换可能还没有被很多媒介操作者所充分认识。媒介自身是否有一种影响力，来发表意见影响社会，应该是有。但这种力量应该很慎重地使用，特别是针对司法的时候。我相信媒介对司法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如果谈到可操作性的话，我想应该是各个方面，特别是媒介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么多年所取得的成果，而不是轻易地毁坏它，或使之退步，这样，这种作用才是比较积极的”。

4. 寻找真实

在一个没有新闻法规、法制体系不健全的国家，人们往往无法可依，举步维艰；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新闻的舆论监督职能面对的是一个非秩序社会时，往往又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似乎正应了一句古话：“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事实上，在我国，甚至连“新闻”的基本定义也被长期地篡改了。在一般公众眼里，新闻与宣传是同义语，因为中国的新闻媒介

受党的各级宣传部门直接领导,其主要职能是——上传下达,而且大部分新闻工作者居然也这样理解。这与美国政治学者、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对“宣传”的定义何其相似乃尔!哈氏说:“宣传,从最广泛的涵义来说,就是操纵表述来影响人们行为的技巧。”长期以来,我国的新闻体制和宣传体制不分,一直是“单一党报体系,高度集权调控,突出宣传功能,经费和发行国家包干”。而新闻和宣传在本质上又有着许多不同:(1)宣传重符号,新闻重信息;(2)宣传要反复,新闻要新意;(3)宣传重观点,新闻重事实;(4)宣传重时宜,新闻重时效;(5)宣传重操控,新闻重沟通;(6)宣传有重点,新闻讲平衡;(7)宣传要花钱,新闻能挣钱。基于此,在西方公众与新闻媒体中,当一个传播者被称为宣传家时,也就是他开始失去公众信任之时。因为,宣传常常与党派和团体私利、偏见等含义相联系。

现代观点认为:客观性是新闻媒体的根本标志。

是的,在一些别的大国,新闻界一贯以客观性来要求新闻媒体:一是将事实与观点分开;二是新闻报道不带感情色彩;三是公正平衡,使双方均有机会向受众提供充分信息的方式进行答复。

那么,在我国,新闻媒体与新闻工作者做到了这起码的一点了吗?!

且看中国新闻界近年来之怪现状:

——批评报道招致开除公职

《经济日报》报道:河南省泌阳县广播电台青年记者魏家强,因采写一篇批评稿而被宣传部开除回家。其后,传媒的公开报道反而使其面临更大压力。

1998年4月7日,泌阳县一个体司机酒后驾车肇事逃逸,魏家强通过调查现场群众,采写了“泌阳出了个‘张金柱’”一文发表。县委副书记李海洲、宣传部长韩万林认为批评稿败坏了泌阳形象,责令广电局严肃处理。广电局局长王志川即以魏家强“违反了宣传

纪律,给单位带来了不良影响”为由,将魏开除,并下发了红头文件。这个消息使泌阳人民震怒了!新闻界同行震惊了!他们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泌阳县广播电台十多名同志前往魏家强家看望。《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老区报》等媒体先后发播文章,批评了泌阳县委的错误做法,给正义者以有力的支持。泌阳群众还自发地把《经济日报》、《中国老区报》等刊发的文章复印数百份广为散发。

6月11日,泌阳县所在上级驻马店地区的机关报《驻马店日报》全文发表了泌阳县“4·7”交通事故受害人强国莲、刘大磊因作者伸张正义、反遭冷遇而鸣不平的“读者来信”及记者调查附记,并表示对此事进行跟踪报道。

然而文章发表后,泌阳县委一些人不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对写稿作者百般刁难,打击报复。6月12日,有关负责人查问是谁给《经济日报》写的稿件,并强迫一些人写伪证,说李海洲没说“谁写批评稿,谁就是泌阳县的败类”这句话。同时,先后派人多次找魏家强询问是不是魏写的稿,并扬言“有你好看的”。魏家强在受到多次威吓,感到前途渺茫的情况下离家出走——据说是到沿海开放城市打工度日。其间有评论感慨:中国基层记者的处境竟如此!中国民间舆论监督的处境竟如此!

但是,一个泌阳县委宣传部的打击报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新闻记者到底有没有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中国社会尊重不尊重舆论监督。“学会保护自己”,这就是我们的新闻记者在一个新闻还逐步法治化的国家发出的呼声……

——笔与“老虎”的较量

1997年11月,《福州晚报》记者顾伟住宅遭枪击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全国数十家媒体相继作了报道。作为“中国记者之家”——中国记协的机关报《中华新闻报》,在作了连续两期的相关报道后,特约当事人顾伟赶写了一篇自叙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不

仅可以了解到该事件第一手的内幕细节,更能感受那砰然于纸上的一个中国记者吓不倒的正义之声:

“我作为一名记者,无法选择退缩”。1997年11月29日晚,福州晚报社宿舍内两声枪响震惊了新闻界,全国众多媒体展开了一场如何保护记者合法权益的讨论。我也因采访报道“老虎机”问题,一夜成了全国知名的“打虎”记者。

说起“打虎”,许多人自然联想到《水浒》中的武松。面对武松,我自叹不如,因为我天生是个胆小的人。小时候被同学欺负了,手臂上划出了血,我回家对父母说是不小心被树枝刮的,我怕如实叙述会将事件扩大;在上海读中专时,我最怕的是体育课,三年的学习生涯我的体育成绩一直不理想。由于我的性格和体格,至今我从没和一位同学、同事、朋友吵过架,闹过别扭。

11月29日晚,面对屋子里的玻璃碎片,面对墙上密密麻麻的黑点,平时自认为比我坚强的妻子哭了。她对我说:“社会上许多人羡慕记者这职业,谁会想到记者在和平年代会遇上‘黑枪’?经营‘老虎机’的人有黑势力撑腰,我们惹不起但可以躲得起。”看着妻子红肿的眼睛和她怀里才9个月的女儿,我的心一度软过,但想到我在采访福州游戏机市场时,了解到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财务人员将十几万元公款填进“老虎机”的嘴巴,想到两名14岁的中学生为还70元的赌债,竟持刀抢劫……我的心渐渐又硬了起来。我想假如今晚面对歹徒的“黑枪”投降,这些开“老虎机”的人日后会更猖狂,会有更多的家庭失去安宁。在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中,我作为一名记者,无法选择退缩。

“所有记者都亮出了真名”。我安慰妻子和女儿入睡后,打电话给福建日报社主办的《海峡都市报》社会部主任盖子,在采访“老虎机”问题上我们是同盟军。盖子问我:“你怕了吗?”我说:“不怕。”他说:“面对‘老虎’,我和你站在一起堵枪眼。”我打电话给盖子是11月30日凌晨2点多,放下电话整夜难眠,在一股激情下我写了

一篇题为“歹徒开枪了”的评论，在11月30日《海峡都市报》头版头条发表。

11月30日下午，我在福州的报亭上读到盖子写的评论：“歹徒之所以狗急跳墙，主要是我们妨碍了他们牟取暴利坑害市民的行为，让他们赚不到昧心钱，这证明了我们的舆论监督切中了要害。然而我们毕竟也是人，也有妻儿老小，因此我们拿起笔与邪恶作斗争的时候，我们渴望背后有正义的大山……”读到这儿我的眼眶湿润了，多好的战友，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曾和我一起“夜探虎穴”的《海峡都市报》记者杨燕，开始写的都未署名。但在11月29日黑枪事件之后，为了声援我大胆地署上自己的姓名，继续“打虎”。12月1日，福建电视台新闻中心派出诸文胜和史建仓追踪枪案，采访进行到18时20分，19时40分的“福建新闻联播”还是准时地播出了这条新闻，并配发了编后语。有领导对诸文胜和史建仓说，考虑到记者安全可以不署名，但他们坦言，不怕报复。虽然各新闻媒体反复曝光，可还是有不少游戏厅经营者为暴利所驱动，阳奉阴违，致使用于赌博的游戏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共营业场所，且“老虎”有愈演愈烈之势。

写好的稿件胎死腹中。此前，经过诸示领导之后，我于10月14日下午来到双福楼，发现确实有十几台赌博机在营业，且顾客不少，“生意”十分兴隆。当下，我盯住4号“钻石列车”，发现仅40分钟，操作者已输掉1400多元。

为了慎重起见，第二天早上，我带着秒表独自去了趟双福楼，并拿出100元在机器上试了一把，结果21秒，100元就被“吃”掉了。我找到场地经理，他把我邀请到了小办公室，把我输的钱还给我，另外塞了一包钱过来，要我手下留情，不写报道，被我拒绝了。

10月15日上午10点30分，我刚刚回到办公室，就有说情电话打进来，既有找本人的，也有找领导的，结果都被顶住了，我写下了第一篇“虎穴”见闻“20秒吞进百元，这种‘游戏机’的胃口真

人”。

当晚，双福楼一经理又找到我，说：“我知道你的朋友在我这儿玩输了很多钱，他输多少，我如数奉还！”我说：“我朋友中没有一个人去玩老虎机的，这次采访全属记者行动。”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组报道“胎死腹中”。

“这番‘好意’被我拒绝了”。11月17日《海峡都市报》社会部杨燕等记者向“老虎”发起了冲击。写了一些暗访游戏机厅的文章，这个报道使我坚定了打“老虎”的信心。再次取得了有关领导的支持后，我找到了《海峡都市报》的“同盟军”。

11月18日晚，我和杨燕等记者深入福州闹市区内颇具规模的7家游戏机娱乐场所明查暗访，我们发现在一些有头有脸颇有身份与背景的业主开设的电子游戏机娱乐场所内有赌博现象而且赌资巨大。11月20日，我在《福州晚报》以“夜探‘虎穴’”、“老虎机害人不浅”、“赌机必须禁绝”为题，一口气发了三篇文章。而《海峡都市报》也同时以《榕城赌机卷土重来》为专题，在该报一、二版用大篇幅对此事进行了全面报道，共有7家游戏厅被点名曝光。

两家报纸的追踪报道引起了福州市有关部门的关注。20日，福州市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市公安局联合召集经营游戏机的业主开会，重申了文化部、公安部和国家工商局的有关规定，同时还宣读了报上的文章，要求业主主动撤除所有禁用机种。当天下午，文化和公安两个部门还对一些游戏机经营场所进行突击检查，没收了部分违禁游戏机及电脑版，并停用了部分未经鉴定的机种。对此，两家报纸均给予充分报道。

21日，我再次对福州游戏机经营场所进行了暗访，发现原先几家有经营“老虎机”的游戏厅或暂停营业，或改经营一般游戏机。看来，一番穷追终于有了一定的收获，但我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在及时报道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也提出了问号：来势凶猛的“赌”机热，会一下子就在榕城消失吗？这些“赌”机是否真的投降

了？会不会再卷土重来？

21日中午我在追踪采访时有人以提供情况为由，留我吃饭，反复“教导”我应该学会“得饶人处且饶人”，趁早把那些“朋友输的钱”好好拿回去。看我毫不动心，又说：“听说你夫人还在国营单位工作，国营单位现在效益都不好，不如到我这里来，什么工种由你挑，反正月薪都少不了1000元。”当然，与前几次一样，这番“好意”也被我拒绝了。

当天下午1点左右，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传呼，告诉我古田路有一家新开的游戏厅仍在经营赌博机。2时40分，我按照举报来到这家开业不久的游戏厅，发现果然有十几台赌博机开着，一旁有人在上分压分。我被这些游戏厅见利忘义的行为所激怒，回到报社，立即动手写了“全市整顿第一天，这家游戏厅胆子真大”一文。20分钟不到，我就接到了对方要求“手下留情”的电话，与此同时，有人跑到部门主任处求情，说只要不在报上披露此事，愿意拿出一笔可观的钱来给部门作福利。这一要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

当天晚上5点，又有人出面找我，以揭露“老虎机”内幕为由，请记者过去谈谈。那人软磨硬泡拖了3个多小时，反复要求我撤稿，一直到晚上12时后，还往我家里打电话，说是愿交个朋友，无条件地帮我配备手机等。

“这‘老虎’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11月24日、25日，不断有读者打电话揭发，两家号称已撤赌博机的游戏厅实际上仍在经营，只不过换在密室进行。我和杨燕等人再次联手出击，我们在经营场所外转了两天，虽然地方不熟悉，没有找到密室，但行动无疑起到了遏制作用，使那些妄想再次登台的“老虎”们感到了压力。

27日，在市里有关领导的直接指挥下，福州有关部门再次突击检查，当场抓住了十几台赌博机和多盘电脑组版，狠狠打击了非法经营。同一天，《海峡都市报》再次开辟了题为《“赌博机”真没了么？》的专栏和电话热线，要求广大市民提供线索，积极行动，以协

助有关部门彻底消除赌博机这一老大难题。

从11月25日起,我已陆续听到传言,说有人“想给我点颜色看”,自己只是不在意而已,直到29日晚,而对满墙的砂枪眼,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朋友们的提醒绝非空穴来风,“老虎机”后面果真有“老虎”,在经过多次较量,屡屡碰壁后,这“老虎”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

“百姓的支持与信任,令我感慨不已”。案发之后,福建省市两级领导高度重视。福建省委书记、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迅速破案,缉拿凶手。《福州晚报》12月2日头版登出评论“正义吓不倒!”,中宣部、中国记协纷纷致电致函对我表示慰问、声援。中保福建人寿保险公司福州分公司为我全家送来10万元保险。

12月3日,一名职工来信写道:“你敢于与社会不良风气作斗争,不受那些人重金收买,令人尊敬。如果我们社会像您这样的人多一些,社会风气一定会好转。希望您能坚持下去,并向您爱人问候。我们支持、感谢您!”

12月4日,另有职工来信对揭露社会丑恶现象、不怕打击报复的记者表示敬佩。他说愿意免费为记者站岗,每天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守护在记者家门口直到抓获凶手为止。

一位姓施的先生打电话到新闻单位,表示愿出资3000元奖励提供破案线索的人。之后,又有一位姓陈的先生表示愿意追加1000元。他说,虽然家境并不宽裕,但愿意为伸张正义出一份力。

12月7日我参加福建省首届“珍珍”杯学生歌手演出活动采访时被人认出,许多人纷纷前来握手表示慰问。一位中年妇女告诉我说:我们老百姓都会支持你,你要保重身体。百姓的支持和信任,令我感慨不已。

“还将运用手中之笔继续把‘老虎’打下去”。11.29事件发生后,福州市加大清理整顿游戏机市场力度。文化、公安、工商铺天

盖地全面行动，拉网式对全市游戏机市场进行大清理。18家经营违禁机种的电子游戏厅被吊销了文化经营许可证，其中包括被新闻媒体曝光的7家。12月13日价值近300万元的773块电脑板、390台违禁游戏机在福州郊区红庙岭垃圾场碾成粉碎。“打虎”取得阶段性胜利。

之后，福州文化市场上违规的赌博机已不见踪影，但是由于新闻曝光在前，有关部门处理在后，一些“老虎机”经营者已闻风而逃，这场“打虎”运动受到打击的只是一些机器，那些“老虎机”后面的“老虎”尚未落入法网，今后“打虎”的任务还很重。作为一名记者，我还将运用手中之笔继续把“老虎”打下去。

谁来筑起正义的大山。顾伟的采访战友，《海峡都市报》记者盖子在黑枪案件发生后，连夜写了一篇评论：“在我们拿起笔与邪恶作斗争的时候，我们渴望背后有正义的大山。”诚然，人民呼唤舆论监督，时代呼唤舆论监督，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进行，越来越多的记者，拿起正义之笔。记者要抨击时弊，抑恶扬善，必然会遇到种种阻力，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1997年以来，接连发生几起记者合法的采访权益受侵害的事件：中央电视台记者在某省受到粗暴对待，福建的顾伟遭黑枪威胁，河南披露某工地违章施工轧死儿童的记者受到一些部门的责难……舆论监督，已经到了呼唤正义的大山的紧要关头。

当前，全国上下正形成日益强大的支持舆论监督的合力。山西309国道乱罚款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曝光后，山西省主要领导要求省电视台连播三天。顾伟事件发生后，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批示：要加紧查处赌机事件，坚决支持舆论监督。福建省委、福州市委也作了批示，并采取了相应的有力措施。而在当年，《宝鸡日报》两位记者与歹徒搏斗，周围的群众只是围观；记者显得多么弱小和可怜。现在，顾伟遭黑枪案件发生后，有人要出3000元奖励提供破案线索，有人自愿在顾伟家门口站岗……

中国记协是中国新闻工作者自己的组织,历来视维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己任。1997年12月4日,中国记协的机关报《中华新闻报》公开支持顾伟,愿为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正当工作权利而作出不懈努力。该报还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新闻工作者正当权益受侵害的事件,必要时还将派记者专程采访报道;同时也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和各界人士及时提供这方面的信息,通过中国记协和社会各界予以协调,促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尽快促进新闻法治化。

5. 新闻官司

正因为中国新闻还没有进入法治时代,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往往缺乏明确清晰而有价值立场的认识,缺乏肩负社会责任而有建设性的行动,而远远不能达到社会文明和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譬如,连续几年召开的国际反腐败会议指出,贪污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其腐败额度一般为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到15%。据此,有些经济学家估计,近年来,我国腐败额度为每年7000亿人民币左右。面对如此巨大的经济“黑洞”,我们的新闻媒介“监督”出了多少钱?震惊全国的大案王宝森、陈希同案,公开曝光已三年多,可为什么连一篇稍微像样的揭露文章也没有?假如中国多一些获普利策奖的坚持正义的新闻记者,试问,国家和民族的“蛀虫”与“人蛆”还能那样多,还敢那样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吗?我们的新闻记者们都到哪里去了?是搞红色新闻、版面赞助、礼品报道、假新闻去了,还是惹上官司、当被告、出庭作证去了?

用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反腐败是我国当前成本最低最有效的反腐败方式。

换一句话说,新闻记者正是充当着“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一角色,必须敏锐、及时、准确地对时代、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时刻保持一种审视和瞭望的姿态。诚然,我国的新闻、法律等方面都存在着体制上的不健全,身为记者,置身于方方面面的利益摩擦之中,

有时难免惹上官司遇上麻烦。但是,作为中国新闻人,依据法律、道德和凭借真实、真理、公平、公正的良知,直面官司,两军相逢勇者胜,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于赢——赢得理直气壮,敢于输——输得明明白白,这,难道不正是中国新闻记者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吗?

虽然,新闻官司了不得,但不做“鬼”事,自然不怕打官司,更何惧恶人先告状;再说,与不敢公开的腐败分子进行战斗,其乐无穷!

——打赢官司的一步

作为新闻报道,文章的真实性和在民事诽谤或被控侵权案件中是新闻机构及新闻记者胜诉最可靠的理由。这是因为:民事诽谤的构成要件中言词虚假是首要条件,如果言词真实则这个首要条件就不成立。这与新闻工作的要求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新闻记者无论是为了满足新闻本身的要求,还是为了在民事诽谤案件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应该做到报道真实、公正。

下面这起发生在80年代的通过广播电台进行的民事诽谤案件,正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何某诉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金某和陈某案

原告:何某,杭州市某医院医生。

被告: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金某、陈某,浙江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1988年4月中旬,被告金某、陈某得知群众提供的杭州市某医院有个医生索要财物这一信息后,当即对此事进行了采访。经调查核实,得知原告人何某乘人之危,向病人家属李某索要财物,并以此事实为基础写就了广播稿。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10日起以此事实为中心内容作了多次连续报道。

原告何某认为:被告无视客观事实,制造虚假新闻,严重损害了他的人格和名誉,应承担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之民事责任,遂向浙江省杭州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

讼。被告辩称：报道事实清楚，不存在制造假新闻和损害原告名誉问题，为此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被告报道所依据的事实是清楚的。该报道批评了医务界存在的不正之风，属于正当舆论监督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1条及有关民事政策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某要求被告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金某、陈某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之诉讼请求。

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要指出的一点是，真实在隐私权案件中则不是答辩理由，更非胜诉条件，因为在这种案件中，越是真实，越是侵权。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

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

——侵害谁的权力

在新闻实践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标题的精彩或醒目，为了版面的节约或美观，有时报道文章所作的标题不能或者不完全能反映正文的内容，结果出现正文所描述的事实是真实的，而标题单独看来却是虚假的现象。那么，这种情况下，虚假且假定具有诽谤性的标题本身，是否侵害了所指对象的名誉权？粗略而言，标题和正文是一个整体，不能将其分割，如果标题不真实，但正文真实，读者读完标题和正文后，是不会以标题所表达的事实为事实的，因此，单是标题虚假不会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再仔细推敲，我们会发现，现在是知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又在不断地加快，根少有人在读书看报时能将所有文章的所有内容都仔细地读完，往往只是浏览一下题目而已。那

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标题和正文是一个整体,但实际对读者起作用、给读者留下印象的只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标题。如果某篇文章的标题具有侵害名誉权的所有构成要件,也能构成侵害名誉权。这种观点对新闻媒体所提的要求显然是非常之高了,但却并不过分,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新闻工作者业务素质的提高。

当然,这里是指有正文的标题,而非“标题新闻”。如果是“标题新闻”,其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言词,如果具备了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那么,也会构成侵权。

作为新闻工作者,其报道文章判断言词意思的标准,应该是读者对言词所能理解的意思,而非作者自己所理解的意思。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重合的,读者所理解的意思正是作者所欲表达的意思。但下面这则案例,文章关键词表达的意思出现了模糊性,从而引发了一场官司:

陈某诉大连日报社、傅某和李某案

原告:陈某,辽宁省瓦房店市某办主任。

被告:大连日报社。

被告:傅某,李某,瓦房店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民警。

1990年7月13日,《大连日报》在第2版“星海录像”专栏中刊登了一篇题为“赌徒竟是这些人”的文章。该文只有300字,说:“不久前的一天下午,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汽车配件商店办公室内乌烟瘴气。几个人围着一张办公桌吆五喝六,不停地摔打着扑克牌,又不时地掏钱。他们‘工作’之认真,竟没有发现公安人员的到来,甚至看到了公安人员也置之不理。过了一会儿,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前来,侵条斯理地对公安人员讲:我叫陈某,是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某办主任。而后,他又向公安人员一一介绍牌桌上的人:厂长、司机……公安人员严肃地指出,这是赌博行为,是违法的。可他们竟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小打小闹’。公安人员传他们到

派出所接受处罚,他们却以自己是‘劳动模范’、‘企业家’来压公安人员让步,但最终4名参赌者还是依法受到了处罚:分别被罚款200元。”文章署名:傅某,李某。

陈某认为:报纸不点赌徒的名而把他公然亮相是错误的,报道失实,要求公开更正,挽回影响,大连日报社经调查,认为事实清楚,没有失误,拒绝了陈某的要求。

陈某于1990年8月6日向大连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在诉状中陈某称:“1990年6月12日下午4点左右,我到工业办下属的汽车商店找人办事,进屋后见有4人在玩扑克赢西瓜吃。在我进去的同时,两民警赶到抓赌。此事本与我无关,可是《大连日报》登出了不实报道,指名道姓地把我比做赌徒,以及以劳模、企业家等称号压制公安人员等诬蔑之辞,致使大连市优秀企业家评委作出了取消我的优秀企业家评选资格的决定,使我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要求《大连日报》登报挽回因报道对他名誉的影响,向他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被告大连日报社辩称:该报道事实清楚,并严格按照程序发稿,没有失误,没有侵害陈某的名誉权。

两位作者也辩称:民警进屋抓赌时陈某明明在一旁观看,并介绍了他的身份,要求内部处理,所写报道是揭露领导者袒护赌博者的歪风,并未说陈某是赌徒,没有侵害陈的名誉权。

1990年11月2日,大连市某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原告陈某并未参与此次赌博,亦无证据证实其在一旁观赌,文中说原告以各种身份和荣誉称号来压公安人员,亦无充分证据,而李某、傅某文章的标题使用了“赌徒”这个贬义词,在文章内容中,非但没有披露参赌者的姓名及职务,反而将未参赌又无据证实在旁观赌的原告的姓名、职务及所获荣誉称号点出与题呼应,无疑使读者得出原告是“赌徒”之结论,其主观上是有过错的。且因此

处的失实而贬低了原告的人格,造成了不良后果,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其行为是违法的,应承担民事责任。大连日报社对稿件应负责审查核实,但仅以电话询问后即将题文不符的稿件发表,致使侵害原告名誉的不良影响扩散,也应承担民事责任。判决要求发表更正文章,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被告大连日报社和傅某、李某对此判决表示不服,向大连市某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当日确实在赌场,确有观赌的行为,也确有找李某谈话的事实。陈某之所以没有资格参加优秀企业家评选,是因为他的单位有两项经济指标没有达到标准,而且,他的资格被评委拿掉是在报纸发表稿件之前。

法院认为:上诉人李某、傅某和大连日报社撰写发表的文章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抓赌的事实经过,报道中不存在捏造事实、侮辱诽谤、恶意诋毁等贬低被上诉人人格的情况,因而无据认定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名誉权。被上诉人答辩所持之理由不能成立。因为文章没有说被上诉人参赌,也没有称他为“赌徒”,被上诉人诉称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把我比作赌徒”,缺乏事实证据。根据举报,从举报前到公安人员到场这段时间,被上诉人一直在场观赌,公安人员抓获赌徒的事实证明了举报的事实是真实的,被上诉人本人也承认在公安人员到场后观察的几分钟内他也在场,因而被上诉人否认观赌的理由不能成立。两位执法民警在抓获赌徒时,被上诉人当场为参赌者说情等事实均存在,被上诉人否认此点缺乏证据。上诉人大连日报社对上述稿件系经过核实无误后予以刊登的,被上诉人诉称大连日报社报道失实,没有事实根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不当,应予更正。判决撤销一审法院的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陈某的诉讼请求,一、二审受理费200元由陈某负担。最后,大连日报社、傅某和李某胜诉。

——材料失实谁负责?

在新闻报道中,有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有关会议向记者提供的新闻发布材料是否还需要记者进行核实?

这个问题关系到记者在主观上的态度:如果说“是”,那么记者没有核实就有过错;如果说“否”,那么记者没有核实材料主观上就没有过错。

当然,一般而言,大凡一个会议,都要求与会者熟悉会议所要谈论、探讨的问题,而且都要求提前做好准备,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会议内容的书面材料。记者接收到会议提供的书面材料,有理由相信是会议组织者和参加者经过调查核实的,不需要重复劳动,再去核实。这样对新闻媒体提出要求其实并不过分。如果还要其进行再次核实,一方面是浪费,另一方面也会丧失时效性。

但是,这里必须存在着一个前提,即会议授权其发表。如果会议仅仅向记者提供材料,且明确告知不要见报,而记者将其发表了,那么,记者在发表之前就应该对书面材料进行核实。

下面的一则案例,正是这方面情况的典型:

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诉《青年报》社和黄××案

原告: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

被告:上海《青年报》社。

被告:黄××,青年报社记者。

1989年1月1日、1月8日,上海青年报社主办的《生活周刊》连载了署名黄××、题为“盗公狂潮”的文章。

原告看到此文后,发现有错误,即向上海市某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各项损失5万元。

被告方则认为,有关情节系取材于有关会议所提供的正式书面材料,而不是记者个人采访所得,按惯例不需审核,发稿程序也无违法之处。对于因材料有误而导致的损害事实没有过错。而且在知道文章有误之后,当即刊登更正启事,向原告致歉,主观上已作了消除影响的努力,不同意承担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8年12月下旬,上海市有关部门召开了一次有关防盗工作的座谈会。该会议向新闻界提供了一份书面材料。该材料将发生在其他厂的小金库被盗案件误印成“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黄××文中所举小金库被盗一节,完整地引用了上述会议材料。1月2日,“二纺机”发现此文有误,于5日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向法院起诉。9日,《青年报》及黄××经核实得知文中所举小金库被盗案所举厂名有误,于1月29日在《生活周刊》上刊登更正启事,向“二纺机”致歉。在此期间,“二纺机”在一些新闻传媒上发表该厂法律顾问就此文发表的声明,用去广告费15900元。

法院采纳了被告方的答辩意见,判决驳回“二纺机”的诉讼请求。“二纺机”不服提起上诉,赔偿金额改为1.6万余元。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生活周刊》所发表的《盗公狂潮》一文虽对“二纺机”的名誉有一定影响,但这篇文章系为配合防盗工作而发表,主观上不具有侮辱、诽谤的故意。由于这篇文章所举小金库被盗一节,取材于有关会议上向新闻界提供的书面材料,文章作者和刊登者并不能预见厂名有误,所以也不存在过失。况且在知道厂名有误后,已作了更正,澄清了事实,因此,青年报社和黄××的行为对“二纺机”不构成侵害名誉权。“二纺机”在已向法院起诉、尚无明确结论的情况下,未与有关方面商谈,径自在传媒上发表声明,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应自负其责。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其实,该案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更正是否是侵害名誉权案件中的答辩理由?当然,这里指的仅仅是诉前更正和诉中更正。答案是肯定的。

无论诉前更正,还是诉中更正,在客观上都起到了消除影响的作用,在主观上则表现了言词发表者的积极态度,因此,如果损害不严重,那么更正后损害者名誉已经恢复如初,作为发表者前后连续的一个行为,不应再认定其为侵害名誉权行为。如果更正不能抵

补损害结果,即没有恢复他人对某人的恰当评价,那么作为一个整体,该行为仍然是侵权行为,但要减轻其所应承担的责任,而不论构成不构成侵权,还是减轻责任,都是被告在侵害名誉权案件中的答辩的理由。

——照片引发的是非

新闻照片本身也是新闻报道中的一种言词符号,其亦能给读者一种信息,表达一种意思,而且,与文字报道相比,更显得直观、形象,更容易吸引读者注意。所以,如果新闻照片所反映的画面是真实的,且非公开他人的隐私,那么就不会构成侵权;而如果它反映的画面是虚假的,且具有民事诽谤的其他构成条件;或虽不虚假,但具有侮辱性和民事侮辱的其他条件;或虽是真实的,但公开的是他人的隐私,且具备侵害隐私权的其他条件,也是可以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的。案件原由是:1988年9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青年报》分别在第五版和第一版刊登一幅新闻照片。该照片显示一群孩子胸前挂着“我们是无辜的,我们要读书”等字样的牌子。《人民日报(海外版)》同时刊登了图片说明:“各中小学开课已近半月,在武汉某小学门外,一群适龄儿童胸前挂着‘我要上学’的牌子要求入学。中小学生学习难已成为武汉市今年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一些学生家长因付不起学校的‘集资’、赞助费和高价学费而被学校拒之门外。某小学校长反映:‘新生报名入学八个班,只有三个教室,经费不足,学校有困难。’”《中国青年报》也配发了图片说明:“9月13日,中小学开课已近半个月,在武汉市某小学门外,我们看到一群适龄儿童,胸前挂着‘我要上学’的牌子,要求入学。据了解,中小学生学习难已成为武汉市今年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一些学生因家长付不起学校的‘集资’、赞助费和高价学费而被学校拒之门外。”

原告认为刊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青年报》上的新闻照片是被告有意拍出来的导演新闻。那些孩子不是无学可上,而

是有学不去上。本校未向学生家长索要“集资”费和高价学费。被告的行为侵害了我校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名誉权。原告向武汉市某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1)判处被告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上登报声明悔过,说明事实真相,为某小学恢复名誉,挽回不良影响;(2)责令被告向某小学及全体教工赔礼道歉,当面承认错误;(3)撤销被告因发表这幅照片在《中国青年报》举办的“剑南春锦标赛”中获得的“剑南杯奖”以消除影响;(4)判令被告赔偿某小学因此而遭受的名誉损失费 5000 元;(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刊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上的新闻照片完全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客观报道,根本不存在导演新闻的问题,是学校索要额外学费不成后将这些适龄儿童拒之门外,而引起部分学生家长不满所造成的,自己并没有侵害武汉某小学的名誉权,不承担民事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8 年 9 月 13 日上午 8 时许,长江轮船总公司武汉房地产公司部分职工带着自己胸前分别挂着写有“我们是无辜的,我们要读书”、“求求校长我要上学”等字样牌子的孩子,来到某小学门前。长江轮船总公司武汉房地产公司干事雷某将此情况告诉了被告。被告立即赶到现场,先后在学校门口和校长室门口给挂牌儿童拍照,书写了文字说明,并向有关新闻单位投稿。结果《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青年报》分别刊登了。法院还查明,之所以会出现挂牌请愿是有原因的。1979 年 6 月,长航总医院与武汉某小学(原告的前身)经协商达成协议,由长航向校方投资 33 万元,其中 30 万元在校内营建教学楼 1000 平方米,职工宿舍 2000 平方米,建成后产权归武汉市教育局所有,3 万元作为教学设备费。学校负责接收在花桥、儿童医院附近、长航总医院内等地的长航系统的符合入学条件的职工子弟入学。而学校单方违背协议将这些适龄儿童拒之门外,并索要额外学费(经费)而引起

部分家长不满所造成的。

一审法院认为：1988年9月13日被告所拍摄的两张照片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非周某所导演的新闻。原告的前身曾在1979年6月与长航有关部门签订协议，规定了双方应尽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长航系统负责向学校提供人民币33万元为其营建教室、教工宿舍、购置教学设备、学校负责接收长航在某小学附近的长航系统的子弟入学，并经过了双方上级单位的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后来虽然法人变更了，但原有的法人的权利和义务应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该协议无终止时间，而某小学单方面终止该协议，不接收长航系统在原告附近的子弟入学是一种违约行为，原告还向长航系统有关部门收经费也是欠妥的。两张照片的画面是真实的；两幅图片的说明词大致相同，第一段是客观情况的反映，第二段是对武汉市当时某些学校出现的乱收费现象的议论。综上所述，两张照片的画面是真实的，说明词也基本属实。该新闻照片是一种正当的舆论监督，没有侮辱诽谤原告的意思，故不构成侵害原告的名誉权。

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之规定精神，判决如下：驳回武汉市某小学之诉讼请求。

该小学不服此一审判决，向上级法院提起了上诉。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

二审法院裁定：准予上诉人撤回上诉，双方均按原审法院判决执行。……

新闻官司何其之多！

新闻报道采访、写作的技巧亦何其之多！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化，随着新闻出版改革的深入进行，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关于新闻官司的“事件”势必越来越趋于复杂化、尖锐化。面对法律、事实、正义、道德与良心，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权，有

第四种权力

力地伸张正义,维护社会公正,既是新闻工作者神圣的使命,也是对自身勇气、信心和能力的极大挑战。

第二章 新闻正义

1. 包国军假新闻案的背后

——《街道》追踪报道所谓“包国军制造的假新闻”。1998年4月，广东惠州、广州、深圳及北京、山东、成都、香港等地的报纸都刊登了青年记者血洒惠州之类的新闻，报道的是同样一件事：《惠州晚报》记者包国军，3月26日晚上9点多钟接到一读者电话投诉，称龙丰夜市有一伙外地人打着“广州怡和化妆品公司”的横幅，以摸奖的形式在推销假洗发水。包国军立即赶去，当场揭穿了那些人的骗局，结果遭到3名歹徒的疯狂报复，并毒打，左手掌被一歹徒用凶器刺穿。4月29日，惠州市公安局通报惠州各新闻单位，说记者血洒惠州之类文章是地地道道的假新闻。随后，《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全国许多报纸以及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这个消息。4月30日，惠州晚报总编辑王功立在报社全体员工会议上，宣布开除包国军。

——试问假在哪里？包国军制造的假新闻被揭穿后，他坚称：作为《惠州晚报》的记者，在报社的宿舍楼下被打是事实，他只是在被打的起因上做了手脚。事实上也是这样：有人卖假是事实，他无辜被打是事实，他的左手掌被刺穿是事实。包国军错就错在杜撰了被刺的原因：他并没有“当场揭穿了那些人的骗局”，而是刚一下宿舍楼就被追打，被追打时他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追打。他犯了“添

油加醋”、“穿靴戴帽”的错误。

——分析造假的原因。包国军承认自己制造假新闻的目的是：

一、说成采访被打，可以报销药费；二、可以享受工伤休假待遇；三、可以扬名；四、可以督促公安机关尽快破案。

广东番禺的作者林晓在《街道》上的评述文章中，称记者包国军说得比较客观、比较真实，他没有隐瞒他的个人目的。但是后来不少反假报道却违反了客观、公正的新闻规律，说他是为了扬名和报销药费、享受工伤休假待遇，却对“督促公安机关尽快破案”只字不提。事实上，从3月26日包国军被打致伤到4月29日惠州市公安局通报各新闻单位包国军制造假新闻的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伤人案就这么难破吗？包国军一定要成为第二个胡喻（1997年6月被歹徒无辜杀死的流浪记者）这个案才能破吗？惠州市公安局破不了案不找原因，却对《羊城晚报》的记者说包国军有“苦肉计”之嫌。如果包国军真的是以“苦肉计”报假案，他应该负法律责任；如果包没有行“苦肉计”，那么惠州市公安局应该承担“诬告罪”的法律责任。三个贩假男人气势汹汹追包国军的女朋友追了20多分钟的路，退一万步讲，即使他们不是卖假货，至少也是强买强卖，怎么说都是他们没理，可他们竟然敢追人，并将非当事人打伤，这一方面说明歹徒猖狂到了何等程度，另一方面更说明惠州的治安乱到了何等程度。这哪里还有正义？哪里还有安全感？

据1998年5月21—27日《羊城晚报·新闻周刊》报道：“包国军称，他在报社已累计4个月没有领到工资，生活上已陷入困境，如果他不说成是采访中被打，他的生活会更糟。他说，他受伤后第二天便向报社的一位领导汇报，可是这位领导头也不抬，没有对包表示任何关心。”

明白了这些“内幕新闻”，对于包国军制造假新闻，有正义感的人恐怕都会既“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试想，一个记者4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当晚出事前还“正在惠州晚报社宿舍里写稿，女友

催他吃饭,他头也不抬地继续写稿(详见1998年5月21日—27日《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中国有多少记者有这种敬业精神?另外,他受伤后第二天即向报社一位领导汇报,可是这位领导“头也不抬”,没有表示任何关心。这位领导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事情后来炒大了,作为惠州晚报社,有没有自我炒作的成分在里面?

——事关中国新闻的客观公正性。客观、真实、公正、全面,乃是教科书上“无产阶级新闻报道(今天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报道)”的本色。它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用含蓄的方法表达出来,只是从容地、冷静地讲事实,而避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倾向性太明显的语言文字,使大家易于接受,乐于接受。而违背了这八个字,也就违背了新闻报道的客观规律,违背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见周胜林《高级新闻写作》1997年10月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关于西方新闻的客观公正性。在美国,客观性所要求的具体操作规范是:提供争论双方的观点,以便识别冲突情况下对手之间的真实主张;提供代表这些真实主张的确切陈述;直接用引号指明这是消息来源而非记者之言;首先依照提供最多的事实材料的方式组织报道。理性地分析包国军制造假新闻与一些传媒的反假新闻,作者林晓觉得两者都违反了新闻的公正客观性。不同的是:包国军是“穿靴戴帽”地制造假新闻,而一些传媒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反击假新闻,到头来自己也有假新闻之嫌。

——中国新闻的正义性。在这里,林晓提出一个新概念——新闻的正义性。正义:公正的道理。如:正义感;主持正义。《荀子·儒效》:“有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现指合于人民利益的道理(《辞海》1979年版),——这里的“人民利益”,应该理解是指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用正义性来梳理一下新闻,衡量新闻的发与不发,作者觉得具有重要意义。记得1994年惠州市惠东县发现有7人染上了霍乱病,惠州市委宣传部下令各新闻单位禁

止报道。当时就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一是霍乱在目前的医学水平下并不是一种不能控制的疫情；二是如果公开报道有7人染上霍乱，可能会在社会上造成恐慌。反观包国军制造的这宗假新闻以及1997年关于北京一个小保姆的假新闻（详见《光明日报》长篇通讯——“一个小保姆和她的一部大书”及随后《南方日报》、《南方周末》记者方进玉采访报道的“一个小保姆和她编织的谎言”等3篇长篇通讯），从正义性角度看，反假者的行为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记者血洒惠州”基本事实是真实的，现在就整个把它否定，就像1998年早些时候《南方日报》报道一个14岁的女学生被强奸，有人就指责报道“严重失实”，说那个女孩是15岁而不是14岁，从而想整个否定那篇报道。但对《南方周末》曝光的“吹牛”的小保姆，林晓认为“一个人吹牛撒谎是不犯法的。适当揭穿她的谎言是应该的。但后来又有记者对她进行穷追猛打，剥她个体无完肤，难道我们的记者真的是外国记者所讥讽的‘只打蚊子不打苍蝇’吗？难道一个小保姆吹牛就真的那么有新闻价值？假如反假报道出来后，那个叫陈玉荣的小保姆再无脸见人，或者不幸去做‘鸡’，或者跳楼自杀了，我们的记者心有何安？”

——对制假者与反假者的理性评判。先是对制假者的评判，《惠州晚报》总编辑王功立说，1995年12月，包国军从内蒙古来到惠州晚报做应聘记者（实为流浪记者，因我国特有的户口制度导致。——作者注），1996年1月起，包国军主持新开辟的打工专版《南国寻梦》，这个专版办得比较成功，在读者尤其是打工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作者留意到，《新闻出版报》曾两次载文，对他主持的《南国寻梦》版给予了较高评价。王功立介绍，包国军在报社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新闻敏感性不错，在此次造假事件之前，报社没有发现他有制造新闻的行为。包国军的同事对包的评价也不错，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包国军会制造假新闻，并且会造得如此“惊天动地”。

但惠州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黄俊良5月13日下午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刘渊采访时说,针对包国军“被毒打”一说,公安机关认为有诸多疑点,包括有“苦肉计”之嫌。惠州市公安局4月29日通报惠州市各新闻单位:自4月10日以来,被包国军本人在全国炒得沸沸扬扬的“记者包国军血洒惠州”之类的文章是地地道道的假新闻,包国军自编自导自演,大肆炒卖自己的“英雄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详见1998年5月27日第73期《羊城晚报·新闻周刊》第2版)。《羊城晚报》专栏作家微音在其评论“新闻也非打假不可”中说:“……危害性最大而又最为恶劣的,莫如害群之马为了追名逐利而炮制的假新闻了。对于这种人,我看也要像对待蟑螂、老鼠那样,要彻底把它弄个精光……正是南有包国军,北有张勇,全是一丘之貉(《羊城晚报》1998年5月17日第一版)”。不过,撰稿人林晓先生对包国军的评判是:报道失实不应该,但人是好人,对他的处置不公,值得同情。接下去就是对反假者的评判:本案例有失公允,应该有正义感,应该恪守新闻公正客观的规律,不要矫枉过正,不要杀鸡用牛刀。值得我们思考的几个相关问题,我们判断假新闻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当然力求新闻从主体到每个细节都100%真实,但做不到的话,也要区分失实报道与假新闻。假者,不存在也。如果新闻主体是不存在的,是凭空捏造的,就是假新闻;如果新闻主体是真实的,只是产生新闻主体的原因或某些细节不真实的话,这不能算是假新闻,只能算是失实报道,对此应该有法律给予制约、规范。

那么谁是真假新闻的评判者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体育比赛中的输赢,只有裁判才有资格定夺,官司上的输赢,只有法官才有资格定夺。那么谁来关注流浪记者的命运呢?近年来,记者队伍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流浪记者,在广东、在北京、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已出现,而恐怕以广东的广州、深圳、惠州等城市为最多。据业内人士介绍,这里而有很多新闻高手,至于惠州城中南下的流浪记

者是在 90 年代的“80 年代看深圳,90 年代看惠州”的口号声中培育来的,随着惠州经济泡沫的幻灭,许多记者生存成了压倒一切的需要,尤其是举家南迁的记者,生活不堪负重。所以惠州的记者队伍发生了裂变,有的进机关,有的进公司,有的开小店,最后仍坚守新闻职业的不外是两种人:一种是不会钻营没有门路的,一种是真正把新闻当作使命的。对这两种人新闻单位都应该表示敬意。但是在自下而上条件都极其恶劣的情况下,譬如生命没有保障,譬如连续几个月领不到工资,谁来关注他们的命运?难道他们不值得人们的宽容和关注?

2. 艰难的采访

——云南电视台记者采访遭围攻

1998 年 10 月 16 日,云南电视台新闻中心《今日话题》栏目记者许玲等人看到了《春城晚报》上的一篇文章:“住手,高原明珠岂容蚕食”,反映昆明市西山区碧鸡镇龙门村两年来一直在滇池边填湖造地的情况。《今日话题》作为新闻评论性节目,有责任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有义务对这件事作进一步的调查和了解,于是,许玲等人与昆明市水利局滇池管理处的同志及有关领导取得了联系,在咨询了有关情况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后,约定 10 月 19 日一起去现场了解情况。

有法不依。10 月 19 日 14 点 15 分,《今日话题》记者许玲、王军,司机李江岚和水利部门的有关同志来到填湖造林现场。昆明市水利局的同志告诉记者,《滇池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一定范围内的滇池水体和滨岸带受到保护,昆明市政府也沿湖设置了 500 多个水位界桩,禁止在此范围内围湖造地。然而,龙门村附近的护湖界桩已被人拔掉,这个村几年来在滇池保护区内填湖造地 47.05 亩。

水利局的同志告诉记者,从 1996 年 7 月起,水利局就同西山区政府以及当地村镇进行过协调,但龙门村一直没有停止过填湖。

1998年2月,水利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作出处理决定,责令其立即停工,在3月底前全部拆除围堰,恢复原貌。

记者随水利局的同志绕水泥围堰拍摄了有关镜头,并采访了正在钓鱼的几位村民。村民说填湖造地是村里干部决定的。当时还有一位正在钓鱼的村民指着几块填出的地告诉记者,那儿可能被村上卖给了某公司。记者发现,填出的地上划了一些白线,但这只是记者观察到的表面现象,记者打算在采访完村民后再去采访龙门村村委会干部。

现场调查。这时,一位穿黑色上衣、30岁左右的妇女跑到记者面前,她手中拿着刊登龙门村填湖造地的那篇文章的《春城晚报》说:“我正在找这篇文章的编辑。完全是不负责任乱说。既然你们来采访,就该听听群众的呼声,我们很气愤。”记者就问:“你在村里担任什么职务?”她说:“我只是个普通群众,是村民。你们到办事处门口,那边有很多村民都想向你们反映情况。”记者也正想听听村民们对此事的看法,于是就来到村委会。水利局的同志因故先走了,走之前特意叮嘱说:“你们要小心,这里的村民不讲道理。过去我们来处理此事还遭到过村民阻挠。”

记者还没有走到村委会门口,就有村民围上来。穿黑衣的妇女这时粗暴地对记者说:“如果你们是实事求是的采访,我们欢迎;如果不是,你们就滚。”并问:“是谁派你们来的?”记者解释说:“我们是来了解真实情况的,作为新闻单位,我们会客观、公正地报道的。”

这时大约二三十名村民围了过来。有一个自称是办事处主任的中年男子主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我们填那地是用十种植农作物的。”记者问:“那么为什么闲置了那么长时间还没种?”他答非所问。随即记者又问:“那么那些地上划的白线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划白线是为了把好地分好交给农民种。”

这时那个穿黑衣的妇女打断了采访,她对“办事处主任”说:

“你知道什么？让这些群众来说。”接着就把这位“主任”拉到一边。这时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主动上来接受采访，他自称是老村长。这时围观群众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并用很粗俗的语言骂记者。记者没有理睬，继续进行采访。

受到围攻。天上下起了雨，记者怕摄像机受潮，再加上村民拉扯，便到了村委会门口的过道上。这时围聚的村民增加到了 100 多人，两位记者被围在中间，气氛非常紧张。其中有人质问记者：“是谁派你们来的？”“你们是受了谁的指使？是不是大老张出钱让你们来的？你们收了他多少钱？”记者解释说：“我们不认识谁是大老张，我们是云南电视台的记者，是来调查了解情况的。”其中一个穿棕色皮衣 60 岁左右的高个子男人高声叫道：“把他们拉到二楼去关起来。”还有人说：“把他们的摄像机砸了。”也有人说：“我们农民没有地了，没有饭吃，个个闲着打麻将，地都种不成，你们还来采访什么？”

由于现场太乱，记者没有办法解释。接着有人用手指、拳头打许玲的面部及眼睛。当时王军一直在开机拍摄，一些群众把他肩上的采访包夺走，还有人抢夺摄像机，并击打他的后脑，扯他的头发和衣服。有人把记者拉扯过去问：“你们叫什么名字，谁叫你们在《春城晚报》上乱登的？”记者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他们，并说自己不是报社的。人群中有人煽动：“我们记住你们的名字了，如果你们胆敢在电视上、报纸上作文章，我们就到你们单位来，反正我们现在地被征了，没有地种，也不想活了。”随后，摄像机倒在了地上，磁带也被一个 20 多岁的男子从机器里拿走。

记者在收拾地上的东西时，又有人说：“他们身上还有磁带，搜他们的身。”一人上来强行搜王军的身，确认没有什么东西了，才让出一条道来让记者走。整个事件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村干部出面劝阻。

强龙难压地头蛇。记者上车后，司机李江岚告诉记者，她已经

向单位领导和 110 报告了情况,110 马上就会赶到。果然,采访车驶出 200 米就遇到了碧鸡镇派出所的警车,车上的警察让记者在原地等待,他们马上到现场去,大约 5 分钟后 110 的警车赶到,询问了有关情况后便让记者同他们一起赶赴现场。车驶到半路时,碧鸡镇派出所的那辆警车已从现场返回,他们让记者到镇派出所去,并说,西山区公安分局的领导和区检察院的领导已经赶来。

到了派出所后,警方就整个事件情况作了笔录。在这次事件中,除被抢走 3 盘录像带外,记者许玲的面部、王军的头部受轻伤,摄像机顶部的保护盖丢失。碧鸡镇派出所一位姓许的所长对记者说:“这件事区里领导很重视,请你们正确对待,不要有什么精神压力,希望你们理解我们的工作,被抢磁带我们会尽力要回来的。”但直到电视台新闻中心负责人晚上 21 点左右与西山区区委书记联系时,区里领导仍不知道此事。

1998 年 10 月 29 日,《中华新闻报》发表编后认为:此事让人痛心的地方有二:一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基本战略,98 洪灾更使得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大家的共识,龙门村却有令不行,围湖造地,冒天下之大不韪;二在舆论监督已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的今天,龙门村一伙人却从一己私利出发,阻挠采访,让人愤慨。

——掌权者“守土有责”

其实,真正“焦点”应该是记者有哪些权力?《中国青年报》记者董时在“也谈记者维权”一文中感慨:在一次曝光私建滥建的采访中,黑龙江日报记者萧芷苗被打,《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即对此事进行了追踪报道。当时,萧的眼球周围结着血块,颈上被抓伤的印迹清晰可见。没想到,萧先讲的不是伤势,而是自己当着民警指认凶手,凶手还是跑掉了。她觉得自己正当的公民权利和记者行使的舆论监督权利一起遭到了践踏。打她的有四人,是两对夫妇。303 室内打她的一对,正是她采访的私建滥建者;在楼道里打她的一对,是私建滥建者的包工头儿。前者打她的理由是,她没有出示记者

证；后者打她，干脆就没有理由。

萧说，这不仅是她个人的事，而是整个新闻工作者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冒着风险对危害社会和其他公民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时，这种监督到底受不受法律的保护？受什么法保护？常常以维护他人利益形象出现的记者，本身也受到被监督对象的伤害时，又该怎么办？萧的话，《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对此事的采访中得到了证实。稿子在见报的当天，其中提到的派出所副所长就打来电话，气愤地指责萧当着他的面叙述，而他又没有当场提出异议的内容不真实。他指责《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另一个理由是：该记者在采访时只说自己是记者，并没有说明是哪家报社的记者，让他产生了都是同一家报纸记者的错觉。所以，他要求《中国青年报》记者赔偿他的“损失”。

对于前一个指责，《中国青年报》记者认为有现场录音和采访笔记作证，事实清晰，无需多谈。对于第二个指责，倒是有些迷惑了。“我不知道，在派出所这样的非私人场所，谈论着殴打记者这样的非个人隐私或国家机密问题，我是哪家报社的记者能否改变采访事件本身的性质？再进一步，假如，我采用了已经被媒体广泛应用的暗访形式，又会怎么样呢？”

其实，类似指责，伴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几乎从没间断过。因为，事实证明，很少有人能够坦然接受监督。来自全国记协的消息说，目前记者采访遭到阻拦、殴打、报复甚至枪击的事件时有发生，而且呈上升趋势。问题是，这类事件发生后，记者依据什么为自己讨回公道？

萧的事件发生以后，对公众负责的记者就不断地咨询律师。可惜，答案是，我国《新闻法》迟迟未能出台，其他与之相关的法律也几乎没有。像已经被大量使用的“暗访”形式合不合法，有些部门是否可以用“影响工作”为由拒绝记者采访那些公众应该知情的内容，目前尚没有明确说法。

所以,由此引发的记者被辱骂殴打、摄像机被砸等过激行为,只能按照一般社会治安案件处理。如果没有造成重伤害,也就不了了之了。关键是采访乃记者的职业行为,需要经常进行,而经常被辱骂、被推搡甚至被殴打,意义就有些不同了。萧的事被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了当地领导的重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杨光洪、哈尔滨市长曹广亮看到报纸当天就对公安部门作了批示,要求尽快将在逃凶手追拿归案。从这一点上看,萧是幸运的。如果当地领导不知此事,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不宜夸大新闻舆论监督作用?

有一位名叫陈长明的朋友著文说,近些年,新闻舆论监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他,无不感到欣慰和自豪。但是,在充分肯定工作成绩的同时,又提出不宜将其作用夸得过大。1998年9月16日,北京某报在一版刊登一篇“析‘记者比法官管用’现象”的评论文章。文章缘于黑龙江铁力市一女孩触电致残,官司打了10年,有关部门相互推诿了10年,经中央电视台曝光后,受害者很快得到了赔偿。因此,人民感叹“记者比法官管用”。文章并不是专门论述“记者比法官管用”,而是由此对舆论监督问题阐发议论。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文章中特别是标题上公开提“记者比法官管用”,这就容易有抬高记者、贬低他人、伤害他人感情之嫌。

实行舆论监督,是新形势下历史赋予人民的新闻工作者的一项崇高职责。我们能为维护正义、打击邪恶做点工作,完全是应该的。就国家整体而言,新闻舆论部门与法官乃至其他各行各业一样,都是组成国家这部“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尽管“触电致残”官司打了10年,尽管问题性质严重,尽管曝光后得到人们称赞,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记者比法官管用”。要知道在我们的社会,虽然存在着不称职的、不为民办事的法官,但这毕竟是少数,众多法官和各行各业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勤奋工作,努力为国家作贡

献。如果因舆论监督促成某一事件很快了结就认为“记者比法官管用”，就显得顾此失彼了。我们应该始终十分明确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就是为国家分忧，更好地让监督部门替老百姓解愁。记者通过舆论监督，帮助法官乃至各行各业总结工作成绩，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促使其改进工作，把各方面工作都做好。百姓对我们工作的这般赞誉，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勉励我们把舆论监督工作做得更好，但我们自己应有清醒的头脑，对百姓不恰当的赞誉要有科学的分析，正确的态度。接下来，作者以告白式的语言结尾：“作为舆论部门，我们一定要摆正位置，正确估价舆论监督的作用。”虽然文中本意没说太多，但读者可以从中理会。

3. 保护自己

——批评的不是时候？

1996年4月，《海口晚报》新闻记者丁吁采写了一组系列批评报道“解困房解了谁的困？”（以下简称“解困房”），揭露了海南金美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孟克非“一家七口竟买了八套解困房”的事。由于解困房问题一个时期以来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该稿引发的社会震动颇大，在海口引起了轰动效应，被视为舆论监督的一次成功出击。但丁吁和《海口晚报》也因此被推上了被告席，经历了一场耗时两年的被批评方诉记者侵权案。

被批评方的起诉书列举了最主要的理由是：批评稿称“一家七口人买了八套房”中“一家”的概念不对，他的房是以兄弟、岳母、侄子等名义买的，而这些人和他不能算“一家”，所以批评稿是错误的。同时，被批评方竭力从政治角度出发，声言批评稿是给政府安居工程抹黑，有损党的形象，有严重导向问题。批评购房是把矛头转向内地调琼的无房干部。

尤其令人警醒的是，“解困房”案结后，被批评者曾起草一份“文件”，题为“关于成立对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吁舆论民众法律监督

基金的函”，称“自行出资 100 万元”，成立专门监督《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的民众法律基金，要向对《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报道失实、批评有误造成的名誉侵权案“提供全部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有关活动费、诉讼当事人诉讼期间的生活费等”，目的是“为因被《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侵权而有冤无处诉讼，诉讼没有钱的公民提供无偿及无条件的经济援助和法律支持”。

此函虽近乎一次闹剧，但透出的信息却是明白无误的，即被舆论监督所打击的某些人意图结成同盟，公开向舆论监督挑战并对抗。作为新闻记者，无怪乎丁咛认为：“新闻舆论监督是所有新闻媒体共同的功能，因此，对任何一家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损害，都是对整个新闻舆论监督的报害，都将直接影响到新闻舆论监督自身的形象和功能的发挥。然而，所有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上联手合力，无疑将大大增强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

如果说《海口晚报》新闻记者丁咛所遭到的仅仅是“温柔的报复”，那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在襄阳被打一事，则尤其可以看出身为中国新闻人的使命与痛苦，以及一个非理性社会对“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具体诠释：

——《焦点访谈》记者襄阳被打内幕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其及时、准确、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风格颇受包括朱总理在内的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他们对一批大家敢怒而不敢言的单位和个人频频曝光，赢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可是在 1998 年 4 月 10 日湖北襄阳农药厂内，《焦点访谈》记者在执行采访任务时遭到数十名该厂工人的围攻，南京的《周末》报记者申赋渔、姜雷、倪治清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998 年 4 月 10 日下午，湖北襄阳农药厂一片混乱。数十名该厂工人显然事先有所预谋地集结起来，然后突然冲进了工厂会议室，没说几句话，他们有的抡起椅子就砸，有的拿起茶杯就扔，有的气势汹汹地掀翻了桌子。此时，湖北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

庭长何天海等正在对该厂执行法院判决。一时之间,记者、法官、律师陷入了咒骂揪打之中。一名职工居然凶狠地高举椅子,砸在圆桌对面身穿制服的法官身上。正在这里采访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张涛被数名工人从背后推翻在地,摄像机摔到两米外墙角的椅子上。手持话筒的《焦点访谈》著名记者陈耀文也遭到拳打脚踢,衣领被撕开,脖子被抓伤,张涛的左腿被踢破踢青。十多个人蜂拥而上强抢一同采访的十堰有线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一个工人突然伸手拔出摄像机中的电池,举在手中大叫:“交带子,不交劈死你!”“把摄像机交出来,不交就砸了它。”当时还有3位新华社记者也被围困在现场。

这里如何会发生如此令人震惊的骚乱?追根溯源,要从该厂的一起“坑农”事件说起。

4月9日,非法拘禁10小时。柑桔树林是湖北省十堰市所辖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范家院村、伍家沟村等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靠桔树刚刚走出贫困线,桔树是他们的希望,也是他们的依靠。1996年春,一心指望桔树早日茁壮成长的桔农们买来邻县襄阳县襄阳农药厂“丰歌”牌柑桔专用肥,结果施了肥的桔林没有唱“丰歌”,而是大面积死亡,无数刚刚走出贫困的桔农重新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权威部门作出鉴定:“丰歌”牌柑桔专用肥的氮、磷、钾严重不符合国家标准,特别是“丰歌”牌柑桔专用肥使用了不得使用的氯元素,系严重伪劣产品。受害的桔农们从此踏上了漫长的索赔之路。然而生产伪劣产品的襄阳农药厂采取种种手段,极力否认“坑农”事实。百般无奈的桔农,只好东挪西借筹资打官司,把襄阳农药厂推上了被告席。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范家院村桔农胜诉。襄阳农药厂不服判决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年10月8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襄阳农药厂上诉,维持原判:襄阳农药厂赔偿桔农损失25万元,并承担桔农诉讼费

8927 元。

然而胜诉已经半年多,受害的桔农们,却仍未拿到一分钱的赔偿。

1998 年 4 月 7 日,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何天海、助理审判员袁昆及原告代理律师张建民一行去襄阳农药厂执行判决。同行的还有十堰有线电视台记者程斌、罗忠。

4 月 8 日上午,法官何天海、袁昆根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与襄阳农药厂副厂长陈宗绶(被告全权代理人)开始商谈还款计划。陈宗绶一再强调企业困难,以厂里无钱为由推诿。于是法官提出以厂里库存农药抵偿,陈也拒绝。最后,法官要求看账,厂方以会计找不到为由推托。陈甚至不签收法院送达的有关裁定书。他说:“我不签,你们搞的叫我去担担子,让我坐牢去?”一直商谈到下午 4 点,仍无任何结果。法官何天海只好依据法律有关规定,对农药厂的仓库和财务室进行查封。

在查封仓库之时,二三十名农药厂工人从四面涌来,其中一男一女冲上前,强行阻止张贴封条,致使查封无法进行。一名女职工一边从法官手里抢扯着封条一边高叫:“你敢贴我就敢撕,不信你试试看,你叫陈厂长来,我只听陈厂长的。”在离开农药厂时,法官何天海告知厂方:一、仓库资产不得非法转移;二、财务人员第二天必须前来配合查账;三、做好职工思想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与本案无关人员一律不准前来。陈宗绶一一应承,并以党性担保,绝对不会转移仓库货物。

4 月 9 日上午 9 点 10 分,十堰有线电视台记者和法官们一起再次来到襄阳农药厂,只听厂长大喊:“厂里保卫工作也归我管,我要你们进得来,连人带车都出不去!”然后又冲出会议室大喊:“你们在我的 18 亩地上,我要你们道歉,否则莫想出去,把门给我锁上,一个人也不准出去。”话音刚落,五十多名工人迅速围到会议室外,大声鼓噪起来,有人赶过去立即把大门锁上。

法官何天海见状,把陈宗绶喊进办公室,要他冷静下来,向他讲明阻挠执法应负法律责任。原告代理律师张建民也力劝陈宗绶不要激动,好好配合法官工作。陈宗绶恶狠狠地瞪着张建民大骂。然后又冲到会议室外面,挑动门外的工人哄闹、围攻法官。法官袁昆跟着出去做陈宗绶的工作,告诉陈宗绶:“你这样做是非法拘禁,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阻挠执行公务。”陈宗绶根本不予理睬,狡辩说法院未经他们允许,不该带记者过来。说罢他又去纠缠已走进汽车的十堰电视台记者,叫他们从车子里滚出来,交出录像带:“若不交出录像带,就不能走,我无法控制工人的情绪。”工人们听他这么一说,立即跟着他大声鼓噪,叫骂不堪入耳。

这时,来了两位襄阳电视台记者,称是厂里让来采访,同时来协调的。其中一位女记者这样采访何天海:“厂方对判决有意见,你们为什么还来执行?”

然后襄阳的记者居然也要求罗忠、程斌交出录像带,理由是如果不交,工人情绪控制不了。

在纠缠当中,陈一示意,工人们就停止叫喊,只要法官一提出要陈签订赔偿协议,陈就让工人吵嚷起哄,并把法官、律师和记者团团围住。陈要记者交出录像带,记者不给,工人们就围攻殴打,混乱之中记者罗忠的腿不知被谁打得青紫。记者们退到车上,陈宗绶不断敲打车窗,要记者交出9日及8日的录像带,带子不交就不让走人。从上午一直相持到下午4点,最后,陈宗绶让五个工人押着记者罗忠回招待所取回8日的录像带看看。看完之后,一定要留下录像带,不留不让走。晚上7时,襄樊市(襄阳县属襄樊市辖区)中级法院执行庭工作人员和襄阳县法院执行庭长闻讯赶到,劝解放人,可是厂方依然不肯,法官们只好向“110”报警,农药厂所在地襄樊高新技术开发区派出所一名负责人带两名民警赶到,再向厂方做工作,厂方还是我行我素,拒不放人,一定要扣下录像带。天渐渐黑下来,万般无奈下,记者只好把两盘录像带交给农药厂,才得以

从农药厂脱身。

后来在4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时空报道》栏目,以“抗拒执法,法不容”为题,披露这一事件的许多镜头,是当时十堰台记者急中生智,将另一盘藏在车座底下的夹缝中侥幸带出的录像带。从上午9:20到晚上7:10,记者被堵在车上,不让上厕所不让吃午饭。法官们由于工人围攻,执法工作也是无法进行。

4月10日,记者法官被围殴。4月10日上午,法官、律师等一行再次来到农药厂执行判决时,厂方称襄阳县委朱副书记和有关领导正在这里开会协调,约定下午再来。4月10日下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陈耀文和张涛闻讯赶到,新华社分社的两位记者及新华社驻十堰记者也赶来襄阳农药厂。陈耀文他们是4月9日下午3点左右在中央电视台“时空报道”办公室接到十堰电视台的求助电话而前来的,当时十堰台记者已被围困5个多小时。中央台记者问到最早飞往离出事地点最近的宜昌的航班,是第二天(10日)早晨7:50。第二天航班晚起飞40多分钟,陈耀文和张涛到中午11:30才出机场,此地离事发现场还有240公里,三峡总公司派了一辆“切诺基”从机场接上记者。下午4时许,他们赶到现场时,十堰中院法官何天海、袁昆正和陈宗绶继续商谈着执行判决的协议。正在商谈之时,许多人将会议室团团围住,大声喊道:“厂长不能签。”“谁签剁谁的手。”陈宗绶乘机摇摇头说:“这我不能签呀!我不签,谁也不能签!”门外一伙人喊叫着“谁也不许签,你们的判决不起作用!”陈宗绶口称“我签不了,我退出。”说罢,这个曾口口声声以“党性担保”的厂长根本不顾事态发展,转身离开会议室。5点42分,现场失去控制,数十名工人猛然冲进了会议室。

冲进会议室的人像发了疯一样,碰到什么砸什么,拿到什么扔什么。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中央电视台记者陈耀文、张涛及十堰有线电视台记者遭到了围攻殴打。

同时遭到围攻的还有前来执法的法官、随同采访的记者等人。

十堰有线电视台的几位记者贴着墙护着摄像机，一些人拿起椅子就朝他们摔过去，椅子砸在记者曹建华背上，接着有二十多个人冲过来抢设备，把摄像机中的电池强行拔了出来，有个人一边舞着电池一边说：“交带子，不交劈死你！”“把摄像机交出来，不交就砸了它。”十堰有线电视台的记者们左遮右挡，还是让一个小伙子强行抢走一盘录像带。随后，人群将法官、律师、记者分别围困在车上、屋里。

在整个围攻过程当中，该厂的厂长们一直不动声色地站在人群之外，叼着香烟悠闲地观战。围困到5时40分左右，律师张建明两次向“110”报警；未见警方行动，6点左右，法院司机再次报警，可警察依然不到。直到7点56分，新华社记者又一次报警之后，公安人员方才来到。

4月11日，法官、律师、记者们基于在襄阳农药厂难以解决问题，决定在襄阳县鹿门宾馆等待解决。但直到下午4点30分，厂方仍无诚意，只好返回十堰。十堰有线电视台的记者们一再要求拿回录像带，对方也是置之不理。

4月16日，《周末》记者在采访十堰有线电视台记者罗忠时得知：“电视台记者已找到陈宗绶，陈宗绶却说，你们去找宣传部周部长，带子不能还。记者找周部长，周部长又说已交公安局，作了物证，不能还。此后多次索取，都遭到他们的拒绝。”

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何天海说：“农民贷款打官司胜了，执行不了，等于法院给农民打了白条。桔农们现在还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一点赔偿，我们向农民、社会没法交待。法院的判决我们是坚决要执行的，即使再遭围攻再冒风险，我们决定17号再去襄阳县。”

4月16日下午记者采访了襄阳县县委办公室，看来《焦点访谈》记者遭到围攻殴打已引起该县的高度重视，一位姓王的同志对记者说：“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开了会，组织了由县委林副书记负责

的调查小组。对这件事我们正在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一查到底,目前县委已决定撤销襄阳农药厂副厂长陈宗绶的职务。这些措施,我们今天已经向中央台《焦点访谈》发了传真汇报了。我们准备马上派人去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商解决执行判决问题。”4月20日,记者再次采访从襄阳县执法归来的十堰中院何天海副庭长:“当地政府对此事如何解决?”何副庭长说:“当地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目前非常配合工作,他们已经做通农药厂职工的工作,并在追查有关人员的责任。陈宗绶已被免去副厂长的职务。由于一些职工对情况不十分了解,致使出现了这种抗法事件。”“那么对于判决他们又如何执行呢?”何副庭长说:“由于该厂效益不好,实在无力立即执行判决,我们17日先带回了6万元现金,厂方答应这几天送来价值7万元的农药‘乐果’(合格产品),以药偿还。现在他们正在对‘乐果’做质量检测,一瓶一瓶地做,再也不会再有劣质农药了。”“余款什么时候能付呢?”记者再次向何副庭长询问。“剩下的他们承诺将在年内分期分批,以现金和农药陆续还清。”“十堰有线电视台的录像带他们归还了没有?”“本来我们这次回来准备帮助他们带回来的,襄阳县委朱副书记说他要亲自给记者送过来,他还要来看望记者同志,可能近几天就会过来。”

襄阳农药厂以暴力抗拒法院执行法院判决,围攻殴打记者、法官、律师,这一恶性事件虽然最终得以解决,但是,人们却不能不进一步深思:这一大群人何以如此藐视法律与舆论监督?是领导的纵容?是群众法盲?抑或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作祟而知法犯法?当地的政府、司法、公安机关面对“暴力抗法”都到哪里去了?这不是地方保护主义又是什么?我国各行各业、上上下下、时时刻刻都在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如果整个社会都盛产“事后诸葛亮”,那么,我们的新闻舆论监督与法制建设要何年何月才能走上正轨?

一个非理性、非秩序、非常规的社会对新闻媒体及其新闻记者

的伤害与打击,势必最终导致其自身致命的“内伤”,这不啻于是一种麻木不仁的自杀行为!

——自由撰稿人反腐被捕

哈尔滨市自由撰稿人盛学友,写过多篇反腐倡廉的文章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也使一些腐败分子惶恐不安。在某些当权的腐败分子的策划下,盛学友于1997年2月6日以受贿罪被捕入狱长达15个月之后才被无罪释放。《读者周报》刊发赵岩文感叹:盛学友的遭遇让人沉思!

哈尔滨市自由撰稿人盛学友在全国早已闻名,他所采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检察日报》、《南方周末》、《报刊文摘》等中央和省市级新闻媒体频频发表,共计200余万字。特别是1992年8月关于“七岁小毕强被其继母虐待致死”的系列报道(近9万字)和1994年关于同患肌肉萎缩绝症的包氏姐妹的系列报道,引起海内外读者的强烈共鸣。1993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他采写的“18次特快列车乘务员高价倒卖卧铺票”一文,引起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关注,铁道部为此下发第47号《紧急通知》,全国开始整顿路风。

1996年,黑龙江省宾县电业局在两年时间里违反规定,非法向该县宾西板纸厂多收电费50多万元。盛学友得知后义愤填膺,他拿起笔,以“‘电老虎’两年吞吃120万!”为题在《法制日报》刊发,宾西板纸厂厂长隋升委托盛学友买了2000份报纸,派人在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门前大量散发,一时惊动了政府官员,“电老虎”违法乱收电费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热点。

此前,隋厂长给盛学友1万元买了一个手机。此后,按当时的市委书记索长友批示,市纪委与市农电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宾县电业局多收电费问题进行调查后,称“盛学友的文章是失实报道”。5月18日,索长友在该报告上批示:“同意调查组提出的处理意见,抓好落实,然后将情况及时报省委办公厅。”

6月20日,原电力工业部机关报《中国电力报》几乎用了一整版的版面刊发了该报记者反驳盛学友的文章。不久,隋升厂长找到盛学友,请他委托律师代理该厂状告宾县电业局违法收费一案。并留下1.5万元诉讼费。

盛学友为该厂找到了黑龙江省颇有名气的主任律师张孟奇先生做其诉讼代理人。法院给予立案,收了诉讼费并开了收据。不久,市法院以“市纪委有了调查结论”为由口头驳回宾西板纸厂的起诉。退回1.5万元诉讼费,暂存在盛学友那里,准备作为上诉的诉讼费用。隋升又为盛学友送来6000元钱作为办案的其他费用。包括坐车、吃饭等差旅费。

1996年5月,盛学友赴京就哈尔滨市宏业公司相关经济纠纷问题采访了全国人大经济法室、国家体改委、国有资产管理局等单位,同时在《法制日报》刊发第二篇报道“哈尔滨发生首起行政机关状告股份公司案”。这篇揭露在哈尔滨市发生的一起极不光彩的事件的报道在哈尔滨市再掀波澜。正当市中级人民法院准备开庭审理这起股权纠纷案时,市委书记索长友做出批示:由市纪检委牵头、司法机关联合办案的专案组进驻哈尔滨市宏业公司清查宏业公司所谓经济问题。由于专案组的介入,该案被迫中止审理。

1996年末、1997年初,盛学友与省政协《北方时报》社记者等人接到检举揭发呼兰县检察院成立反贪局向社会各界敛收钱财的举报信。经调查核实:呼兰县检察院成立反贪局时向各界发出请帖,不要送鲜花,不要送牌匾,请给予大力支持;在召开成立大会时鸣礼炮18响,收贺礼钱款仅账面上就有13万元,当日设宴数十桌,盛学友等人及时将这一情况告知市纪检委第五执法监察室主任刘星明。原哈市反贪局局长王发得知盛学友又出现在“雷区”,迅速向索长友汇报,并就盛学友从宏业公司账面上取出1.5万元差旅费一事同时做了特殊的解释。

索长友当即指示王发和市纪检委的有关人员,先抓入,后定罪

(注:在王发指令下,检察机关对盛学友采取强制措施不到一个月时间,王发就被中纪委和省纪委以涉嫌受贿罪撤职查办)。1997年1月13日,刚刚从呼兰采访归哈的盛学友,一进家门岳母就告诉他妻子得了严重的甲肝,盛学友立即把妻子送到了传染病院。

1997年1月16日,市纪检委吕某传呼盛学友,吕某说:“请你谈一谈呼兰反贪局成立时的违纪情况。”半小时后吕某和两个身穿检察院服装的人来到了医院,强行命令检察院的人把盛学友带到专案组。1997年2月6日(大年三十),盛学友以受贿罪被逮捕。1997年5月,索长友因涉嫌受贿罪和其子女大量侵占国家财产及突击提拔王发等一批贪官等违法乱纪问题被中纪委和黑龙江省委撤职查办。

1997年11月末,哈市新任市委书记李清林收到一封群众来信,信中揭露了贪官索长友既是法盲却又专制霸道、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丑恶嘴脸。李清林书记立即召开有关调查此事的部门领导参加会议,并认真听取了汇报。

11月29日,检察机关迫于原市委书记索长友旧部的压力,以受贿罪为盛学友打印起诉书。12月3日,盛学友收到起诉书。12月初,李清林书记在多次听取汇报后批示:一定要慎重处理,要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理此案。

1997年9月3日,本案公诉人——香坊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耿建忠和哈尔滨日报社记者张鸣霄、张春燕在同一个报社的两份报纸《哈尔滨日报》、《新晚报》上同时刊发长篇报道“一名‘自由撰稿人’的沉沦”、“盛学友绊倒在钱堆上”。全国多家报纸纷纷刊发转载了此文,闻此不幸消息后,盛学友的母亲当即双目失明,姐姐精神失常。

看到报纸后,自称“穷秀才”的盛学友的几个朋友为营救盛学友,先后几次找到全国著名的黑龙江十大杰出律师之一孙少波先生,请教盛学友是否构成犯罪。孙律师回答:“就本案公诉人的耿建

忠与哈尔滨日报社记者张鸣霄与张春燕 1997 年 9 月 3 日在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一名‘自由撰稿人’的沉沦”仔细分析,我看不构成犯罪。”孙律师认为:该文作者不懂“自由撰稿人”的概念;盛学友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资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从主体资格上看,盛学友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他曾被东北亚经济报社临时聘为三个月的试用记者。

二是宾县宾西板纸厂和哈尔滨市宏业公司付给盛学友的款项,都是两企业为其遭受的不法侵害讨个公道,请盛学友为他们采访、报道预付的差旅费等费用。上述两个单位的款项均为工作之需要。

三是盛学友所接受的这两家企业的款项没有进行最后结算。作为自由撰稿人,盛学友付出了,理应得到回报,恰恰上述请他的两家单位至今也没有进行结算,盛学友应得多少报酬,请公众评说。孙律师和李律师得出结论:盛学友是无罪的。要求撤销此案,将盛学友无罪释放。

果然,香坊区检察院按上级指令对盛学友提起公诉,将盛学友一案移送到区法院。孙律师按照盛学友及妻子之委托作为辩护人带着辩护词和调查到的证据找到香坊区法院办案人(刑庭庭长)和主管院长徐立杰,反复陈述其辩护意见。徐院长对其辩护意见和出示的证据十分重视,先后多次与办案人员和审判委员会进行认真研究,最后将本案退回到香坊区检察院。区检察院接到退回的案卷后立即向市反贪局二处进行汇报,经市检察院与其上级检察机关反复研究,最后依照《刑法》第 93 条和《刑事诉讼法》第 135 条之规定,于 1998 年 3 月 20 日做出“哈检局侦二撤字 1998(1)号”《撤案决定书》。孙少波和李东岩两位律师认为,由打击报复导致的侵犯盛学友的公民民主权、人身权、财产权、名誉权等权利的责任问题,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以上是国内记者及自由撰稿人的情况,而外国的记者远比我

国的记者还要惨,资料显示:一个国际性媒介观察组织在一份关于新闻自由的年度报告中称,在1997年全世界有26名记者被杀害,至少129名记者被监禁。26名记者中7名死于印度,4名死于哥伦比亚;土耳其监禁的记者最多,达29名。

太多太多的例子,太多太多的委屈,新闻记者一旦踏上了舆论监督这条不归路,就注定要时刻保持清醒与警惕,时刻准备与邪恶和黑暗作战,时刻将自己置于牺牲的立场。

壮哉!中国新闻人。悲哉!中国新闻人。自重自爱哉!中国新闻人惟有坚持正义……

伟大的莎士比亚在《一报还一报》中说过:“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

爱默生也说过:“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追求知识与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存在,例如充当灯塔守望者。”

新闻记者作为“船头的瞭望者”,同样不能把舆论监督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而只能做真正体现自由意志的自由职业者。——这,也许是作为一名新闻人一生最高的光荣、梦想与使命!

4. 正义属于谁

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舆论监督力量存在,它理应是公开的、公平的、公正的,而不是封闭的、利益的、别有用心的。新闻记者,作为社会气候晴雨表,作为整个国家的神经触角,他理应是敏锐的,正义的,而不是滞后的、偏执的。一个国家或人民的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是否“合格”,惟一的标准是:实事求是,坚持正义,相信天理民心,秉笔直书真理。所以,真正的新闻在理论上是完全独立、客观的第四种权力。但事实上,这似乎并不可能……

——新闻承受的尴尬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部训是：加入新闻评论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

诚然，任何一位新闻工作者一旦进入工作角色，便注定要为自己所选择的事业而上下求索、鞠躬尽瘁。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尤其要求每一位新闻人四处奔波、餐风露宿乃至担惊受怕——因为现在还没有《新闻法》。

要做好新闻的采写报道，要真正实现秉笔直书、伸张正义，新闻及其新闻人经历了多少背后的尴尬与苦难……

老百姓常说，中国目前办得最好的报纸是《南方周末》，最好的电视节目是《焦点访谈》。美国的《新闻周刊》也这样认为。在老百姓眼中，真正关心民众疾苦，敢说真话实话，多替底层人民想一想，这就是最“好”的新闻媒介了。

发行曾突破 200 万份的《南方周末》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中国新闻的“透气孔”，一向以敢于揭露社会黑暗、关注百姓忧苦而著称。但知情的人都知道，《南方周末》其实是一个相当微妙的地方，众目睽睽，有如一座火山口，方方面面都“盯”得十分紧，而为了求得生存，《南方周末》甚至以不向广东本省“开刀”为代价来换得立足之地。

至于中央电视台的名牌节目《焦点访谈》，更是如履薄冰，如走在双刃剑上，可以说是“举步维艰”。要知道，没有记者代表公众的利益，该有多少家百姓欢乐、多少家百姓忧愁？

艰苦的环境。有人说，《焦点访谈》的记者不能太年轻。这个栏目所具有的批评监督色彩，使得节目制作中面对的是众多的坎坷、陷阱和假象。你可能有很高的学历、很广博的知识、很敏捷的口才，但如果缺乏社会阅历，就无法胜任。

实际上，社会阅历的重要性不光体现在线索的选择上，更体现

在线索的采访过程中。

《焦点访谈》的记者常常奔波于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戈壁沙漠、海疆边防，这些地方的条件都非常恶劣。有一次记者朱邦录与范本吉赴大兴安岭拍摄阿尔山森林大火的节目，就充分领略了这种艰苦。

为了做出特色，使报道更深入、更充分，他们决定到起火的初始地点、到救人的第一线去采访和拍摄。阿尔山山高坡陡，积满了松软的没膝深的腐叶，行走非常困难。范本吉和朱邦录背着摄像机、三角架、电池包等 30 公斤重的设备，一步一步爬到采访现场。为了减轻重量，他们甚至连换洗衣服都没带。

山上白天的气温是 27—28 摄氏度，到夜里只有零下 4 摄氏度。

采访期间恰逢人工降雨灭火，他们的衣服湿透了也没法换，只能到了晚上脱下衣服，缩在被窝里，听着五六级的山风吹打着军用帐篷，冻得瑟瑟发抖。

在救火现场采访，缺水少食，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这惟一的一顿饭就是一个凉馒头和拇指大的一条咸菜！饥饿难耐，朱邦录想起了妻子给他做的龙虾，简直垂涎欲滴。回到北京，妻子给他买了六斤龙虾，朱邦录和女儿一顿就都吃光了。

为了赶播出时间，范本吉到了北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发着高烧赶到台里，连夜编辑制作完了这期节目。这期节目是电视台对此次森林大火最详尽、最深入的一次报道。

阻力重重的采访。有一次，记者赛纳、曲长缨、朱邦录等 3 人到山西某地采访，准备做一个节目叫《假破产真逃债》。事情是这样的：当地的某企业在破产后，更名改姓重新登记注册，挂上了块新牌子，并从银行贷款 4000 万元。这样，老企业欠的债不了了之。

3 人来到这家企业时，发现工厂的正门已被锁住，门口的路坑坑洼洼，透过门缝可见到工厂内厂房破旧、杂草丛生，样子颇为凄

惨。3人又来到工厂的后门,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车辆、工人川流不息,企业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他们上前与工人搭讪,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天色已晚,3人回到住地,并把此次采访通知了有关部门。第二天再去采访,发现情况有了变化,工厂的正门已经打开。3人刚跨入大门,三百多个工人突然出现,把他们团团围住。他们使劲解释,但工人显然受人指使,知道记者曝光后对企业将大大不利,所以一直将3人紧紧围住。这样僵持了4个小时,直到当地政府来了个秘书长,才把他们“解救”了出去。

回到宾馆,3人发现隔壁的房门一直敞开着,里面的人像是公安局的,这显然是来监视他们的,有可能连电话也被监听了。3人采取措施把拍好的录像带赶紧转移。后来,那个厂的工人还找到宾馆来闹事,他们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了那段时间。《焦点访谈》的记者像这样被围困甚至被殴打的遭遇不少,像康锐、张俊峰、陈耀文都遇到过。一些人在地方保护主义或个人利益的趋使下,胆子极大,敢抢砸记者的摄像机,敢对记者进行攻击。但这只是他们用的手段中“武”的一方面,他们还有花样百出的“文”的手段,用各种各样的“公关”办法来对付、压制记者的调查采访。

《焦点访谈》的记者介绍说,他们出去采访,有时飞机刚起飞,对方就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掌握了他们航班到达的时间。于是,证据很可能被转移,各种防范措施也可能早已准备就绪。记者到达采访地后,可能有人专门出来陪,给你安排吃,安排玩,就是不安排采访,形同“软禁”。记者进行采访时,旁边往往会站着一些在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不说话,不“干扰”采访,但老百姓在这些人面前往往就不敢开口说真话。

宛若“走钢丝”的批评报道。一篇无懈可击的报道应该是真实、客观、公正的。客观,要求用事实说话,避免明显的主观介入;公正,要求拍摄过程不带偏见。迄今为止,《焦点访谈》还没有因为报道的事实有出人而引起麻烦或官司。这是《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们恪

守职业道德、遵循新闻原则的结果。《焦点访谈》的记者陈耀文说：“我们进行报道，决不乱批评，总是依据法律条文对事件进行分析。可以说，法律是我们进行批评最有力的武器。”

杨明泽讲述了他和再军拍摄郑州张金柱案件的一些情况：“当法警叫到张金柱的名字后，约几十秒钟的时间，张金柱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他抱着氧气袋缓慢地走出来。他的头发很长，鼻子里插着输氧管。见到此景我们的第一感觉是这个镜头不能拍。他想以一个弱者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以求得同情。狱医对我们说，他拔掉氧气管根本没有问题。我们把他请到阴凉的地方，和他聊天，请他拔掉管子。张金柱操着河南口音说：‘俺不说，俺见了记者就哆嗦。’”

“经过规劝，他终于同意拔掉氧气管，他说：‘俺十五岁当兵，革命三十多年，就为这么点儿小事，就把俺变成这个样子。’这点儿小事？这点儿小事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意识到这句话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张金柱的心态。虽然我们当时没有录下这个镜头，但是我们把张金柱的这句话作为这个节目的开场白。序幕由此拉开。尽管我们从内心里非常痛恨这个残暴的家伙，但从节目的要求出发，我们要冷静地摆事实，不能产生倾向性，论证一定要引用官方的证言。即使对肇事者的介绍，也由交通部门的人员进行解释：‘这就是肇事者’。张金柱一案已经结案，对他的判决是由法律裁定的。我们的‘节目’只是叙述了事件的过程，整体上没有记者个人情绪化的内容，因而‘节目’站得住脚。”

痛苦的“枪毙”。可能《焦点访谈》节目被“枪毙”的概率比其他栏目要高，它的话题比较敏感，许多批评节目后面都有如潮的说情的人存在。记者在付出巨大的热情和心血之后，不知节目能否顺利通过，这确实是一个“难”处。但是在我们的采访中，《焦点访谈》的大多数记者似乎已把节目被“毙”看作很正常的现象，杨明泽说：“这更促使我要学会适应环境。”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央电视台台长

杨伟光曾谈到过“枪毙”节目的问题。他以《焦点访谈》记者陈耀文为例,说他从因节目被“毙”而流泪到自己“枪毙”自己的节目,表明了《焦点访谈》的记者在不断成熟。

陈耀文为之流泪的是克拉玛依火灾的节目。他说拍此片时投入了几乎全部的情感和智慧。从技术和业务的角度上看此片,事后也得到了北京广播学院教授的高度评价。在送台领导审查时,节目被“卡”住了。陈耀文当即掉下了眼泪。后来他总结说,节目被“毙”掉是因为有些话说得比较过火。回过来看,当时自己确实不很成熟,想成功的思想较重。以后在做上海某化妆品厂的节目时,陈耀文显然已经趋于成熟。该厂驻北京办事处的几个工作人员,将本厂出产的过期化妆品更换包装,重新投放市场。陈耀文在顺利进行了前期拍摄后便开始进入后期制作,这时他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此节目播出后效果会怎样?

更换包装的毕竟是几个工作人员的个体行为,与化妆品厂无关。如果节目播出,影响所及,将是对该厂及其产品的销量形成打击。在编了六七分钟后,陈耀文毅然停了下来。为了一种社会责任,他决定放弃,尽管这是一个不错的题材。

陈耀文由此引出了这样的思考:记者对社会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敢于批评,并且报道真实,是否就是一个好记者?在某些情况下动机与效果是不一致的。批评可能殃及池鱼,引发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不考虑到这一点,就不能算是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

《焦点访谈》记者的双重压力。随着《焦点访谈》影响的扩大,一些记者的名气也渐渐增大,但是他们把自己同歌星与主持人明星严格划分开来。一位记者说:“我们与那些歌星和主持人明星不一样。人们不关心我们的私生活,不关心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他们关注的是我们的节目及我们在节目中说了些什么。”

也许《焦点访谈》的记者很难有踏实安宁的时候。如果以居住时间长短来定义“家”的概念,他们的家很可能就在宾馆。一年中,他们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外面奔波采访。王卓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七天就外出采访。当时北京天气较凉,冷风从窗缝直往屋里灌。王卓的妻子独自一人,只能拖着虚弱的身体,爬上窗台贴封条,结果受了病。提到此事,王卓总是愧疚不已。

实际上,在以节目为生命的《焦点访谈》里,谁都不能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里不养老,不养小,不养庸人,如果按期交不上高质量的节目,你就很难立足。

《焦点访谈》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各地的人,比如孙杰和范本吉原来是新华社的,林凤安原来在地方电视台担任中层领导。他们抛弃了稳定的工作,放弃了过去舒适的生活方式,来到了《焦点访谈》。这里工作艰辛,收入也并不特别丰厚,那他们图的是什么呢?范本吉说:“图《焦点访谈》的感召力,图《焦点访谈》是一个真正干事创业的地方!”

中央电视台东门设有一个《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的信访接待室,每天来这里上访的人络绎不绝。同时,《焦点访谈》节目组每天接到的来信来电也是不计其数。有人曾开玩笑地说《焦点访谈》是“国务院第二信访办”、是“人民法庭”。很多人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焦点访谈》上。

在讨论到栏目以后的发展,在很多《焦点访谈》的记者头脑中,忧患意识非常浓厚。

在耀眼的光环后,记者们体会到社会过高期望与自己有限力量之间的矛盾。按一天一个节目计算,《焦点访谈》一年只能触及365个或366个问题,这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只是沧海一粟。那么,其他的大量问题由谁来解决呢?

1998年第10期《时代青年》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难处”的报道,可以说道出了中国新闻人的心声。试想,《焦点访

谈》尚且如此,那些级别与规模相对“低”一些的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度日岂不更加艰难?而新华社一位刚刚参加工作的记者则更是深有体会:“我去广西某地采访,到了一个村子,全村男女老少听说中央来人采访调查了,竟然在河滩上齐刷刷地给我跪了下来;而到了另一个村子,那里的民风彪悍,说中央来人又怎么样,该出手时就出手,吓得我只好带上当地公安去协助采访,实在不行,我也打好了撒腿就跑的主意……”

新闻难,报道难,谁与记者共渡难关?

第三章 中外新闻洞察

《检察日报》记者兼新闻中心副主任赵信在其新出的一本《一个记者笔下的肃贪报告》专著中说：我们中国的记者职业是一个“浮躁”的职业。是一个“讨巧”的职业。是一个“沽名钓誉”甚至“欺世盗名”的职业。记者在“浮躁”中嬉于浮躁，在“讨巧”中一味讨巧，在“沽名钓誉”和“欺世盗名”中追逐名利，你还能搞出什么名堂？他希望你这一番话不会被误解。

西方的新闻观与中国的新闻观确不一样，西方尤其美国的记者也和中国的记者不一样，中国记者擅长宣传，西方记者擅长报道，比如普利策及普利策奖获得者的作品可以验证，一些记录普利策及普利策奖获得者作品的图书如《新闻与正义》、《黑镜头》等尤为好卖。连同接近中国大陆的港台记者，如吴小莉等，也成了新闻人物。这是为什么呢？莫非“水土”不同。

在我国，真实的“声音”由来已久。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工作方针。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就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在另一次会议上，郭沫若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争辩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

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1957年晚些时候,有些地方出现了否认共产党和要求西方的议会民主模式。于是,双百方针偏重于“铲毒草”了。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他认为“中国的报刊开始鼓噪所谓百花齐放”。后来发生始料不及的整风运动,出现了“右派”,似乎一夜之间,和风细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成了“大鸣大放”,一切事与愿违。直至发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国家与人民损失惨重。

应当承认,当初的出发点是好,但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向现代化学习,不能不补上西方先进的一课。

1. 何为先于一切的目标

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保持这一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后者。

——(美)托马斯·杰斐逊

——从《焦点访谈》与《南方周末》想到的

过去,外地来京上访申诉人员一下火车直奔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信访办(北京宣武区永定门西街甲一号,电话:010—63035987);现在,他们急于打听的是中央电视台,一门心思认定要找《焦点访谈》。作者高巍曾经下到河北偏僻农村调查村民选举的情况,农民们一拥而上围住,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焦点访谈》来的吗?俺们最爱看《焦点访谈》,就信《焦点访谈》”。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栏目,《焦点访谈》似乎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正义、良心与审判的象征。迷信《焦点访谈》或曰崇拜《焦点访谈》实在让我们不安也让我们深思,但它至少昭示了一个真理:公道自在人心,新闻自

由与舆论监督的力量不可战胜！

与另外一些国内外有着国际名声的所谓大报不同,《南方周末》是惟一不靠行政命令、层层摊派而主要由私人订阅每期发行达130万份的报纸,在新闻界的圈子里被称为“办得最好的报纸”,在广大群众中索性被称作“南青天”。随便读读《南方周末》中那些滚烫的、热情洋溢的文字,很难抑制住读者心中那份久违的感动:

“特别是贵报坚持新闻良知,爱憎分明,秉笔直书,不落窠臼,这在戒律殊多、处处掣肘的大环境下,实属难能可贵。”“我们更关注弱者,小人物的命运,毕竟弱者太多太多,谁都瞧他们不起,谁都不敢欺负,谁都置若罔闻,不屑一顾,我们不!这就形成了《南方周末》在大众心目中的位置。”“我完全同意广大读者对《南方周末》仗义执言、针砭时弊、敢于为民立言请命的办报方针的评价。”……

• 《南方周末》的读者大多有一种显著的特点,即在价值观上突出地表现为有社会责任感,对社会问题关注度高。再看看《南方周末》1998年9月25日刊登的“对你我的调查结果”显示:89%的读者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批评社会不良现象”;90%的读者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让社会变得更美好”;读者对《南方周末》内容的期望,也较多集中在“热点问题讨论”和“批评与揭露性的报道”上,认为应该增加上述内容的分别为71.8%和68.2%。可以说,一个结论已经呼之欲出,中国社会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实现全面、彻底的新闻法治和舆论监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推进,一些“制度缺陷”、“法律无力”和“制度真空”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产生了一系列诸如地区差距、分配不公、国企困境、贪污腐败、治安恶化和行为价值标准失落等新旧矛盾,并进而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司法腐败等传统监督机制失灵甚至失控等严重问题。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极左和传统僵化思维的束缚,过去的20年,新闻体制虽自身经历变革但并未从根本上触动和放开。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就必须保证新闻舆论监督,以现代舆论监督的力量补充司法监督、立法监督、行政监督等的不足。

——新闻立法,来一次深呼吸

对于享有比较充分的新闻出版法治这一点,西方新闻界一向是引以自豪的。

美国国会于 1791 年通过了宪法的十条修正案(又被称作“权利法案”),其中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申冤请愿之权利。”它奠定了美国新闻自由基石,一直是美国新闻界的尚方宝剑和护身符,并在以后一系列重大新闻案件中不断被援引。

同样的,加拿大宪法也于 1982 年,保证加拿大人民“得以在开放的社会中,享有自由而蓬勃发展的新闻”,其实这早就是加拿大的传统,这份文件只是付诸文字的确认而已。

1789 年 8 月 26 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第十一款提出了关于新闻自由原则的最光辉的声明:“自由表达和传播意见与思想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只要在法律限制范围内,担负起此项自由的责任。”

德国鉴于法西斯统治的惨痛教训,在宪法第五条对新闻自由作了慎重又明确的规定:“(一)每个人有通过可利用的渠道不受阻碍地获得信息的权利,有使用口头、文字、图像的形式自由表达和传播自己意见的权利。新闻自由和通过电台及影片进行报道的自由受到保护。没有新闻检查。(二)这种规定受到现有宪法规定的约束,受到保护青少年的法律规定以及个人名誉权利的约束。”

在这些法律条文的保护下,西方各国都取消了新闻检查(事后追惩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取消了报纸、杂志的出版登记;允许记者采访除属国家机密外的任何部门和查阅除属国家机密外的任何

第四种权力

材料。

关于新闻检查,中国曾有一个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被批评单位的上级审阅批准。前一阶段,《焦点访谈》批评山西交警乱收费的报道,以及《南方周末》揭露昆明市某区公安局负责人的儿子仗势侮辱残害多名少女的文章,突破了这一限制,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这只是个别行为的冲击,而不是对制度缺陷的冲击。对这样的禁区,不但需要大量个别行动突破的积累,更需要立法的规范来保障成果,而不应随领导人的好恶改变、政治空气的松紧而反复。

关于新闻立法,从80年代初期开始动议,中期呈现积极研讨和草拟《新闻法》的活跃局面,末期基本形成了框架。随着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新闻出版立法的步伐,《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法》几乎呼之欲出。但进入90年代,这一重要工作反而止步不前。

新闻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新闻自由。具体地说,就是保障公民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情况、表达意见的权利,保障新闻媒介正当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和评论权;同时依法限制滥用自由的行为,规定新闻媒介对于泄密、干涉公正司法审判、刊播虚假信息和广告、进行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保障性的法制规范是新闻媒介进行舆论监督、履行社会职责的根本前提之一。法治使规范具有了统一性、确定性、强制性和权威性。无法可依,只靠行政指导和政策调整,规范笼统模糊、充满弹性,经常出现因领导人、时间、地点和部门的不同而被随意解释的情况。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国目前新闻媒介无不隶属于各种各样的党政部门,不但很难以公众媒体的姿态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经常和制度化的舆论监督,而且容易成为主管主办部门彰显政绩、隐恶忌医的自我宣传、自我保护工具。

当今世界上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不对新闻事业实行法

治的。但我国在新闻法治方面的力量很弱,今后只能迎头赶上,没有理由再作拖延。而且,保障性的新闻立法将使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从中获益:一、新闻媒介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将各种社会焦点问题反映出来,让人们看到决策层在面对而不是回避社会矛盾,而且全社会都必须面对和思考同样的问题,这样会使决策者的直接压力减小。二、通过新闻媒介的参与、沟通和引导,能够使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直接摩擦的可能性降低,理解和宽容度加大。三、充分的信息流通和舆论监督可以为现存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的舆论基础和社会心理准备。四、有利于整个社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法制化、秩序化,很多问题经新闻媒介反映出来,经社会广泛参与讨论而形成的措施和规则,在执行和实施中比闭门造车出来的法律和规则要积极和顺利得多。五、许多新问题、新矛盾及时通过新闻媒介反映出来,容易从一开始就使可能激化的冲突得到缓解或释放,新闻媒介也容易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促进社会发展建设性地着眼于全局和长远的利益价值观。六、有利于中国新闻事业向现代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从审批制到登记制,路有多长

国外出版社之多实在令人瞠目结舌,也许这是出版自由最生动的注解。新闻出版自由至少包括,不受批准即可自由出版报刊书籍,即不必向政府申请营业执照或交付保证金;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受限制,人人都拥有出版权。美国的出版社逾万家,日本的出版社 5000 家,台湾的出版社是我们的十几倍,就连弹丸之地香港登记注册的出版机构也超过 3000 家!

简单类比的直接后果,便是 80 年代国内出版社“雨后春笋”般地裂变生长,1982 年全国出版社总数约一百三十余家,几番“分社”之后,原有的一家省级人民出版社“母鸡孵蛋”似地裂变为若干专业社:教育编辑室扩建为教育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扩建为文艺出版社,科技编辑室扩建为科技出版社……雪球一路滚下去,国家机

关、人民团体、大专院校、公安武警也纷纷建社挂牌。短短几年,300家、400家、500家,新出版社数不胜数,一路攀升!仿佛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泱泱大国倘若没有成千上万家出版机构,便气虚志短,便失去了“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光华!

正是因为“审批制”,激增后的出版社只增不减,只生不灭。新成立的出版机构完全纳入计划经济模式,叫你“审批”书号、选题,“审批”买汽车、建宿舍、办公楼和“生老病死全包”的进入指标,弄得手握审批大权的政府机关苦不堪言。于是在全国出版社总数突破550家、年出书品种突破10万种的时候,新闻出版署不得不着手“治理整顿”,坚决实施“从片面追求数量增长向提高质量效益”的“阶段性转移”,给重复建设、盲目膨胀的出版业亮了红灯!

此时人们再回头瞅瞅国外:美国的1.3万余家出版社,年出书300种以上的仅3200家,其余八九千家出版社往往只是某企业一个附属机构,年出书1—3种;甚至有的出版社或转向、或停业,多年也不出一本书,仅在工商总署的电脑里注册着一个社名。英国1万余家出版社,正常出书的不过4000家。德国堪称“出版强国”,它的1.4万家出版机构是包括文化、咨询、音像电子、电脑软件的“大出版”概念,真正的图书出版社仅3000余家。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出版社多如牛毛,但相当一批是“皮包公司”和“夫妻店”。台湾1997年登记在案的出版社5400家,扣除全年没有出书,或仅从事经销,或只出版杂志、内刊者,市场中真正营业的出版社不过1534家。其规模是1~10人的社占71.7%,11—20人的社占13.3%,21—50人的社占8.1%,51—100人的社占2.8%,100人以上的社仅为4.1%。

但我们已经齐刷刷站立起来的565家出版社,最小的规模大约也在五六十人吧!这么多年,除了违规出坏书被行政吊销牌照之外,所有的出版机构均受国家政策保护,不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中,与所有企业一样,出版社的生存永远是动态的。美国时代·华纳出版集团、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恪守这样的信条:“我们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

无国界的资本运营,优胜劣汰,发达国家崛起了一个又一个大型、超大型的出版集团。比如美国的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时代·华纳出版集团,汤姆逊出版公司,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读者文摘出版集团,德国的贝塔斯曼出版集团,荷兰的克伦威尔出版公司,加拿大的禾林出版公司以及日本的讲谈社、小学馆等等,都是资本雄厚、出版量大、营销有术的现代出版企业。

这些国家的出版企业的设立与中国出版迥然不同,他们完全把出版社当作企业,当作现代产业,只需采取工商企业的“登记制”,投入资本,申报注册,即可运作。

审批制、登记制,泾渭分明,各行其道,标志着现代出版中完全不同的两种运行机制。

中国知识分子们盼望了20年,希望或者说梦想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法》来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终于在1997年1月2日等来了一部《出版管理条例》的颁布。业内人士最为关注的出版社的设立与管理,还是“审批制”。

《出版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设立出版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 (一)有出版单位的名称、章程;
- (二)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
- (三)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 (四)有3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 (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 (六)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编辑出版专业人员。

审批设立出版单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

这个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阵地意识”的审批制,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实行的登记制有本质的区别。

世纪末的中国人,浮躁的心思被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鼓荡着,他们一边回头历数改革开放以来自己丧失的种种机遇,一边又以20年间积累的资金、实力、经验和改革热情,把新的投资开发热点投向了看似平静的出版业。

相当一批文化人、企业家、二渠道书商和早想由出版社“出道”的业内人士,尽管谁都知道在中国申报出版社最要紧的条款不是钱,仍旧明知故问:30万元,能否注册出版社?

还有工商企业的经营者,手握大笔资金,寻求新的资金利润率,寻求与信息产业、高文化产业的投资热点。比如北京一家出版社策划出版“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光碟,苦于资金匮乏,难以成功。秦皇岛耀华玻璃集团果断投资2000万元入股,项目成功,回报丰厚。企业家们由出版尝到了甜头,他们也试探政府的口气:提倡企业文化,能不能申办出版社?

更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久经商战、摸爬滚打的欧美大出版集团的投资家和决策人,他们习惯转动地球仪来激发投资灵感。他们以绅士气派叩击门扉虚掩的中国出版市场:尊敬的阁下,外资企业到贵国注册申办出版项目,共谋发展,请问注册时应付美元还是马克?其实,高鼻子老外早已研究了我们的《出版管理条例》,知道在中国设立出版社,“最难攻克屏障是第二条、第六条及其附注”——这是两种体制的根本分歧。

人们议论纷纷,人们心中忐忑,人们不明究里却又翘首以待。谁都知道,人们期待的或许并不是“30万元资本注册出版社”,人们真正期待的是,中国出版在改革开放20年之后还能有何作为?

现代出版业的本质是信息传播业在信息资源丰富、信息流动

频繁、信息手段多元、信息消费量激增的时代,完全应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出版产业自身法则来组织出版活动,既追求良好的出版导向和社会效益,同时也追求社会资产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实行出版单位企业化、出版组织专业化、出版经营集约化、出版物市场最大化,从而使中国出版尽快成为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结合的“朝阳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强质产业。90年代,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包括出版在内的信息产业,以每年30%的速度持续稳定发展,大大超过商业、交通、通讯、金融和保险业,其增幅相当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10倍。我国出版业的产业化发展远未达到这样的速度。

12亿人口的中国,给中国乃至世界出版业以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

过去,我们失去过太多的机遇。现在不应当再失去机遇了。机遇是时间,机遇是财富,机遇是中国出版生命线!

那么,从审批制到登记制,路有多远?

——第四种权力:舆论也需要监督吗?

发生在1998年多事之秋的临床顿绯闻案(又称“拉链门”事件)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舆论监督的威力。当然,最重要还是独立检察官制度和弹劾程序,但是新闻界的穷追猛打、全面出击也功不可没。我们无意涉入有关隐私权和此案背景的讨论,只是惊异于美国舆论监督何以如此深入,有所作为,相形之下我们的新闻界对于某些腐败行为实在是太无力了!

在美国,新闻监督决定了美国的政治公开化以及对政府权力的制约。除了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之间具有相互制约的关系外,公众的舆论无疑是约束权力的一种权力。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把新闻自由的实践看作是探索美国民主政治体制如何有效运作的伟大尝试。他反复指出:“人民的意见是各级政府的基础。”“人民是统治者的惟一监督者。”“要使他们永远关心国事。假

如他们一旦不关心公共事务了，那么你和我，以及国会和州议会，法官和州长，都要变成豺狼了。”人民有权监督政府，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来实现呢？杰斐逊认为，最主要最经常的中介就是报刊，于是有了本章开头所引的那段著名的话。

1998年9月28日《民主与法制画报》上发表的樊尔文章实在是太精彩也太精辟了，本书不忍割爱只能全文照引：

自从朱镕基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并给《焦点访谈》题词后，“舆论监督”“群众喉舌”一夜之间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与过去的“舆论一律”相比，现在能郑重提出并充分肯定“舆论监督”的意义，无论如何是一大进步。只是中国自有其特殊国情，传统习惯势力总是有办法将什么好东西一经拿出来就全变了味。“舆论监督”一不经意间就变成了“监督舆论”，且看引文“舆论监督还是监督舆论。”据介绍：海南省“全国首家新闻舆论监督中心”隆重挂牌，由宣传部长做主任，3家媒体各派1名处级以上干部做副主任，中心设4人编制，各媒体再建分部。中心的任务，据报道为“统一确定（报道）主题，统一指导思想，统一步骤和方式，统一协调行动，搞兵团作战”云云。鄙人年迈迟钝，实在猜不透：在全国大刀阔斧精兵简政的改革关头，海南搭建这个“中心”究竟算个啥？部长亲自指挥出几个“统一”，便能“锋芒对准腐败，矛头直指歪风”了么？作为新闻老兵，我且质疑几句。

海南媒体也有多家，任务和特色自应迥异，本可按党的方针政策各显神通，文责自负，有合作更有竞争。党委宣传部即使是省委宣传部，受省委委托，可对省内媒体进行领导监督，但也只应限于方针政策指导。这才能算作文明超脱的领导，党委也可保持高超地位和清醒头脑。领导不是统治，这本来明确浅显的组织原则，不幸经过多年极左摧残，实已面目全非。如今海南省造出一个“监督中心”，部长指挥“兵团作战”，很可能搞成“一张嘴定调，一支笔审稿”，媒体特色尽失，受众有权不订，不看，媒体还怎么活下去？回忆

“大跃进”时，大城市也曾抽调记者搞联合系列歌颂特写，经领导锦上添花，全都成了既臭又长的“假大空”，参与过的老记者还为伪造历史而耻辱沉重，如今中青年同行更应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啊！

据传媒透露，海南省最近接连曝出腐败大案，如东方市的书记贪赃枉法被判死刑。但万宁市的“假公安”案尤为惊人：该市公安局在岗 510 人中，未经合法手续混入的便有 265 人，大都为干部亲属，有大官开私人便条从后门塞进的，也有花了几万元买进的，其学历、经历大都胡编乱造。面对如此局面，省领导尤其要沉着冷静，责成省内政法、党纪部门尤其是公安厅去万宁市一查到底，首先查查那些串通作弊的大小官员；也可组织记者参与采访，如实报道，向中央和百姓有个交代。而另一报道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位广州记者到万宁市，公安局办公室人员推说“要局长批准才可接待”，好不容易找到局长，他又推说“要凭海南新闻中心的介绍信才可采访”。我暗自忖度：海南推出这个“新闻舆论监督中心”，既已控制本省媒体于掌握，又阻挡异地记者于门外，把它改称为“监督新闻舆论中心”，是否更为恰当呢？

呼唤“舆论监督”，却落了个“监督舆论”，中国的事情也大抵如此。沉思之余，愈发感到新闻法制化之路任重而道远。

2. 点破美国精神

——杰斐逊：对自由的困惑与坚守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你追求阳光，就躲不开身后的阴影。

——某哲人语

美国出版自由传统的形成，与托马斯·杰斐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杰斐逊对新闻历史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促成通过了美国宪法的十条修正案；同时，他作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对于报界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从而确立了报界独立于政府的特殊地位。

1776 年 7 月 4 日，杰斐逊在大陆会议上主持起草并通过了

《独立宣言》。宣言指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是生而平等的，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等权利。为了确保这些权利，人民建立了政府，它们的权力是由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产生出来的。当任何形式的政体妨害了这种目的时，人民有权力去改变它，或废除它；人民有权力建立新政府，它必须建立在最能保证人民的安全和幸福的原则上，其政权的组织形式也要以此为依归。”不难看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乃是那些不可让渡的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这种包括言论出版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787年公布的主要是由汉密尔顿起草的宪法草案中，虽然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但在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方面，却比《独立宣言》倒退了许多。此时杰斐逊正在法国担任公使，他对于这个草案极为不满。由于他的宣传鼓动和共和派的压力，终于在1789年补充了宪法的前10条修正案，作为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法案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订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至此，言论出版自由才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新闻自由原则终告确立。

不过，法律终归是法律。在华盛顿、亚当斯担任总统，即联邦党人执政的时代，新闻自由并未得到切实的保障。据说，亚当斯执政时国会制订的《外侨法》、《煽动法》，就是专门用来对付政府的敌人的。《煽动法》规定：“凡书写、印刷，口头或书面发表……任何捏造的、诽谤和恶意的文章……攻击合众国政府，或国会两院中的任何一统……或在职总统……或抵制、反对或政击任何此类法律者……处以2000元以下罚金并处两年内监禁。”据此，一些攻击亚当斯的人被起诉，以致被关进监狱。奇怪的是，这些法律并未影响到联邦党人对杰斐逊的攻击。

上述情形在1801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年国会里共和派议员挫败了联邦党人将《煽动法》延长两年的企图，同时，杰斐逊当选

为美国第三任总统。跟前面两任总统相比,杰斐逊对新闻自由的维护是很真诚的。

在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正是美国新闻史上所称“黑暗年代”的政党报刊时期,联邦党人和民主党人利用各自报刊相互攻击、造谣、诽谤、谩骂,甚至大打出手。杰斐逊作为民主党人的代表成为联邦党人报刊攻击的首要目标。即便如此,他仍始终如一地为新闻自由辩护。1787年,他在给朋友卡林顿的一封信中说,“我深信人民如有良好的判断力,将会是最佳的武器。他们也许会一时被误导,但是不久就会自行纠正错误。人民是当政者惟一的监督,即使他们偶会犯错,对政府机关来说这仍是基本原则。如果因为他们犯了错,就给予过分严苛的惩罚,很可能就此压制了人民自由的惟一守护神。要避免人民的不当干预,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报纸的渠道,提供他们充分的资讯,而且要设法让报纸能够深入全体民众。民众的意见是政府的基石,因此,首要目标就是让他们保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如果要我在政府和报纸之间二者择一,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杰斐逊如此重视报纸,重视新闻自由,在于他的坚定信念。他认为,人们只有利用报纸,自由地交流思想,才能认识真理,人们的分歧通过自由讨论而自行澄清。只有提供新闻的自由和发表各种言论的自由,人民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政府才能听到人民的意见。而且,报纸自由是人民其他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哪里报刊是自由的,并且每个人都能阅读它们,一切就是安全的。”虽然杰斐逊有时痛心疾首,有时心灰意懒,他曾愤怒地写道:“报刊随心所欲和撒谎到放肆的程度,从而使它完全丧失人们对它的信任”,“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是,禁止报刊发行反而比放纵那些荒诞不经的谎言泛滥使国家的利益受到较小的损害……,从来不看报的人要比读报的人消息更灵通”,但他仍然满怀美好的理想进行新闻自由的伟大试验。

对于那些“塞满谎话、诽谤”的联邦党人报纸,杰斐逊仍打算

“保护他们造谣与诽谤的权利”，他表示“甘愿将自己作为一项伟大的试验，以证明一个公正、廉洁而得到人民了解的政府，即便是荒唐报纸的谎言也不能将其推翻。那些在法律范围内约束自己、尊重事实的报纸，其攻击当然更无妨碍。这种试验在向世人说明，出版自由与平民政府不能并立的见解显然虚妄。因此我对许多诽谤我的文字，从未加以反驳。报纸任意说谎毫无力量，已为确定的事实。我只有让别人叫他尊重事实，以恢复其力量。”从这些论述中，不难领略到杰斐逊的胸怀。在世界新闻史上，还找不出第二个如此宽待报纸的政治家。正是杰斐逊执政时期，美国新闻自由的传统才得以最终确立。

——自由与安全，哪一个更重要

知情权即公民拥有知情的权利，本来是新闻自由应有的题中之义，但真正提出知的权利不过是最近40年的事，因为政府的保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新闻采访。号称新闻自由程度最高的美国就有两条法律实施保密。一是1789年的档案管理条例，规定政府机构的负责人有权决定本部门文件的管理、使用和典藏办法；二是1946年的行政制度法规，规定政府为了正当理由即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对有关文件保密。

在近30年中，有两件大事使公民的知晓权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一是在1958年、1966年国会两次通过的消息自由法案，规定公民有权使用政府的文件、记录、政策声明等档案材料，如申请遭拒绝，可向法院起诉。二是1971年的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案”。

1971年初，美国著名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雇员丹·埃尔斯白格向《纽约时报》秘密送上了后来以“五角大楼文件”闻名的美国国防部秘密档案。它记载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68年美国卷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官方历史，证明了林登·约翰逊政府在美国卷入东南亚方面事实上奉行着一种欺骗、制造假象和耍花招的政策，包括掩饰美莱村大屠杀的真相，对柬埔寨的持续轰炸。这份报告多

达 47 卷 250 多万字,文件副本上都有“绝密”字样,是对越南战争感到失望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拉马洪在 1967 年 6 月下令编纂的。《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尼尔·希恩带领一群助手躲在一家饭店里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纽约时报》对“绝密”字样不予理睬。从 1971 年 6 月 13 日起以“越南档案:五角大楼研究,追溯三个年代美国的卷入”为标题,开始连载这批文件。《纽约时报》素有发表政府文件的传统,早在 1918 年就由于发表关于一次大战的报告、文件和名人演说而获得第一枚普利策为公众服务奖章。尼克松政府一方面下令白宫人员不得与外界接触,一方面,政府行政部门向法院起诉,要求政府的司法系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判决报纸中断发表这些秘密文件。文件发表的第三天,美国司法部下达一项临时禁令,此举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新闻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非战争状态下事先限制发表印刷材料,是明显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而在尼克松总统的默许下,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认为,如果《纽约时报》继续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就会立即使美国国防利益和国家安全受到巨大的损害”。

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也弄到这一份文件,只有两大箱的影印文件,没有索引,没有排列顺序,布莱德利和一个工作小组日以继夜在他家里整理文件内容。同时,在隔壁房间里,一整队律师累积出越来越多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刊行这些文件是愚蠢疯狂的举动。终于,在如果要发表这些文件则印刷机开动的最后 1 小时内,先是布莱德利,然后是律师群,打电话到《华盛顿邮报》老板凯萨琳·葛瑞姆家里——当时她正在举行户外晚宴——向她汇报这个举动的得失;这时只有她才能作出决定。“我说:‘印’。”凯萨琳·葛瑞姆终于这样宣告。第二天,亨利·基辛格,当时是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打电话到凯萨琳·葛瑞姆的办公室。“凯萨琳,你听说了吗?”他问。“苏联大使安纳托利·多李力雷说,他现在在华盛顿已无事可做了,因为《华盛顿邮报》已经把美国所有的秘密都公开

出来了。”

于是,《华盛顿邮报》成为政府控告的第二家报纸。其他一些报纸,主要是《波士顿环球报》也刊登了一部分五角大楼文件,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是政府控告的主要对象。

经过地方法院审理和一级级的上诉之后,终于经美国的最高法院一锤定音,以6票对3票的结果判决新闻界胜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雨果·布莱克,针对这个案子说了一段著名的话:每一次企图用法庭判决去阻止报界,总会导致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恶名昭著以及不可原谅的违背。这一案件轰动一时,在美国立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国会又在1974年通过“消息自由法案补充法案”和1976年的“阳光普照法案”,进一步削减保密范围,加快申请使用政府材料的过程。以后,西方不少国家,像英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都仿照美国制订了消息自由法案。关于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美国的开国者之一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之中。”当一切都是公开的,一切都在全民的监督之下,就不再有阴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可能发生的错误决策将会尽早地被纠正,这样的国家,其安全才是有保证的。在新闻自由这个问题上,如果忽略一些次要的因素和争执,真正能够对新闻自由构成威胁,真正能够使新闻自由作出让步的,就是所谓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而政府希望不公布于己不利的材料时,不费力气就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借口,莫过是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了。正因为如此,这正是美国新闻界的恐惧,美国人民的恐惧。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是美国政治生活运作中最强有力约束的一环,一旦它被“国家安全”炸开了一个借口,一个拥有强大权势的美国政府,会很容易地制造一些缺口,轻易地拿走人民的一点点自由;一个聚有巨大财富的美国政府,会迅速腐败下去,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在自由与安全面前,美国人民艰难而坚定地选择了自由。

——自由的界限在哪里：诽谤罪与隐私权

新闻诽谤是西方各国涉及面最广、案情最为复杂，也是令新闻界、司法界最挠头的案件。“不准使用新闻媒介诽谤他人”是西方任何国家新闻法规必备的条文。但一涉及到具体案件，是否构成诽谤罪，是轻微伤害还是严重伤害，那就变得非常复杂，有时官司一打几个月甚至拖上一年半载。

什么是诽谤？各国法律的解释各有不同。美国法律研究会编辑的《法律的重述》所下的定义为：“无确凿的证据而散布对他人不真实的事实并损害他人的名誉。”“传播足以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使其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或有碍其与第三人的往来。”

诽谤的对象一般有三种：一是个人（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官员）；二是某个特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三是企事业单位所生产的产品（包括服务）。

诽谤罪的确认一般有四个条件：一是特定的对象，可以让他人确认的对象，不是泛指。例如“无官不贪”、“无商不奸”，虽然指责了所有政府官员、所有商人，但不是指向特定对象，不构成诽谤罪；二是歪曲、夸大、捏造事实；三是必须含有恶意；四是公开传播，造成对象的名誉损害。

在新闻媒介，批评政府以及政府官员时，西方国家有一个传统原则：公正评论。这里包括两个条件：一是真实，只要材料是真实的，任何批评都将是合法的；二是公正，不是出于恶意。否则，很可能触犯诽谤罪。

只有虚伪不实的陈述才是诽谤，事实真相绝对不是诽谤，这一沿袭至今的原则是由曾格案件奠定的。

案件的主人公曾格是一个贫困人家出身的出版商。1733年11月5日于纽约创刊了《新闻周刊》。这家周刊虽然在业务上不怎么出色，但是作为纽约平民派的代言人，它激烈地批评殖民当局，受到了纽约公众欢迎，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殖民总督考

斯比极为不满，他一方面指控曾格是“对政府进行无耻中伤，恶毒谩骂，和煽动性责难，”另一方面又命令他一手提拔的首席法官德兰西想办法要大陪审团对曾格提出起诉。但大陪审团拒绝起诉，而议会也不想对曾格提出任何控告。最后总督考斯比只有自己发布命令，于1734年11月17日将曾格予以逮捕。曾格被拘狱中，《新闻周刊》仅脱刊一期。其余各期，均由曾格在狱中编辑，继续出版达9个月之久。该案于1735年8月4日正式开始审讯。政府的起诉书以《新闻周刊》发表的几篇文章为依据，这些文章断言人民的自由与财产业已受到政府的严重威胁，因而控告《新闻周刊》构成了诽谤罪。这场官司的审理轰动了整个北美殖民地，一位80岁高龄的老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从费城来到纽约，充当曾格的辩护律师。

汉密尔顿在辩护中指出：“发表控诉是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所享有的权利。”他承认他的当事人曾格确实印刷而且发表了检查官提到的文章，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些文章就构成了诽谤罪。他对检查官说：“在宣布我的当事人是一个诽谤者之前，你还得搞一些名堂，你须得证明那些言论本身是诽谤性的，也就是说说是假的，恶毒的，煽动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无罪的。”他坚持说只有“谎言才能构成中伤，才构成诽谤，”并且主动要求去“证明这几篇被称作诽谤的文章所讲的是事实。”

当法官表示不允许“将明显的诽谤证明是事实”，并正告不许与法庭抗争时，汉密尔顿直接面对陪审员吁请他们作为自由人，根据自己的良心行动，不要怕官方的报复。汉密尔顿表示：“我虽已老朽，然而一旦有必要，哪怕到天涯海角我当在所不辞，只要我的服务在那里能为扑灭依据检查官的告发而提出起诉的火焰起一点微薄的作用；这种做法是由政府实行的、旨在剥夺人民对那些当权者独断专行的企图提出抗议（还有控诉）的权利，正是那些人伤害和压迫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激起人民呐喊和控诉；然后再将人民的控诉作为新的压迫和起诉的根据。”汉密尔顿对陪审员说：“你们在

此审理的，并不是那位可怜的印刷商的事业，也不仅仅是纽约的事业。不是的，它的后果会影响到美洲大陆上生活在一个英国政府统治下的每一个自由人。这是最重要的事业，是自由的事业。”他呼吁陪审员们以公正廉明的裁决来保证“大自然和我们国家的法律赋予我们应享有的权利——自由——这就是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写出来以揭露和反抗（至少在世界的这些地区）专断权力的自由。”结果，汉密尔顿的答辩胜诉，陪审团作出了“无罪”判决。曾格获释，和汉密尔顿一样，成了美国新闻界的英雄。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公报》发表了一封伦敦读者来信。该信引述一位法律与政治学家的意见，谓汉密尔顿所述之原则，“虽不是法律，实优于法律，实应成为法律，而且在任何正义伸张之处，一定永为法律。”汉密尔顿的答辩，写下了出版自由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美国 1960 年的“沙利文案”和 1983 年的“沙龙案”对确认新闻媒介对政府的批评权利具有重大意义。“沙利文案”的发生是在 1960 年。这是黑人的入权运动最风起云涌的年代。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前夕，是种族问题最敏感，也是种族冲突最容易爆发的时候。那年的 3 月 29 日，《纽约时报》以整版刊登了一幅广告。这是由 64 人签名的一个宣传广告，签名人中间包括一些南方的黑人牧师。宣传的内容是当时在美国南方黑人进行的非暴力示威行动。他们呼吁着：“在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的许诺下，我们有权利以人的尊严生活。”接下来，这份宣传广告谈到，黑人遭到了由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所教唆的“恐怖浪潮”的攻击，还举了一些警察虐待黑人的例子。可是，事后发现，这些例子有很多不实之处。

看到这份宣传广告之后，蒙哥马利市专管警察部门的一名政府官员，名叫沙利文的，向法院告状，以诽谤罪告《纽约时报》和四名黑人牧师。尽管那个宣传广告上的指责，并没有揭到他的名字，但是他认为，既然他的职位使他必须为该市的警察行为负责，因此，《纽约时报》刊登的广告，已经诋毁了他的名誉。一开始，法院的

陪审团判给他 50 万美元的损失赔偿金。而且,阿拉巴马州高级法院支持了这一判决。

《纽约时报》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这时,已经是 1964 年了。

《纽约时报》的律师辩称,这篇宣传广告是由 64 名知名人士签署的,如果他们知道内容不实,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故意的诽谤行为。至于《纽约时报》,他们并没有责任要对发表的东西作精确的核实,他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新闻自由,有权决定是否发表。

最高法院一致通过推翻了初级法院的判决。并且,针对公职人员提出的诽谤案,第一次宣布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公职人员遇到不实的批评而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不能以诽谤罪要求赔偿金,除非他能够提出证损,证明这是出于“真实的恶意”。请注意,当事人要拿出这样的证据,证明新闻媒体事先就有诬陷的企图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公职人员几乎不可能打赢这样的官司。法庭同时指出:在自由辩论中,发生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必须保护新闻界有“喘气的空间”,使他们有可能生存下去。

最后,最高法院在全体一致的判决书中写道:“宪法第一号修正案的规定,旨在提倡大胆的揭露。辩论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准确的说法。如果抓住这些错误说法,特别是对议论政府部门工作时出现的错误说法加以惩罚,今后就会窒息这种讨论……对于公开问题的讨论,应当是不受约束的,大胆地开放绿灯。”

在三年以后的另外两个案子中,美国最高法院又把这一原则从“公职人员”扩大到了“公众人物”。在 1986 年,这一原则再一次扩大到“卷入公众事物”的普通人。

“沙利文案”涉及到的是部分事实的失实,而“沙龙案”涉及到一个事件关键性问题上失实。1983 年 2 月,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了 1982 年 9 月发生在巴勒斯坦两个难民营内的大屠杀经过。报道中提到,当黎巴嫩总统杰马耶勒遭暗杀后,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

沙龙曾和杰马耶勒家属讨论过复仇一事。1983年6月,沙龙专程赴纽约,向联邦法院起诉,认为《时代》的报道暗示他曾鼓励乃至教唆了这场大屠杀,对他构成诽谤。虽然法院的调查确认《时代》对上述细节报道失实,但《时代》杂志并不是故意的、恶意的,沙龙败诉。

无论是“沙利文案”还是“沙龙案”,都可以看出,西方一些国家对新闻媒介的诽谤罪的确认主要针对公民个人(包括法人组织),而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公务活动的批评、指责,只要不涉及个人私人生活,一般都从严控制,作出有利于新闻媒介的判决。对比中国,《宪法》第41条有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美国的《法律大辞典》对隐私权下了这样的定义,隐私权是“不被干涉的权利;免于被不正当地公开的权利……个人(或组织)如果愿意,可使他本人和他的财产不受公众监视的权利。”

隐私权虽然是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存权,但在西方各国的宪法中都没有提到这个概念。在法律词汇中出现隐私权的条文还是近百年的事,但也只有近几十年才逐渐被社会所重视。因为随着各种电子监视器无孔不入地侵人人人们的私生活,人们越来越感到正常生活受到威胁,需要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威廉·布鲁塞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新闻法规》一书中对侵犯隐私权的情况分为四类:(1)闯入原告的私人禁地。例如记者用远摄镜头、监听器或装扮成其他身份的人混入他人家庭、病房或私人聚会获取材料,并在媒介上公开传播。但在公共场合所获取的任何个人资料均不在此列;(2)公开私人物件,使原告的正常社会生活被破坏。例如未经本人同意,公开私人信件、日记、病例、档案;(3)在公众面前将原告置于错误位置。例如,某家地方报纸在报道警察抓获一名盗窃犯时,不小心将协助警察抓盗窃犯的居民名字错写成盗窃犯,该居民上诉当地法院,获得50万美元名誉赔偿费;(4)未经本人同意,利用原告的姓名、肖像等进行商

业活动,例如刊登商业广告、拍摄广告片等等。

在确认诽谤罪时,真实性是防止触犯诽谤罪的最强大武器;但在确认侵犯隐私罪时,真实不起作用,惟一能起作用的是“新闻价值”。法院在判决时,常以传播内容是否有新闻价值作为决定性依据。例如,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女儿安娜公主在度假时,和其男友在游泳池裸体游泳,被人偷拍照片,登在报纸上,引起全英轰动。安娜公主上诉法院,法院以此照片有新闻价值为由,令安娜公主败诉。

对隐私权的侵犯也有除真实性外道德上的强大限制。1991年3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了肯尼迪外甥史密斯涉嫌强奸案。在报道这一案件的过程中,《纽约时报》、全国广播公司等竟无视个人的隐私权利,公开报道女事主的姓名,发表叙述女事主身世背景的特写,引起了新闻界内外的强烈不满,《纽约时报》社内部有100多位编辑、记者以及其他职工联名向报社当局提出书面抗议,使该报陷入危机。经过全编辑部300多人开会激烈争论,《纽约时报》于4月26日刊出向读者致歉的启事,表示该报将引以为戒,“在可能的范围内,以及符合正确新闻标准的要求之下,保护性犯罪中被害人的身份。”

但对于公众人物,即使是出于道德上的原因,也很难在与报界控告诽谤罪中胜诉。事情发生在1983年,美国一家较大的色情杂志刊登了一份以滑稽漫画形式出现的烈酒广告,广告的漫画虚构了这样的情节,挖苦一个叫弗威尔的“公众人物”,说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喝醉酒后同他的母亲在户外的小屋里发生的!弗威尔不干了,他没法把它当什么滑稽玩笑接受下来,一纸诉状告到法院。他的诉状分两部分。第一条,是诽谤罪,被陪审团否决了。理由是这种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胡闹的,根本不会有人当真,也就谈不上什么诽谤。另一条,要求精神伤害赔偿,陪审团同意了,判给他20万美元精神创伤赔偿金。这一判决立刻引起了政治漫画家、艺术家和

连环画作家的严重关注。他们时时都可能画些戳痛公众人物的东西,要是一张漫画就可以判决精神损伤的巨额赔偿的话,界线在哪里?但是,1986年巡回上诉法庭支持了初级法院的判决。

两年后,当最高法院复审时一致同意:一个公众人物,当他受到讽刺挖苦的时候,不论它是多么具有伤害性,甚至有色情描写,都不能要求损害赔偿。公众人物是经常受到讽刺挖苦、漫画化甚至丑化的。首席法官说,考虑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普遍原则,我根本就没打算提供一个例外,让它在这种事情的对错中间划上一条界线。对于最高法院,诽谤罪的解决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寻求的目标,确保新闻监督的功能,以维持社会的健康正常动作。因此,判案时就可以避开细节的纠缠,避开在低层次的是与非之间划界线,而作出高一层次的原则性判决。新闻出版界也有自己的一套自然约束,裁决报道是否属实,以挽回当事人的名誉损失。

——报道权利与公正审判

翻开一份《北京晚报》,你可以在某个版面发现有关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案件的预报,并且欢迎公民自由旁听和记者主动采访。这也是个新鲜事,表明中国在司法公开的道路上大大推进一步了。

美国新闻界认为报道权利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宪法权利。因为报纸如果无权采访消息、报道消息,那么出版的权利和批评的权利就都成为一纸空谈,无从实现了。否认报纸的报道权利,就是否认“人民的了解的权利”,就是否认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因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是民主与自治政府。公民的知情权——有权了解政府的活动,使用政府部门的文件、记录,是民主制度固有的权利。

美国政府、国会、法院都有允许报纸采访、报道的传统,政府有发布新闻的制度,官员有接受采访的习惯。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自1789—1795年,允许记者列席(秘密会议除外)。法院开庭允许记者采访,但这是根据公开审判的原则,并无特别的法律规定。

庭长有权决定何种案例不公开审判。国会还专门制定了法案以保障媒介的“报道权利”。

新闻界坚持公众有权知道,而政府则在某些敏感问题上用公众“需要知道”代替“有权知道”,并随时以“国家利益”作为拒绝媒介暴露真相的挡箭牌。但是,目前而言,西方各国在保障新闻自由和公开化方面是做得不错的。美国国会议员对于所有重大问题的立场,更是在美国民众的监督之下。美国国会的听证,除了一些外交国防秘密之外,一般都是公开的。而且,它对于各种问题的投票情况也是公开的。就是每一个议员对各种议题,投的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都不能瞒着他的选民。国会议员们在国会发表的讲话,法律规定美国老百姓都有权向国会索取。另外,整个听证过程都由一个专门的电视频道现场转播。这个频道很奇怪,常常在很晚的时候还在播国会听证,由于已是下班时间,国会议员们也都下班了,除了主持人和书记员几乎没有什么人听,一个议会大厅里空空荡荡的,那发言的议员照样在那里滔滔不绝。这是因为重大议题排满了白天的议事日程,如果议员对各类问题还有意见要发表,就只能排在晚上。但是,他并不是在白说,除了有记录在案,他的选民也可以在电视里知道他的态度。

倒是新闻自由与舆论监督对司法工作造成的一些不当干扰值得注意。美国新闻界由于片面强调新闻自由,在新闻取舍上持“宁肯因发表了报道而犯错误,不愿因封锁新闻面犯错误”的态度,从而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伤害(这与中国蒋介石时代的“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相映成趣?)。

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报道就是这一方面一个典型的例证。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当天,警方将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德抓获。由于顶不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新闻媒介记者的纠缠,因而警方只得将本应秘密进行的审讯、转移凶手的工作改为公开,使犯罪集团获得了杀人灭口的机会(例如中国台湾的

白冰冰、白晓燕事件,公众舆论认为新闻界有罪。还包括戴安娜车祸事件,新闻界负有连带责任)。两天后,凶手奥斯瓦德被暗杀,使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调查工作无法继续下去,在美国历史上增加了一个千古之谜。

新闻媒介的舆论审判手法尤不可取,因为它将严重影响甚至干扰司法工作。不少新闻媒介在报道司法工作时常常带有倾向性,从而使司法工作的公正与准确受到影响。例如,1956年,美国佐治亚州杰斐逊市的一名富商在家中被暗杀,该地区的流浪汉詹姆斯·福斯特涉嫌被捕。在报道这一暗杀案时,该州的一些报纸竟没有根据地断言凶手就是福斯特,从而使法院受此影响而轻率地判决福斯特死刑。所幸真正的凶手后来被警方抓获,福斯特才得以解脱,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新闻界与司法界最大的摩擦是关于记者对消息来源的保密问题。一般说,新闻媒介都不愿公开信息来源,而法院为调查需要,常常会强迫记者公布消息来源。英、法等国有个法令,规定只有当记者的消息来源与国家安全或司法机关无关时,他们才有权拒绝透露。美国有“考德威尔案”作为判例。1972年,《纽约时报》记者考德威尔采访黑人左翼组织黑豹党,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联邦大陪审团在调查左翼黑人活动时,传讯记者作证,考德威尔拒绝,而政府则认为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向调查犯罪活动的法院审判团作证。最高法院判决: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其他宪法条款,均未给予记者拒绝对大陪审团提供有关的消息之权。1978年,法院又命令《纽约时报》记者迈伦·法伯交出一个案件的采访笔记。法伯拒绝。法院以藐视法庭罪逮捕法伯,并对《纽约时报》处以罚金。

但是,只要记者的消息来源正当,事情就不一样了。在水门事件中,《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记者有一份果访录音,采访对象是“水门案”的一个被告,在采访时说出了一些实情,当时负责此案的法官西里卡就要这名记者交出采访录音带。

谁知这名《洛杉矶时报》记者居然不干。因为在美国,记者与他的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就像律师和他的客户,心理医生和他的病人,神父和他的信徒一样,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是受法律保护的。记者的新闻来源受到“新闻自由”的宪法保护,如果他不愿意交出来,谁也奈何不了他。法官西里卡一怒之下,就以“藐视法庭罪”当场拘留了记者。因为判“藐视法庭罪”在美国是法官的权力,不必通过陪审团,但是,如果被判的人不服,当然可以上诉,由上诉法院对于法官的这一权力进行监督和审查,以防法官的权力被滥用,结果记者上诉之后,上诉法院立即下令,限法官西里卡在两小时内把记者给放了。他当然只好乖乖地服从。

中国虽然实行“公开审判”不久,但也在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1998年9月22日《人民法院报》刊登的一篇“也要规范舆论监督”,算是先行一步敲响了警钟,现全文照录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经强调,要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落在实处,各类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的外,一律实行公开审理,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允许新闻单位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

肖扬院长的讲话表明了人民法院反对司法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决心,对人民法院摒弃“暗箱操作”有着巨大的震撼和推动作用。一些司法腐败现象也频频见诸新闻媒体,“曝光”成为当前一个热门话题。令人鼓舞的是,舆论监督、新闻“曝光”大大推动了司法机关反腐败和人民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进程。

然而,新闻工作者队伍也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笔者最近就亲眼目睹了如此“监督”、“曝光”之怪现象。以往,人民法院经常遇到“案件未进门,双方都托人”的情况。如今又出现“案件未进门,记者追责任”的新情况,有些记者在案件还未立案之前就“发号施令”、“指挥办案”,若不从命就“曝光”,因其不出示单位介绍信、记者证,

搞不清是单位指派还是个人行为,人民法院只得苦口婆心对其普法。还有记者未经合议庭法官同意,擅自采访庭审,随便出入法庭,使庭审秩序受到影响。有一位打着“为民请命,替天行道”旗号的记者,对一件进入再审程序且正在审理的案件致信给法院院长,以“曝光”来要挟院长在24小时之内对该案件作出答复。由于此类现象频繁出现,不仅牵扯人民法院的精力,也干扰了人民法院正常执法。少数记者听了一方当事人的一面之词,便信以为真,怀着“为民请命”的责任感来法院“兴师问罪”,或带有其他目的,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干扰”。

宪法赋予了人民法院独立办案的权力。笔者认为,新闻工作者对司法实行舆论监督,除去有主持正义、惩恶扬善的一腔热血之外,更需要的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规范行使舆论监督权。

——学习永远的先驱者普利策

1890年,双眼失明的约瑟夫·普利策宣布退休,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纽约世界报》。四年的励精图治,使他购进时每天只发行1.5万份的这家报纸,一跃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每天印数达到25万份,并且新建了纽约城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报社大楼。

大都市的喧闹,使这位头脑敏捷又极度衰弱的老人无法忍受。他经常住在游艇上,在海上随意漂泊。他退过电报指挥庞大的报业。1910年的一个清晨,秘书邓宁赫姆来到游艇上,向普利策报告:“先生,昨晚有消息说,您的夫人同意您所有的计划。”“哦,亲爱的凯林,她当然会同意。我在家时,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些计划。”普利策开始穿衣服。他已经学会了怎样用触觉和听觉去做一些事。他有5位秘书,有的思考问题,有的判断事物,有的料理生活,他依靠他们了解外部世界。他走进了游艇上的图书室,对早已坐在那里的秘书们说:“今天我们不读报了。”

先生们,我准备宣读遗嘱。秘书们都大吃一惊。“当然,我请邓

第四种权力

宁赫姆来宣读。”但很快普利策就自己讲了：“我将100万美元赠给纽约的太平洋交响乐团协会；另外，将用100万美元修建一座托马斯·杰斐逊塑像，他总是在思想上指引我。”普利策崇拜这位起草了《独立宣言》的美国第三任总统。他沉默了一会儿，饱含感情地说：“还有一件礼物出自我的内心。我想帮助那些记者成为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希望他们了解自己肩上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我已经赠给哥伦比亚大学300万美元，用于创建一所新闻学院。”秘书们一阵惊愕。30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个巨额数目。“新闻学院将用我最心爱的女儿露西尔·艾玛的名字命名。可能会有人讥笑我，记者是写出来的，不是大学训练出来的。我创办新闻学院，主要是教会那些男女青年记者，怎样报道，怎样写得简洁，怎样成为编辑，直到他们知道历史和文学、科学和文艺。”“我还要设立普利策奖，专门奖给每一年度最好的新闻工作者，奖给最好的编辑和最好的新闻故事。另外，我留给《纽约世界报》的钱，足够它永远办下去。”听到秘书们由衷的赞扬，这位近代报纸拓荒者父亲般地笑了。他眼睛瞎了，但比一般人看得更远。一年后的1911年11月29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港。普利策在他的游艇上病情加重。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地说：“轻点，很轻，很轻，很轻……”死神拥抱了这位拥有2000万美元的美国最大的报业巨子。这一年，他64岁。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已经成为美国新闻从业人员向往的学府。美国一批著名大学也都相继设立了新闻学院。普利策奖金从1917年起每年授予各类报刊作品以及小说、诗歌、传记、历史、戏剧等等，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

——恩怨难辨：新闻与情报

在变幻莫测的情报大战中，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CIA）经常利用本国驻外记者从事间谍活动，刺探驻在国各种情报。据披露，在美国，被外国政府指控为间谍最多的扮演者，除了外交官就是美国驻外记者了。

从事媒体研究工作的潘家永著文介绍,在前苏联时期,与CIA的专职间谍一样,美国驻外记者中的兼职间谍们进行间谍活动的重要区域也是前苏联。据报道,1920年,美国《巴尔迪摩太阳报》女记者玛格丽特因是美国军事情报局的间谍,被前苏联党局逮捕。1976年5月,前苏联政府下令将美联社、新闻周刊社和纽约时报社驻莫斯科的3名记者驱逐出境,原因是这3名记者在莫斯科到处活动,为CIA刺探和提供前苏联的各种秘密。据一些分析家估计,今天美国驻俄罗斯的记者当中,还有人在为CIA服务。美国驻外记者受CIA之托,在其他一些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也比较活跃。

在70年代前期,人们很少对以记者身份从事间谍活动提出疑问和指责,然而这种状况在7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转变,舆论界开始抨击CIA利用记者搞情报工作的做法。面对来自新闻界的压力,1976年当时任CIA局长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布什签署一项命令,限制CIA与美国一些驻外记者之间的合作。然而,由于这仅仅是限制面非全面禁止,以致新闻界仍有不少人不满意。

1977年9月,卡尔·伯恩斯坦在美国《滚石》杂志上发表文章,披露CIA在过去25年中曾经利用400多名美国记者从事间谍活动,这一报道使得一向以保持中立、不做政府传声筒自居的美国新闻界一片哗然,纷纷抨击CIA局长。在美国国会的施压下,1977年11月30日,当时的CIA局长特纳签署禁令,全面禁止CIA利用记者搞间谍活动。然而,此项禁令并没有遏止住CIA继续与记者的合作。

1979年11月,著名的伊朗人质危机发生后,一位在伊朗有特殊渠道的美国记者应CIA之邀与CIA人员会面,讨论如何利用自己的记者身份帮助解救人质的问题。1987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一位记者在伊朗采访时,被伊朗政府指控是美国和以色列的间谍。80年代末,埃及政府指控英文杂志《今日开罗》前记者美国人雷诺兹为CIA做事。人们不禁要问:禁止CIA利用记者的禁令不是在

1977 年就开始施行了吗？是的，这项禁令是早就生效施行了。可是这项禁令的末尾一句埋下了伏笔：“本规定的政策和禁令没有例外，除非获得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特批。”

1980 年 4 月，当时的 CIA 负责人特纳在一次会议上透露，他曾经 3 次特批 CIA 与记者合作。1997 年，《华盛顿邮报》报道，CIA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称，在禁令发布后至今的近 20 年时间里，CIA 负责人曾经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批准超越这项禁令。对此，美国新闻界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指责 CIA 不守信用。《华尔街日报》载文说，尽管利用记者从事间谍活动会对美国安全有一定好处，但这种做法会损害新闻媒体为公众所带来的更多的好处。《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评论尤为激烈，并警告 CIA：“别把手伸到我们新闻界！”面对来自新闻界的批评，时任 CIA 局长的多伊说：“我非常理解同情新闻界，但在国家安全和美国前途的生死攸关时刻，我们还是要考虑在情报工作中利用记者。”该项禁令自 1977 年颁行以来，究竟有过多少次特批？外界人上谁也说不清，CIA 的官员对此也讳莫如深，看来，这将成为一个难解的谜团。

第四章 职业化进程与良知

1. 势利记者批判

中国当今的新闻记者中,权势记者多,势利记者多,不够“简洁明亮”的记者多,少说废话的记者少。在西方,记者掌握着继立法、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种权力,即坚持公众立场的舆论监督权,是这种权力透明了前三种权力,互为监督和制约,使他们更加明白自己的职能和受到的制约。只有相互制约,才能保证权力不会滥用,更保证权力得到有效行使。

在中国,记者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可以监督立法、政府、司法,在宪法精神指引下,还可以监督全体执政党党员、全体公民和法律保障可以监督的所有实体、机构。当然,记者也被被监督者所监督。记者权力的行使,标志着民主、进步和现代化有了保障。在西方社会中,当记者与当总统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舆论是代表社会与民间的权力,因此记者必须有时代的使命感,必须有敢于为民请命的责任心。一个政府若没有记者的权力,就好像没有窗户的房屋是死气沉沉的,不透明的。空气不流动,没有生机与活力,是不能长期存在的。记者不能没有力量。因此,记者肩上的担子很重。

曾以撰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何清涟女士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着棋是引入社会监督机制,而社会监督机制的两大支柱之一就是舆论监督,实现法治的第一步也

第四种权力

就是舆论公开。但是，她又警告这并不是说任何条件下放开舆论就有效，因为一旦目前已现雏形的“黑白合流”现象发展到可以用黑社会势力干预舆论——这已有记者受黑社会势力枪击，官员们买杀手杀政敌等事例为证——恐怕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难于上青天。

——现在的记者形象

从职能部门年年下发严禁有偿新闻紧急通知和查处假新闻的情况看，中国的记者活得相当滋润，似乎一个个都是有权有势的，而且似乎一个个都很有钱，所以作者称之为“势利记者”。在中国当记者似乎很容易，只要会做宣传稿就可以了，宣传就是报道——以宣传为目的，以报道的形式进一步做好这个工作。有的大学毕业生一分配到报社工作，就言称自己是记者了。有的人工作性质是发行的、广告的，却在工作证上写明“记者”身份。有了记者身份，确实便于工作开展，尤其铁路、医院、法院等垄断机关多是给好脸的。有的声称有门路的大学毕业生——上班还没转正就发给国家新闻出版署记者证核发办公室统一印制的正式记者证（据称有规定大学毕业生上岗一年后才能正式定职）。按一般程序来说，大学毕业进入新闻单位，从事的是报刊广播电视采编工作，就能得到这个身份的证明。可是那些没有从事新闻采编的人员要想得到“记者证”当门面，或当敲门砖，或在交通不便等特别时刻使用，似乎也很灵验，通过有用的关系，花点钱拿到记者证就可以当不写稿的“记者”。在买东西时，打着记者牌号的消费者，若碰到吃亏或侵权时亮出记者证就可以索回面子。曾有某消费者买到假货要求索赔，不是有家商场负责人这样大言不惭地说：“如果你是记者，好，当即退货；如果你是消费者，对不起，活该你倒霉”。拿消费者权益不当回事。“活该”这个词用得好，直接对抗的是代表纳税人意志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平时经常宣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记者这时感到了什么叫权力，什么叫法，什么叫权大于法。我常想，如果我是在场的记者，我该怎么办？大不了也是掏出记者证晃一晃，以后的事就是不

了了之,如佛家对联“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事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所述,本“不了”的也“了”了,“非法”的居然“法也”。这时,你若不干,人家已给你足够面子,在你面前当孙子,因为你是记者,他们也会让你感动,再不然就请你吃饭,人前人后拥着,甚至还请来了你平时十分敬畏的自己所在报社领导,你还坚持什么,领导都趴下了,还怕你个“小记者”,谁不知道中国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国度,前车之鉴还少吗?乖乖地当大爷,请你喝酒,酒不醉人人自醉,讲什么原则,原则都进了肚子当酒喝了。

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记者证确实不怎么值钱了,有时连自己的身份也证明不了,北京的邮局送来稿费汇款单,凭记者证去领取,对不起,不行,你必须拿身份证或工作证,“记者证”证明不了你的身份,那么什么是身份、什么是身份证呢?应该是证明你身份的有效证件,你的身份是记者,你拿的是国家专业行政机关——新闻出版署统一核发的记者证,却在领取汇款单时失效了,邮局属国家邮政总局管,记者又能怎么样。尽管你可以曝光,但邮局是当然的国家事业单位,它说了不算,那么谁说了算呢?毕竟舆论不是执法机关,所以你拿记者证领不来稿费只能怨自己。现在我国还没出台《记者法》(尽管有《法官法》、《警官法》等等),更没有《新闻法》,“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只能如此而已。要当记者,先学会做人。做人的原则都没有,更谈不上人文关怀、人道精神、平民意识和道德情操了。在一次国内外记者交流会上,美国《时代周刊》驻京记者吉米接受提问,当听到“在中国,记者是国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国家干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收入很低,请问在西方发达国家,职业化的记者是不是收入很高?”时,吉米笑了,他说他若为了钱就不当记者了,而是应该去做生意,应该在市场经济社会专职赚钱,而不是当记者。他把“记者”这一神圣使命当作职业化的事业来做,而且引以自豪,很有成就感。199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朱镕基当选总理首次答记者提

问时,吉米很荣幸地得到第一次提问。他作为一名美国记者,无疑大出风头,但是记者之间不问你来自何方,采访是分内的事,大家是平等的,又是竞争对手。所以,不必问你干嘛来了,不管你想问什么问题,你就可以提出什么问题,有没有提出,结采怎样,都是你自己的分内之事,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自由活动,别人无权干涉。记者是创造性的自由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中外之分,有的只是有没有尽职尽责,有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意识,有没有坚持正义和为真理献身的实事求是精神。

——真正的无冕之王

“无冕之王”之词是由西方新闻界传出的,在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新闻记者是不能被称为“无冕之王”的。在由新闻出版署主办的《中国报刊月报》1998年第1期上,重庆市记协副秘书长彭德汉撰文介绍“这一论点”:无论是在40年代的延安,或是1949年以后的新政权,对当时的新闻工作者来说,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是应该解决了的问题。他承认从80年代后期到现在,把我们的记者称作“无冕之王”,而且颇为流行,有人自我恭维,有人甚至把舆论监督和“无冕之王”牵扯到一起。他把这归于不了解西方“无冕之王”一词的来龙去脉,往往人云亦云。为此,彭先生负责任地介绍了新情况:1949年以来,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达50万人,而其中从新闻院校毕业的不足十分之一,对“人民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读者服务,为看报人服务”缺乏深刻的了解。

而我国新闻记者的现状是:从文化水准上看,中国新闻人无疑属于知识分子行列。93.2%的现职新闻工作者拥有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其中,“初中生新闻记者”还不到0.4%。大多数新闻工作者曾就学于人文或者社会学科,很多人是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中文系或者外语系的学生,理工科的学生看来很少选择新闻,他们在整个新闻从业大军中所占席位最少。从性别上

看,男“新闻人”占据了明显的多数,每三名新闻工作者中“男二女一”,这一结果与美国的情况类似,美国的女新闻人席位只比中国多不到1个百分点。从年龄上看,中国新闻人总的说“偏大”。平均年龄已经超过37岁,29岁以下的少壮派不到30%。数字较为确切的是中国的新闻记者有一半是中共党员,所以我国的新闻工作者又称是“党的喉舌,党的新闻工作者”,此后有五分之一的是中共党员的后备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尽管一般人总是笼统地把新闻工作者都叫作“记者”,事实上,新闻工作者有明确的“采写”和“编辑”之分,记者更多地担当前一部分职责。而且目前,编辑与记者的比例竟然是2:1,这也许出乎人们的意料,但这个数据暗示出中国新闻有“重编辑、轻采写”的倾向。

了解我国的记者情况后,进而了解西方。据说“无冕之王”这个词来源于19世纪的英国。当时人们认为女王是“有冕之王”。王室继承人到了成年之际,要举行加冕典礼,然后登上王位宝座。享有英国舆论权威声誉的《泰晤士报》前后有三大主笔,这三大主笔辞职后,都被内阁吸收为阁员,成为地位很高的大臣,故被人称为“无冕之王”。后来这个称呼就泛指西方的新闻记者了。我们既然认为市场经济难得分清楚什么姓社什么姓资,就没有必要对西方的“无冕之王”的舆论监督权利大惊小怪。东西方的差距在缩小,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现在承认落后不敌视发达,比80年代进步得多了。在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不仅有我们缺少的“无冕之王论”,还有“第四阶级论”、“第四种权力论”、“第四种力量论”,都认为新闻记者是特殊工作者。“第四阶级论”来源于英国议会。在18世纪的英国,新闻记者可以在议会旁听发言和辩论(1998年11月大连消息,记者和公民凭有效证件可以旁听当地人大会议)。1772年,英国议会举行会议时,政治家爱德蒙克·巴特指出:“议会中有三个阶级(贵族、僧侣、资产者),但是,在记者席中坐着一个第四阶级。他比那三个都重要。”爱德蒙克的“第四阶级论”,后来就被广泛应

第四种权力

用以说明记者的特殊地位。至于西方的“第四种力量论”“第四种权力论”指的也是新闻媒体所代表的公众立场、公民意志。西方新闻理论界认为,在社会政治力量中,除了政府、立法、司法外,新闻记者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是一种可以和政府、立法、司法独立平行的第四种力量。只是,有的新闻媒介把独立、公正喊得震天响,却是依附于大财团和大集团的。美国著名的摩根财团就插手新闻事业控制报纸,直接办报,兼并报纸,《纽约时报》、《时代》都是它参与的典型。美国现代报业三巨头之一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出身于一个矿业主家庭,靠雄厚的家产控制报业,收买了《纽约日报》等。他们当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吹鼓手。在拥护资本主义制度这方面,在宣传只有资本主义才是自由世界这方面,他们的舆论是一律的。事实上,我们已经承认资本主义是发达的,抛开姓社姓资的争论,我们发现:相互监督与相互竞争才是新闻媒介发挥作用的真正到位。虽然西方一些媒体是不同财团和不同政治集团的代言人,但他们互相制约。有些媒体可能与政府某些当政者有矛盾或别的目的,如克林顿绯闻案,揭发与打击一些政治集团的隐私,甚至对不同党派不同派系的现任总统或国会议长谩骂一番,直至把对立集团当政者搞下去,但这些报纸和广播电视对自己集团的大老板的利益不敢触动,否则主编主笔就会受牵连。“无冕之王”只是“现在进行式”,不存在某些人所描绘的“虚伪的无冕之王”、“是某些金融垄断资本的奴婢,某些政治集团的奴婢”等歪论。

——人民记者是不是无冕之王?

我们的记者现在的定论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到位,实行党政分开,实行政企分开,实行依法治国,新闻界也有了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广州成立了“中国第一”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后来相继成立了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深圳也积极申办深圳特区报业集团,上海成立了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最晚的首都北京,成立了经济日报报

业集团、光明日报报业集团。风是从南方先吹起来的，所以先受益的当然是南方和沿海地区。由于按市场模式经营，我们的记者与西方的记者在手段上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不违法（况且违了法会有司法部门去追究责任），他怎么不能称为中国的“无冕之王”呢？他在从事采访和宣传报道中，做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为势利所左右，不怕外来的压力，能及时地、真实地、客观地反映事物本来面目，弘扬正气，诛伐邪恶，敢于支持人民利益，不要官职，也不会丢“乌纱帽”，做到公正，不偏不倚，认真监督，难道就不是称职的中国特色的“无冕之王”？

在安徽某县事件发生地若没有无冕之王出现，将会如何发展，我无法预测，但真有了头顶“无冕之王”桂冠的记者加入的时候，才让人特别尴尬、特别恶心。是这样，县税务局副局长儿子打死人了，死者家属四处上访、告状，他们找到某地的代表某政治集团行使舆论监督权力的××电视台名栏目请求“热点监督”，于是这个“热点监督”的记者前去采访、核实——后来不了了之，县上有人挺自豪地说，当地的税务局副局长根本就没让这些热点监督的记者进县城，事情就摆平了，那记者收了10万雪花银就回去了。

而摆平整个事情的副局长花了的30万雪花银——不知都是谁的钱？公或私？有否来路不明？先不去提它，我极其憎恨的是那个记者多么可怕呀，令人恐惧，没有良知，没有良心，更谈不上丁点恻隐之心。假如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又能如何呢？我不仅恐惧那副局长，更恐惧那出卖良知、正义和良心的狗日的记者。安徽某地的人还对此自豪，真不可思议？这样的丑闻，耻辱，都出现了，还有什么不能干呢？这是我听到消息最初的想法和愤怒。也不仅仅是安徽某地某些人蛮干，不明事理，原因很简单，是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我们能怨谁呢？污染一碗水好治理，一旦污染了水源就真正“无法无天”了。

——“钱”途光明 正义无踪

一些势利之徒搞新闻商品化,搞一切向钱看的行业不正之风,严重沦落到见利忘义、见钱眼开,把广告做得与新闻一样,把新闻做得与广告一样,使有偿新闻年年下文件制止,年年屡禁不止,有的编辑出卖版面,自称收碎银子;有的记者和广告员合二为一,记者采访时拉广告,广告员拉广告时拿着记者证,记者成了广告员,广告员成了专拉广告的记者。这些记者满天飞,依仗所谓的“无冕之王”的特殊地位,拉广告,搞收入,个人得利。还有被国外新闻界嗤之以鼻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些单位在阳光下不避人耳目地对记者发“红包”、礼品,让记者又吃又嫖又拿。事实上,红包新闻、版面赞助、礼品报道,中国第一线的记者,有多少人曾经抵挡这样的诱惑?新闻报道和宣传导向,揭露真相和完成使命,在中国新一代新闻人的天平上,哪一个更具分量?1998年1月,我国培养新闻人才的著名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即中国记协)联手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正是一贯充当调查员角色的特殊群体——新闻工作者。在近6个月的时间内,全国10个省、183个中央及地方新闻单位的2002名记者、编辑,参加了问卷调查。调查人员说,问卷采取了不具名的方式,由被调查者自填,根据确定的抽查方式,抽查数据在95%的量信水平,最大误差将不超过正负3%。1998年6月30日,浙江《联谊报》刊发俞国明、靳丽萍文章披露这份调查,并揭露新闻记者中钱权交易和造假行为,令人震惊。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我们一些报刊内部新闻纪律涣散、职业道德败坏。据揭发,有一刊物曾以数百元、数千元的价格出卖一个记者证,还有一个报社在大企业供销部门设办事处和记者站,甚至供销处长也挂上了兼职“记者”的桂冠。这一切,真正的“无冕之王”们可不要等闲视之,因为好新闻总在“自己身边”发生。

在这次调查中,还暴露出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主要缺陷:不注意

思想理论方面的积累,不注意业务的研究,不注意报刊市场的动向,不注意国际新闻界的动态。

而像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这些优秀的国民党执政时期出理的记者、报人,他们莫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 1946年,范长江到了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曾经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作了一次《论人民的报纸》的讲座。其中有这么一段:“我们的报纸,是否因为不受检查,就无法无天,老子天下第一,无冕之王,铁鞭在手呢?是不是什么都不管,什么稿子都登呢?我们是自觉地选择。我们在无检查中办报,要比有检查中办报责任心大得多。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报纸,要对人民负责,随时随地看稿件是不是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没必要自欺欺人,我们也要有真正的“无冕之王”,我们也要有自己的神圣的新闻事业、产业。

——并非历史的笑话

1958年有一位大学者马寅初竟然仅为坚持自己的人口理论而被“打人地狱”,在北京东总部胡同23号待罪20年。马老因何坐牢,熟悉历史的人千万不要忘记,马老是因为说了难听的真话、坚持真理才被“打人地狱”。陕西《各界》杂志发表马治权文章介绍,早在“大鸣大放”“大跃进”的50年代,马寅初就拿人口理论与毛泽东论战,并在新闻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宣称:“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评,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任何情况下,我都要坚持自己的人口理论。”“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己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据说,毛泽东读了马寅初的文章后,没有像曹操厚待陈琳《讨曹檄文》时的大度,更没有女皇帝武则天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骂声”集怜爱于一身,而是当即向秘书作了一段口头指示:“在反右斗争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马寅初仍然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单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人身攻击)。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

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人格侮辱),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要手软。”领袖发话,一时应者如云,万炮齐轰,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难道是马寅初愿意这样吗?在毛泽东下令批判马寅初之前,周恩来就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找他谈话。谈到最后谈不拢,周总理几乎是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您比我年长16岁,您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20年过去了,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不妨从你的家庭出身、西方教育等方面入手。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明白,不到万不得已,他这个当总理的绍兴同乡不会说这样的话;但是要他作违心检讨,他办不到啊。他沉思很久,最后蹦出来这样两句话:“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权力是腐蚀剂,而时间是过滤器,历史终于证明应该检讨的不是马寅初。到了1979年,年已98岁的马寅初得到了中共中央给予的平反,当时他下肢瘫痪,耳朵背,坐着轮椅,听到平反的通知只说了一句话:“20多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

这事从发生到平反是20年,从平反到现在又是20年。40年过去了,我们进步了多少?我们经常说爱国主义,经常说民族自强,但是又有几个人热血沸腾呢?又有几个人有马寅初的骨气和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精神呢?有许多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的国家干部、我们的大报记者不说真话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尽人意的地方。民主党派是否还有马寅初老人的这种精神,我们姑且不论;就共产党内部,批评与自我批评如何?有民谣反说成“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可以说,20世纪中国人的探索历尽曲折,祖国和人民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但不管代价多大,只要使我们头脑清醒,在即将

到来的 21 世纪不走误区或少走误区,就足以告慰那些为中华民族付出代价的无数的仁人志士,劳苦大众。然而,怎样才能使我们头脑清醒呢?我们早有古训在先,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且一定要把这种古训制成法律,从法律上肯定“言论自由”、“言者无罪”,并将舆论监督视为一种重要的监督形式。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我们迈向头脑清醒的第一步。“头脑清醒”才能保证今后“不再误事”。

2. 焦点问题:中国一年仅有 365 个?

中央电视台的名栏目《焦点访谈》,近来名声大振,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对其揭露丑恶、反腐败和对社会问题的曝光及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可谓“功德无量”,无不抚掌叫好。几年的时间,向全社会曝光了许多热点问题,勇敢地揭露了许多丑恶现象,此中还涉及一些大案要案,对于推动反腐败斗争,对于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所以在如今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甚至远比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的收视率还要高。《中华工商时报》著文说,令人感到高兴的是,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其中央领导对于《焦点访谈》十分重视,有好几次节目刚播出,中央领导立即就向发生问题的省分打了电话,并指示一定要查清问题,出了责任的事件,还要对责任人给予处理。这也就是说,在中央领导的直接关怀、过问下,《焦点访谈》节目的影响才越显广泛。但问题是,《焦点访谈》曝光的问题大多是重大事件,这样的事件连远在北京的中央电视台都知道了,如果说当地政府竟然会不知道,未免有点说不过去了,如果当地政府知道,而一定要等到《焦点访谈》曝光以后才着手解决,那就更说不过去了。一年只有 365 天,《焦点访谈》也只有 365 期节目,中国的问题难道就只有 365 个吗?如果像 1998 年 8 月间发生南北水灾,当月《焦点访谈》内容就以报道灾区为主,《东方时空》、《新闻联播》也不离其左,那么,一些案件没法曝光,更没法解决,这该怎么办呀?

记得还有一篇为《焦点访谈》节目叫好的文章提出这样的建议,办它一万个《焦点访谈》栏目如何?这个建议令人大吃一惊:一万个《焦点访谈》,如何得了。估计这是作者在看了节目之后愤慨之余、痛快之余,兴致所至开了个玩笑。看来,舆论监督在反腐败、反官僚,包括反社会不良现象中的先锋作用、昭示作用,国人已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但《焦点访谈》有其特殊性,在人们眼里,它是代表中央的,是民间传说中手持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其他的地方电视台,有这样的权威,有这样的“威仪”吗?当然,地方的新闻媒体,应该说也开展了许多舆论监督,也取得了一些实效。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即在监督上的“级别递减”现象,在中央级独立做主的传媒上被监督曝光的权力掌握者其级别多在县处以下,在省级传媒上“亮相”的则多是乡镇干部,而市级传媒,恐怕只能在村庄一级做文章了。真所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此种现象,难道不足以引人深思吗?但我们仍然要像《焦点访谈》的记者们表示敬意。毕竟地是一尺一尺地去扫的。天下虽大,扫一尺就干净了一尺,其工作无论如何是有意义的。但若论《焦点访谈》最大的成功,那还得说在于它经过多年磨炼之后终于成为中国第一个同时被官方和百姓认可的“以批评和揭露为主”的名牌栏目,于此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在民主化建设上取得的进步。

——新闻岂能靠策划创收

记者的错位,就是当起了赚钱的策划人,本是目击新闻事件的眼睛却盯上了赚钱的路途,立志从商现成为一些记者的新出路。无疑,记者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因为他们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是作为喉舌的具体声音的体现者,拿其加以利用可以充分体现其无限量的价值。有个策划人如是说,新闻策划和典型的树立是提高城市无形资产的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之一。所以一个地区的首脑及其“喉舌”——新闻记者,必须掌握和运用这些基本技能。所谓新闻策划的定义是:策划人利用统治阶层和

意识对新闻的导向作用,或者利用一些已经发生的事件,引导和附和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新闻导向,使该新闻的引导作用加强或提供例证,以达到宣传地区或企业乃至个人的目的。按策划人的意思,策划新闻就像给市场提供一些适销对路的产品一样制造一些适销对路的新闻来。一些新闻记者很容易地进入策划界,产品生产厂家也对媒体倍加信赖,广告效应显而易见。因此,在没有事情要发生的情况下,为了他们的策划成功就虚构一个事件,并抱怨地说“为了新闻导向不得不这样写”。诚然,这种做法是不保险的,一旦被揭穿,后果可想而知。可是怎么没见谁抵制这种策划呢?“文化大革命”时所策划的“读书无用论”,还有一些“样板戏”和所谓的“榜样”都是别有用心的,还有一些与事实出人较大的假新闻、公然的假统计数字等等,不光“文化大革命”中有,今天也有,按照今天的思路与“程序”操作明天还会有。我们不该反思一下吗?所以,我们说,麻木的记者还叫记者吗?懦弱的记者还叫记者吗?如果这样的记者能吃香喝辣的,能呼风唤雨,那么我们中国还有记者吗?没有记者的中国还会是一个发展、进步、民主和积极进取的中国吗?

仅仅为新闻而做新闻,仅仅为当记者而做记者,这样的国家还会有新闻吗?麻木的人绝对当不了记者,麻木的人也发现不了新闻,所以我们该悲哀的是当记者的做不了新闻,做新闻的又当不了记者,这可是最大的现实和最大的国情。或许这话偏了一些,但事实上谁能改变这一些?《焦点访谈》也就是一年365个,而中国有12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泱泱大国,浩浩荡荡,365个“焦点”显然不够。再说,中央级新闻单位仅仅可以曝光省级以下的单位,所以就出现“户骗村,村骗乡,一骗骗到党中央”的怪事。那么,曝光省级以上的新闻单位在哪里,我们不得而知?没有良好的监督,执法者将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粗暴,孟德斯鸠说过,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应该清醒的不止是新闻界。

记者是年轻人的职业,是不太需要技巧和经验的,记者是需要

第四种权力

大胆和天赋的，勇敢、聪明的人和认真的人是可以优先当记者的，记者的优点是敢想敢做，要有大无畏的劲头，还要会急中生智。这些仅仅是因为保证采访成功才需要做的，不是表示你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再者，记者当久了，见到同样的事情多了，也很容易麻木，或容易被人利用，记者是很容易被人称作“枪手”的，当了工具，你就不是记者了，也就不能独立独行了，所以当称职的记者要有牺牲精神，即对事业忠诚、投入和义无反顾，记者对属于自己的除了荣誉之外其余什么都可以不要，这仿佛战场上流血和牺牲的英雄，生与死，不是此，便是彼，哪有时间想那么多。记者的阵地也是战场，也容不得苟且偷生的伪人和汉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知道，还会有谁能做到当记者？当记者中的真正英雄？

——记者不要造神话

在美国，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现任《芝加哥论坛报》出版商的杰克·富勒，在18岁任职芝加哥城市新闻署时得到当老记者的父亲忠告：“当一场大火在燃烧时，你是惟一的要关心所有遇难者的名字是如何拼写的人。”19世纪纽约的出版商约瑟夫·普利策把“准确！准确！！准确！！！”作为他的座右铭时，他只是指一些小事情如姓名、年龄、地址。对新闻中经常忽略一些大问题的准确，普利策和当时的著名记者一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他着重强调许多小事情也极大地表明了他的高明之处。假如这些小事情都做不对，读者也不会相信你能把大事情做好、做正确。在我国，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就是英明呀、就是好呀、多亏了××呀、托××的福呀、最亲还是××呀等等，甚至多家报刊一起宣传，一时星光灿烂。可是新闻需要真实、准确，实事求是，无须加工、修饰、美化和倾向，准确与认真即可。但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有时下面的通讯员写报道，年年岁岁“文”相似，岁岁年年“数”不同、去年的稿件，今年改一个标题，把新数字一填了事。而这些报纸都是“认人不认稿”，只要你是下面系统的通讯员，下面的事就指望你了，逢年过节

互相问候和慰问一下即可,稿子写得不好也罢,反正这样的稿件领导欢迎、喜欢,群众似乎也没意见,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是处处莺歌燕舞的一年。

但,报刊媒介要做到“认稿不认人”也难,你的稿件写得好,有价值,但我不认识你,你也不了解我这个媒介的风格、特色,这种报纸和编辑对那些自由撰稿人身份的民间记者就轻视了,谁让你不是“格式化”的记者呢?认稿不认人的报纸有著名的《南方周末》,认人不认稿的大报多得是,多为有组织的团体机关报纸,大家能天天看到,但大家极少天天去读。所以说真话的《南方周末》在百姓市民中尤为好卖,而那些说神话或曾经造神话的报纸正失去光明,正日落西山。不过,台湾的情况与内地还不一样,著名报人李敖在解除“报禁”的环境中是好手,行得直,坐得正,有胆略,不怕牺牲,不但有希望把牢底坐穿,而且把自己坐得更风光,更风华正茂,又很有钱,我们内地的新闻媒介更值得学习一下,早日成就自己,创办报纸,推出名记者。

——美国记者与政府的关系

力嵘在谈到“白宫丑闻和美国舆论”时介绍,克林顿总统的智囊、竞选班子的骨干迪克·莫里斯突然因桃色丑闻辞职,成了克林顿被民主党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的美国头条新闻。一年来,莫里斯经常在离白宫不远的杰斐逊饭店与妓女谢莉·罗兰兹鬼混,却没有想到这位女士竟暗地出卖了他,把真相透露给《明星》周刊记者,并录下了证据。《明星》周刊在发表前一天,将副本送给同属一个老板的《纽约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和《华尔街日报》等,但只有《纽约邮报》刊登了这一消息。发表前,《纽约邮报》还特地一一核实的消息出处,如电话录音、照片和录像带等,甚至听取了华盛顿权威人士的意见。据透露,有人认为这是共和党攻击民主党的计谋,即使事实确实,也不能发表。了解美国舆论界内幕的人士认为,在华盛顿,白宫对舆论控制很严,许多常驻白宫的记者是莫里斯等

白宫官员的好友，他们报道也离不开这群要员，天天两眼紧盯着新闻发布会。至于白宫内幕丑闻，他们则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不敢轻举妄动。美国舆论一向自称新闻自由的“捍卫者”，可是从莫里斯丑闻的报道过程，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山姆大叔的伪善面目。他们在报道别国的新闻时，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行动非常“自由”，经常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任意夸大或歪曲，利用谣言大做文章。英国报纸说，美国报刊报道英国王室婚姻问题，常常把小报作为可靠消息来源。在奥运会期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作了大量诋毁中国运动员的报道，其节目主持人科斯塔斯先生信口开河，玷污了所有努力拼搏的运动员。这种做法既卑鄙又愚蠢，也不符合职业道德。更令人吃惊的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8月20日向旅美中国学生和华人团体代表表示道歉，到了29日，科斯塔斯先生在该公司的“今日谈”节目中，又否认了这一道歉，说什么只是“礼节性”的，从未表示过“道歉”。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激起了旅美和加拿大华人团体的强烈抗议。他不仅缺乏一个新闻记者的基本职业道德，甚至连作为普通人的道德都没有了。

——记者要学会报道

记者是什么？是政府的监督者，是民众的喉舌，是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者……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在中央电视台对《焦点访谈》节目组发表谈话时说“我也是你们的监督对象”。1998年11月12日《焦点访谈》曝光安徽南陵县鹅岭粮站借粮充库存骗正在这里视察的朱镕基总理。值得一提的是朱镕基总理十分愿意让记者在媒体上曝光这件事，证明了他的求实精神和对媒体的宽容和厚爱。

总理以身作则，他作为人民的勤务员受到监督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他的这句话在报道时被许多传媒包括新华社“忽略不计”，不知这是为什么。或许，面对总理提出“请监督我”这样的要求时，出于某种习惯心理，他们实在是有些不知所措了。毕竟，这种事情

还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啊。

所以媒体要想成功,必须向《南方周末》学习,学习其办报精神,其匠心独具的报道方式。请看《南方周末》的语言风格——头版头条标题一览:副局长谋杀正局长——副局长杨锦生认为“只有谋取正职,才能为所欲为”(1997年12月5日);小人物终于告赢公安厅——一场实力悬殊的官司,一个惊疑参半的结果(同上);几亿报失该谁负责——在这省涉嫌诈骗,在那省位居高官(1997年12月26日);科学殿堂里的杀人案件(1997年9月26日);暴风骤雨之后——“改革能人”张传之免职风波(1997年8月1日);郑州四千警蒙冤平反记——“不信东风唤不回”(1997年6月6日);靠陈希同发迹的蛀虫(1997年11月7日);三秦反贪第一案“借救灾扶贫资金中饱私囊,陕西民政厅贿赂窝案告破”(1997年11月14日);中州惊天大血案开审——肇事者是原郑州某公安分局局长,另一白衣同车人神秘失踪(1997年12月12日);副市长策划的谋杀案——丧心病狂的权利之争导致一场血光之灾(1996年4月5日);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他叫谁下跪谁就得下跪,他叫谁拿钱谁就得拿钱,他被判刑却没进过一天监狱”(1998年1月9日)……

面对非正义,《南方周末》记者就是要知难而进。记者主持舆论监督,能指出问题,反映群众疾苦,给广大人民群众以鼓舞,使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因此舆论监督是真正的“群众喉舌”,是证明“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的重要力量。记者应该要求自己站在朱镕基总理的位置看问题,从高度上想问题。原苏联名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认为,记者要爱憎分明,坚定而无所畏惧地为伟大事业而奋斗。要记住自己手中拿的是非常强大的武器。

但是,尤为弱势的是我国新闻还在宣传高于一切的狭窄轨道上行驶,已经行驶了近半个世纪。《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张建伟在《南方周末》上提出,从宣传到报道应该是两种不同的传播手段。正

如“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一样,“西方新闻有宣传,中国新闻有报道”,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问题是,我们经常混淆“宣传”与“报道”的界限,在更多时候,在本应加强“报道”的时候,却过分依赖我们驾轻就熟的“宣传”手段,使我们的新闻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益,甚至连“宣传效果”也指向负极。新闻报道要有充分事实,但只有信息才能决定新闻价值。有事实的新闻不一定是新闻,有信息的报道一定是新闻。信息有两类:读者“想知道”、“应该知道”但“尚未知道”的为“狭义信息”,形成报道,为“独家新闻”。读者已知信息的某一方面,经记者的挖掘,使之或深化了背景,或转化了认知角度,或揭示出深层价值的,为“广义信息”。新闻报道的质量,由这两类信息的质与量所决定,所谓新闻报道,指的就是这样的信息报道。它们出现在大众传媒中,被称为“提供信息”。宣传也有两类:预先或在采访写作中为非信息的“事实”附着既定的(多半是官方认定的)“口径”,形成稿子,为“宣传稿”。起初的确是信息,也形成了报道,但第二次乃至第N次地不断地重复这一读者“已经知道”的“信息”,使信息不再具有信息的特性,只留下明显的“宣传意义”,仍顽强地形成稿件,也是“宣传稿”。它们当然也可能具有非凡的“艺术性”,但无论如何,它们出现在大众传播中,被称为“搞宣传”。中国新闻界应首先认识到:只要中国不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新闻从“宣传”到“报道”就是一条必然之路,这是一条惟一的生存之路。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改变的 and 改革的还有许多,比如我们的报道方式,我们的写作艺术,我们的新闻价值观等等。

3. 体制内记者和“内参”外的声音

体制内的记者会写内参,体制外的记者会写报道。但是,体制内记者遇到“内参”失实打起名誉权官司怎么办?《中国报刊月报》杂志刊登《新闻记者》一位记者的文章说,在我国,许多党的新闻机构除了面向全社会传播新闻外,还编印专供高级领导机关参阅的

“内参”。“内参”内容可以是记者采写的不宜公开发表的报道、报告,也可以是群众来信来访申诉内容的摘编。在“新闻官司”中,因“内参”引起名誉权纠纷的诉讼案为数虽然不多,但对可不可以打“内参官司”却至今尚存争议。如据《半月谈·内部版》报道:在1996年10月于安徽马鞍山举行的第三次“新闻官司”研讨会上,就有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内参”作为新闻机构的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所限制,但影响较大,刊登了侵害他人名誉权性质的内容理应与公开出版物一样承担民事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内参”是新闻媒介向领导部门反映重大问题和群众意见的渠道,若有不实之处,可以更正,也可由有关部门处置,而不应对簿公堂。

其实,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歧见早就存在。第一起完整的因“内参”引起的侵害名誉权诉讼,是陕西富平县法院干部王亚光诉西北信息报社的一篇“内参”侵犯名誉权案。“内参”印发于1991年6月,内容是反映王亚光等人违纪殴打体罚人犯的问题。王于1991年8月起诉,西安市新城法院受理。1992年10月,新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强调“内参反映问题是送给有关领导看的”,该期“内参”所报道的事实是存在的,判决驳回王的起诉。王不服上诉。1993年4月,西安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书强调报社有权以“内参”的形式向有关领导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对反映的问题负有审查核实之责任,不得侵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该“内参”在内容上有失实和用词不当之处,应予批评,但所反映的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可以看出,两审判决虽然一致,但侧重点各不相同。一审判决书强调“内参”是给领导看的;二审判决书强调报社对“内参”也有核实之责。换句话说,若未尽责造成侵权事实,则应承担责任。可见对于因“内参”引起纠纷是否列入“新闻官司”范围是不明确的。

比“王案”更早的涉及“内参”的“新闻官司”,还有著名的海灯

法师名誉权案。该案最初也是以“内参”侵害名誉权起诉的。1988年底,《四川日报》记者敬永祥写信给新华社,对海灯的身世、武功、佛学、生活水平等提出异议,在《内参选编》刊出。1989年8月,海灯的徒弟兼养子范应莲以敬永祥信歪曲事实、侵害其师和本人的名誉权向成都中级法院起诉。敬永祥答辩的论点之一就是该文刊于秘密内刊上,范从秘密刊物上获取材料提起诉讼是非法的,不应受理。敬所反映的问题如有不实,应由保密机关处理。新华社也致函四川高级人民法院表示:《内参》稿件是给中央反映情况的机密材料,不能作为立案、审查和定性处理的依据。后来,范向法院补充事实,指控敬还在《金岛》、《报告文学》这两个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攻击海灯。1993年5月,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称:“关于敬写给新华社的信,因系刊登于秘密刊物,且写信的真正动机难以查明,故写信的行为可不认定为侵害海灯和范应莲的名誉权。”所以此案虽然一审判决侵害名誉权成立,但却是以在《金岛》、《报告文学》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依据,而把与被判侵权的文章有相同内容的《内参》排除在外。此案表明,《内参》不属名誉权法调整范围,即使有失实也不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1995年发生在上海的陈凯名誉权案,使这个矛盾得到进一步展开。陈凯是“上海男子性功能康复治疗中心”的负责人。1993年,上海性教育协会一份报告认为陈的“中心”一个调查所公布数据不实,对陈的行医资格提出了怀疑。陈以该报告侵害自己名誉权对上海市性教育协会起诉。一审法院于1994年6月判决构成侵权。“协会”不服上诉。二审法院于1995年9月判决认为:上海性教育协会的“报告”是一种反映给民政部的内部报告,以保护青少年的利益和社会公益。虽在个别措辞上有偏激之处,但主观上不具有诽谤、侮辱陈凯的性质,客观上不构成对陈凯名誉权的侵害。改判撤消一审判决,驳回陈凯之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除对事实的不同说法外,争议的焦点就是内部报告是否可以构成侵害名誉权。一种

意见在谈到本案时认为：“内部报告不应作为侵(害名誉)权依据”。“如果此判例成立，今后所有的内参、内部报告，甚至人民群众对腐败的举报都有可能成为侵权的被告，这无论从法律或政策的角度都是极为危险的信号”。另一种对立的意见则坚持认为，内部报告同样有可能发生侵害他人的名誉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说，内部材料对领导的决断起着关键作用，如基本内容失实造成冤错，对当事人的损害更甚于一般报刊文章，编写者理应承担侵权责任。

一新华社记者认为：弄清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对所谓的《内参》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有人仅仅用“非公开发行”、“非赢利性”来界定《内参》，这是含糊不清的。除了正式出版的书报刊外，其余印刷品大都是非公开发行或非赢利的，名目繁多，不可一概而论。《内参》是新闻机构编印的专供领导机关参阅的文书材料。编印分发《内参》要报告上级主管机关批准或备案。各种《内参》的分发和阅读范围有严格的限定，通过机要通讯系统送达。有的《内参》还印有密级和编号。《内参》和内部刊物是不同的。通常说的内部刊物有两种，一种是指内部发行的正式期刊，只能在国内按指定范围征订、发行，不得在社会上公开征订、陈列和销售，禁止向国外发行，前述《半月谈·内部版》即是。另一种便是持“内部报刊准印证”的非正式期刊，是资料性非商品性的内部期刊，不得公开发行销售，1998年至1999年还得继续进行整顿，而这两种出版物都不是秘密文书。

对于《内参》是否属于名誉权法范围的问题，需要明确什么样的行为才构成侵害他人名誉权。侵害名誉权行为通常是言论实施的行为，理论上认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言论中有损害他人名誉(包括贬低他人社会评价的虚假事实陈述、侮辱他人人格的语言等)的内容；二、有特定指向，就是说，即使没有指名道姓，也足以使旁人理解是指特定某人；三、公然散布，即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传播。这是一种无界限的开放式的传播。新闻传播的对象无疑是不特定

的多数人,所以新闻若传播了有损他人名誉的内容必定要承担责任。而《内参》就不同了,这是专供领导参阅的资料,属于秘密文书,阅读者负有对情况调查核实和保守秘密的义务,所以其传播的范围是有限的、封闭式的。因此《内参》的差错不应归于名誉权法所调整的范围。当事人若以侵害名誉权对《内参》起诉,法院不予受理。顺便指出,由于《内参》是秘密文书,所以谁将《内参》内容公开散布就应由谁对后果负责,而不是《内参》。

新闻媒介属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大众传播行为中,传者、被传者、受传者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是平等的、自愿的,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内参》不是大众传播媒介,而是一级组织传播工具。组织传播的基本特征是传播活动必须凭借组织自身的系统进行,组织系统即为信息传播通道,传播的动力来自组织固有的强制力。组织传播最重要的类型是垂直传播,包括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等。下行传播例如上级向下级发布命令、指示,颁发文件;上行传播例如下级向上级反映情况与意见。由此可见,组织传播体现的是一种统属关系,其中大量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内参》、“情况反映”等属于上行传播。

公民向党和国家机关反映情况以及举报、控告等,是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民主权利。《内参》是反映情况的一条重要渠道。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反映情况不实和故意诬告是有严格区别的。法律只追究诬告的责任,对反映不实者可酌情予以解释、澄清以至教育,而不应予以法律处罚。以通过《内参》或其他渠道向上级反映情况是不符合这一法制原则的。当然,如果反映人自己又将不实情况扩散,造成损害他人后果,对这种扩散行为理应承担法律责任。

《内参》、“情况反映”一类内部参阅材料原是党和国家机关行政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绝大多数党和国家机关都把工作简报、情况简报作为信息的一个来源。新闻机构编印《内参》,在性质上同党和国家机关的简报是一样的。我国新闻机构主要进行大众传播活

动,同时又是从事向党和国家机关反映下面实际情况的组织传播活动,这是因为我国新闻机构都直接或间接从属于一定的党和国家机关,特别是党的机关报和国家通讯社、电台、电视台,更是承担着党和政府的耳目的任务。无论是新闻机构的《内参》,还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种简报,都是沟通人民群众和党与国家领导机关的重要渠道。这些内部材料,一是秘密,二是参考。事实上,对《内参》的内容不可能事事核实,有些群众信访摘编就印有“未经核实仅供参考”的字样。有关党、政机关不会也不应把这些参阅材料作为决策或采取措施的惟一依据。如果内部材料发生差错竟造成了损害他人的后果,譬如党、政机关仅仅根据有差错的材料就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处理,说明党、政机关在主观上存在过错,依法应由党、政机关对受害人承担责任,而不是由内部材料的编印者承担责任。《内参》编印者同它的上级存在统属关系,应在行政上对上级承担责任。特别是新闻机构,如实反映情况是它的应尽职责,对《内参》上的内容同样要严格核实,因客观原因未及经核实的则要在《内参》上如实说明,如因主观上的过错造成《内参》材料的重大差错,有关责任人员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所谓内部刊物,包括内部发行的正式期刊和持“准印证”的非正式期刊,就性质上说,仍然属于大众传播媒介,尽管是非公开发行或者非赢利的,但它们的传播范围并不是有界的、封闭的,如果刊登了侵害他人名誉权的内容,应具有公然散布的特征,属于名誉权法调整范围,当事人提起诉讼,法院应予受理。

——新闻人语:你怕不怕警察

中国记者中缺少真正意义上的评论员,可能与“橘生淮北为枳”有关,原因是水土问题。但体制外的“记者”——自由撰稿人会写评论,比如“你怕不怕警察?”,看到这个题目,你可能纳闷:人民警察是保护人民、维护人民利益的,怎么可能怕呢?还有,你遵纪守法,遵守交通规则,不做任何损害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的事儿;再

说，你还是纳税人，似乎更没有理由怕由纳税人供养的人民警察了。不过，即使你什么都好，我劝你还是最好别这么自信。不信，只需说几件事情，看你到底怕不怕警察？

“我就是那个还未‘出名’的张金柱，警察！我刚喝过酒，驾着一辆通过特权从路上‘白捡’的走私车（张金柱案发后，这个无比冤枉的车主受张金柱牵连无故赔偿受害人一定经济损失），我的车技并不怎样，你好好地走在人行道上，我开车能追到人行道上。你正骑着自行车，我撞了你，还带上了另外一个人，我就这样拖着你们和自行车，任凭周围的群众再喊再叫，我愣是将你们拖了 1500 多米。你怕不怕？你不怕是假的！除非你是钢铸铁打的！”

“好，你不骑车，晚上你和一位异性散步，我是湖北洪湖市茅江派出所的 A 巡警，我们单位为了‘创收’，眼下就专门抓你们这样的人。什么罪名？卖淫嫖娼。你不承认，我打你我骂你我恐吓你看你承认不承认。为了证明你的清白你从四楼跳下，跳下就跳下，我们局里会说你跳楼自杀是‘逃避法律的自伤行为’。你还跳吗？你想跳就跳吧！”

“你说，你不骑车，也不散步，你是本本分分的农民，你白天老老实实种地，晚上安安生生呆在家里守着老婆和孩子。你以为你的家就是避风港？错！我是黑龙江呼兰县许堡派出所的 B 警察。我先抓一个女教师，用辱骂、拳脚和电棍对付她，甚至下流地用刑具捅她的隐秘之处，逼她承认与一张我们事先拟好的名单上的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名单上就有你。你不承认，我们有办法，骂你是轻的，主要是打，别忘了我们是武装力量，各种刑具有的是，看你承认不承认。你问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忘了告诉你，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多罚点钱弥补经费的不足。”

“你是刘少屯，浙江苍南县白沙中学的教师。有一次上体育课时有人强占操场打球影响正常的教学，你与他发生了争执。他是当地一个无业人员，可他的亲戚不都是无业人员，我就是他的一个亲

威，警察！他把事儿对我说了，我现在就要把你抓起来。证据？没有！罪名？流氓头子！你不承认，打，用烟头摁在你额头上烧。还不承认，用电棍伸进你的嘴里放电看你招不招！你不服收审决定，不服就不服，你先在监狱里蹲着；你不服劳教决定，不服就不服，先劳教3年再说。最后证明你没罪，没罪就把你放了。我还是我，毫毛未损，继续当我的人民警察。”……

“不知道你看了最近报纸上的这几则报道后怕不怕警察，可能你胆儿大些，不怕，可我怕，怕我们人民警察，就因为没做坏事才怕，要是真做了坏事兴许才不怕！”

真言可畏。原来体制内的记者多数成了坚守正义的自由撰稿人，因为想成为体制内“老实听话”的记者不那么“容易”。

——体制外的“记者”吐真言

你知道吗？这样的文章最好不要发表。确实，发表了也未必有用。有谁看呢，谁听呢？有权阶层《内参》还看不完呢。一篇文章名叫“曝光三陪小姐”，是这样写道：在遍布城乡的KTV包房，小姐都是有价的，钱成了与之交易的惟一工具，没有钱，想占便宜，纯属吃饱撑的。但是有一批人没有钱也可以耍小姐，这些人是有头有脸的，有可以“交易的资本”，比如权力在手者，就不怕没有人上钩，而且还是愿者上钩，不用强求，主动权在我手上，小姐什么的，只是小小意思，怕什么？我说小姐是心忧“肉贱”愿客骚，如白居易老先生《卖炭翁》里的诗句“心忧炭贱愿天寒”同义。在现实主义诗人笔下底层人民是疾苦又无奈，而现在无奈的是小姐们，她们没生意就无法维持生活，所以就希望客人风骚一些，客人要抓住她们，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掂摸要弄。有了风骚客人，就有她们的饭碗，就有她们吃饭的权利，如果没有人放肆、风骚，她们就没办法，只能两手空空回到穷乡僻壤，这是没办法的。她们或许会自我安慰“我拿青春赌明天”，或许在继续死死守候，她们知道为了吃饭就必须去做、去付出，她们有青春鲜活的肉体、笑容和旺盛的精力，对金钱的厚爱。

她们似乎认定有今天的忍耐就有明天的更美好，她们“坐台”当“三陪”，她们出台“卖肉体”，她们有自己的职业道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此外，还让她们干些什么呢，她们有的小学毕业，有的初中毕业，甚至还有文盲，甚至刚刚见到号称“文明”的城市，刚刚熟悉数人民币，就满怀着光荣和梦想，走出家门做事业，但她们真的什么都能做吗？

不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她们，所受的素质教育、九年义务教育还剩下多少？她们的国民待遇是怎样的？如果她们不卖身，境况还要差。令人不明白又很吃惊的是，卖身后的她们还是不能选择自己的居住地，没有迁徙自由，她们不能在首都这样的暂住地常住，甚至恋爱、登记结婚，她们注定要回原籍，然后才能去做城里人该做的正常的一切，这公平吗？

或许有许多城里人认为这些小姐是“贱”，但又有谁认为她是人，她是不应该贱的。现实为什么会这样残酷地“贱”了她们呢？如果这样是公平的，那么就会出现玩弄小姐以及社会道德的沦丧。小姐是弱者，把弱者给欺负了，这就等于把水给弄浑了，人与人之间用不着信任了，一切就此拉倒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心忧“肉贱”愿客骚，这个社会还会好吗？或许，白居易老先生知道后，还会夜不能寐，无奈地挥洒诗情，做出一首新时代的《卖××》来。

对于现实，自由撰稿人只能说这些了，因为现在的先生们和小姐们都不想听什么了？他们只想玩耍。再者，由于文章太真实，也就没有发表的必要。有些人是如此观点。

作者还需强调一下恋爱自由权，像这样的文章也不多。真话其实很管用，读者说呢？

“恋爱中的人权说到容易做到难。人有许多本能，诸如自私、食欲、贪欲、性侵犯、强奸、恶毒、麻木等，这是人性恶的一面。必须承认人性本恶，人生来都是有罪的，这点不容怀疑，更不可饶恕，因此，人不能没有规则和法律来约束，人不能没有忏悔和认罪感，人

不能没有人权。今天我所说的是恋爱中的自由权,不过,我们平时常讲的爱情一般有这样的说法:即爱情在关键时刻能拯救生命,驱赶罪恶,让生命升华出人性的光芒来。但是,今天我对这样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在残酷的生活中,爱情难敌“人性之黑,本能之恶”,一般所谓的想说爱你不容易只是平时闲人的呻吟,只可当作样子看,爱在现实生活中有时挺苦挺难挺惨的,不说透你不会信。

传统观念中的爱讲究门当户对,什么郎才女貌最般配,其实都是些害人的所谓真理,爱最讲究自由,规则是自由的无怨无悔,甚至老夫少妻、少夫老妻之间,也都会行得通。爱情贵在自由,自由往往是与权利挂钩的,但是我们身边和周围碰到的没有恋爱自由权的日子太多,苦不堪言的日子太多,如陕西礼泉县有个叫寇随谦的副县长,女儿恋上镇里的农民小伙子竟有罪,致使小伙子的49岁老爸被副县长手下的公安抓走打死。这个礼泉县的县官竟这样对待自己的老百姓,何生命权之有?何恋爱权之有?

恋爱自由,宪法、婚姻法上都有规定,但执行起来太难,谁有权谁受益,法不如权,权力导致自由权利无效,这究竟是谁的悲哀?1998年6月6日,欣慰的是《北京晚报》传来消息,称礼泉县“理”要全,副县长寇随谦动用警力干涉婚姻自由致人于死案终有结果,滥用职权的县公安局局长、刑警队指导员白某被逮捕,寇副县长被立案调查——事情刚刚开了个头,还不知打死人的公安干警是否偿命?

恋爱不自由在礼泉县公然发生,最可怜的是礼泉县那些渴望自由恋爱的青年。

同时在这个礼泉县——这个10年来令人有悲无喜的地方发生了离婚不自由。

那是1988年4月26日下午,在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烽火村,刚被村干部和公安干警从外地“带回来”的青年农民武芳被毁容,变成了一个烧伤面积达23%、双目近乎失明的浑身焦黑的炭人。

武芳被害是因为想自由离婚，不料惨遭毁容。而前者是恋爱不自由，还赔上一条生命。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件残酷的事实都在礼泉县发生，一个10年前，一个10年后。不知礼泉县还会有下一个10年吗？

再说一个侵犯自由权的事比前两个小一点，但一样的不可忍。那是一个京城某餐馆打工的小伙子，整天在为老板卖命，难得见到外面的女孩倾诉衷肠，天天无处行使恋爱权内心憋得慌，就日久生情，与同在一块打工的女孩谈起了恋爱，没想到老板知道后大为震怒，先炒了小伙子的鱿鱼，而后无端报复，肆意欺凌那农村来的女孩。由于他自己心态极不健康，打人骂人家常便饭，众人胆小，多是敢怒不敢言，无人敢问，直到现在那无法无天的老板还在侵犯雇工的恋爱权，不见有什么法追究他？恋爱何罪，竟被粗暴干涉？爱情不自由，人间怪事，竟司空见惯！

其实人间最自由的便是恋爱，到了1919年“五·四”过后80年，竟然在中国有些土地上自由不起来？怪事，荒唐。恋爱不自由，还有什么能够自由呢？自由权遭粗暴干涉，那些守法立法和执法者干吗去了？守法者不至于开店挣钱去了，立法者不至于理发去了，执法者不至于睡觉去了。法还是没有力度？老百姓还需要不需要相信法？法本身有没有公正？类似批评与评论的文章本身能否有用？

——自由撰稿人之正义

山东青岛著名的自由撰稿人、民间摄影记者丁大康先生在全国率先报道法官知法犯法是“兽行缘于特权”。《工人日报·新闻周末》报道了丁大康追踪采访的这起发生在法官身上的丑闻后，全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闻讯为之震怒，称“决不护短，一查到底”。这起丑闻发生在1998年7月22日下午，山东枣庄市山亭区徐庄乡回民小学学生米勇和哥哥米鑫在石门水库浅水处戏水，一辆带有“法院”字样的金杯面包车戛然而止，下来4名身着制服，酒意十足的

法官。在浅水处,一名法官说,谁能从这头游到那头,我就给谁1000元钱。山亭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王永强抢过话茬:“我能游100米!”旁边的米勇天真地说:“你不行!”“谁说我不行,不行咱试试!”王一把抓过米勇抛入水中,不论哥哥米鑫如何跪倒磕头哀求,几个法官在原地丝毫不动。最后,11岁的米勇终于溺死。

在新闻界的监督下,1998年12月1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间接)杀人罪一审判处46岁、原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王永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8年12月8日《中国青年报》以“法官溺死儿童只判死缓,原告将请求检察院抗诉”为题进行报道。报道介绍,受害人对判决不服,杀人应该偿命。而被告人、杀人犯王永强对判决结果基本接受。

对此,一位名为袁昌志的正义之士认为:想不通为什么天职是保护人民的某些司法干部,对待老百姓却是那么残忍。这令人想起了日本鬼子侵华时将我国的妇女儿童抛入水中火中的情景,而今天是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又令人想起开车撞人、拖人的张金柱和驾车撞伤前女友、撞死其男友的重庆一级警司邹昭键……

司法的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公安的腐败是最恐惧的腐败,而当司法人员直接残害大众时,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最后期待也会消失殆尽。司法机关的腐败频频曝光,一些人也被绳之以法,为什么一个个“张金柱”、“李金柱”仍然竞相涌现呢?

这主要是因为司法机关仍然拥有民众难以监督、制约的权力。权力腐蚀人,拥有绝对权力的人绝对的被腐蚀。一批批腐败分子,无一例外地拥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权力,当他们在自己权力的极限内为所欲为惯了,慢慢地就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只记得两点:对上献媚取宠,对下作威作福。这一点也不奇怪,对上献媚时失衡的心理,需要在对下抖威风时得到平衡;而残忍到丧失人性的地步,则是因为在握有一部分权力的情况下,在不断地权权交易、权

钱交易中,灵魂逐渐迷失,自以为成了权的化身。

面对荧屏上辛劳正直的人民法官形象,老百姓经常看到的却是上午像包公,中午像关公,晚上像济公的法官嘴脸,无论你怎么高明的“舆论导向”也改变不了老百姓的看法,这就应了一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权力不能真正受到制约,新的“王永强”仍会接二连三地出现。

——对舆论监督的可操作性的质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消费者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吗?消费者打假多是被迫的,因为假货太多,还因为有“消法”支持。可在现实生活中,竟有人对吃了亏的消费者说三道四,称消费者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不是生活消费需要购买,而被指责为知假买假,诈取钱财,是刁民。真是怪论,按照这个逻辑推理,那么知假卖假者当属经营者了,难道“经营者”还不是诈取钱财的经营者?打假的王海们有被“假”反打的危险,经营者却丝毛无损,这岂不是本末倒置、粗暴地玩法律条文于股掌?

1996年底,有一件记者所亲身经历的事更令我震惊,这位记者作为消费者前往一家北京的火锅城就餐,由于是他和他的朋友们聚餐,晚来的一个朋友已吃过饭不再吃,但已经入座,朋友们就热心地递上一杯饮料。这时,走来一位服务员,说新来的顾客需交钱,每位42元。这个数字是指火锅费39元,锅底费3元,但该火锅城一楼入口处却明明写着每位39元,没有明示还要收3元锅底费。这莫不是一些地方卫生监督员的“手法”?先是躲在一旁看你吐痰、扔垃圾,等你事实清楚后一跃而出,撕张五元罚款单,让你乖乖地掏钱。对此,这位记者感到莫名的气愤和悲哀。《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消法》)第19条明确指出,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

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寿命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第22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通过这两条,就可以认为该火锅城服务质量太差,一是顾客来时,经营者没有向其明示收费标准,明为39元,实为42元,隐藏3元锅底费,而且未说明这是火锅城内部自定的待客标准;二是该顾客是来找人但不是就餐的,而且他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只喝了饮料,按人头收42元火锅费有些差强人意,强买强卖;三是火锅城的内部自定待客标准缺乏法律依据,不应向大众强行推广;四是火锅城作为面向大众的经营场所应该允许顾客的朋友来找他,或出入,顾客的朋友在未影响经营者生意的同时应处处受到尊重。但该火锅城把所有进门者都当成就餐者的顾客按人头收费。如果火锅城对顾客没引导好,损失只能自负,不能怪罪顾客才是。五是火锅城极其不尊重消费者的解释权利,声称不付钱不行,少一分也不行,而消费者的朋友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只是喝几口饮料,客人来时未讲明情况,难道这是消费者自己的责任吗?这样下去,谁敢去吃“咬人”的火锅?

火锅吃后,这位受尽委屈的记者自然不平,很快在中央某报上刊登一篇批评稿“喝杯‘开水’要价四十一——火锅城‘涮’客有方”,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中的“开水”一词使用不当,实为透明的饮料,是外观上看似白开水的饮料。没想到见报后,影响很大,对方一纸诉状告到某市某区人民法院,一年后的1997年10月30日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中央某报败诉,理由是公民和法人的名誉权受法律的保护,原告火锅城采取自助的形式经营,事先规定固定价格,按人数收费(怎么没有明示在先、说明在先?).即使服务员劝顾客吃些并为顾客点上火锅(注意是劝顾客吃,劝顾客受罚?).而顾客是在不明真相的条件下喝了饮料也要按收费标准收费。法院认为该

记者在中央某报上批评报道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造成经济损失,根据《民法通则》第 120 条应为原告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8000 元,诉讼费由中央某报一方负担。这个判决把板子都打在被告中央某报上,而对被告提出的《消法》条款未予支持。而且诉讼费 2290 元明显不公,按惯例,诉讼费根据判决金额的 1% 决定的,而此案判决金额是 8000 元,诉讼却是按法院不予支持并给予驳回的原告诉讼请求“赔偿经济损失 8000 元”做出的,这难道是公正执法、公平判决吗?赔偿金额 8000 元是怎样认定的,判决书上含糊其辞,一笔带过。看到这个判决书,作为消费者的此案“始作俑者”不明白,为什么《消法》上条款有理有据,为什么以坚持公正和法律精神为准的法院不予支持?难道非要再审一次吗?一审与二审是一家人(上下级)吗?有没有 95% 的可能是维持原判。若维持原判,再审还有什么意义?这岂不是再次对消费者不予支持?

法院维护的是法律及公正的尊严,法律体现的是公民的意志,公民的意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的是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的权益神圣不可侵犯。凡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法人或自然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消费者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不管是哪一方先告状,法律都要体现出公正、公平,判决就像板上钉钉,而不是黑板上写字想擦掉就擦掉,未判决之前应从细从实查证,不可“想当然”判案。

作者写下这么多感想,依据是《消法》——我们每个人都要用好的法律,每个人都要维护神圣的法律尊严,真正让法治时代的法治精神体现出来。依法治国,应从小事做起,应从点点滴滴做起,不然,忽视小的,势必日后忽视大的。忽视小的,小损失。忽视大的,大损失。小损失可怕,大损失更可怕。

还是回到本文标题上来吧,消费者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吗?如不能,那么谁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是法律,抑或法律以外?作为即将步入法治时代的公民们,对此判决,公民们是尊重法律?还是尊

重“法律以外”?再者,新闻记者作为坚持正义和公众立场的新闻工作者,掌握舆论监督权利,维护自身权益,何错之有?若国家的宣传舆论监督工具不能运用,那么谁来监督宰客者,谁来曝光宰客者?不然;岂不让舆论工具及法律失去意义?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错的正不了,正的错不了。这是因为有神圣的法律和公正的执法者。我们相信真理存在。我们相信有真理的保护。

——如何避免官司“骚扰”?

市场经济时代,有了官司不要怕,没有官司要小心。《中国出版》有一篇文章提出:所谓新闻出版侵害名誉权是指报纸、期刊、出版社在自己出版的报纸、期刊、图书及音像制品上故意或者过失地刊登侮辱、诽谤公民或法人的作品,或者揭露公民的隐私,造成受害者名誉权损失的行为。所以要引起记者们的注意。

从司法实践看,新闻出版单位为避免侵权,除了须认真审核新闻稿及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的作品披露的事实是否真实外,还须防止原稿存在如下问题:第一,错误地指责某人为罪犯。第二,错误地指责某人的行为逾越了社会道德规范,如指责某人生活作风不好、不赡养父母、虐待家庭成员、虚伪等。第三,指称某人染有恶疾或精神病,使公众厌恶而不愿与其交往。第四,毁损他人在职业或商业活动中的声誉。第五,陈述一项事实时运用不当比喻。比如,称某人为恶棍、骗子、强盗、流氓、无赖、妖精、疯狗、蠢猪等;或者不是善意地对他人人格进行正当批评,而是以漫画形式对他人人格进行丑化;或者在陈述事实时进行不当的评论。第六,揭载他人隐私。从这些年来新闻出版侵权官司看,对两种人的隐私权的保护需十分注意:第一,犯罪分子的隐私权。第二,社会知名人士的隐私权。

——文责谁负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事实不准、报道失实,稿件就成了无生命的“空文”,不仅起不到体制内传媒所要求的“武装人、引导人、塑造

人、鼓舞人”的作用，还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同时也会降低报刊的威信。而要保证新闻的真实性，编辑是个关键环节。编辑面对众多的来稿，既不能“错把黄金当成铜”，也不能“抓住鱼目当珍珠”，而应对报道的事实、时间、地点、人物、数字、引语等，进行认真推敲、核对清楚。这就要求编辑必须有为读者、为社会高度负责的责任心，要有严谨的工作作风。有人说，采编就像一场足球赛，一般队员（作者）丢了球，还有可能抢回来，而守门员（编者）失守，损失就无法挽回，因此，“责任心是编辑工作的灵魂”。如今的一些报刊，失实报道和假新闻时有发生，在记者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有人认为其原因恐怕与我们的一些编辑缺少责任心有很大关系。因此记者编辑们理应注意吸取经验，亡羊补牢。

——专家比记者看得更清楚

比记者还清楚的自由采访者有专家、学者和普通人，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呐喊更有舆论监督的价值。请看民间的声音之一：

一篇发表在《新民晚报》上的顺口溜说，“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穷了靠边的（离、退休干部），醉了当官的；打麻将三天五天不累，喝茅台三瓶五瓶不醉，下舞池三夜五夜不睡，玩女人三个五个不累，干正事三年五年不会；省里干部忙出国，县里干部忙吃喝，乡里干部忙赌博；高等教育商业化，教授讲师商人化，智力劳动商品化，大学校园商场化；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

请看民间的声音之二：

某年10月1日，天安门前人如潮水，地下通道站满了警察，行人只许出，不许进。因为我这个“人民”事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约人在先，必须进去。所以我在出示记者身份证不管用的同时，只得翻越栅栏而入。我成功了。我把我翻越栅栏的行为归罪于警察，警察逼我无路可走，我只得反其道而行之。警察的工作是维护治安，疏通路段，预防犯罪，保护合法的公民，惩治罪犯。而不是

行人有犯罪的可能,都要被看管,限制行动自由。如果是这样,警察除了充当专制工具外,还有何用?我想:记者监督警察没有错,警察监督记者也没有错。不过,只怕监督空有其名,让犯罪者更加胆大妄为而已。

请看民间的声音之三:

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表示了他想把世界看得更“清楚”的美好愿望。他说“在中国,制度理应价更高”,但事实上:

“夏天回到北京,忙碌之中,赶上女儿急诊,送去儿童医院,我也陪了整整一夜,亲身体会到了“过渡时期”我们的医疗体制中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现在旅居莱茵河畔,有时间回味那次经历,不禁慨叹:需要付出多少患者的生命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医疗制度呢?

“1997年8月21日夜里,女儿或许是食物中毒,或许是急性肠炎,反正高烧不退。体温接近40度时,我和妻子决定送她到旁边的复兴医院急诊。当时是半夜,急诊部值班医生不知道在哪间屋子里睡觉。护士敲一根暖气管通知他有病人急诊。谁知这位医生来了以后,先问女儿多大了,然后告诉我说,凡是14岁以下的病人,医院一律不管。我惊讶地反问他,他首先是不是一名“医生”。他说他是,但仍然不能为我的女儿看病。我请他哪怕是只看一眼病人的情况是否严重,是否应当送到更远的儿童医院就诊。他索性回到房里去了,临走告诉我一句非常理性的话:‘如果我为你女儿看了病,我就可能吃官司。如果我不给她看病,天大的事也没有我的错。’这位高度理性的年轻医生姓孙,工作证号码是673。

“肯定是以前出过医疗事故并且病人家属状告过院方,所以复兴医院规定凡是‘儿童’都由儿童医院处理,本院一律不诊。可是医院的这一规定在‘急诊’情况下完全违背了医生应当遵循的‘治病救人’的最高道德准则。

“我意识到同具备了如此高度的‘工具理性’的医生已经没有

办法对话,于是转而请小护士打电话叫急救车,也许因为是半夜,急救站里也找不到司机,大约等了30分钟,车终于来了。又过了10分钟,我们到了儿童医院急诊大楼。我们从挂号到等来一位医生看女儿的病,一共40分钟。加上在复兴医院耽误的时间,已经近两个小时了。

“医生看过女儿的病情,让妻子带她去化验大便。可是当化验结果终于从化验室拿来时,医生不相信化验结果是‘肠炎’。她坚持认为是‘痢疾’,必须再去化验。就这样,我们等了3次化验结果,而第3次化验结果是这样形成的:化验员问妻子,大夫到底认为是什么病。妻子回答,大夫认为是痢疾,于是化验员说,那就写‘痢疾’吧!”

“女儿现在终于有了一张病床躺下,护上也终于过来为她扎上了针管然后接上点滴瓶。因为确诊为‘痢疾’,所以医生开了很贵的点滴用药,几百元吧。药盒上印着‘Calfon’药名(医生叫它‘凯福龙’),德国产品,没有过期。我依次看了观察室里其他的病床,所有的儿童(大概是6名)都在点滴,而且都有德国的‘退烧’药加在点滴液里。我又在急诊室墙上看到一张急诊收费标准,最高的(恢复心脏起搏手术)也不过是10元。相比而言,药费可以为医院带来大大高于‘操作(Operation)’的收入(至少以营业额计算是这样的)。

“更令人寒心的事情现在才发生。点滴后大约10分钟内,所有在女儿之前点滴的儿童都开始颤抖或者‘抽搐’,值班医生和护士都开始害怕。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20分钟,那些儿童的家属吵着要求解释。我注意到护士悄悄把所有病床的点滴瓶收走,在隔壁清洁室里噼里啪啦地销毁了。而且她告诉医生说,白天曾经有7名患者用过这种德国药之后也出现抽筋,不仅如此,所有儿童的高烧都完全没有好转。最后,我自己的女儿也开始颤抖,深呼吸。她说越是呼吸,越抖动得厉害。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颤抖足以令人窒息而死。医生和护士围着女儿抢救了20分钟,急救针和各种药物,然

而，高烧不退，但抖动停止了。医生说她马上要下班，建议我们转到很远的一家从没有听说过的医院去继续‘治理’。我立刻拒绝了。我要求只开最常用从而保险的退烧药，回家治疗。当时是早上8点左右。这位医生的上级——该急诊部的主任，态度更加恶劣。在她看来，我们不同意转院简直是‘不人道’的行为，而且由于我们的行为，医院将不对病人负任何责任。我们带着女儿回家了。只用了最简单的国产退烧药，女儿在一天内就完全康复了。我记得所有其他病人都被儿童医院说服，转到了那家知名的医院。我真为他们经不起折腾的小生命担心。

“我不清楚我们现在是否还有严格的医药管理制度，是否还有进口药物和各种新药的检查和试验制度，以及是否还有防止医护人员擅自买卖药物的制度。我说的制度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具备了执行制度的激励机制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制度’。如此看来，目前药物价格大大高于医务人员的劳务价格，所以人们才会有足够大的激励去推销药物，哪怕是付出‘草菅人命’的道德代价。但是要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却涉及到更广泛的医疗体制改革的问题（摘自1998年4月号《街道》）。

——历史上的光荣与梦想

我们青年界所拥有76年光荣历史的著名杂志《中国青年》，1998年11期刊登著名新闻人恽代英写于1923年的青春发言，曾原载1923年10月20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一期。编者按说：75年，弹指一挥间。世事沧桑，人间巨变。光荣与梦想，继承与发展，由此发轫。谨摘恽代英先生《中国青年》1923年发刊词纪念《中国青年》创刊75周年：

“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衰老沉寂的中国像是不可救药了。但是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惟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

“只是可惜风雪的熏染太利害了。魔魂的诱探太有力量了。志

第四种权力

行薄弱的父兄，脑筋昏乱的师友，一天对他要说许多似是而非的话，亦要劝他作出许多败坏操守的行为。所以许多青年每每仍是不能保持他自己的纯洁，而为万恶社会所同化。

“亦有一些青年，幸而能不为那种父兄师友所愚惑，但是他们又因自己品行才学的有些缺欠，而在社会上得不着指导他们纠正他们的人，所以他们常常苦于不知应当怎样做事，以及他们做的事不知应当怎样改良。

“我们必须为青年的这种需要，供给他们一种忠实的友谊的刊物。这便是我们刊行《中国青年》的意思。

“《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要介绍一些活动的方法，亦要陈述一些由活动所得的教训。中国的事，总是要做的。做事的方法，总是要学的。青年要学得做事，要用做事以学做事。青年是需要读书的，要读指导怎样做事的那些书。但是同时要做事。只愿读书而不做事的人，纵然把指导做事的知识学到手了，他会失了他做事的习惯。

“《中国青年》要指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要介绍一些强健伟大的事绩与言论，亦要用种种可以警惕青年的材料，以洗刷青年苟且偷惰的恶弊。中国希望她的国民都能尽他的责任。中国需要强健的国民，只有强健能救拔我们于习俗之中。只有强健能使我们避开魔鬼的诱探。只有强健能打倒一切魔鬼，为中国前途开一个新纪元。

“《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切实的路上。要介绍一些切实可供研究的参考资料。要帮助青年去得一些切近合用，然而在学校中不容易得着的知识。中国的青年，已经显然可见其必须担负指导群众的责任。所以他们必须自己对于要走的路很有把握。虚骄的浮夸，不是中国所需要的。中国的青年，必须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好。

“这个对于《中国青年》的期望或者太大了，不是本社同仁力量

所能做到的。但是本社同仁总当勉力的向这一方面做,而且亦诚意的要求阅者诸君,大家要给我们一些仁爱的帮助,以补我们的不周到地方。”

看了上文,只是不知,今天的我们除了怀念恽代英,还拿什么声音回报先烈?

——寄给新闻界的真实声音

《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每天都收到一些青年来信,涉及的问题五花八门,以下这封信是1997年3月15日由作者亲自送来的。他说他前几天生病了,抱病写完此信,并从几千里之外赶到北京,就是想当面听听编辑、记者的见解。在信中,作者讲述了他的奋斗史和经商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想,甚至毫不掩饰自己所参与的最隐秘最见不得人的事情。他所披露的种种腐败和丑恶现象,正是我们党和政府全力以赴要解决的问题。这些现象尽管发生在个别基层单位、个别人身上,也应引起高度重视。透过这封信,人们清晰地看到腐败和丑恶是怎样毒化社会风气,毒化青年一代心灵的。值得赞赏的是作者的勇气和坦诚,如没有勇气和坦诚,不敢面对现实面对阳光,长了霉的心灵最终会腐烂。

为了帮助这位小伙子摆脱困境,《中国青年》编辑部有人建议他应该挂靠一个部门,有了靠山,做生意就会顺当;有人说他应该赶紧清仓盘货,到投资环境好的地方再图发展;有人拍案而起,鼓励他去有关部门上告,和腐败分子彻底决裂,不惜拼个鱼死网破……

信的作者说,这些他早就考虑过,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想搞清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在他经商的几年中,他的做人准则为什么总是和经营行为发生冲突?在现实生活中,他能不能把二者统一起来,又讲良知,又能挣到钱?如果良知和挣钱发生冲突,他该怎么办?

《中国青年》的记者们被问住了。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包含着

市场经济环境中,我们年青人的人生信条和行为准则如何选择的问题。该杂志希望借助广大读者的智慧帮助他,也帮助广大青年和读者自己。也许,答案就在大家不懈的探索中。

——想生存发展,就要把自己变得丑恶?

一个小老板致《中国青年》的信:

《中国青年》编辑部:

我向你们求援。

有位外国作家说得好:“天下最痛苦的人,莫过于内疚在心的。”我就是这样的人。这一阵子,我几乎每天都失眠,胡思乱想,昏昏沉沉……

我是个农家子弟,老家就在某省偏僻的农村。苦熬苦读上了大学,1987年毕业时由于没有家庭背景,被分到乡里教中学。教书育人是高尚的职业,我本来有心吃一辈子粉笔灰,可是现实给了我很大刺激,我一连谈了两个对象都告吹,她们明确地说,教书的太穷,乡里环境太艰苦。于是,我开始活动往县城调。没钱没势,进城谈何容易。遭到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若干次白眼后,我一赌气辞了职。

那是1992年,“市场经济”撩拨得人心又热又乱。我发誓要挣很多钱,劝说父亲卖掉一口猪和一袋干辣椒,乘驴车、汽车、火车一头扎进深圳特区。特区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遍地是黄金。我一个外地人,又穷又土,举目无亲,奔波了两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当时真是走投无路。回乡教书已不可能,且怕人耻笑;继续找工作,盘缠眼看就要花光,几毛钱一包的方便面就要断顿。就在身上仅剩2毛钱的紧要关头,我被某木器厂雇用,干推销员。推销员工资很低,但是有10%~15%的销售提成。我周旋于深圳市各商场和机关企业,劝说他们买我的木器。起初很艰难,他们不理睬我,经常把我轰走。那几个月,我把一辈子的好话都说尽了。冤枉路不知跑了多少,平均每月穿坏一双皮鞋。也许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上帝,几个月后的

一天,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要我送几张办公桌去。接着客户接连不断,忙得我不亦乐乎。我的销售业绩可观,成了老板的红人。这位老板的心很黑,订单一多做不过来,他就让工人以次充好,粗制滥造。我向他提出,做人做生意要讲信誉,他不听。我说,坑害客户的事我不干。他火了,你要是不干,当月的提成就不给。我也火了,不给拉倒,不干净的钱我不要。离开厂后,我当过杂志社的发行部主任,当过广告公司的业务员,苦干3年,我居然挣了200多万元!

没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山沟里的穷小子不要说能挣到200万元,做梦都梦不到。有了这笔钱,我的心开给躁动。我为什么不能尝尝当老板的滋味?

全国各地考察了一圈,我初选了4个地方:深圳、大连、杭州及家乡省会。尽管家乡省会的条件最差,我最后还是钟情于它。我想,甜不甜,故乡水嘛。

1995年5月1日,我下决心在省会开一家商场。选址、筹款。办理各种手续速度很快,10天内全部完成。5月10日,一座投资400万元、营业面积1000余平方米的商场宣告开业。开业典礼真是热闹非凡,市区的领导,还有方方面面的官员都来道贺,光酒席就摆了20桌。席间,领导不住鼓励我这个归来的游子要多为振兴本地经济作贡献。我心里热乎乎的,就着酒劲透出我的雄心壮志:经营好商场,下一步要办工厂,造福家乡,造福社会……

谁想开业以后,经营效果很不理想。假货把我整惨了。假货造得很逼真,进价低,我自然竞争不过。我对部下说,经商要讲信誉,我的商场绝不能靠贩假挣钱,我的心里很不平衡。还有比这更令人憋气的事。仅举几例。

——早上,我让营业员挂出“年终减价酬宾”的横幅。9时许,几辆摩托车浩浩荡荡开到门口,说是市容大队的,挂横幅未经许可,要罚款5000元。我是看隔壁挂我才挂的。来人气势汹汹地说,今天就是要查你。我陪着笑脸,点烟敬茶,眼睁睁看他们掖走5000

第四种权力

元。

——消防的来了。正待安排午饭，税务人员赶到。进门就问：文老板，听说你们进了一批VCD，想借去看一下。我就让营业员搬来两台，打发他们走了。

——工商来了，见面就质问：为什么不参加企业法人培训班？我说：你们发的教材我买了，没时间去培训班。工商说：不参加也要交培训费，否则不给年检。年检逾期，罚款10000元。

——质检来了，有省里的、市里的，还有区里的。有的扯商标，有的查音响，翻箱倒柜一阵后，提出要我付质检费。他们说，这叫对消费者负责。交完质检费，宣布合格。

——电视台记者打来电话，说想要18000元广告费，电视台给播节目。

他听出我的口气犹豫，暗示随时有可能“曝光”。我马上答应……我真是心力交瘁。这一二年，我已形成条件反射，一听电话响，一听有人找，心里马上就发毛。开商场的，自然希望顾客盈门，我却惧怕许多顾客，不希望他们来买东西，我有一个账本，记录着这些顾客的购物情况。也仅举几例。

——×局长的儿子要结婚，让直接管我的×所长拿来一张购买清单，计38860元。×所长说：“某局长的儿子嘛，收个出厂价吧。”不算广东到这里的运费，出厂价是25630元。我正待应允，×公子来电话：“我最多出18200元。”这笔买卖我净亏8650元。

——××是×主任的司机，买走15800元的商品，只付9500元，净亏3010元。

——××办×主任，为女儿结婚买走16800元的家具，口头说付6800元，实付2000元，净亏11000元。

——消防队×副队长说家里想买一部电脑，扔下2000元就走，我追出去，他说过两天要来检查，我只得认账。此次净亏6000多元……我只有忍气吞声。我始终相信，这些权力部门的大多数干

部是好的。不过,几十个部门每个部门只要出一两个贪财的家伙,每年只要到我的商场“买”一次东西,我就吃不消!

当初投资 400 多万,不到两年,净亏 160 万。再这样下去,不用两年我就要破产了。破产了,我个人无所谓,原本就是个穷光蛋,可借朋友的 200 多万元我怎么还?我着急,快急死了!

假货泛滥,生意萧条,再加上吃拿卡要,我陷入了困境。朋友给我出主意说,老百姓的钱不好赚,你应该去赚公家的钱。我思虑再三,最后,还是照着办了。

那天下午,朋友来电话,说××局要添置 20 万元的办公用品,只等×副局长敲定哪家商场。我当即心领神会,问好处费多少。朋友说,×副局长不要钱。我正纳闷,朋友问起××夜总会,我赶忙点头。晚上,×副局长来到夜总会,径直走进去。曲里拐弯进了包间。我虽经商数年,还是第一次进夜总会呢,副局长去哪我就跟到哪。一个小姐端着一瓶酒进来,两人你一杯我一杯喝起来。喝着喝着,小姐就坐到副局长的腿上去了。我在一旁窘得很,副局长倒不在乎。一会儿,送茶的小姐来了,长得挺漂亮,副局长一伸手,又揽在腿上。三人说笑调情,丑态百出。玩到深夜,我出去结帐,3320 元。如是三次,副局长金口大开,就定你们商场。20 万的东西,毛利 5 万多,扣除风流费和给朋友的介绍费,我一下就赚了 3 万多。

前不久,一笔大买卖来了。××托人找我,说是××局要新组建,需购买 300 万元的办公用品。××虽然官不大,却是个掌实权的人物。为了让合同到手,我处处满足他的欲望。游深圳,逛广州,纸醉金迷,夜夜笙歌。那个晚上,××酒足饭饱后狮子大开口,要我把 40% 的毛利悄悄塞给他,否则就不和我签合同。300 万元的商品,毛利大约有 40 多万,他要走 40%,再扣除我为他支付的各种开销 10 万多元以及各种税费,尚有近 10 万元利润,我咬牙答应了。谁知××又提出,为庆祝合作成功,他想乐一下。说白了,就是给他找个妓女。我说我哪认识妓女,××不高兴了,说我没诚意。我

只得厚着脸皮求朋友,从××夜总会找来一个。××领着妓女走上楼去,一会又下来,说文老板你得上楼去为我望风,现在扫黄风声紧。我虽然百般不情愿,但想到已经为这笔生意付出10万元的代价,我立刻软了。我当时头脑中一片空白,好像有魔鬼附体一样,乖乖跟他上了楼,看家狗似的站在楼道口。我真无法用语言形容那时的感受。

回到家,我一头栽在床上。生平第一次感到心灵的折磨是多么痛苦,我不住骂自己,为了区区10万肮脏的钱,你居然变成个拉皮条的,把祖宗的脸都丢尽了!我心里在咆哮:无耻的××,算了,给你吃喝嫖赌的钱算我交了学费,10万元利润我不要了,40%的毛利让它见鬼去吧!

第二天一早,走进冷冷清清的商场,看着垂头丧气的部下,我对自己的责备,积蓄了一夜的良知和愤怒顿时变得苍白无力。我开始同情昨天在饭店里的我,一遍遍为自己辩护: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子,有什么办法。要生存要发展,你就必须容忍丑恶,学会丑恶。你不给××40%,别人会给的;你不挣这10万元肮脏钱,别人会挣的。到时候别人发起来了,你却破产了。你说你曾有过良知,有过正义,谁信你,谁同情你?

这些日子,我内心总是平静不下来。我开始厌恶这种尔虞我诈、不讲良知的的生活,也许,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经商。可是,眼下我欠了债,不经商怎么还?

想生存发展,就要把自己变得丑恶些吗?

一个想挣钱又想讲良知的小老板

1997年3月10日

感谢《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此文,小老板的文章透出一种声音,让我们知道新闻界在“拉广告”的同时,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总不至于什么也不做。

4. 怀念80年代的新闻

特别注：1998 年是多事之秋，发生在白宫的性丑闻证明，美国总统是透明的，美国的联邦政府也是彻底透明的。还好，克林顿总统终于承认他确实与白宫前见习生莱温斯基有性关系，作者认为克林顿先生起码是个倒霉的诚实鬼，一人做事一人当，算没丢尽男人的面子和自尊。再者，起码美国总统是个透明的人，而且是个私心得到严格监督的人，这点很受人欣赏。但不知他的这段“性”事和“一时糊涂”会不会被一向开放的美国人民所容忍？确实，一个政界人物，在他没有完全有把握接受媒体舆论监督之前，请不要进入政界。

现在，我们从国内的情况看，今天的新闻也在监督，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是新闻生存的保证。我们开始从一条迟到的新闻怀念 80 年代，并向 80 年代的记者看齐。请看：“中央国家机关不少干部时间观念在哪里？上班迟到松松垮垮不能容忍”：

新华社北京 1987 年 6 月 15 日电（记者邹爱国 张严平） 8 点上班的钟声响过之后，中央国家机关有多少人迟到？6 月 9 日到 12 日 8 时至 8 时 30 分，记者到中央国家机关 8 个部委门前作了一番观察，发现各部委迟到人数最多的竟有 371 人，最少的也有 124 人。难怪一位外地来京的同志说：“如果你早上 8 点准时到中央一些部委办事，保准办不成！”

在半个小时的统计中，记者发现迟到者许多是年轻人。他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步行；有一般干部，也有坐小轿车的。走进机关时，他们有的托着油饼，有的提着蔬菜，有的拿着鱼肉，或者匆匆忙忙，或者懒懒散散。8 点 30 分之后，记者离开一些部委时，还见到一些人陆陆续续朝机关大门走来。

请看这 8 个部委的情况：

6 月 9 日——位于东长安街的某部共有 217 人迟到，其中 8 时至 8 时 10 分的有 139 人，8 时 10 分至 20 分的有 45 人，8 时 20 分至 30 分的有 33 人。8 时 15 分，一位 20 多岁的年轻人走进大

门，与他相识的一个同志看着表对他说：“都一刻了。”他头一扬说：“我今儿算早的。”8时26分，一位30来岁的人一手拿着油饼，一手推着自行车进来。在门口等客人的一名工作人员问：“怎么还没吃饭？”他答：“昨晚玩迟了……”据记者观察，在迟到的人中，约由3/5的人骑自行车上班，而不是挤公共汽车或电车来的。记者8时30分离开这个部时，见到的最后一个迟到者是一名骑摩托车的年轻人。

6月10日——位于阜内大街的某部迟到者多达302人。这里还不包括8时06分开进部机关的两辆班车里的人数。8时10分前后，3辆小轿车径直驶进部大院，走下车来的是几个提着公文包首长模样的人。8点10分至30分，这个部迟到者达180余人。8点12分，一位中年女同志抱着一捆莴笋急匆匆走来，到大门口突然看了看表：“才12分。”脚步立刻慢悠悠起来。8点15分，一位40多岁的人托着一大块排骨走进来，有人对他说：“哎呀，你东西都买来了！”他举着排骨应道：“可不，早市上买的。”

6月10日——位于东安门北街的某部共有256人迟到。在迟到者中，骑自行车者多达167人，约占迟到者总数的2/3。在记者统计的半个小时内，有四五位进门后放下自行车，又出大门走向离这个部30多米的小吃店，坐下吃早点。8时29分，一对男女边吃边聊，从小吃店出来进了机关。以上统计还不包括坐班车上班迟到者。在上班铃响后16分钟，一名副部长坐小轿车来到机关，据介绍，这位副部长是这天来得最早的一位部领导。

6月11日——西单北大街附近的某委迟到者有218人。迟到者大多骑自行车。他们中间在上班途中采购到菜蔬鱼肉的有20多人。一位女同志提着几条鱼走进机关，有人问她买的什么鱼，她美滋滋地说：“鲢鱼！鲢鱼！”8点20分，一位中年人手提黑色公文包心满意足地走进机关，他那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塞满了黄瓜和西红柿。8点15分来上班的是七八个青年人。据了解，他们的住处离

机关只有 100 米左右。

6 月 9 日,西长安街某部——迟到者 262 人。

6 月 11 日,位于月坛南街的某部——迟到者 371 人。

6 月 12 日,太平桥大街某机关——迟到者 124 人。

6 月 12 日,位于复兴路的某部——迟到者 293 人。

以上统计不包括从后门、边门进入机关的迟到人数。

记者观察的这些情况,只是一个现象。在迟到的同志中,有的可能因为加班来迟了,有的可能因为交通拥挤耽误了,但是可以肯定确有一些迟到者是因为纪律松弛造成的。这种情况,总不能习以为常地让它继续存在下去。

该报道详见 1987 年 6 月 16 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刊发新华社通稿的中央和地方大报。作者之一的邹爱国 1998 年曾任新华社《瞭望》杂志副总编辑。

观在是 90 年代末,我们从上文中可以知道部分中央部委地址,如经常路过其大门口的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东城区北河沿大街 147 号,最高人民法院在东城区东交民巷 27 号,人事部在东城区和平里中街 12 号,卫生部在西城区后海北河沿 44 号,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西城区复外大街 2 号,公安部在东城区东长安街 14 号,水利部和全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宣武区白广路二条 2 号,等等。

——深入采访不容易

一位年轻记者说:“深入采访有什么好处?费力,费时间,出稿慢,还不如赶赶场子,看看现成材料,抓些短平快的。”

是呀,深入采访有什么好处?会得到什么?一位名为方群文的作者并不这么看,他记得一位新闻前辈讲课时,打了这样一个比喻:“涉深水者得珍珠。”珍珠者,宝中之宝也,多么诱人!但不要以为珍珠就是宾馆餐桌上的山珍海味,或是赶场子拿的红包,或是拉广告给的提成。珍珠是什么?是你奉献给读者的精品力作。一篇

精品力作,给十元、几十元稿费,不等于它就是青菜、萝卜。优秀的作品令人百读不厌,能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心灵。这样的作品,它不在金钱之上,也不在金钱之下,而是在金钱之外。

有人当了几年记者,也写了不少稿子,可查找一下,不要说珍珠了,就是想挑一篇稍有特色的作品也难以寻觅。社会上流行一句话,也许不是戏言:“防火防盗防记者。”出精品力作没多大能耐,搞有偿新闻倒是行家里手,为蝇头小利,便丢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贞操,哀莫大于此!贪欲之症烈于癌,再这样下去,不仅有损于新闻事业,而且也断送了自己。范长江曾经说过:“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热衷于捞实惠的人,最好别干记者这一行。因此可以说,深入采访下去并不容易,要不怕金钱和美色的诱惑。

——新闻要讲清什么

曾经看到一则消息说,一辆出租车迫使公共汽车停下来,出租车驾驶人员拉开车门,不由分说把人拖下,当头就打。公安人员赶来把双方“请”去。新闻谴责了打人者的凶暴、表达对窗口行业服务人员的同情。一位名为肖苏的新闻界人士著文认为“当初以为这打人者似乎不该去派出所,而应被送进精神病院,他一定属‘打架狂’一类”。后来他又读到一条新闻,认为“不但离奇,而且出名”。这就是韦唯东阳横店事件。韦唯一下飞机就要加钱,到了演出地又把观众晾在一边,只顾后台数钱,还有在台上种种表现,详详细细跃然纸上……这回记者们又糊涂了,韦唯也犯病了?

这件事各家传媒有很多后续报道,也有韦唯一方的说法。今天,人们冷静下来,该听一听一位律师的说法:如果观众不满要打官司,被告不应该是韦唯,而应该是主办者。前面说的一事,直到看到当天另外一张报纸才知道了原因,因为公共汽车在道上“挤”出租车、“玩”出租车,激得出租车驾驶员一时性起。当然这不是本文要说的事,作者也无意为韦唯翻案。也不是说打人要有理由。

但新闻一定要有公众关注的理由,要有“为什么”。新闻要素的

五个“W:(何时 When,何地 where,何人 who,何事 what,何因 why),后来又加了一个“H”和“M”,即怎样 how 和本质 meaning。在这个时候,一个也丢不得。否则,新闻就失掉了价值。即使你有后续报道,有各方说法,但每一篇报道,都不能失之于度,不能“过”。每一篇报道,都有影响力,都能给读者较深的印象。为了褒一事或为了贬一事,常常劈头盖脸,不容喘气,弄到极致。这种马虎作法是要不得的。

——也能工作在别处

郑州火车站供水车间的 10 名女上水员,被称作“水花”。河南《大河报》女记者刘阳去“打工”,成了第 11 名“水花”。她换好工装,戴好安全帽,领班把她带到股道中的上水台,告诉她:“这活不难,3 分钟保你出师。”一趟列车进站了,记者忙碌起来。经过实践,她的“我当‘水花’”发表在该报《记者打工》专栏,记述的就是她在这里打工一天的经历和感受。《记者打工》是最早推出的一个颇具特色的专栏,“编后”话说:“靠群众近些再近些,是我们的心愿,为此开设本栏。本报记者将到那些群众生活离不了的行业去,顶班干上一两天,写写自己的真实感受,也让读者了解普通劳动者的甘苦。”

如果一个记者能做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真是好事。从采访角度看,参与是这一新举措最基本的特征,是区别其他专栏的地方。所谓参与,是指记者不仅是个报道者,同时又是报道客体实践的参与者。而参与,则是通过“打工”这种形式出现的,它有助于记者了解真实情况,有助于记者获得一般采访不易获得的材料,还有助于记者学习自己不懂的知识。这种采访方式对于年轻记者,特别是刚踏入新闻门槛不久的记者,在思想作风上会受到较大锻炼。记者们对参与“打工”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参与的记者写稿最多,他们去了婚姻登记处,妇产科,社会福利院,精神病院,殡仪馆,生老病死,生离死别,悲欢离合,都见过了。从打工中受益最多,增强了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道义感。

——不要逼记者制造新闻

近年,不少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诸如实行发稿与奖金乃至工资挂钩,职称实行内部聘任制,实行竞争上岗……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新闻单位来说,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整个中国都认了这个理儿,何况敏感的新闻界?

但这样的消息听多了反倒觉得应该重视培养提高编辑、记者的素质。现在连工厂农村都重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而且把这当成生存、发展之本,何况新闻从业人员。如果他们都“低头拉车”,拼命写起稿子来,不注意补充自己、提高自己,那么凭老本能拼上多久?

目前,不少新闻媒体扩版,新上版面但不加人。这似乎是对以前人浮于事的矫枉过正。编辑、记者的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经营方面的压力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一名编辑年发稿多少为满负荷?所以定额大概是并非多多益善,总得考虑人的承受能力。

一位名为赵维的作者认为,一个新闻媒体与其他媒体之间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的水平的竞争,即编辑、记者整体力量之间的竞争。其实增加定额、解决“大锅饭”等问题还只是媒体进入市场竞争的前期准备,还没具备进入竞争的条件。有眼光的媒体应该在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同时把力量下在人才的培养上。有的报社在实行定额管理的同时,更注重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更新,他们创造条件让编辑、记者撰写新闻研究论文,定期组织理论研讨。同时还注意送那些工作有实绩、对业务有兴趣、有发展前途的采编人员进修,或鼓励他们在职学习。

应培养专家型、学者型的编辑、记者喊了多少年了,对于新闻媒体来说,高质量的编辑、记者的成长也得有个环境问题,包括给他们自己学习提高的时间和时机。如仅以字数、条数论英雄,过了

若干年后再检验我们今天的“改革成果”，可能会发现它造就了大量平庸的“新闻匠”，而一些本可能有作为的记者、编辑在单一“挂钩”中变成了王安石笔下的“仲永”。

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不是一定额了之。让编辑记者调整自己，这是否也是改革的一项内容呢？

——让记者“跑”起来

香港的记者与内地记者相比，由于两地情况不同，差别比较明显。这从对记者的不同谑称就可以看出来。内地的记者像“新闻官”，有人这么认为，社会也如此看待；香港的记者则是“跑街的”，雅与不雅，都不妨事。

视觉独特的郑剑认为，新闻是跑出来的。我们不熟知的“跑街的”一词，是指香港的记者要不停地满街跑，哪儿有新闻便闻风而动，把话筒递上去，把相机举起来，发回报道，写出稿件。香港是一个现代化城市，报馆、电台很多，新闻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行业，也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职业。因此，香港记者大都比较年轻，不年轻就不能满街跑，一个记者，年轻时不跑出些东西，职称不能较快地提升，一上岁数就来不及了。他们虽然年轻，职业素质却令人敬佩，一般而言，国语、粤语、英语都通，文字、摄影都行，驾车、电脑更不在话下。相比之下，内地的记者则像官员，地位也比较高。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影响使新闻单位带上官衙色彩，记者习惯于按步就班，有点官派，不适应“跑”新闻。于是，有不少记者只盯着自己脚下的一点点地方，视野很窄，有的干脆“深居简出”，一年写几篇东西搪塞而已。下去采访也习惯于程式化、格式化，听听汇报，看看材料，甚至要求被采访者热情款待，有不如意，还要耍耍脾气，不愿意“跑”和“挖”，不太会用自己的眼睛发现新闻。一定要记住，记者不是职务也不是职称，记者是新闻眼，是监督职能，是从事的监督职业。

好新闻是用脚板跑出来的，可见“跑”对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当

然,这个“跑”是深入的代名词,它代表一种作风,也反映一种机制。深入出成果,深入出精品,而“跑”起来则是基本的要求。但愿我们的记者少一些官气,设法“跑”起来。

——敢为市场的“清道夫”

现在商家篡改生产日期,欺诈消费者的太多了,对此,记者应如何识别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我们的记者应成为“消协”,还是应成为“新闻官”?

要知道,商家的“可爱之处”便是太在乎消费者了,太把消费者当上帝看了。在一家普通的随处可见的超市里,一些对数字敏感的消费者不难发现,食品的保质期太重要了,而在这样的超市里,商家玩起与“生产日期”捉迷藏的游戏似乎很容易。在柜台上,竟有两年前生产的保健品,仅仅因为上面的保质期是“24月”,似乎很有力度地说明这些产品货真价实。据媒介追踪,一年前这家保健品的生产厂因开发市场不力被竞争对手挤垮,生意不好关了门。可这个关门企业几度积压的产品仍在卖,总让消费者担心,生出不少疑问:保健品有24月的保质期吗,快过期的产品还能卖吗?

不光保健品,还有牙膏等日化品,都存在着保质期快过期而商场仍在卖的问题。消费者反映,有的商场卖牙膏篡改生产日期,不择手段欺诈消费者。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买牙膏宜买新不买旧,一般半月买一支,不用存货。可这家商场与众不同,他们把牙膏皮上的生产日期19970615划掉,另行贴一个打字条,上而是19980402。本是半年前的产品,改一下就变成了刚生产出来的新产品。这种行为莫不是说明商家太注重消费者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注重,是特别的注重。这次篡改牙膏生产日期便是提防消费者,蒙骗消费者。用一句话说是商家“防消费者甚于防敌”。现在是和平年代,自然没有敌人,但有些单位就假想出一些“敌人”来,一边提防着,一边又怕“敌人”不来——没有“敌人”,何来交易?假货令我们损失太多,所以应旗帜鲜明地把商家知假卖假、篡改生产日期称之

为欺诈,并给予曝光和重罚。同时提醒消费者注意,还要防其从地下卷土重来,再次蛊惑民心,造成新的恐慌。

还有监督收钱开票不盖章的事。每月的10—20日是北京住宅电话和移动电话交服务费的最后期限,迟于这个时间就要被处以滞纳金和停机的罚项。某日消费者去红莲小区建设银行营业厅交费,一位服务员收钱开票,可是开的票上没有盖收款银行的章。这位服务员说近两个月来,若发票不报销就不盖章了。令人不解,银行有什么权力收了钱而不在发票上盖章?盖章是银行的义务,不是你想盖就盖,不想盖就不盖的,而是你必须盖的,因为你收了钱,不然你以后不承认这笔款怎么办,打起官司来也说不清楚。记得1998年10月17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是“曝光江西某地移动电话收费不合理”,其中有一句话是当地电信不承认出自本系统的移动电话计费清单上的数目,称“这样的清单任何电脑都可以打印出。”有了教训,所以消费者一定要银行盖章,章是没有人敢冒险乱刻的,但收费单在任何一台电脑上都可以打印出的,如果没有“章”,人们怎么信得过你银行?

——办报与市场

新闻媒体和消费大众应积极监督商家、厂家及行政执法机关,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应当神圣地行使,更好地为净化市场作贡献。今后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报纸的走向是面向市场,走产业化的道路,报纸是商品,读者是消费者,读者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帝,“上帝”认可,也就是拥有市场,只有拥有市场才有条件称得上创造效益。

报纸就要把市场做到位,服务读者,引导读者,真正体现是“有用”的报纸,老百姓最在乎“有没有用?”,所以报纸尊重老百姓,也就是尊重市场规律。

报纸不能贪大,没有实力,摊子铺得越大越暴露弱势,越容易陷入死地。所以办报纸需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沉稳的工作态

度,要胸有成竹,先想到,再做到,实实在在在做好市场文章。

报纸要策划自己的无限“商机”,敢于与对手竞争,找准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为谁服务,怎么服务,都要明确。追求自己的市场,打一个时间差,不占领就会错失良机。比如《中国青年报》的深度报道、《南方周末》的正义感、《北京青年报》的及时、全景式报道、《北京晨报》的快餐炒作、《北京晚报》的“平稳”、“晚餐式”报道,都是值得记者编辑们注意的,有比较才有发现,因此,早取长补短早受益。办报当报业老板要找一些新闻业的顾问指导或出谋划策,要进行一些读者调查,了解与掌握谁是真正的读者,都是哪些人,怎样引导他们。拉近与读者的联系,花点小钱办大事,为了明天有更大的市场。把蛋糕做大,是责任,又是压力。要办好报纸就没有退路,只有前进与“赢”!

一 反应迟钝为哪般

北京人又比外地人“优越”了一级,自1999年起,北京人的月票将由多年使用的旧票面更换为新票面。在更换之前的1998年8月31日,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张贴一纸通知:北京月票仅限北京居民购买,购买时凭北京市居民身份证——是不是计划经济时遗留的一套,我不说,自然有人明白。遗憾的是众多北京多事的新闻媒体没有报道此事,更没有炒作,令我大吃一惊。

邓小平特别痛恨的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不实事求是,而不实事求是的存在并非没有利,而且好处大焉,比如在既得利益体现上“一路绿灯”,垄断了外地人买月票的自由和权利。谁都知道,如果不改革就没有变动,没有变动就四平八稳,就不会影响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样的时间越长越对既得利益享受者好处多。但是,不改革是违反历史规律的,也是与我国1978年以后实行的邓小平努力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背道而驰的。你说,我们是选择前进,还是选择后退?我们不难理解,我们没有退路了,只有前进的份;所以跨世纪的我们面对的是机遇与挑战,包括“地狱”与“天堂”

都在眼前,顺应时代发展的就是通向天堂,背向时代发展就是通向地狱,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有没有地狱与天堂,虽然我们还有对“信奉天堂的民族”有这样或那样的恩怨,但我们还是应该知道天堂总会比地狱好。所以我们还犹豫什么呢?而且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不仅仅是北京人自己的首都;北京是全国人民建设起来的,凭什么就你北京人“牛”?

北京有 1000 多万人口,外地的建设者就占了三分之一,有 330 万之多,凭什么,北京公交总公司可以人为地划一个区别——小小一张北京月票,仅仅每月 15 元或 25 元,就值得把 330 万外地人得罪了,多么轻易?外地人到北京是干什么的?是为北京的市场作贡献,连朱总理也希望进京开会的全国总工会十三大代表帮一下他的忙,多在北京买点东西回家。这是因为经济环境内需不足,需要刺激消费。怎么刺激?就是给大家花钱的机会。可北京怪了,连月票也不卖给外地人了。怎么还谈消费,怎么还谈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轻视外地人,多么不宽容,多么没有首都人民应有的高姿态。再说,北京作出如此政策有没有通过全国人大的批准?因为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北京的决策应该让全国人民知道,并评判一下是否合适?这点做不到,北京人是不是有点不虚心?毕竟我的那句老话是北京的事情应该向全国人民公开。是否见仁见智,由人民说了算?首都,首善之区,怎能轻易疏远外地人,这么随心所欲?

特别不该的是,代表公众利益的大众传媒,给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怎么不就月票的事来个见仁见智呢?记得几年前郑州市取消外地人购买月票的权利时,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媒体竞相炒作,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后来,连作出这个决定的也觉得这样做太过分,而且还“上当”了,媒体不友好,外地人也有情绪,不再好好买月票了,逃票增加了,公交公司倍显无可奈何。毕竟做一件事要经过时间与市场规律的考验。

还有一个地方叫上海,在公交屡屡亏损的情况下,果断地把月票取消,把计划经济的弊端给割了,长痛不如短痛,如果这样还亏损就再找原因,不怕市场不认可。这种精神多么可嘉。而北京呢,就会知道一刀切,好与不好,不管那么多。这怎么能行呢?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怎能让它毁在北京人手中——毫不客气地说。北京的做法好与不好,自有公断,我相信全国人民。

作者想,如果北京公交不成熟的决策到了1999年推行的话,大家最好都不乘公交汽车,都改骑自行车出去办事,如果堵车我不怕,因为自行车有不怕红灯的优势——这是北京的“特色”,而且自行车快于机动车,尤其是二环以内的四个城区。到时候,公交再亏损的话(因为300多万外地人已买不到月票,也无须买)——你自作自受。如果再堵车,并归罪于外地人骑自行车,并且不让外地人骑自行车,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自行车卖不掉,更多的自行车生产厂关门,下岗将更加容易,再就业将更加雪上加霜,到时候又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虽然行不通,但大家一样穷。恐怕历史还会有惊人的相似,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浩劫。多可怕呀。

反应迟钝的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们都会有所清醒吧?迟钝的新闻界请改变自己,要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要透明实在,要“铁肩担道义”,相信自己是站在历史与现实与未来都贯穿的一条线上,经得起历史与未来的考验。新闻记者是职业,就要有严格的职业道德准则,不能像一个家族一样实行“宗法”,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实行“自扫门前雪”,实行“绝对的利己主义”,这样下去,新闻记者也会败坏新闻,新闻也不会名副其实,就像一些偷漏税的商业企业一样坏了名声,失去正义的力量,毁灭了自身的价值。

第五章 改革尖兵——发现名记者

在哪里见到记者最多？在有红包可以领的地方。这不仅是记者的悲哀，更是全民的悲哀，因为全民的声音全被金钱给收买了——这不应该是现实的现实。

如果说中国有名记者，那么谁是本世纪的名记者？戴煌、卢跃刚、朱德付、因被诬陷得以惨淡成名的殷新生……

范长江奖、普利策奖，新闻无学，却有奖，我们知道新闻事业也是时势造英雄，可昔日的英雄魂系不归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通过天天发生如此众多的新闻官司看出，“现在进行时”的新闻记者难免惹上官司，有的身败名裂，有的获以险胜，有的借机扬名。他们有苦有乐，有喜有愁，有爱有恨。但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记者依据法律和凭着真实、公正、良心去直面官司，打赢官司，即使败诉也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正直做人做记者。他们不怕打官司，知道两军相逢勇者胜，拿出自我牺牲精神，维护新闻记者的权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们学会避免打官司及采访技巧和打官司的技巧，掌握有关新闻的法规的明细和相关法律条文，坚持不懈地呼唤完善新闻法规，借助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的职能进行维护权利。

一旦失去监督，世道将会怎样？新闻是永远富有挑战的事业，是勇敢者的游戏，是年轻人冒险并获得荣誉的阵地。要知道，中国

并不缺少新闻与正义以及新闻记者的良心，我们身边已经有不写《内参》的记者——他们为公开曝光一点点而努力，虽然舆论监督者的声音包含着心声、骂声、委曲求全和呻吟声，虽然进步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值得向许多好记者学习，尤其是向采访报道了“大国寡民”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学习，他敢于摸着石头过河，他是记者中的成功人士，他不怕官司缠身。然而他却不是人大代表。

“我是记者，我没有故意地得罪人，但实际上已经得罪了不少人”。碰到许多记者，大都是把这样的话当作开场白。记者不像某些领导所特意标榜的“领导也是人嘛”，而是时不时地无奈地充当“吃力不讨好、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尴尬角色。在这样一种场合：有前呼后拥的领导，有女子军乐队，有大批陪同的大小官员，有更多当“演员”的群众，有许多要做样子的事情，但是一位主要领导发现自己等了多时，邀请的电视台记者还没有到或不来了，就“气不打一处来”，竟宣布“所谓重要的会议暂时取消”——没有摄像机、没有闪光灯、没有记者们现场采访，就不开。什么时候记者来了就什么时候开。然后他从心底大骂了一通“让领导里外不是人”的记者真是“×××”。无疑，记者要学会做人，尤其是学会做领导喜欢的人。

另外一种场合是在单位里常见到的，一位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为己任的记者，官司频频缠身，以致于单位里的人对凡是到单位里找他的人都以为是法院的人，不知道这是记者的悲哀，还是单位里的一些人的悲哀。反正他是臭名远扬了。记者不好当，做得罪人的名记者更不好当，尤其在中国，你不服不行。当记者需要向勇敢的榜样学习。

1.《南方周末》记者勇敢

《南方周末》记者也曾有过无奈地“逃跑”的经历，这是因为“苛政”猛于虎，还是明知没完没了，而采取不了了之的下策？《南方周

末》的这位记者叫朱德付，江西人，现在是《南方日报》的记者，他曾因采访报道恶势力，险些在广西北海一法院被恶人先告状的“恶人”陈崇明从楼上扔下去。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当时有法院的法警在场，朱德付向法院负责人声明“如在贵法院被害，贵法院难卸责任”，之后在朱德付的强烈要求下，法警护送其撤出北海。时隔两年之久，被《南方周末》记者称之为恶人先告状的“恶人”陈崇明诉《南方周末》“名誉侵权案”，于1998年10月15日上午在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第二次开庭，“恶人”又一次“撒野”，前来采访的《南方周末》记者郭国松再一次被攻击之后，他又无奈地在法警的护送下“迅速撤离北海”。1998年10月23日，《南方周末》以“陈崇明咆哮公堂，法官不得已派两法警护送记者离庭”为题，继续对朱德付曝光的“刘秋海事件”追踪报道。报道说，冤枉一过路的政协委员刘秋海为交通事故肇事者的广西北海人陈崇明，其妹妹陈小俐在深圳涉嫌参与香港黑社会分子制造的绑架勒索案、偷渡香港、私藏枪支等一系列案件被《南方周末》曝光后，直接采访的记者郭国松继朱德付之后成为又一个被陈崇明肆意攻击和恐吓的对象，肆无忌惮地叫嚷“让你跑不出北海”。当庭审即将结束的时候，记者身边的一位朋友悄悄地提醒“要注意安全，今天来了许多人”，而记者身后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些戴墨镜的人。果然，休庭后，陈崇明确有恃无恐地挑衅，如果没有退庭后再返回来的法官和法警亲自护送，恐怕会有一名《南方周末》的记者“光荣”在舆论监督中。

2. 良知死了吗？

在与新华社老记者戴煌、《中国青年报》名记者卢跃刚谈论新闻选题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请我们关注一下殷新生——这位河南《郑州晚报》的政法记者，1989年9月14日因采访一起拐卖人口案被当事人控告而陷入囹圄，随后过了9年，1998年已51岁的殷新生还没有等到公正的一天。1998年11月1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朱德付、张双武、林炜采访报道“全国最大迫害记者事件全情告

白”，曝光了郑州市某检察机关迫害《郑州晚报》记者殷新生 9 年冤屈未伸的惊人消息。报道介绍：殷新生——一位仗义执言的记者，学雷锋做好事，为了帮助一名被拐卖的儿童重返家园，惹祸上身，冤陷囹圄，经 9 年申诉，中央和省、市有关领导 30 多次批示，全国人大、全国记协、有关司法机构十多次复查调查未果。全国记协一位负责人在一次记协工作会议上愤然指出：“殷新生一案，是 1949 年以来最严重、最突出、最典型的打击迫害记者事件。”1998 年 9 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著《直面人生》，再次报道了殷新生一案，称郑州检察院制造了“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一记者奇冤”，上演一幕幕丑剧。

事情发生在 1989 年，当时的“导火索”是殷新生执笔写了这张小纸条：“最近两个月来，我们三个新闻单位调查了一起拐卖儿童案，案情复杂，牵涉人员较多，柘城县大孟村的孟庆德、李雪芝、孟庆勤、孟凡祥等 4 人，在很大程度上怀疑是拐卖儿童同伙，现在这四个人都在郑州，我们请求你们帮助审查，以求此案早日结案。”落款是“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陈朝中、《郑州晚报》记者殷新生和郑州电台记者刘洪恩”。

1989 年 9 月 14 日，郑州市金水区公安分局杜岭派出所查获了一起拐卖儿童案。拐卖儿童的男子叫高清池，河南柘城农民。被拐卖的孩子刚满周岁，当时已被杜岭派出所收留。时任《郑州晚报》记者、群工部副主任的殷新生获悉后进行追踪采访。追踪的结果是，有两对夫妻坚持说被拐卖的孩子属子自己。一个是豫西伊川县的苗全亮、李会玲夫妇，另一个是豫东柘城县的孟庆德、李雪芝夫妇。经查办人杜岭派出所副所长韦兵役调查发现，拐卖儿童的嫌疑犯高清池声称孩子是其患精神病的弟弟高清峰与李会玲所生。李会玲后与高清峰离婚。于是，殷新生等人开始怀疑孟家夫妇与高清池及其家人与拐卖儿童案有关。随后，殷新生等记者将疑惑反映给郑州市公安局审查站，加上此前有伊川县李会玲写来的举报高

家数人是拐卖儿童同伙的材料,11月18日,公安局审查站依法传讯了孟庆德夫妇及与前来认领小孩的孟庆勤。经初步审查,审查站认为不能排除孟庆德等3人参与拐卖儿童的嫌疑,便决定对他们进行收容审查。执行之前,审查站站长赵平法要求殷新生将口头反映的情况写成书面举报材料,殷便以一同采访的三家新闻单位的名义写下了如上一张纸条。当天下午,郑州市公安局审查站以涉嫌参与拐卖儿童为由,对孟庆德、李雪芝、孟庆勤3人实施收容审查。11月23日承办此案的杜岭派出所民警带领苗全亮、李会玲夫妇和孟庆德、李雪芝夫妇以及被拐卖的孩子,携河南省公安厅的介绍函到该厅指定的法医鉴定单位——洛阳医学专科学校作亲子鉴定。殷新生以记者身份一同前往并热情协助。鉴定结果表明,被拐卖的孩子与孟庆德、李雪芝夫妇没有血缘关系。然而,事情的发展变得不可思议起来。1991年4月6日,郑州市检察院突然将殷新生刑事拘留,理由是河南省柘城县农民孟庆德、李雪芝、孟庆勤、孟凡祥等人控告殷新生诬告陷害,致使他们分别被公安局审查站收容审查二三个月。殷新生清楚地记得那天被诱捕时的情况。“我们是郑州市检察院法纪处的,我们赵处长想找你问问最近你采访那起拐卖儿童案的事儿”。这天上午,殷新生刚上班,已等候在《郑州晚报》群工部办公室的两名检察官就迎了上来。“好啊,大家都来关心被拐卖儿童,这是好事”。殷新生一边抖落身上的积雪一边说。然后,到了检察院,检察官又以找有事将殷新生带进警车,开进郑州市看守所。这时他才看到检察官出示刑事拘留证。10天后,1990年4月16日殷新生被正式逮捕入狱,案由是“诬告陷害”,被关押近9个月。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了解到,殷新生有新闻界“犟牛”之称,为受了冤屈的弱者伸张正义,不畏权势,敢于碰硬。曾8次获河南省和郑州市好新闻奖,多年被评为郑州市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为河南省巩县农民反映村干部问题得到解决,获“神笔驱邪恶,金

第四种权力

文树正风”的锦旗。1989年又为荥阳县农民反映受迫害的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拍手称快。1989年12月殷新生在《郑州晚报》曝光郑州市检察院越权介入一宗企业合同纠纷案的违法行为,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维护了企业及承包人的合法权益。后来,殷新生与检察院结下了“缘”。之后,原郑州市政法委秘书长找到殷新生转达市检察院的意见:“你的稿子对企业恢复生产和群众的情绪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时任郑州市委政法委书记的王荣生也认为殷新生“这样做很不合适”。有人分析殷新生入狱与此事有关,因为柘城县农民最初控告的是郑州市公安审查站。后来怎么把矛头指向殷新生,有很多疑点。

殷新生被捕是不是欲加之罪?检察院称殷新生那张字条触犯了《刑法》第138条,构成诬告陷害罪。为了证明这一点,郑州市检察院进行了长达3年多的反复侦查,案卷达1040页。检察院定罪的“依据”是“主观上的故意”,“客观上的捏造事实”和“干扰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等4条。但这样的“依据”疑点更多。1990年12月19日,在河南省高院、郑州市公安局审查站和河南省第二律师事务所等的强烈异议和有关部门的干预下,郑州市检察院为已在狱中“生活”了近9个月的殷新生开具了“取保候审”的证明。原杜岭派出所负责侦查此案的副所长韦兵役说:“‘明知’什么?如果‘明知’,我们干嘛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反复调查核实?如果连老殷都‘明知’了,而我们还拒绝交出孩子,这不是指控我们与老殷共同犯罪吗?”几天前刚办完退休手续的原郑州市公安局审查站站长赵平法说:“指控殷新生‘明知’的人才是无中生有呢!殷新生向我们反映、举报,只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至于是否需要收审,完全是我们根据传讯和初步审查的情况,再依照当时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来决定,与殷新生完全无关。就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来说,殷新生的行为有功无过,更无罪!”

1991年7月10日,郑州市检察院通过该院的审查起诉处育

接向郑州市中级法院起诉。后不知为何把案卷交由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起诉。中原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当即要求退卷,致使计划中的公开审判无法进行。在退卷时,法院院长没忘记在案卷里夹上一张纸条:“如果在中原区法院开庭,我要亲任审判长,当庭宣布殷新生无罪释放。”起诉不成,郑州市检察院又于1992年3月13日将案卷转至市中级法院交换意见。5月27日,市中级法院审委会研究后答复,殷的行为不构成诬告陷害罪。理由是:客观上没有捏造事实的行为;主观上诬告陷害必须是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而殷的举报字条上写的是“怀疑”,并请求审查,审查的法律后果有三种:没事、行政处理和刑事追究,举报与审查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时任河南省高院院长的郑增茂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中也断然指出:“‘怀疑’咋能是犯罪呢?办案人员的水平怎么低到这种程度!”1992年6月29日,中共郑州市委政法委召开专题书记办公会研究殷案,一致作出如下决定:“《郑州晚报》记者殷新生一案……如果由郑州市定,那么书记办公会的意见是:这是个错案,立即纠正、撤案!”

在全国人大、河南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的多次催办和督促下,郑州市检察院又历经数次补充侦查后,才于1993年3月9日,“依据省检察院的意见”对殷作出“有罪免于起诉”决定。殷拒绝在免诉书上签字。

1996年12月,全国人大办公厅调查组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说)怀疑就是捏造事实,无中生有,这个结论扭曲了事实。”“显然,殷新生并没有捏造事实,定诬告陷害罪的根据不能成立。”据此,全国人大调查组指出:“法律表明,殷所写的字条,正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是一个新闻记者应尽的职责。”

人们不禁问:了犹未了是否不了了之?郑州市检察院对其自身酿成的这一冤案没完没了地拖着顶着的做法,激起了公众的义愤。

自1990年开始,全国记协就一直关注“殷新生事件”,并多次责成河南省记协对案子做深入的调查并向全国记协汇报。全国数十家报刊相继以“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迫害记者事件”、“今日冤狱”、“舆论监督岂容粗暴干预”、“舆论监督呼唤法律保护”、“殷新生一案何日见青天”等等为题,揭露和评述这一事件。

中央有关领导及河南省、郑州市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先后就此案作过30多次批示,要求郑州市检察院尽快作出公正处理,并将此案的调查报告呈送省委。

对于这个被认为是“明显的错案”的案件,郑州市、河南省检察院为什么就能长期置当事人申诉和各级党政领导和监督部门的意见于不顾?

综观省市两级检察机关对此案的处理过程,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既然逮捕了,就要给你定罪。“主观故意”和“客观犯罪事实”“依据”,几乎都是控告方或与控告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询问笔录和证言,甚至仅听一人之言就认定殷的“犯罪事实”。比如,仅凭控告方说殷曾向其索取1700元所谓广告费,就将此言认定为殷的一个“犯罪事实”,并写进有关正式文件里。

有关领导人对案子关注多了之后,上级检察机关包括最高检察院也曾派出过调查组声称进行彻底深入的调查和审查。但几乎每一次调查,都给郑州市检察院留下数页让人疑惑的文字,指导市检察院如何不惜一切代价、“更加扎实”地推翻当事人的辩解,以证明当事人有罪。

遗憾的是,殷新生冤案迄今已历经9年,郑州市检察院虽然反复五六次对案件进行了“深入、扎实”的补充侦查,却偏偏忘了做另外一项相当简单的侦查:让苗、孟两家到第三个地方做一次公正的、令人信服的亲子鉴定,以致于那位被拐卖的孩子如今已长至八九岁,却仍然被寄养在一个好心的铁路工人家里,仍然无法与自己的亲生父母阖家团圆。

1998年10月28日上午9点20分,值得庆幸的是殷新生终于盼来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自己诉郑州市检察院研究室科长董正平及《河南法制报》社名誉侵权案一审开庭。旁听席上坐着专程赶赴郑州的中央和地方新闻单位的近20名记者以及闻讯而来的社会各界群众。虽然审理还未果,但它说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一句诗的分量。

如今本书作者只能用一句法律条文安慰殷新生,希望更多的人都知道并不要误解了这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3. 记者与作家都是干嘛的?

《中国青年报》新闻中心副主任、社会知名报告文学作者卢跃刚自长篇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在底层》推出并赢得广泛反响后,热心关注的人们对他究竟算是记者,还是应算是作家,有不少争议。1998年7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张剑荆文章分析:从卢跃刚的作品目录中,看不出他是记者,除了小说,就是报告文学,即使是《以人民的名义》、《关广梅现象回顾》、《傻子瓜子》等明显属于调查性报道的作品,也不用报道而用“报告”。是卢跃刚对“记者”有偏见?1998年5月他新推出的《大国寡民》,很显而易见,卢跃刚对“记者”持有一定的看法。烽火村的发迹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各种新闻媒体塑造了王保京。“烽火村的历史,是伴随着新闻界的历史”(《大国寡民》第282页)。如果说,王保京确如《大国寡民》中写的那样,作为新闻界的一员,我们的记者难道不感到脸红?我们这些记者几十年来都干了些什么啊!几十年中,造了大大小小多少神啊!卢跃刚之所以不用小说,而用报告文学——尽管有文学两字,但他从实际出发、从法律出发、从无私忘我出发,他都是一位新闻记者,因为这一部《大国寡民》已说明一切,这部书不应被划作文学一类,而应属于本年度极为优秀的调查性报道。不知道新闻界要

不要设这个奖?其实这个奖不应是报告文学奖,而应是报道类的新闻奖,《大国寡民》在新闻界和新闻作品中有这个获奖的权利和条件。新闻界应为有这样的作品和作者而感到骄傲。卢跃刚应是那种希望能够拯救记者职业尊严的那一类记者,而且这是当代最紧要的问题之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记者这个职业被糟蹋得实在太惨了,且看卢跃刚在采访中得到的真实的声音,这是位老农所说:王行兴长期主持烽火村工作,按“劳模”市长王保京吩咐,参与了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接待过形形色色的记者,也结交了一些记者朋友。他按“人生观和世界观把到过烽火村的记者分为五类”。一类令人尊重,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宁说九十九,不说一百一,不惟王保京云亦云,看不惯烽火村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这一套。他们是烽火村的一面镜子。二类记者令人悲哀,你说一是一,你说二是二,你说大红就是大红,你说大紫就是大紫,不核实,不动脑子,动机良好,热情很高,囫囵吞枣,“抓典型”犯错误,与这类记者有关。三类记者令人害怕,只讨好采访对象,对被采访人的事迹和观点,加盐加醋,你缺个叶子就给你补叶子,你缺朵花就给你补朵花,渲染拔高。四类记者令人惶惑,吃透上面的意图,上面带观点,烽火村找例子,先进一切都先进,没有例子,没有说法,就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出谋划策,制造例子,制造说法。五类记者令人讨厌,纯粹利用先进典型、模范人物给自己捞好处,与一些单位、集体结成利益共同体,“互利互惠”。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类记者,不归人以上所述,弄得人哭笑不得(《大国寡民》第83页)。看来,对怎样做记者,卢跃刚用行动在说明。可以这样说,他在书中对记者的批评毋宁说是对社会良知的期待。在《大国寡民》的扉页上,他写道:“罪恶与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冷漠和麻木,对罪恶与苦难无边无际的冷漠和麻木。”在这句话后,这位记者朋友张剑荆在写评论时加了一句:即使别人因各种原因而冷漠和麻木,但记者不能,因为即使要传达出这种冷漠和麻木,也需要记者的热情和尽职尽责

责。

——《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和“法”

“堂·吉诃德”和其需要的社会。“我是堂·吉诃德或堂·吉诃德小组成员！”《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这样说，“我没有许多报告文学同行那么好的运气，可以踏踏实实地打死老虎，然后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容不迫安安全全地解剖一番。我碰到的大多是活老虎，大多是景阳冈上死缠烂打的局面。数年来，我都陷在大大小小的官司里欲罢不能。找我的的人和找我的事，大多数涉及法律问题，法律无能为力才找的我。”

“事情到了撕破脸、破釜沉舟的地步才找的我。因为，找我意味着舆论干预，意味着没有退路的公开宣战。他们是冲着我的笔来的。然而，我也是‘套中人’，与我的所有当事人那样，无时不生活在樊篱与枷锁之中。我这支笔的活动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天马行空。而且，对手个个不是等闲之辈，等闲之辈干不出种种违反常规违反人性的事儿来。更多的时候，对手是一个军团，一个千丝万缕的强大体系。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对付一个由各种共同利益集结起来的军团和强大体系，便是堂·吉诃德，顶多是堂·吉诃德小组。我们的立场，是公众立场。我们的合法性基础是公众利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第四种权力’。我们手里的武器，一件是公理，一件是法律。但是，我们的对手往往不认公理，不认法律，执法犯法，徇私枉法。这样的局面，经常使我们的武器软弱无力，使我们的行动平添几分不合时尚的黑色幽默。但是，正如一位我所尊敬的人所说：‘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几个堂·吉诃德。’当然也需要几个堂·吉诃德小组。‘社会需要’可能就是堂·吉诃德存在的全部理由和价值。”

所以，像以往那样，当卢跃刚的《大国寡民》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对于案件，对于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没有结局，更不要说满意的结局了。对卢跃刚来说，这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

争、无言的结局。

那是在湖南娄底阴云笼罩下的1993年，卢跃刚先后在《当代》上发表了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及其续篇《讨个说法》，从发表作品到最终解决问题，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当时他说：“我将用连续报告的形式，来揭示娄底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件的全部过程。”事态的发展正如所料。人民代表颜跃明被非法拘禁214天以及他后来的调查连同发表作品后公开与私下的较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娄底事件”。《以人民的名义》的结尾这样写道：“2月24日凌晨，寒流来了，漫天都是雪片。我们匆匆赶路。我在风雪中与饱经磨难的娄底城告别。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较量并没有结束，我还会回来，无论是怎样的结局我都会回来。我相信，我还会为我这篇报告文学写一个可能是悲剧可能是喜剧，也可能是悲喜交加的长长续篇。”到年底，长篇报道续篇的结尾却更加令人失望：结果“只能告诉人们，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因果报应、出口鸟气的好莱坞式结局，在生活中，往往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美丽的期待”。

这样的结局，对于怀着良好的愿望和美丽期待的读者无疑是一种嘲弄和蔑视。文学刊物《当代》编辑部也认为这样的结局不是“结局”，无法向读者交待，颇人道地想等出个好的哪怕是稍许说得过去的结局再发“续篇”。《当代》不仅是想给法律和颜跃明一个尊严，更想给读者一个尊严——不致于让读者太绝望，太窝囊。但卢跃刚说：“没有结局不正是最好的‘结局’吗？”于是，他的《讨个说法》发表。

立即，湖南组织反击。战场从湖南转移到了北京。众多湖南要员居然与匿名信作者沆瀣一气，对作者进行诬陷，公函满天飞，以地方党政组织的名义罗列罪状，足以置他于死地。接下来便是莫名的调查。被迫，卢跃刚不得不致信湖南省委书记，言：“我做好了被起诉的一切准备，可以在你们指定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庭！”当然，他们没有这个勇气。他们除了“大事化小”的黑匣子策略外，除

了匿名信作者提供的子虚乌有外,除了被揭了疮疤的仇恨心理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端到台面上来说。接下来北京新闻界联袂应战。最后,湖南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正式承认:新闻舆论监督对解决娄底事件起了积极的作用。被害人颜跃明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加害人受到了应有的处分,虽然处分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娄底事件”画了句号,用3年时间。与“娄底事件”比较,“任亚非事件”更加棘手。《以人民的名义》的主人翁颜跃明行使人民代表权力,提出罢免市长案,几乎送了命;重庆市海外集团总裁任亚非没想到他主持收购重庆针织总厂的性质是私营企业收购破产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第一例,也没想到他向纪检部门和司法部门举报一些党政官员受贿动摇了刚刚搭起来的重庆高层政治机构,以致各种政治力量联手将他送进了监狱。

任亚非只能自救。早在1994年底,任亚非便有预感。那天深夜,任亚非对着录音机录下了他所掌握的证据,并把相关的证据材料一式数份藏好,以防不测。任亚非的语调缓慢而沉重,情景悲壮。本来他可以一走了之,但是他不走。他固执地认为“不至于那么黑暗”。当然,他也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否则他不会害怕“突然消失”而录下自己的“遗言”。任亚非在劫难逃。他以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根据卢跃刚所掌握的证据,任亚非案纯属冤案。他判刑后,卢跃刚写了报告文学《在底层》,发表于《中国作家》1996年第3期。《在底层》实际上是以底层人的生活为线索,描述了底层人生存的人文环境,彻底打破长期营造起来的“当家作主”的虚幻景象,从“天上”回到地下,进行生存自救。“自救”是改革20年乃至21世纪中国基本的时代特征。

报告文学发表后,即在海内外引起了反响。卢跃刚敢于冒“为犯罪分子鸣冤叫屈”的风险认定任亚非冤枉主要有两条理由:第一,海外集团的企业性质,是本案的要害。海外集团是一个由任亚非出资、挂靠市统战部海外联谊会的假集体企业,即所谓的“戴红

帽子”，这是《公司法》未公布实施前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全国这类“假集体”、“假国营”企业何止几十万家；第二，任亚非举报贪官污吏，按照相关规定，他是举报人，应该受到保护，现在不仅没有受到保护，反而受到了残酷打击。

前者涉及“产权”，后者涉及“政治”。政客利用海外集团产权不清，前期运作不规范的情况，操纵司法，对任亚非进行打击报复，这一点确凿无疑。原重庆市委书记和一位了解内情的副书记后来也支持这一看法。因为他们知道，由于任亚非举报带来的风波，是用“大事化小”的政治办法解决的。但是在解决的过程中，没有遵循政治“游戏规则”——妥协与平衡的规则。一位副书记说：“这种处理结果，对任亚非太不公平。”这位副书记所说的“公平”是政治“游戏规则”里的“公平”，离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公平”相去甚远。结果是弱肉强食，贪官污吏这边放了一马，举报人任亚非却锒铛入狱。

政客操纵法律得心应手。于是，任亚非的“产”便被“共”了。

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坐进了“奔驰 320”，企业自然被搞得一团糟。司法者的角色也很尴尬。一天晚上卢跃刚到重庆临江门吃夜宵，碰上主办任亚非案的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此公借着酒劲儿，毫不忌讳记者和任亚非的律师、任亚非的妻子等多人在场，极其生动地描绘了一个事实：“这件事是上面阉（注：“阉”，四川方言，这里有‘笼罩’、‘迫使’、‘操纵’等意）起整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是丘儿！”“丘儿”，四川方言，有“丘八”之意，又引申为“跟班的”、“听喝的”。“上面”是谁？为什么要这样？这个事实说明了政客与法律的关系。人们不免悲哀和怅惘，让咬谁就咬谁，让整谁就整谁，“法律”成了什么？颜跃明被解救出来了，任亚非还在监狱里苦苦挣扎。

卢跃刚介入任亚非事件，掐指一算，将近四年，还没有句号！《在底层》发表后，重庆的反击比湖南卑鄙得多，一时惹来无数的烦恼。许多不相干的机构和不相干的人借权势压人，在没有调查核实

的情况下,听信地方组织一面之词,妄下结论,极尽攻讦之能事,酿出一场大风波。如果任亚非冤案纠正,又不知有多少人尴尬。

自救没完没了。重庆风波没了结,卢跃刚便登上了咸阳故道——就是那“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地方,就是那“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地方。有朋友劝导他,何必不识时务,何必自己跟自己较劲,何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逼到了这个份儿上,他卢跃刚只能直面说,如果你面对人不人鬼不鬼的武芳,你能熟视无睹吗?你能回避吗?但凡是人,都会拍案而起,痛斥禽兽!何况他的手里还握有一支笔!这甚至不是责任和良知的问题,而是人性问题。与颜跃明和任亚非相比,武芳的命运更悲惨。颜跃明毕竟还是曾经风云了10年的“改革家”,任亚非也曾经是声名显赫的“企业家”,而武芳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孤立无援的农村妇女。总要有人帮她说话吧?法律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案发3年后,羞羞答答发了言,结果是几个月让王保京市长二公子王农业人模人样地去当省劳模、省人大代表。与湖南和重庆相比,陕西弥漫着一种说不太清楚的怪异气氛。湖南民风强悍,重庆则带着码头上行走赤裸裸不在乎的劲头,历史上,这两块土地风云变幻,躁动不安,着实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陕西本应恢弘大气,秦汉宫阙,大唐雄风。然而,这几十年阴柔、诡谲、虚妄之气漫溢,怎生不怪异?

一个村庄——陕西咸阳市礼泉县烽火村,一个退休的副市长——全国劳模王保京,对当地政治影响如此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被害人指控、媒体曝光、中央领导人批示、司法机关复查的情况下,居然还能左右省人大代表的候选局势,居然还有人出来为武芳案嫌疑人王农业当省人大代表出大力流大汗,担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几乎如愿以偿,换别的任何一个地方,会不会有这样的局面?只是感觉这儿有些人更加没有廉耻,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信奉权力,匍匐长跪,惟权是命,惟权是听。真是邪气浸淫,不忍卒睹。

人们只要把 50 年代王保京和烽火村媒体报道编年史看完便知道,王保京和烽火村被宠坏了。主流意识形态推崇什么事,推崇什么人,便知道推崇什么风气,推崇什么精神。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谎话的虚妄之风毒害了人们的心灵,摧毁了人们的信念,亵渎了人们的美好期待。结果就是死人,数千万地死人。结果就是失望,直至绝望。结果就是道德沦丧,斯文扫地。“法律”也不能幸免。

人们通常说,法律是人制定的,是人执行的,也就是说,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是冷冰冰的工具,掌握在一些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人手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人有善恶之分,于是人们又制定了法律之法律,对执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恶进行防范和制裁,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面对权力,面对恐惧,法律之法律算得了什么呢?看来,光有法律不行,辅之以法律之法律还是不行。还应该有更高的原则来支持法律。比如公正的原则,平等的原则,自由的原则,等等。如果法律违背了这些原则,法律就要修改;如果执法者违背了这些原则,就应该启动罢免程序。当然,在专制制度下,法律是统治者的意志,法律的支持系统是强权。朕即是法。

卢跃刚认为,现代法律,应该有一个社会公认的理性准则和尊重法律的社会氛围来维持,否则就是一堆废纸,断难维持公正。法学界说,为什么重思辨的希腊精神和重法律的罗马精神没有在中国社会出现?这是个文化问题。这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有关。传统中国,基本上是个伦理国家,社会保护机制中,伦理的功能远远大于法律的功能;法律维持的仅仅是现实秩序,而不是形而上准则。甚至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的法律。直到二十多年前,中国的法律还是不能保证国家主席人身安全的“法律”,还是拿刀割断张志新脖子的“法律”。

近二十年,中国社会匆匆忙忙走进了市场经济,生生地要把一

锅夹生饭煮熟。人们痛切地认识到无法无天、以权代法乃社会罪恶之渊源，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紧立法，并且成效显著。90年代称“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但是，谁都知道，中国社会离“法治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原因起码有两条：一是制度，二是伦理。都不是吹糠见米一蹴而就的事儿。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不完整，市场经济应该是以一整套伦理规范为背景的法治经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与其说是一套经济制度，不如说是一套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价值体系。这套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只能是“公正”。我们的麻烦在于，旧的伦理体系破坏了，新的伦理体系又没有建立，司法制度设计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于是在很多坎节儿的时候，法律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空中楼阁，成了权势者掌中玩物，成了仅供观赏的花瓶。把人家的法律精神（不是法律，是法律精神）移栽到我们的这块土地上，假借雨露阳光，吸收本土肥力，长成一棵健康的大树，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

所以，提供这么一个“法”的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颜跃明、任亚非、武芳的命运了。记得《大国寡民》引用了一幅佛家的对联：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但，“不了了之”谈何容易，“非法法也”姑妄听之。

——卢跃刚岂止是“记录历史”？

一个村庄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甚至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没有什么了不起，任何一个村庄都有这种可能。仅仅把眼光盯在案件上——虽然搞清楚案件的来龙去脉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仅仅去追踪犯罪动机并对犯罪原因作出一般性的社会解释——虽然犯罪动机和社会原因的探寻是武芳案重新调查非常重要的环节，对于武芳案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对全国劳模王保京和烽火村发迹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浮夸和弄虚作假的历史。在清算过程中，最让卢跃刚迷惑不解的是，王保京和烽火村撒了弥天大谎，一屁股屎，反而可以理直气壮地从历

史走向今天,看那架势,还将光辉灿烂地走向未来。所以,对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历史考察,主要是围绕着与产量的浮夸和弄虚作假及其政治文化背景展开的。

当地人印象深刻的是 1958 年“大跃进”,王保京大会小会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小麦 15 万”。除了烽火人,当地一般人并不知道奠定了王保京和烽火村政治基础的两次虚假产量:1952 年玉米丰产地亩产玉米 1200 斤,1954 年亩产玉米 1500 斤;不知道王保京的署名文章中声称可以亩产粮食 240 万斤。在那荒诞的历史断面里,农民领袖要在政治台面上立足,受到当权者垂青,要害是“产量”。注意,不是丰收,而是产量。丰收的含义清楚,而产量可以有歧义。产量后面再跟上科学试验,便可以蒙人唬人,便可以产量高而不丰收了,便可以永远在一亩三分地里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精神)生产(物质)双丰收了。科学试验,“科学”穿着神秘的衣服,“试验”又装扮成了一系列不确定的模样,解释起来,进可攻,退可守。

这种把戏蒙农村人不行,蒙包括记者和作家在内的城里人绰绰有余。当然,有些记者和作家不是被蒙的无辜者,而是怀着不同的动机自愿加入了蒙人帮闲的队伍。产量高才会丰收,他们之间有牢不可破的逻辑关系。官员们天天教农民们如何种庄稼的时候,经常出现两个概念:一是“提高单产”,二是“增加复种指数”或“增加复种面积”,就是为了提高产量,“夺取粮食大丰收”。王保京和烽火村最精妙绝伦的经验,是长期把“产量”与“丰收”的逻辑关系截然分开,或者是在媒体上混淆这两个概念,即使不丰收,也能获得荣誉,也能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许多农民出身的官员绝对清楚里面的诀窍,不点穿罢了,各取所需罢了。这是一场聪明人的聚会:烽火村自助餐开始了,人们端着盘子各取所需,川流不息。烽火村自助餐丰盛而长久,是一桌场面浩大的流水席,从 50 年代一直吃到 90 年代。有此,恐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多出来更多

的路障和沟壑。

真是成也报纸，败也报纸。“产量”是烽火村政治含金量很高的关键词。考证烽火村的产量“纪录”构成了《大国寡民》的主要特征。跨度整整45年，近半个世纪！产量就是一系列数字。每一组数字仿佛就是一个个絮絮叨叨的小精灵，不厌其烦地给你讲述过去的故事，给你一页页翻开真实的历史。亩产粮食240万斤的豪言壮语便非常隐蔽地埋在了1958年王保京一篇署名文章的尾巴里。《陕西日报》的编辑也算是没昏了头的高手，既不张扬，也不得罪浮夸的时代，便那么冷冷地处理了。看得见就看，看不见就算。要是有人较真儿，说陕西人“保守”，便可出示证据反驳：“保守？我陕西人浮夸全国第一！”换了湖北、河南、河北等浮夸风厉害地区的报纸便可能大炒特炒，便可能出现这样的标题：“青年农民科学家王保京说：粮食亩产可达240万斤！”

咸阳农民、当地出版物《烽火春秋》的作者对数字也相当敏感。《烽火春秋》的考证具有颠覆性：1952年玉米亩产1200斤“纪录”不确，只打了800多斤；1954年玉米亩产1500斤，可是玉米过秤时“不干”。作者显然对当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了如指掌，对烽火村的情况了如指掌。后来卢跃刚的调查考证与《烽火春秋》结论基本吻合。

历史线索便这样连接起来了：从1952年玉米亩产1200斤到1955年产值和税收弄虚作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反右、反左倾，“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投降派、学小靳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不难发现，烽火村的历史像一个发育完整延续性极好的地层剖面，每个时代层面都能找到烽火村的“标准化石”。卢跃刚断定，这是独一无二的。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卢跃刚检索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陕西日报》三家报纸，结果令他大吃一惊：好生了得！他非常

感谢王保京对政治的敏感和对媒体功能认识的早熟,更要感谢媒体近半个世纪对烽火村坚持不懈的关注和宣传,这种关注和宣传依年代展开,很容易了解烽火村几十年的生活,更客观地观察烽火村的历史。所以,为王保京和烽火村建立一个“媒体报道编年史”是十分必要的。虽然,卢跃刚经常用的“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报告文学”,首要的社会功能应该与新闻一样,是“记录历史”,是选择历史和社会矛盾最激烈、分量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现象、事件或人物来记录历史。这是由非虚构文体的真实性原则决定的。真实包括情节细节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台湾把报告文学叫做“报道文学”,就是用文学的眼光和方法报道新闻事实,比“报告文学”的定位更准确。首先是报道,其次才是文学,文学的余地非常有限。不能本末倒置。任何打着文学的幌子哗众取宠,任何打着主旋律的幌子回避矛盾回避现实的闪烁其词,都可能严重损害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都可能严重损害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从而失去现实和历史的价值。不能想象,一个作家离开了中国社会多灾多难的大转型大变迁背景进行写作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报告文学要为生存处境写作,不能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

卢跃刚还介绍了一位陕西农民杨伟名,他说,“今天,我还为发现了杨伟名而激动不已。杨伟名的地下知名文章‘一叶知秋——当前形势怀感’是真实的声音,虽然他为此受尽迫害。记得中国共产党人李锐先生说:中国共产党中产生了顾准,应该是党的一个安慰。套用这句话,陕西60年代产生了杨伟名,应该是陕西人的一个安慰。这还不够,应该是整个中国人的一个安慰”(作者与卢跃刚开玩笑说,90年代《中国青年报》产生了卢跃刚应该说是对中国新闻界的安慰)。

顾准是一位在黑暗中探索真理的思想家,他在1956年提出计划经济也要遵循价值规律;他从希腊城邦制度入手考察了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起源,提出了至今还是尖端问题的政治多元化问题。

他是一个去世了30年才被人们逐渐发现的思想家。顾准是共产党内高层的知识分子思想家。他了解体制，是体制的创立者之一，是体制内罕见的保持了独立思想品格的高级干部，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杨伟名则是底层拔地而起的思想家。他出身卑微，只读过3年私塾，有过短暂的基层政权从政经验，然后回乡务农。他的出现是个谜。我们现在还不能深入地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发生、发展的轨迹，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叶知秋》这就足够了。我们在《一叶知秋》可以看到他的生存环境，可以看到他探索真理、坚持真理的勇气，站在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土地上直面现实，毫不躲闪毫不隐讳地揭示重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其真知灼见，足以与顾准交相辉映。我想，任何一个了解历史背景并有判断力的人，读了《一叶知秋》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杨伟名如同布鲁诺，把生命压在了思想的天平上。这是在黑暗中探索真理的思想家的共同命运。思想家的孤独，为世俗社会所不容，经历一个轮回，又为社会所认识，是人类社会一个重大的现象。

民族精神，往往不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而是一桶水与粮食发酵后酿出的一杯酒，而是众多矿石冶炼出的一块钢坯。顾准如是，杨伟名如是。杨伟名使包括记者卢跃刚在内的公众人士改变了对中国农民的基本看法。卢跃刚相信：历史会证明，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教育城里人。为此，卢跃刚提到一本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他认为这是一部思想混乱、具有新纳粹倾向的书。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农民问题。这位有第三只眼的人操着旧贵族的腔调，用他伪装的德国名字评论了土地承包制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后，提出了一条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路”：“让农民再饥饿几年”！这个思路潜藏着两个令人恐怖的逻辑：一是死几千万人或再死几千万人算不了什么；二是统购统销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剥夺农民近三十年，时间还不够长！

作为真实的观察者，卢跃刚还没有看到知识分子应有的反应。

可悲的不是出版了这么一本怪书,可悲的是知识界出奇的迟钝和麻木,可悲的是知识界由于某种狭隘的心理而失去了判断力。

——不了了之的新闻透视:法律面前的交锋

面对恶霸的残暴,小老百姓还有能活命的吗?贱民、刁民、草民,都是说小老百姓的,小老百姓命如草芥,甚至还没有某些官员口袋里的钞票有使用价值?这一切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又揭示了什么?

《中国青年报》名记者卢跃刚先生推出报告文学《大国寡民》后,新闻界评论这个陕西礼泉县:“有怎样的土地就长出怎样的庄稼,有怎样的环境就怀上怎样的怪胎。”残害武芳的王农业是王保京副市长的儿子,又是武芳所在烽火村的村主任,他和他老子王保京几十年“齐心协力”共创有“红旗模范村”“先进村”之誉的烽火村,名震八百里秦川,他们俩及其走狗欺上瞒下,鱼肉百姓,上有省委书记×××接见,中央有新闻媒介吹捧,可见此人有通天之路。自50年代“大跃进”起,王保京就是“上通中央”的大能人了,叫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种庄稼施以狗肉汤当肥料增收,南瓜瓢里灌粪便速生、增产;筑小麦“阿房宫”,次牛亩产粮食可达240万斤;放卫星,坐火箭,一个又一个吹不破的神话。40年来,王保京创造了一个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和权力的历史,中央大报(甚至是当然的权威报纸)给他大幅报道和图片,这对迷信舆论的人和左右舆论的人来说,好比至高无上的超越法外的神圣光环。可是狂吹到最后,烽火村的小老百姓们自食苦果,苦不堪言。不可怀疑的是烽火村大小百姓受苦,正是应验王保京40年谎言的时候到了,但是小老百姓不可避免地还是输了,苦了,而制造这个“谎祸”的罪人却继续官至高位,无人敢动一个指头,这是怎样的一个较量呀,正义、依法治国、灵魂、良知、真善美,竟然敌不过邪恶?没人知道,陕西礼泉县的烽火村该是一个怎样设计的陷阱?更不知武芳何时才能得到法律的援助走出陷阱?何时才能铲除施暴者?天地良心,除暴安

良，还是一个永远的未知数吗？公理何在？正义何在？尊严何在？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人是生而平等的，但无时不在枷锁之中。

难道这个枷锁就不能用法律拆除吗？在《中国青年报》名记者卢跃刚的笔下，陕西的小老百姓武芳在欲死不能、欲活不能的情况下继续寻求法律援助，但是她所面对的是一群有巨大权力的政治骗子，这些人把众百姓给予的权力集中在手；这些人素质低下却高坐庙台，品质恶劣却握权在手，奸诈一世，涂炭生灵，小老百姓苦不堪言。有句古诗说得那么直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难道一个大国救不了一个弱女子、一个伤者？难道一个大国就能视武芳落入陷阱而不管？难道一个大国就让陕西几个掌管权力的而又罪恶滔天的“书记”、“衙内”继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继续让那些素质低下和品质恶劣者公然作恶？主持一个小老百姓的公道是多么艰难呀！为一个小老百姓伸冤是多么艰难呀！陕西这片地方，还能让武芳看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那一天吗？强权与弱小的悬殊，应该生出罪恶，还是应该生出正义、公理、公平？在明天，武芳能得到公平与正义的指引吗？能得到弱者的尊严吗？

——良知与没有良知的较量：指控权力犯罪

圣经说，你们犯下的罪，你们最终将自己承受。

很多时候我却发现，一些人犯下了滔天罪过，往往得不到追究，甚至有老百姓被迫做了替死鬼，而且还在身后背上一个非死不可的罪名。

1988年犯下的罪，1998年还没有追究，罪恶仍在继续。就是这样一起发生在陕西礼泉县的惨绝人寰的特大硫酸毁容案，几乎使一个美丽的女子变成一个鬼一样的人。

今天要说的悲惨故事发生在1988年4月26日下午，在陕西省咸阳地区（现为咸阳市）礼泉县烽火村，刚刚被村干部和公安干警连骗带吓挟持回来的农村妇女武芳，没有去住自己一直坚持要

离婚的丈夫王茂新的家，而是住在村接待站，当时正赶上陕西省省长侯宗宾要来视察，在村里也算上一个知名人物的村接待站站长王正吉提出，要把武芳以前住的房调一下，调到靠边的北房去，细心的武芳发现，北房没有内关的保险栓，外面的人想进来随时都可以进来，这时候，她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是没有思想、没有感情、只供泄欲和生儿育女的动物，是一件属于烽火村的没有意志没有自由权利的东西。等到进村第三天，还没见有人来和她讨论她此行的惟一目的——离婚。村干部们一直在说谎，他们早已了解这桩死亡已久的婚姻的原因和她不容商量的态度，然而他们一直在努力调解，不懈地让她和丈夫睡觉（不言而喻是被强奸），仿佛结婚8年的恩怨、痛苦、被欺凌被污辱都可以一睡了之。3天的折磨，武芳已经筋疲力尽，送走姐姐，她关好门，和衣睡下，在黑暗中啜泣。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并拉开了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惨绝人寰的一幕。来者叫王农业，是烽火村农工商公司总经理兼烽火村水泥厂经理，年龄只有27岁，却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老子正是当地具有“皇帝一样被称作孤家寡人”威力的人物——烽火村总支书记兼咸阳市常委、副市长王保京，他主管着烽火村除王保京之外的一百八十多户人家、一千八百多人：1的生老病死。村里的实权人物是王保京的“公子”王农业，他进来后说的话很有分量，他让三个村干部出去，自己来劝：“武芳，睡去，几个月没见面了，睡去。”武芳忙拉着王农业的后衣角，被王甩开，并顺手拉灭了电灯。门开了，院子里有许多人，武芳想跑出去，王茂新从后面紧紧抱住，一个“膀大腰圆的短头发女人”进来了，此时武芳被拌倒了，她凄厉地喊叫求救，没有人上前，王茂新踢她的腰，胖女人骑在她的肚子上咬她的脸，屋里一片黑暗，突然武芳觉得一股液体冲脸倒下……一瓶浓硫酸流进她美丽的眼睛，她身上最精妙绝伦的部分被摧残。“救命啊，救命啊，”一声声惨叫……屋里屋外的人没有理她，没人在乎她，她本能地用手护住眼睛，使劲揉眼睛，结

果却是更猛烈的烧灼，硫酸在不断地倾倒，向她那茂密乌亮的头发扑去，头发在燃烧，脸在变形，剧烈地溃烂，耳朵像蚕食桑叶般地没了，她撕心裂肺地嚎叫却换来更多的帮凶，罪恶在继续，她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有人脱她的外衣，把她的外衣往上掀，有人解她的腰带，把她的裤子往下扒，有人脱她的袜子，硫酸倒向了乳房，然后倒向上腹部，下腹部，大腿根部……健康美丽的武芳即刻变成了全身焦黑的炭人……

后经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烧伤科诊断：(1)硫酸烧伤头、面、颈、胸、背、臀、双上肢、右下肢，烧伤面积 23%，呈三度烧伤，伴颅骨烧伤；(2)双眼角膜烧伤后浑浊，左眼失明，右眼部分恢复视力；(3)右耳廓烧伤后缺损，外耳道烧伤，鼓膜穿孔；(4)乳房烧毁，右手背伸直肌腱部分缺损，落个残废。一位外科医生说，她可以在解剖室里把人的肢体大卸八块，可以在手术室上眼都不眨地把活生生的皮肤划开，把人的骨头锯下来，把人的五脏六腑拿出来，但是见不得被硫酸烧烂的人，甚至不愿意听人说，谁说，她会嚎叫着跑开，因为她看见过被硫酸烧伤的人，就因为看过一眼，便成了永远的噩梦。

多么触目惊心的现实，在 1988 年 4 月 26 日晚 11 时许成为永远不能改变的历史，这个 40 年来接待过无数中央、省、地、市、县党政要员，接待过上百万国内外各行各业参观取经的烽火村接待站兼村委会办公室，在举世闻名的“精神文明”、“新农村”的大红牌子下，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硫酸毁容毁身案。

多人参与！集体围观！危害惨烈！闻所未闻！

罪孽，兽行，幸灾乐祸，和绝大多数人的沉默，武芳不可避免地
被硫酸和着血擦洗肉体 and 心灵。

武芳住进省医学院，钱仍不够，武芳和以命相陪的老妈妈饿着肚子，她们连买饭的钱也没有，有人劝说“烽火村是全国的先进村

文明村富裕村，村干部犯的事，就该找王保京，他是全国劳模、咸阳市副市长，又是烽火村支部书记哩”。就这样，武芳的年迈的老父老母敲了8次王保京副市长的家门，两次见到了王大人，甚至老人给王大人下跪，哀号不已，恳求借500元救女儿之命，王副市长不为所动，撵老人出门。接下来就是武芳不停地告状，找了3年公检法、党委政府、新闻单位、妇联，都没有感动衙门里的“神仙”，没解决任何问题，武芳尝尽了人间冷暖。1991年6月1日，案发整3年后，咸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接待了武芳，6月3日，方世信主任在武芳的伸冤信上批示：“这是一起严重的毁容案件。拟转市检察院，要求尽快查结，向市中院起诉，并将查处情况报市人大法制委。”市人大副主任郭建义拍案而起，批示要求“严惩这帮惨无人道的凶手”。7月25日市人大法制委《情况反映》登载“一起故意伤害案长达三年未结”一文并明确提出处理此案的要求。一周后，市检察院向市人大递交正式报告，报告称“此案是1989年6月9日由礼泉县检察院送我院审查起诉的，经侦查认为被告王茂新之弟王茂章身为水泥厂化验员，深知硫酸的性能而为其兄提供，并拉灭电灯（作者注：实际为王农业所拉，王茂章为其背罪名，后为此判刑13年），实为帮凶，应为本案被告，属于从犯。1989年7月31日，我院将王茂章取保候审，列为被告，8月24日将此案起诉于咸阳市中院。9月24日，中院以事实不清退回我院。11月14日又起诉于中院，1990年3月31日被退回。1991年6月15日我院又将此案起诉到中院”。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在报告上批示“从报告上看，毁容案长达3年判决不了，主要责任在市中院”。早在此前的1989年2月24日，礼泉县检察院以王茂新一人故意伤害罪起诉至县法院，县法院认为被告手段残忍，情节极为恶劣，应属市中院审理。5月3日移送中院，中院因事实不清，5月10日又退回礼泉县法院。到了9月2日，咸阳市检察院以王茂新、王茂章犯故意伤害罪起诉至中院，中院认为有6个问题，遂发回检察院进行补充侦查。此后又反复两个回合，

直至被市人大干预，郭建义副主任亲自出马才进入司法程序。在调查和法庭指证过程中，村接待站站长王正吉证实王农业在犯罪现场，又是最后离开现场。这与武芳的指控一致。但案卷中对王农业是拉灯人未作丝毫记载——这是一张窗户纸，没有人去捅。

时间又向前推了一年，1991年底，法院审理结束，王茂新被枪决，王茂章判刑13年。记者在王茂章服刑的陕西铜川市崔家沟监狱调查得知，王茂章的妻子说她丈夫是后进屋的，没拉灭电灯，是“千真万确”的，说王茂章判刑太重，找来律师要申诉。在礼泉县公安局拘留所，曾与王茂新关在一块的礼泉县某司机说，当时王茂新承认他用硫酸烧自己妻子是王农业教的办法，是王农业拉灭了电灯后才实施的，王农业还说能在短时间保自己出狱。经核实，证明人确实与王茂新同号关押。武芳3年来虽告状不辍，一名罪犯被诛，一名罪犯被判刑，但她仍然不服，认为还有拉灯的一个参与犯罪过程的重要嫌疑人未被追究，漏网在外。

1996年10月20日，烽火村的说客摸进了武芳的隐居地，开价10万元让她闭嘴，被严辞拒绝。12月9日傍晚，两个烽火村村民闯进武芳娘家，威胁武母，不让武芳继续告状下去，武母恐惧，服毒自尽，被紧急抢救生还。

1997年3月，全国人民的首都——北京，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信访快讯》以“一起特大毁容案的凶手为何逍遥法外”为标题，全文刊登了武芳的控诉信。“编者提要”写道：“陕西礼泉县北屯乡北二村妇女（武芳娘家）给大会来信，控告其夫王茂新与村干部多人合谋，于1988年4月26日将她骗回村，按倒在地，向其面部、腹部、腿部泼倒硫酸，致使其颅骨外露，左眼失明，右耳缺损，烧伤面积达23%，经五次手术，才有幸脱险。这样一起特大残忍的毁容案，只是因为村干部王农业的父亲是咸阳市的副市长，拖了3年才对首犯主犯作了判决，而在这位副市长的包庇下，共同实施犯罪的村干部王农业等人至今逍遥法外。为此1996年8月8日《中国青

年报》第二版头条和1996年11月30日《中国社会报》头版头条以‘蹊跷的特大毁容案’和‘特大毁容案的背后’为题作了详细披露。来信要求人大为她伸张正义，洗血沉冤。”中纪委副书记侯宗宾，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公安部部长陶驷驹等就此案作出批示，要求陕西认真调查，依法处理。正当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公安部干预未果之际，1997年5月8日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中国青年报》及作者卢跃刚因“名誉侵权”被王保京、王农业起诉，毫不相干的第三地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桩民事案，令人不解的是这次武芳成了证人，而武芳的事已拖了9年，有关法院也没有这么快受理，王农业这个最大的犯罪嫌疑人仍在当省人大代表。罪恶仍在继续，1997年6月1日，武芳娘家遭两歹徒袭击，武芳老母遭毒打，紧急报案后，当地的警方传唤歹徒时被围攻殴打，派出所所长赵志权受重伤住院。6月2日，礼泉县政协委员、原烽火村党总支副书记王行兴被烽火村恶势力认为是“举报人”、“村中叛徒”，也惨遭毒打。而在此前的5月29日，惊怵和恐惧继续笼罩着咸阳市上空之时，当时正奉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和陕西省高级法院之命，起草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复查报告的咸阳市中院院长任维突遭车祸死亡。警方努力未果，法院努力未果……

烽火村的武芳，挣扎在生与死之间，她以其超常的毅力、旺盛的生命力不懈伸冤、告状，她用生命作支柱，坚决与妖魔一样的恶势力斗到底。

再回头看烽火村，对比一下武芳的遭遇，分明感到这里是两重天：1991年底，当主犯首犯王茂新被处决后，好恶分明的烽火村村民厚葬罪犯，厚待罪犯家属，武芳被迫流落他乡。当1996年8月8日《中国青年报》曝光毁容案后，烽火村的当家人王保京、王农业父子有恃无恐，大举反击，大量散发致《中国青年报》“公开信”，运用权力，操纵法律，购买《陕西日报》一个版面吹捧自己，美化自己。

且说王保京个人,其人发迹不可小视,1949年王保京冒充“陕西省侦察大队长”诈骗,被刑事拘留;1952年、1954年以“科学种田”的名义极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宰牛杀狗,熬汤作小麦肥料,在烽火村搭起了小麦“阿房宫”,号称亩产可达240万斤,创全国浮夸之最,获“农民科学家”称号;1959年继续“反右倾”,为1958年“大跃进”画上一个句号,把准政治脉搏的王保京平稳过渡;70年代,王保京东山再起,隐瞒土地,浮夸产量,骗取荣誉和权力,任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兼村党支部书记,中央大媒体和陕西地方党报围绕王保京和烽火村,从50年代到现在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80年代,“常青树”一样的王保京继续运用媒体和权力,兴风作浪,反而当上了咸阳市副市长、市委常委。1988年4月26日,嫁到烽火村8年已育有一女的武芳被王家毁容,王保京的人公子王农业参与其中。1996年8月8日《中国青年报》揭露硫酸毁容案和烽火村的历史。1996年12月24日,某主要领导却一点也不意外地视察烽火村,肯定王保京和烽火村是“一个好班子,一个好队伍,一个好带头人”。1997年8月29日,陕西省西安中级法院作出裁决:王保京、王农业、烽火村委会诉《中国青年报》和作者卢跃刚“名誉侵权案”因涉及刑事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裁定,本案中止审理——马拉松和暧昧不清的武芳案复查。

面对中央的干预,媒介的曝光,烽火村仍没有善罢甘休,在一些领导的支持下,村干部和权势之徒加紧活动,力图让武芳案嫌疑人王农业继上届省人大代表之后,企图连任1998年人大代表。面对这样的现实,王保京、王农业和烽火村还会有美好的明天,可是武芳呢,她还有明天吗?她的明天还会惨痛下去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会是一句空话吗?

如今,武芳继续与恶势力交锋,《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继续与恶势力交锋,法律继续与恶势力交锋!卢跃刚说,怎样的土地长出怎样的庄稼,在这个烽火村,四十余年的是与非,四十余年的悲

喜剧，四十余年的怪现象，四十余年说谎大合唱，终于酿成一世“谎祸”！谁来清算？看来，陕西这场大较量还远远没有结束！

4. 为民请命的新华社记者

1997年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出台，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屠宰税，必须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指标，不得按人头、田亩平摊”。显而易见，这条规定是针对那些把“猪头税”按“人头税”、“田亩税”收取、从而对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的“昏官”的一条禁令。在这个重大决定的背后，有一位视百姓为父母的新闻工作者解国记。

1996年，对于新华社记者解国记来说，也许只是一个平常的年份，但对于河南省禹州市西北山区的莪庄乡3万农民来说，却非比寻常。一篇署名解国记的新华社电讯和《警惕农民负担“七十二变”》的新闻评论，使这个偏僻山区一时响遍大江南北，也使山民们第一次收回了被巧取豪夺的17万元血汗钱。

被乱收费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农民，第一次扬眉吐气。解国记的名字在当地也差不多成了“包青天”。1997年6月13日《南方周末》报道了解国记和他的采访。

——猪头税里出政绩

1996年7月26日早晨，解国记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收听河南台的早间新闻。一条关于“猪头税”引起群众不满的口播稿触动了解国记的神经。凭着一贯的职业敏感性，他本能地意识到这其中所蕴藏的重大新闻价值。

30日早晨，解国记和这条新闻的撰稿人冯肖楠等人一起驱车前往莪庄。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处副处长冯肖楠已经是第二次采访，轻车熟路，他们很快到达目的地。车子刚停下，听说采访“猪头税”的事，村民们顿时围上来，越聚越多，问“猪头税”是怎么收的，他们气愤异常，七嘴八舌，都说按人头收的，每口人11元钱，不管养猪

不养猪，都交这个数。这时候，一个外村农民也围过来，他说他也属裴庄乡，他们村里的“猪头税”收得更紧。那天村里是高音喇叭广播的，叫一天交齐。没钱交麦子，没有新麦子拿陈麦。一口人按 14 斤麦收。麦子是 8 毛多钱一斤，加起来也是十多元钱。谁不交抓谁。一个年轻农民更生气。他说他在按人头交“猪头税”之前，已经交付“猪头税”了，是在卖猪的时候交的。“但是这次还要叫我交 33 元，因为我家 3 口人！”通过采访猪肉经营户，解国记进一步证实，包括猪头税按人头交，加上养猪、卖猪重复征税，实际上，一头猪要交上三次税。

变相的农民负担还远远不止这一项。比如说“建房费”交过以后，每年还要交“宅基地使用费”；即使你不种烟叶，照样要交“烟叶保证金”，而且数额很大……

令农民愤慨的是，这税那税，这费那费，加起来这么重，还不让说。上边发的什么农民负担监督卡、明白卡，根本不灵。卡上是一个数，另外还有实收的一个数。监督卡、明白卡是让上边检查时看的，实际收费的这个单子不让人看。一个农民叫刘合申，他拿出两张纸，一张是监督卡，上面一二三四项，列得挺清楚。按这个卡算，人均负担是 32.32 元；另一张纸是实际收费单子，解国记算了一下，人均 86.92 元，比监督卡超了一倍。

然而那些给老百姓造成沉重负担而又弄虚作假的“地方官”，面对记者的调查，是如何表现的呢？裴庄乡乡长范国敏不无炫耀地向记者说：1994 年乡里税收是 32.5 万元，1996 年翻了一番多，是 79.8 万元。1997 年争取达到 250 万元，上半年已经完成 114 万元。这就是说光上半年已经比 1996 年全年还多了 42.9%。难道这就是一级政府的所谓政绩？联想到采访中农民苦不堪言的状况，解国记感到震惊，当即奋笔疾书，写出“‘猪头税’竟按人头收”这条触目惊心的新闻稿，接着又一鼓作气写出一篇新闻评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农民负担的‘七十二变’，不能不警惕；对于把‘政绩’

建立在沉重的农民负担基础上的官儿们，不能不警惕！”文章出来后引起极大反响，河南省委办公厅、禹州市委快速作出反应，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并就地免去了茆庄乡乡长范国敏的党内外领导职务。

——从邓州谋杀村民案到郑州“大肚子”信箱

解国记及时捕捉到“猪头税”这个重大新闻，绝非偶然。早在1994年，解国记就以《内参》形式率先向国家高层报告了河南邓州一个村领导班子集体谋杀上访农民的恶性案件，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推动了此案迅速解决。

1994年7月31日，一位秘密来访者敲响了新华社河南分社值班室的门。来人告诉正在值班的解国记：邓州市陶营乡徐楼村的几名村干部，合谋将本村一个向上级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的村民杀害了。

“有这回事？！”如晴天霹雳，解国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事不宜迟，8月2日，解国记带上地图，顶着高温，驱车300公里，一路打探来到了位于河南省西南一隅的邓州徐楼村。

在村民的带领下，解国记拖着沉重的步子，去察看了上访者陈重申被勒死的现场，沉匿尸体的刁南灌渠倒虹吸涵洞，酷暑天气里被村民拦下不让埋葬而停尸19天的草地，新湿的坟墓……每走一处，他的心都像被皮鞭狠命抽打似的。和着汗水和泪水，解国记详细采访了每一个情节、细节、地点和当事人的亲属。

通过艰苦细致的调查访问，解国记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甚至看到了被害人陈重申写给上级有关部门的最后一封举报信。陈重申所在的徐北村民小组，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不过300多元，然而却要负担100多元的各种提留摊派和收费。一户六口之家，就要负担七八百元，谁能出得起？出不起，村干部就组织“棒子队”到各户强行收粮牵牛，私自拘押人。与茅草屋、土坯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村会计家，一溜九间水泥裙墙砖砌大瓦房。村民反映说，

那里面少不了俺的血汗钱。

陈重申家实在不像家的样子——连个院墙、门户都没有，只有两座土坯房、两间茅草房，屋里除了一个柜子好点外，别无像回事的家具，全部家当也就千把块钱。陈重申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境况下，不惜倾家荡产，冒着生命危险担当起“为民请命”的大义，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以致招来了杀身之祸。

当新华社高级记者解国记来到被害人家徒四壁的残破家园，面对被害人妻子揪心的哭诉时，他悲愤得连一句安慰的话也说出来了。回到分社，解国记怀着沉重的心情，当天就写出一条内参“河南农民陈重申反映‘三乱’被村干部杀害”稿子传到北京以后，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作了长篇指示；河南省先后召开4次会议，发出两份专项文件，最终使参与这起恶性案件的多名乡、村两级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不是法律处分，不是犯罪），村领导班子被解散改组，6名案犯被依法逮捕起诉判刑，其中4名主犯被执行枪决。这一事件极大地震动了各级部门，使上上下下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农村基层组织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此后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了整顿农村基层组织的决议。

如果说对于“猪头税”事件、谋杀村民案的调查报告体现了记者的新闻良知的話，那么1991年对于郑州“大肚子信箱”的批评报道则反映了解国记始终不渝的职业原则：敢为人民鼓与呼。1990年至1991年间，郑州货站街信箱10个月无人开取，给该社区民众利益造成了很大损失。当时人大、政协“两会”正在举行，解国记冒着风险，顶着压力，明察暗访，采写发表了“郑州货站街信箱‘十月怀胎’竟无人过问”的报道，引起很大反响。原邮电部召开全国电话会议通报批评，号召全系统以之为戒；郑州市邮政局确定今后每年4月1日（“大肚子信箱”暴露日期）为全局“质量警钟日”。

——解国记身世

河南省清丰县位于古老的黄河故道上。1953年，解国记就出

生在清丰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生8个月,他的生母就因“月间病”撒手西归;7岁那一年,他的父亲亦被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饥饿夺去了生命。解国记是被爷爷奶奶抱着,轮流吃全村人的乳汁长大的。那个叫做枣格的小村,就是他的乳母。在解国记的记者生涯中,他对老百姓的感恩思想,以及对于农民负担的痛切感受,都可以从他早年的遭遇中找到答案。

新时期高考制度恢复以后,解国记成为第一批大学生,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分配到新华社河南分社。在14年的新闻工作中,解国记从资料员干起,一直干到记者、高级记者、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他脚踏实地深入民间,深入社会,先后采写发表了大量的乡村调研文章,如“河南农民对粮食定购的看法”、“棉农对棉花压级压价犹有余悸”、“国务院紧急通知下发之后”、“白庄农民集体上访原因初探”、“沸沸扬扬中能沉淀多少真货”等,每一篇都反映了民情,每一篇都凝结着解国记忧国忧民的良苦用心。解国记说:吃了老百姓的奶,做孝子是应该的。

5. 直面人生的戴煌

80年代以来,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的工作,几乎都是与昭雪一个又一个冤假错案连在一起。其中有的是为死去的冤魂昭雪,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浮雕塑造者高庄教授,比如被恶毒杀害的江西青年思想者李九莲;有的是为活人洗冤,比如被诬“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的原公安部副部长丁兆甲,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定无罪、地方某些部门却坚持要逮捕的阎少卿;有的是为正义鸣不平,比如写了很好的小说《穷棒子王国》却在法院败诉的作家古鉴兹。后来戴煌发表长篇纪实作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在一些媒体刊出后,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涟漪。

80年代以前,戴煌和几十万人一起陷进了那场万劫不复的灾难,九死一生。一个曾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弥漫硝烟中握笔驰骋的战地记者,21年后,才带着满头岁月的霜雪和残疾的眼睛回

到了他的岗位。他的武器还是那支笔——一杆天地之间的良心秤。在这权法时有失衡，善恶时有混淆，冤屈依然不绝的年代，应有更多的人知道他。

为作家鸣不平，与法庭唱对台，戴煌手中的一支笔记录的不仅是一桩事实。杂文家严秀在《“平反”漫谈——一个极其优良的民族传统》中说：“一个民族在发生了某种忠奸倒置的重大冤案之后，整个民族精神和民族良心为此而感到痛苦和窒息，这就必然会造成一个民族民心不振、民心消沉的现象。”这段话也是戴煌做一些事情的动力。这些年他接触的案子较多，没有时间一一过问，但有些事情由于本身的分量和它的意义，他一定要抽出时间参与。比如古鉴兹的案子是这样的：作家古鉴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穷棒子王国》，198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原河北遵化县委书记王国藩起诉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状告这本书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决该小说侵害了王国藩的名誉权不得再版发行，未出售的书全部销毁；被告登报向王国藩道歉；赔偿王国藩经济和精神损失7300多元。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不服判决，继续上诉。尽管古鉴兹一再郑重申辩：小说中写的“不可能是生活中任何一个实有的人和事”。法律规定，侵权责任必须以侵权行为给被侵权人造成一定损害为前提；而损害的原因，只能在发生损害之前的现象中寻找。王国藩早在11年前就被罢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他对遵化县委1978年所做的《关于王国藩所犯严重错误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从未公开说过“不”字。王国藩的所作所为比起小说中的主人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中级法院对古鉴兹提供的证据和说明，并不理睬，仍维持原判。与此同时，许多著名老作家致信最高法院：“如果都这样将文学作品对号入座告状，法院又判定有理，作家谁还敢写东西？”“说对王国藩‘名誉侵权’，得有一个王国藩并无‘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劣迹为前提，但是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在八届全国人大的两次全体会议上，陈源斌等三十几位人大

代表联名提交议案,以《穷棒子王国》为例,呼吁依法保护公民创作权。

从古鉴兹上诉中级法院开始,戴煌就一直赴法院旁听,并从多方面搜集材料。先是与别人一起写出“震动中国文坛的《穷棒子王国》案”的长篇报道。后来古鉴兹继续上诉,他举行调查,又掌握了案情内外大量的活生生事实材料,写出长达6.3万多字的长篇纪实作品——《“凡是”对求实的一场新格斗》。戴煌说,一审判决后,社会舆论大哗,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和中组部派往调查王国藩一案的负责人气愤地说:法院为什么不向他们这些最了解王国藩问题的人进行调查?戴煌还记述了中级法院是如何倾向性先行,设套刁难古鉴兹,详细报道了中级法院审理的经过。中级法院审判后,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仍继续申诉,但传媒再也没有声音了,戴煌却没有沉默。

《“凡是”对求实的一场新格斗》是可以当作法律专业的典型案例教材的,也可以进入历史。它让后人知道,有关文艺的立法出台之前,作家为自己的权益进行了多么艰难的努力,从中还可以看到中国法制建设中有待克服的弊端还很多。

与做官的“为难”,为老百姓出气,戴煌一篇篇长文如一盏刺眼的探照灯,把阴暗与肮脏统统照亮。戴煌写的“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当代中国权、法对抗的缩影”一文,说的是他的报告文学“权柄魔术师”和“在层层厚网的覆盖下”发表前后,引起的“权力地震”。其中权力的淫威,百姓的怨怒,令人痛心疾首:现在还有没有天地良心?在中国我们能不能信任法律?

“权柄魔术师”写的是1984年四川凉山官场搞的汽车进口走私案马虎了之。当时正值“整党”和“严打”的高潮。州卫生局局长等人伪造“港澳同胞”捐赠汽车来信,从香港购进6台空调越野车和一些大彩电、冰柜、照相机等。他们没有控办的批条,但得到州委和州政府一些人的支持,迫使银行付出30万元人民币,通过黑市

高价换成港币做成了这笔交易。凉山州为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卫校的图书、实验设备、危房都没有着落，可卫生局长为买汽车花掉80000多元卫生事业费。当地干部群众怨声载道。1988年戴煌到重庆讲学，听说了这件事，立即到凉山调查。不想“权柄魔术师”还未定稿，已经引起轩然大波。他不顾凉山州委百般阻挠，终让文章与读者见面。老百姓拍手称快，可凉山州委为此与他纠缠了一年多，省里负责人也对他大伤脑筋。

“在层层厚网的覆盖下”写的是凉山州副州长儿子季小勇故意伤人致死的案件。这一目了然的重大人命案，审理过程却九曲十八折。州中有权力者以种种借口为季小勇开脱罪责。州检察官曾宪元顶着巨大压力要求“从严从重判处”。不想州审判长判处季死刑后，四川高级法院改判为死缓，又由中级法院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季送到他老子当过县委书记的布拖县“以观后效”。曾宪元却被宣布“停职检查”，遭到种种围攻诬陷。文章质问：在那一层层厚实的关系网覆盖下的“人民公仆”们，敢不敢向人民公开他们的肮脏交易？

戴煌认为凉山的案子虽然事情都不大，但却很典型，本来我们应该是最讲民主、最讲自由、最讲开故，对人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可恰恰相反，总是包得严严实实，向人民隐瞒真相，向人民撒谎。所以他愿意在这方面下功夫，就要同这种顽固、腐朽落后的东西作斗争。“你越是怕人知道，我越是要挑开来看”。

戴煌的《胡耀邦平反与冤假错案》一书中收录了耸人听闻的李九莲一案。李九莲说林彪像奸臣，怀疑“文化大革命”是否得当，1969年入狱。后在劳改农场仍对华国锋提出批评，于1977年被判死刑。她活着时，就被将下颚和舌头用尖锐的竹签穿在一起，行刑后又被歹徒奸尸挖去双乳。戴煌当时自己的冤案刚平反，便不远千里去调查，在华国锋还在位时，写下了《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的《内参》。胡耀邦看到后，立即批示“妥善处理”。这个被判死刑2人、抓

60 多人、株连 600 多人,包括受害人家属一起共牵涉 2000 多人的大冤案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

平时讲真话不难;受了打击还坚持讲真话,不易。在长达数十年的不公正待遇后,仍坚持真理的戴煌回首往事,感慨良多。谈起他的右派经历,戴煌说:1956 年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朱总司令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带回来的时候,新华社正在开全国国内工作会议,斯大林的这些事情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要避免中国将来也发生这样的悲剧。其实过去我对毛主席也是很崇拜的,但是建国后发生的一些事,我有些不理解。个人崇拜确实是存在的,当时暴露出来的,较之后来仅仅是一点点而已。我看到了苗头。在外交学院学习时,我就作了一个发言,谈到“个人迷信”、“神化和特权”等问题,因此当了右派。有很多人 60 年代初就被摘了帽子,戴煌的劳改时间却很长。据戴煌讲:我先是被弄到北大荒接受监督劳动。1960 年冬天回到北京,1961 年才回社里资料组搞资料,写出文章来也不准署名。1962 年七千人大会后,确实要搞“右派”甄别,还想在新华社搞试点。在党组织多方面的动员下,我写了个材料,谈自己 1956 年以来对“神化和特权”的思考,谈个人崇拜对党和国家的危害;还就中苏关系方面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和在北大荒劳动看到的情况,讲了许多别人想讲而不敢讲的话,一共 10 万字,送给党小组、党总支、党委逐级传阅。传阅到最后,结论是:材料写得很好,虽然遭受到这么大的折磨,还能坚持向党讲真话。他们准备把我的材料打印出来送到中南海去。

“相隔不到一个月,大约是 10 月底,有人通知我说,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打退翻案风。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转眼间,原来说我材料写得好。一个月后又通知,说我是向党新的进攻。1957 年是对我的第一次批判,这一次是再批判。对他们来说,批判我很困难,我要辩护啊!那时“大跃进”失败了,人民公社怨声载道,全国饿死了 3000 多万

人，整彭德怀显然是丧失人心的，我要谈起这些问题来，他们怎么批我呢？批判搞了两个月，结束的那一天，社党委委员方石同志作总结说：“不管怎样，戴煌过去历史上为党所做的工作，那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在批判我的会上，最后他能讲出这样的话，应该说是很难的。

“到了1964年4月，我被正式劳教，开除公职。当时说劳教两年，结果两年结束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没人管我了。于是我留在农场就业。留场就业也是劳改，只是表面上有公民权，星期天可以上街，节假日可以回家。先是在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后来又去修海河。林彪事件发生时，我被弄到太原劳改队呆了将近九年。”

戴煌19岁就成为新华社记者，作为新华社苏北前线记者，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大战。他写的著名的《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选入小学课本，影响了两代人。1998年11月，记者到新华社找他，他表示对真正的共产党有信心，他说：“我们打天下死了那么多的人，天下打下来了，又出现这么多腐败黑暗的现象，如果我们不管，天下还会丢掉的。……我并不是大记者，大记者就是要比一般记者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抓住社会的要害，独立思考；是社会的良知，正义的代言人。我只是按照自己的人生奋斗的目标，来摄取我需要的东西，不随波逐流而已。”

戴煌，记者中的稀少者。

戴煌、卢跃刚、朱德付等是现在的名记者，而邹容、邵飘萍、史量才、范长江等是过去的名记者。当然还有一些影响不太大的有为记者，他们是特立独行而又默默无闻的个体，不代表单位，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独步从山海关老龙头走完万里长城的《中国保险报》的记者于春生，不忍多年的寂寞，终于创举一把，告别跻身多年的报社，告别总是“平淡、平淡、平淡”的平淡，沿长城向西挺进，饿了吃干粮，无人处就露宿山沟，有时住在农家或村干部家。他就边走边考察农家，尽览农民生存现状，苦与难，公正与邪恶，贫困和富

裕，边走边写，随时发稿，发表了一系列长城沿线真实的声音。

现在与过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时代不同了，记者也不会一样。所以我们只能把眼光盯住 21 世纪，希望 21 世纪产生更多的名记者。

第六章 近代报人报业

晚清、民国，多事之秋的中国乃是一个爆出新闻的地域，早期中国新闻的黑暗，创造了一大批中国早期记者的先驱，他们出生入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今，该是他们看我们的时候了，要做好现代中国记者，就要有早期记者的献身精神，为国民为民族当好改革与开放的尖兵。因为现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仍然是新闻迭出的时代。

尽管中国的新闻事业可上溯到商周之世，尽管实物的证据也可以追溯到唐代（有《开元杂报》为凭），但欲求真正的新闻出版，则仍当问诸近代。中国有了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出版，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事。不过彼时的国人犹视新闻出版为外商之事业，如果不是落拓文人，一般不会参与报纸事业。

甲午之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泱泱大国竟败于我们一向看不起的倭寇之手，这才使得流连于故金石堆里、线装书旁的士大夫惊起，于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士子渐知言论报国。他们看到，“新民”是当下刻不容缓的任务。这样，短短数年之内，报业纷起，革新救亡的呼声，响彻了半个天空。王韬、郑观应、梁启超、麦孟华，他们以如椽巨笔，写下中国新闻史的第一页。

1. 启蒙派报人：王韬、梁启超及其他

近代中国不由功业而以思想、言论报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

王韬为第一人。这个生性风流、放浪行骸的传统士子，是鸦片战争以后最早精通西学者。他早年应举落第，从此便绝意科场，开始点滴的文化改良。早年他曾经上书支持过太平天国，被称为“长毛状元”，这一谰而近虐的称号他晚年极力掩饰，这正表明他对于历史认识逐渐成熟。

1849年，年轻的王韬应西人麦都思之聘，到新教伦敦会办的“墨海书馆”担任中文编辑。他一生的事业，即发轫于斯。在“墨海书馆”期间，王韬对西学有了精深的了解。他的循环史观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以后他流亡香港、游历欧洲，使得他成为最早真正理解西方的中国人。

王韬投身报界自《循环日报》始。1873年，刚由澳门返回香港的王韬与监管香港墨海书局长达20年之久的黄胜，并其他同仁，集资10000墨西哥鹰洋，购买了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香港中环创办了中华印务总局。利用同样的印刷设备，次年1月5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同年6月，容闳等在上海创办《汇报》。

王韬给这份报纸取名“循环”，表达了他的循环史观。他坚信，中国通过变法图强，能够再度崛起。《循环日报》仿照西方报纸体例，除星期日以外，每天出版。每天该报首栏要发表政论文章一篇。同一般性纯为牟利的报纸相比，王韬注意舆论足以影响群众的一面。《循环日报》的政论文章1883年曾单独结集出版。王韬深知作为商业社会的香港，民众最关心的是什么。王韬深知最新市场价格和船期公告对香港这种商业城市至关重要。因此，经济版都编排在前面，而且篇幅多于一般消息栏一倍。这种经营策略上正确的抉择为报纸带来很大的收益，也因此保证了《循环日报》的独立——如众所知，经济独立是言论自由的前提。

那时，尽管清政府推行极端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新闻舆论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但王韬仍企图使报纸承担起对政治领域的批

评作用。他建议说,中国驻外使节应有翻译西方报纸的人才,把重要文章译成中文递送总理衙门,这将使得中国在外交上知己知彼,大有裨益。他还设想中国应能在对外事务上设法直接影响西方舆论。具体的做法就是中国在欧洲发行西文报纸,这样,一旦西方列强待中国不公,就能通过西方公众舆论对有关政府施加压力。

王韬最早认识到,报纸可以成为官方消息与公众态度之间的桥梁。他举伦敦的《泰晤士报》与巴黎的主要报纸为例,说明如果报纸编排得当并广泛发行,便能影响事态发展,并有效地阻止当政者权力滥用。

1884年,王韬结束了长达23年的政治流亡生活,从香港回到上海。不久即与《申报》发生关系。《申报》是1949年以前历史最长的一份报纸,由英国人美查创办。王韬的女婿钱昕伯是《申报》的主编,该报此时除经常发表他的诗词,还为他排印出版了文言小说《瓮牖余谈》等。最后一部书先在《申报》下属的《点石斋画报》连载,著名画家吴友如为其配画,后来才结成书册。他与《申报》的关系既是如此密切,后来有人附会他曾任《申报》总编纂,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以后,王韬还为《万国公报》写过近四十篇的政论文章。1897年,王韬孤独地死去。他一生持言论报国的态度,并且有了成熟的新闻出版思想,对后来的中国报人影响深远。可谓是中国新闻界的先驱。

王韬同时的报刊政论家尚有郑观应。郑观应1841年生于广东香山,科场失意以后就投身商业,曾参加过改良派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政治活动。他的政论文章多数发表在19世纪70~80年代香港的《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和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地出版的《中西见闻录》等报刊上。这些文章后来辑成《救世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书,尤以《盛世危言》流行最广。

王韬以后,梁启超实执报界牛耳。

1895年6月,梁启超主持《中外公报》,这是维新分子事业的

发端。经费袁世凯捐金五百,其余各界捐款计得千余。当时北京连印刷机器都没有,《中外公报》用的是木版雕印。每天一张,除了论说一篇,并无新闻。梁启超每天主持写短文一篇。当时风气未开,不望有人订阅,就雇人分送给各大官邸。虽然这份报纸不久被查封,梁启超的文名由此为人所知,也就是在办了这份报纸以后,他办报的心情迫切起来。不久,他应邀至上海任《时务报》主笔。

1896年,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创办《时务报》于上海,该报发刊以后,行销海内,有万余份的发行量。梁启超任总撰述,他的《变法通议》即发表于此时,“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这样虎虎生气的文章,正代表了青年梁启超激进的态度。

《时务报》刚刚创办时,销路如何殊无把握。创办者之一汪康年尚在首鼠两端,经梁启超力劝,谓报纸倘能销4000份,即可支持,才决定留下。不料第一年的销量就到了8000份。各地开明官绅为《时务报》发行帮了很大的忙。须知当时民气未开,能够自觉地关注言论的民众尚不多见。上智之士的引导很是必要。《时务报》风行之后,梁启超声名亦因而鹊起。他当时不过二十多岁,已经被人们康梁并称了。

梁启超因言辞激烈,与张之洞抵牾,愤然离去,《时务报》即由汪康年一人周旋。1898年5月,御史宋伯鲁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奉旨由康有为督办。汪康年拒不交出,他当即刊登启事,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一切体例,仍如《时务报》。这实在是新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因为在专制的体制下,言论官办,惟一的效果就是使得人民的喉舌成为王之爪牙。

戊戌政变发生以后,梁启超遁逃日本。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创办的《清议报》出至100期,为时3年。

在《清议报》第一期《清议报叙例》中,梁启超谈了该报的发刊宗旨:

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这份在海外创立的报纸因没有后顾之忧，正所谓“光棍”者流是也，攻击慈禧、荣禄等人不遗余力，但是《清议报》看重“立”甚于“破”，对于发刊宗旨，《清议报》还是坚持的。以“发明东亚学术”为例，在该报第35、36期，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概念和“新思想、新语句、旧风格”的三点主张。梁启超在1900年诗云：“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这种抱负，真可炳照后世。

《清议报》以“广民智、振民气”为标榜，把“倡民权、衍哲理、明政局、厉国耻”当作办刊目标，创刊数月，发行就达到3000多份。但是因《清议报》激烈攻击西太后，清廷下令严禁进口，这就使得发行量受到限制，即其最盛之时，销量也没超过5000份。在内地，还出现了抬高报价的事情。独裁者们对于《清议报》又恨又怕，外强中干即此可见。

梁启超所创办主持的各报中，《新民丛报》最为成功。他的文风影响了一代人，被称为“新民体”。这份1902年创刊的报纸出版周期为半个月，正是这份报纸，奠定了梁启超在近代新闻出版界不可动摇的地位。

梁启超述其宗旨云：“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我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本报为我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

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同《清议报》时期动辄谈“我党”如何，痛骂西太后等人的情形相比，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可谓完全成熟。新闻必须于政治之外谋求自身的独立，这成为《新民丛报》办刊的一大特色。

《新民丛报》第一年中所登的文章，大率出诸梁启超之手。他每人必定要写 5000 字以上，传说他经常是左手打麻将，右手笔走龙蛇，写《新民丛报》的评论文章。第二年以后，才陆续聘请人来分担著述。先后有蒋智由、马君武、康有为、章太炎、麦孟华、杨度、徐佛苏等，其中不少是《时务报》、《清议报》时期的旧人。

《新民丛报》本来极力鼓吹自由平等、民权革命。但是 1904 年以后，梁启超不再谈论种族革命，而专讲政治革命。他表示，不再主张“极端之破坏”，“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这样，就跟革命党人产生了矛盾。革命党人的报纸《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梁启超以一人之力，对抗《民报》群雄，怎奈革命党人的影响越来越大，梁启超的立宪论最终不敌革命论，在这以后，《新民丛报》销数大减，加以经济压力，人力缺乏，终于停刊。

《新民丛报》以后，梁启超又陆续创办了《新小说》、《政论报》、《国风报》、《庸言报》等报纸，但是他的全盛期已过，虽仍有影响，较诸畴昔的海内风行，终不可同日而语。

梁启超认为，报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低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报纸文章自身的弊病。他针对报界积弊，提出“公、要、周、适”四点原则：

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模棱，实鉴乎挟党见以论国事，必将有辟于亲友辟于所贱恶，非惟自蔽，抑其言亦不足取重于社会也，故勉避之。

以要为主。凡所讨论，必一国一群之大问题。若辽豕白头之理想，邻猫产子之事实，概不置论，以严别裁。

以周为主。凡每日所出事实,其关于一国一群之大问题,为国民所当措意者,必次论之。或著之论说,或辍以批评,务献刍蕘,以助达识。

以适为主。虽有高尚之学理,恢奇之言论,苟其不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则其言必无力而反以滋病,故同人相勸,必度可行者乃言之。

这四点原则,同后来《大公报》奉行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前后相映,体现了近代报人独立的精神世界。

梁启超投身报界期间,不受威胁,不为利诱,坚定地捍卫着言论的独立。1915年,袁世凯阴谋改制称帝,梁启超闻此事夜难成寐,他当即草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给女儿的信中,他说:“我定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不复能属文耳。”在这篇文章还没有发表时,袁世凯预感到梁启超会有意见,就派人送来大洋20万元,让他不要发文,遭到拒绝以后,又来威胁他说,你亡命十余年,不想过两天好日子吗?梁启超回答说,宁愿亡命,决不苟活于污浊的空气下。文章见报后,梁启超发一通电说:“启超一介书生,手无寸铁,舍口诛笔伐外,何能为役,且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仰天下固多风骨之士,必安见不有闻吾言而兴者也。”这种气概,是可以为报人矜持的。

梁启超的诗友狄葆贤,也是在报界与其遥相呼应的亲密战友。早年,狄葆贤自日本归国,与《湘学报》主笔唐才常在上海组织中国独立协会。他们不忿戊戌变法惨遭失败的结局,谋图起义。中国独立协会对外宣称是东文译社,以掩官厅耳目。唐才常的起义最终遭到血腥镇压,这是近代史上很有名的一次事件,也可算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勤王运动。起义失败后,狄葆贤对武力运动丧失了希望,而把一腔幽愤,都寄托到言论报国之上。狄葆贤,名楚青,号平子,他在上海创立《时报》(1904年),于报馆中建了一座宝塔式的建筑

——平等阁，因自署“平等阁主”。《时报》在他经营期间，朝气蓬勃，在内容上多所创新。聘请陈冷为主笔，开头设时评栏，分版讨论。1904年冬，为粤汉铁路建筑权问题呼号，次年为美国虐待华工，劝国人制造国货，购买国货。1916年，日本用“二十一条”要挟，《时报》提倡救国储金，借众力以振兴实业。《时报》影响很大，胡适就承认他年轻时受过《时报》很大的影响。

可惜30年代末期，狄葆贤把《时报》卖给了上海大地产商黄伯惠。该报日渐降格，终于沦落为依靠花絮新闻、强奸凶杀等招徕读者的小报，最终被市场所淹没。

2. 革命派报人和报纸

中国新闻史上，革命派掌握言论的时间同启蒙派相比不是很长，但影响也很大。1899年，在香港出版了《中国日报》，这是最早宣扬革命的一份报纸。发表的“民主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在当时实可谓是惊世骇俗，“左得可怕”。继之而起的有《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广东报》、《有所谓报》、《少年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天铎报》、《复报》、《民报》、《二十世纪新支那》等，皆提倡民族主义，鼓吹排满。《苏报》以文字贾祸，成为近代著名大案。

《苏报》于1897年创刊，本来仅是外商投资而由胡璋（铁梅）经营的小报。为了自由度更大一些，以胡的日本籍妻子生驹悦的名义在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

后来，陈范（梦坡）出资，购得《苏报》的股权。陈范曾经做过江南知县，因为教案而遭到撤职处分，十分痛愤晚清官场的腐败，想借言论报国。他开始属于保皇派，后来逐渐倾向革命。陈范聘请吴稚晖等人做主笔，气象为之廓开。晚清著名的革命团体光复会是吴稚晖、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组织的，这样，光复会就借《苏报》来鼓吹革命，光复会的会员徐锡麟、马忠汉、陈伯平、秋瑾等，都是《苏报》的重要撰稿人。

陈范接办《苏报》以后,即从1902年起增设“学界风潮”栏目,开始宣传革命。当时,经过义和团运动、辛丑和约等折腾,俄国拒不立即从东北撤军,举国愤激。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在上海创设中国教育社,不久又成立爱国学社,收容被驱逐归国的留日学生以及参加学运而被开除的南京陆师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学生。《苏报》约章、蔡等七人轮流撰稿,每月付百元报酬,来补助爱国学社经费。《苏报》的这一义举是它与光复会人士发生关系之始。

1903年5月,章太炎任《苏报》主编,《苏报》更走向言辞激烈、大胆议政的道路。在《驳康有为政见书》一文中,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令部计”这样的话,而介绍邹容所著《革命军》,该书当中有“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刮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这等恣肆的文字。正因为《苏报》介绍了《革命军》,而该书序又是章太炎所作,早就对《苏报》视如眼中钉、肉中刺的清朝政府有了借口,决心借题发挥,一举查封《苏报》。清政府责成大学士张之洞,湖广总督端方以及两江总督魏光燾主持其事。他们通过上海道,命令会审公堂立出牌票,说:“奉道宪密札,奉苏抚宪札,钦奉电旨,查有上海创立爱国学社,招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形同叛逆,着严密查拿等因钦此。札道拿办。并先奉南洋大臣谕,沪上各报内,《苏报》近更狂吠,愈无忌惮,着即拿办。转飭密派干役,将单开各要犯分别严拿,务获禀办,毋稍泄漏疏虞,致被免脱。一面答差协捕,立将苏报馆严行封闭等因奉此。除另单发封苏报馆外,合飭密拿,仰即协捕立提后开人等。限即日解候讯究,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以上苏报馆主笔,章炳麟、邹容、龙积之,以上伪作《革命军》匪人,陈范即陈梦坡,苏报馆主。以上七名,该差不动声色即行按名拿获,解究毋延。”(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清朝政府预先收买了《新闻报》主持人福开森,与租界当局勾

结,封闭报馆,并逮捕章太炎、邹容、龙泽厚、陈吉甫等7人。陈范适因事赴日本,其子仲彝被捕。蔡元培闻风逃到青岛。但是《苏报》是在日本总领事馆注册的,又处在租界,按照当时的规矩,清政府没有直接审判的权力。审判权属于会审公廨。慈禧太后下令,一定要跟领事团交涉,将《苏报》案诸人引渡。领事已经有人同意了,幸好西洋各报一致反对,以至于英国大使萨道首先倡议,说:“《苏报》诸人,当在租界鞠讯,断不可交与华官。使果有罪可据,则加以应获之罪,亦不能出租界一步。”英国蓝斯庚侯爵在上议院答施宾塞伯爵说:“此次诸人,因刊登激烈之词于报纸,以致逮捕。予尝一读其译文,亦不能不称其为最激烈最勇猛之议论。按彼等所以为上海工部局所拘获者,因工部局受上海当道之促迫,不得已而出此。故与华官订定,诸人当在上海租界之会审公堂审判受罪。迨其中二人既经公堂辨明之罪,则吾等亦不能不照华官所定之约实行之。乃清政府忽有将诸人交出之要求,吾等惟有坚持方针,不为所移。并须寄语吾国之审判此事者,亦当力拒其要求也。上海各领事之意见,虽属可疑,但吾等自知其决不致孤立。夫华人之正法于北京者,受惨酷之刑罪,其野蛮人之情状,贵爵当亦知之熟矣。由此观之,目前所论之案,虽有一派人主张交诸人于华官之手,吾等决不当附和之也。当党于此派之领事官,吾亦不敢谓其必居多数也。”(《中国报学史》第131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报》案件影响很大,以至于英国众议院来讨论这个问题。英国议员之所以会力主不将《苏报》案诸人移交清政府,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一移交清政府,《苏报》案被捕者必死无疑。而言论自由,都是英国报界所一贯主张的,在报纸上发表“最激烈最勇猛的议论”绝到不了死罪。

与此同时,美国当时的外交部也命令它在上海的领事,不得将《苏报》诸人交给中国官员,并将主张引渡的上海总领事古纳调任。

但是,租界也不能不照顾到中国政府的脸面,于是组织额外公

堂，派上海县会审，清政府并且聘请律师，对簿公堂，立意要将《苏报》诸人定罪。他们申诉的理由是“登报大逆不道污蔑公上”。被告也请律师出面为其辩护。这件案件总共审问四次，中国官员同会审公廨、英国副领事双方都作出让步，议定钱允生、陈吉甫两名报馆办事人员开释，陈仲彝是陈范之子，准许交保。龙积之押候湖广总督谕示。惟有章太炎与邹容定为永远监禁。然而，这个决议领事团并不完全同意。于是，又在北京进行多方交涉，至次年3月，才改判邹容监禁两年，章太炎监禁3年罚做苦工，限满开释，驱逐出境。龙积之与此案无甚关系，准予开释。

邹容不幸于1905年出狱前病死，章太炎则于翌年出狱后即东渡日本，主编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这样，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才告一段落。然而，正如上海县的谕示中所说，照从前的规矩，章太炎、邹容等属于谋反大逆，并有叛国罪名，应当“不分首从”，皆要凌迟处死或斩决。只是因为西方列强的态度，才使得清政府的毒手未能伸至租界。这是两种文明的对话，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苏报》案并未就此了结。这件案子的主犯是章太炎、吴稚晖、蔡元培、邹容。蔡元培闻风逃往青岛，而吴稚晖却也得以漏网，并且在章、邹二人人狱以后，还能去探监，这就伏下了章太炎与吴稚晖后来笔战的缘由。章太炎怀疑吴稚晖向清廷告密，认为他卖友求荣，因此后来专门写了一篇“与吴稚晖谈‘苏报案’”，加以驳斥。

《苏报》案中还有一个物值得一提，他就是晚清著名诗人俞明震。俞明震曾任南京陆师学堂总办，是章太炎的老师，当时担任江苏候补道。他自告奋勇，在清廷准备对《苏报》下手之前，到上海同上海道袁树勋主持其事。是他故意放走了蔡、吴二人，也为吴、邹二人上下斡旋。《苏报》以后，上海又创刊《国民日报》。这份报纸是由《苏报》中人发起，外人高茂尔出面。清政府一方面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另一方面又命令邮政局不得代寄《国民日报》。但

是，邮政方面的答复是，这样禁寄，防不胜防。弄得清政府相当尴尬。

1905年，蔡元培等又组织了《警钟日报》，以金少甫、刘师培为主笔。清廷通过德国领事，致函会审公廨，希图拘捕金、刘二人。结果报中要人事先均得到风声，会审公廨只得把几个不重要人物监禁了事。

革命派的报纸当中，1905～1906年间创刊的《复报》与《民报》，因为是在东京发行，文字之激越愤慨，尤远胜于以上各报。《复报》由刘师培编辑，《民报》编辑开始是张继，章太炎出狱东渡以后，就由章充任。《民报》的执笔有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其主义以中英文刊于该报最显著版面：（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土地国有；（三）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四）建设共和政府；（五）主张中日国民的联合；（六）要求各国赞成中国之革命事业。孙中山先生为《民报》撰写了发刊词，提出三大主义：曰民族、民权、民生。革命派的报纸当中，于佑任所办诸报亦可彪炳千秋。《神州日报》从1907年创刊，到1927年停刊，在上海报坛影响很大。于佑任主事其间仅只两个月，却使得该报数日之内，发行量超过万份，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畅销的报纸之一。《神州日报》与同盟会关系十分密切，发起人当中于佑任、杨笃生、庞青城等都是同盟会会员，而邵力子在该报创刊后不久也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先生指示，要于佑任把《神州日报》办成革命的机关报。并以此为基地，联系“东南八省”的“党务”。这份报纸同教育界关系也很密切，因此在知识分子中反响很大。该报以“上中社会”为主要对象，读者群尤其定位在学生和军人。对于国内各学堂、各省军营均长期奉赠一份，以供公共阅读，而个别的学生订户实行半价优待。目的当然是为了宣传革命，赢利远在其次。1907年5月8日，福州路祥兴琴行失火，延及《时报》馆，《神州日报》所有主笔房、排字房、机器房及其中的访稿、存稿、藏书、藏报、藏纸、印机、铅字、铜模均化为灰烬。但是，仅仅过了一天，

《神州日报》又恢复了出版。开始几日委托商务印书馆代为排印,每天暂出一张,全部赠阅,因事先投了保险,不到一个月,就基本恢复了正常。

于佑任时期的《神州日报》,对宣传同盟会的革命思想、革命主张起到很大作用。1907年,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发动了好几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其中钦廉、黄冈、惠州七女湖等三次起义,《神州日报》均有详细报道。

《神州日报》在宣传革命思想的时候很注意策略。首先,它表现出调停的立场,不把政治主张表现得剑拔弩张。在对革命党及清廷的称呼上,它不显示鲜明的爱憎,一般情况下,称革命者为“党人”、“革命党人”或“孙党”,但对个别来稿及外电中的“匪”、“匪党”、“乱党”等则一仍其旧。它也刊登上谕、奏折等官样文章。其次一点,对于革命活动,《神州日报》从不作正面报道,主要靠公布各级政府机关发布的通报、函电及转载外电和外报的报道。

3. 元老记者于佑任

作为革命派的机关报,《神州日报》同时还兼具揭露社会黑暗,为民众代言之功能。在对于这些问题的揭露上,《神州日报》可谓不遗余力,对于官僚们,它不惜用这样的字眼:“无恶不作”、“欺诈苛索”,揭露出监狱“私刑之惨,有过于上断头台”,“监所内之污秽,如豕豕之所”。它斗争的矛头,甚至直接指向庆亲王奕劻。

于佑任在《神州日报》仅呆了80天,却把这份报纸推向了最高峰,作为近代最有影响的报人之一,于佑任的事业是从这里开始的。继《神州日报》以后,于佑任又经营了《民呼报》、《民吁报》与《民立报》。宋教仁在《民立报》署名渔父,文章最为引人注目。

这三份报纸当中,惟有《民立报》寿命最长,影响也最大。虽然主张比较激进,但是却没有叫嚣的习气。所有宣传,都注重论证,理论折服力相当强。

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于佑任素有“元老记者”之称,这与他奋

力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及《民立报》的业绩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在办报过程中所倡立的重理智而不重情感和不求同的思想，成为后来报业界的楷模。他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国民党的左派人士，与他办报过程中所形成的民主思想不无关系。

于佑任在投身政界以后，即与报人生涯告别了。但是他忘不了这段生活，几十年后，他仍津津乐道。1945年1月12日，他应中国新闻学会邀请，作了题为《我还想做新闻记者》的讲演：

“今天中国新闻学会要我到这里来讲演，事前并要我宣示讲题。我离开新闻界已有30余年，在今天回忆起来，在30年前，我因为革命的需要而离开新闻界，并离开上海到北方去，虽然在革命整个计划上，有一点贡献，但是在我新闻事业的立场上，至今我还深悔那时候离开得太失策，至今没有完成我在新闻上的志愿。说新闻事业是国家进步及民族文化解放的神圣事业，一点没有夸张。新闻事业值得称为神圣的，在国家进步及民族文化解放的意义上真是超绝的利器，世界上哪一个新闻事业机关的成功，里面必有许多志士仁人在那里努力。这许多志士仁人，能够立志做新闻事业，同时也是治国平天下的人才。我今天回想起来，与我在新闻界共事的人，多数已成仁而去，我现在所愿留此余生以努力的，就想完成当时许多新闻界志士所未竟之志。

今天我的讲题是《我还想做新闻记者》。各位一定要问我是什么原因，我的答复极简单，因为欣羡新闻记者：我的耳目，我的手足，还可以贡献于人群，所以我还想做一个记者。新闻记者是可以欣羡的，尤其是今天的新闻记者的材料太丰富了。像我一个离开新闻界甚久的人，在日常见闻中我能体会到这种局面。

按眼前的情形说：第一可以欣羡的是随军记者。在去年6月，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的当儿，最初我们在报纸上看见片段的报告。后来在电影中看见“一鳞半爪”，数千架飞机，上千条船舰，真是世界的壮观。我们心目中的壮观是意会的，但是当时许多随军记者

是亲历目击的。记得去年有一天，一位新从欧洲回来的记者对我讲一段参加大西洋护航队的故事。上千条的船只中有航空母舰、军舰、商船，上面有飞机，海底有潜水艇，一次护航航程中，总遇见几次战斗，那战斗真是壮观！我对那位记者的讲述，真是心向往之。这几天美军在吕宋岛仁牙因湾登陆，我看见报上的记载，便想到此中必有许多随军记者在那里参加，他们的心胸眼界，何等幸运！他们随着麦克阿瑟将军登陆，是何等的威风！我们远征军中，年来有许多青年记者驰骋于丛林旷野之间，或随机轰炸，如果我是一名记者，至少我有这个幸运的可能。有志的青年男女，为什么大家不追逐这一个可喜的幸运呢。

其次可欣羡的，是随着空军出去轰炸我们的共同敌人，其余每天随着第几航空队到敌前敌后去轰炸，我们仿佛可以报答国恩与亲仇，长风万里，杀敌致果，惟有今日空军的随军记者可以有此气概！

其次可欣羡的，是派到外国的若干政治记者或外交记者。不但足迹游踪，遍及名都大邑；交际范围，可以无所不包。有外交官的利便，而无外交官的拘束。驻在国的政治首领，有机会约在周末去打球或钓鱼，或约去参加他们的家庭晚会，其他学者名士，工商巨子，劳工领袖，无不可以自由交往。我们赤心为国，一个驻外的记者，不知可替国家做多少有益的工作，无形的贡献。

其次可欣羡的，如派在殖民地或穷荒地带的记者，我们可以看见多少痛苦的、享乐的情形，及许多奇异习俗，珍禽异果，若有机会随着探险家到荆棘丛莽、冰天雪地中去辗转，更是何等开阔。讲到国内，在今天的抗战大时代中，假使我们做一名战地旅行记者，做一名出入沦陷区的记者，做一名哪一部门的专访记者（尤其是农民工人方面），哪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大大发挥，替国家作一番重大的贡献。以上所说，多半偏重于外勤方面。

至于内勤方面，现在一篇社论，一条特殊的新闻，几行专栏特

第四种权力

写,我们报纸上早晨登出来,到当晚可以在世界各国大报上转载,或引起评论反响。七八年来我们报纸上的社论、内容与范围,不知比以前进步多少!我们的评论记者与专栏记者,都可以与外国报纸并驾齐驱,这是时代进步的鞭策,使我们各部门的记者不能不奋勉。

现在我们的记者,但患自己能力学识不足,不患不能成名……今天记者的名,是世界性的。今天的名记者与世界大政治家、大实业家,可以分庭抗礼,精神上可以得着同样的尊荣。讲到这里,真是心花怒放,眼前光明,记者的天地,哪一个人也比不上他,个人的畅快,同时也是国家的帮助。

各位在场的记者先生,那种开阔的天地是属于你们的,那各种可喜的幸运是属于你们的,我欣羡你们。我虽离开了新闻界30余年,所以还想做新闻记者。

新闻记者永远是前进的,……我离新闻界虽然甚久,但是,这种精神未尝稍变。我盼望我们的新闻界永远随着时代前进,照近几年的现象,确实现在的新闻界样样比过去进步。我可以附带讲一点30余年前我的记者经验。在我初办《神州日报》时,中国新闻界的内容实在贫乏得很,我们要想参观,也没有地方可以一观的,设备则一切条件都是简陋的。百无办法时,同邵力子先生往日本去调查,归时约杨笃生先生主持编辑,我可以分出许多时间去发展报馆业务。后来,在《民呼报》、《民吁报》的时代,真是困苦不忍回忆。一个报馆的事,从筹款、购置、编稿、写社论,上版,外面交际应付,都要随时照顾。在《民吁报》时代,我被捕房判决逐出英租界,我住在西门,每天上午要到吴淞复旦及中公两校去教书,回到法租界已近傍晚,一切的事都要料理。到后来《民立报》时代,人才是算盛极一时,有宋教仁、马君武、邵力子、吉楚伦、李孟符、杨千里、徐血儿、汪允中、吕志伊、范鸿仙、张季鸾、李浩然诸先生,《民立报》的国外电信,欧洲日本美国都有专派记者,仿佛今日报馆的海外电信网。记

得当时上海英文《泰晤士报》，还每月订购我们的海外电信稿，当时《民立报》驻英国的记者就是章行严先生。辛亥革命时，章先生首先打一个电报回来，说英国舆论主张对中国内政不加干涉，当时在国内革命进展上有极大的影响。

在我的记者生涯回顾上，我当时在报馆所做的工作，除了排字以外，可以说什么都做过。当时我们觉得做新闻记者的天地宽大，30余年来我的想法与体会，还是如此。后来我因为军事而脱离新闻界，现在抗战快要胜利，我真是还想做新闻记者。

《民立报》创刊词中有两句话：“有独立之言论，然后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然后有独立之国民。”当时这几句话是传颂一时的。现在世界高唱“新闻自由”，新闻界尤其拥护新闻自由的原则。我想“自由”与“独立”系相互有关系，无自由不能独立，不独立亦不能自由。国家有自由，言论方有自由；言论有自由，人民方有自由。心胸广大的各位记者先生，必能体会此中的因果关系。

抗战到了8年，我们检讨政治与社会各部门，新闻界是充满了新的气象，并且达到相当的成功。在前几年敌人对我滥施轰炸，大家叫着疲劳轰炸，哪有人知道社会中最疲劳的职业莫过于新闻界。新闻界全体从业人员，昼夜24小时不停止地工作，为的是对国家效忠服务。疲劳轰炸没有挫折我们新闻界的意志，没有使全国的报纸停刊！

5年前重庆各报联合版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光荣纪录，七八年来全国新闻界全体从业人员所表现的，真是“智”、“仁”、“勇”，三者无所不包。旷观大势，努力学问，与时代俱进，此是“智”；对内宣泄民隐，对外维持正义，扶弱抑强，此是“仁”；不避危险辛苦，参加战斗，随军前后，在绝危险中照常工作（从南京撤退时起，各地最后撤退者，必为报馆），此是“勇”。有此三者，岂但新闻界之荣，亦国家精神上最珍贵之收获。在我对诸位欣羡之余，把这一篇送给各位，多谢各位的光临，敬祝各位前途的成功，歌呼我们的新闻事业，在

艰难困苦中，节节步入新的时代。”

两年后，在复旦新闻馆落成典礼上，他以《新闻自由万岁！中华自由万岁！》为题发表演说，这在国民党已经走到日暮途穷的地步下，不啻于洪炉煅铁，其声至宏至大。他认为：“独立自由的精神，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近代的文明与进化，都由独立自由的精神产生出来。而现代社会中的新闻事业，便是推进与培养这种精神的。“在陆海空军以外，另有一种力量不仅维持世界秩序，而为维持世界和平，并且鼓励世界和平，创造世界和平。巨响一震，世界皆响，声浪所播，光明所射，尤为广大悠久，受人类之歌颂。此种积极力量，就是新闻的力量”。无论在实绩上，还是在思想上，于佑任均不愧为近代报界元老级人物。

4. “无冕之王”血谏民国——昨天的名记者

提起民国，除了连绵不绝、哀鸿遍野的战乱，除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闹剧，最让我们不能忘情的，是还曾经有那样一批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以殊死的抗争，为那个黑暗的社会增加了一点亮色。许多人倒在血泊之中。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活得比今天还舒适、还风光，然而，他们却没有选择这样的生活。为了正义，为了良知，他们带血的呐喊，穿过世纪的风风雨雨，一直响到今天，轰然于我们还没有麻木的耳畔！

杨乃武鲜为人知的“文字之祸”

发生在清朝末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人人皆知，但后来的杨乃武又怎么样了？他生活得好吗？

1877年（即清光绪三年）12月在浙江省余杭县枉法知县刘锡彤严刑威逼下，屈打成招的杨乃武，经过刑部大堂的审讯，得到平反回家后，虽然受了严刑，经过调养后身体还算健康。《申报》董事长美查，因他素有刀笔之能，于1878年聘请他担任《申报》主笔之职。进入报馆不久，又因一篇文章得罪了钦差（驻英大使郭嵩焘）被迫离职，这件事对他打击非常大，从此一蹶不振，孤独悲凉地度过

了后半生。1878年7月19日,《申报》发表了摘自《字林西报》的一篇文章《星使驻英近事》(星使指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文中报道:郭嵩焘在请英国画家古曼画像时,闹出了很多笑话。郭嵩焘坚决要求画师把两个耳朵都画出来,“若一只耳,观者不将谓一耳已割去耶?”当画师说画不出花翎顶时,他就把官帽一起画进去。画师请他穿上朝服,他竟一本正经地说,要是我穿上朝服,恐怕你们的国民见到连叩头礼拜都来不及了。文章发表后,报纸传到北京,清朝专管各国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的稍有国际知识的官员,认为郭嵩焘这种神态,大失身份,便对他进行函电责备,使得郭嵩焘惶惶不安。同时,刊出这篇文字的《申报》也传到欧洲,驻英使馆见到了《申报》,权贵们不禁大怒,一面请清朝驻英大使馆内任参赞之职的英人马格里电函《申报》更正;另一方面则追查这篇文章的来由。《申报》馆接到马格里的更正函后,方知这篇文章触犯了钦差大人。更正函的前面有批评《申报》主笔之词,但为把报纸继续办下去,只好将更正函原文照登。更正函发表后,郭嵩焘仍竭力追究那篇文章的来源。这篇文章译自《字林西报》,由主笔杨乃武经手编发。但报馆认为,报纸有客观反映事件的自由,为避免祸延主笔杨乃武,因此对凡来追查的人谎称译自《欧卧阑报》。郭又派人到该报查询,当然查不出来,郭威胁《申报》:“如不交出西报译文底稿,后果由《申报》负责。”杨乃武此时已成惊弓之鸟,被迫离开主笔的职位回浙江老家了。适巧郭奉命离任回国,总算没对《申报》再纠缠下去。《申报》馆全体工作人员深恐杨乃武再遭“累继之罪”,虽然杨已离开,但对外均不谈此事底细,外界也不知杨离开《申报》的原因,直到事过境迁后,才为少数人所知道。

——1939年的“国际间谍案”

被关在军法处听候处置的香港《星岛日报》驻重庆特派记者王研石等十几名新闻记者,怎么也弄不明白,民国政府为什么要把他们关押起来,还以“间谍罪”为名。基于爱国之心,他们为抗战宣传

作出了很大贡献,怎么会做“间谍”去卖国呢?

1939年4月初,国民党军统局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逮捕了一批记者。其中有王研石、苏联塔斯社驻重庆记者舒宗桥、美国合众社驻重庆记者王公达、重庆《新民晚报》记者刘自勤、《时事新报》黄卓明等。他们先被关在校场口司令部稽查处的看守所,后又在军统机关里关了一阵,3个月后,又被转到军法处,自逮捕以来,从没有人审讯过,这究竟为什么呢?

1939年,国民党在日军攻击下,节节败退,退到四川,定重庆为陪都,人民流离失所,痛苦不满,一些中外记者纷纷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香港《星岛日报》、塔斯社、合众社等媒介都有国内记者发表的、引起重大反响的报道。在四面楚歌声中,国民党对“洋人”不敢下手,于是在这些新闻媒介任记者的中国人便首当其冲了。这些记者被关押,各国驻华大使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谴责抗议,要求立即放人。国民党政府对外国人的压力无计可施,再加上丁佑任、邵力子等人的说项,这些记者在被关押了半年后,全部释放。

——蒋介石“永不录用”的陈德徵

1942年冬,重庆,陶百川被任命为《中央日报》社长,顾念旧情(陶在上海市党部时曾由陈德徵提拔),派陈当了一名挂名的主笔。不久,因为《中央日报》透露了一件外交机密——英、美等国在战后准备交还租界,本来相约盟国同时发表的,《中央日报》先发了,引起英美使馆的抗议,蒋介石下令严查,并把《中央日报》的名册调去审查,看看有无可疑分子混杂其间。当他看到陈德徵的名字时,又勾起了十几年前的余怒,特在上面批了两句话:此人尚未死乎?着各机关永不录用。御批一下,陈自然又失业了。赖有一同乡在重庆开一纸张文具店,请他去当司账,才得了一个饭碗,可见其悲凉。他怎么会把蒋介石得罪了呢?

1926年北伐开始,邵力子和叶楚傖都到广东当了大官。《民国

日报》由陈德徵掌握编辑大权,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陈除了任《民国日报》总编辑外,还在上海市党部和文教机关任职。一次,《民国日报》发起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竟是陈德徵,第二名才是蒋中正。这一下闯了大祸,蒋总司令赫然震怒,借故把陈押解到南京。几个月后,人虽释放了,却得了个永远不得重用的处分,由此跌入十八层地狱。这是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一书所述。顺着这条线索,研究者查阅了1926年、1927年、1928年、1929年的《民国日报》,除1929年8月18日有一则民意测验的小消息外,再也翻不出其他线索了,百思不得其解,但又猛然醒悟,民国时期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何况70年后的今天?

——陈其美被杀

1916年5月,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被迫不做皇帝的袁世凯(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亡)在总统办公室内,来回地走着。他的神情急躁、不安,身上不停地出汗。什么事情让袁世凯如此伤神?原来,他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

他放眼全国,屈指细数,在辛亥革命起义将领中,惟一不能令他放心的只有西南的实力派蔡锷和中华革命党的“惟一柱石”陈其美了。袁对陈70万元大洋利诱亦告失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个“无毒不丈夫”。时下陈其美经费拮据急于筹款,且疏于防范之机,派人设圈套,刺杀了他,然后给刺杀凶手赏银13万元。

1916年5月19日,上海各家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一条举国瞩目的消息:陈其美于昨天傍晚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寓所被刺身亡。然而,陈其美因何被袁世凯派人刺杀?是谁干的?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他的政治背景:

1909~1910年,陈其美先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并协助于佑任、宋教仁等主办《民立报》宣传革命。此后,公开以《民立报》采访员身份进行活动。在反袁斗争中和黄兴、宋教仁等共同成为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和主要助手,成功地领导了辛亥上海

起义，同时在袁世凯驻有重兵之地的上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策划了刺杀郑汝成（上海镇守使，袁世凯坐镇江南的悍将）和肇和舰起义（袁政府海军的主要力量，长期驻沪）的重大事件，打击了袁世凯，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肇和舰起义后不久，蔡锷、唐继尧等联名宣布云南独立。陈其美的反袁活动，引起袁世凯的仇恨。

《民国日报》在吊奠陈其美的第二天，发表了陈其美归葬哀辞：“天不死公于广州，不死公于上海，不死公于袁逆朝夕受戮之时。吾疑公盖为靖难而来，靖难外无所恋于天地耶。”真是字字落地有声。在其安葬仪式上，来自全国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哭声一片。陈其美之墓就筑于浙江湖州城南碧浪湖畔，墓碑正面刻有“气壮山河”四个大字。

——《苏报》案：邹容屈死狱中

1903年6月30日，一队警察与巡捕神情严肃，匆匆来到上海南京路泥城桥福元里爱国学社。他们的到来，拉开了清末民初最大的案件——《苏报》案的序幕。

案件的主角邹容，时年19岁，英俊倜傥少年。他在《革命军·自序》中记述了自己的人生简历：“居于蜀十有六年，以辛丑（1901年）出扬子江，旅上海，壬寅（1902年）游海外。”邹容在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的方言馆学习日语，而后赴日本，进入同文书院学习。留学期间，读了卢梭、孟德斯鸠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革命激情像火焰爆发。他开始写《革命军》，并多次参加学生运动，清政府驻日公使密谋制裁邹容，在朋友的劝告下，他于1903年4月返回上海。回上海后，住进南京路泥城桥爱国学社，与《苏报》主编章士钊同一宿舍，他和上海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最密切的是章太炎（炳麟）。同时，也写完了那篇著名的《革命军》。《苏报》于1896年6月26日在上海创刊。原为日办报纸，1900年，由曾任江西某县县令、后革职寓居上海的举人陈范接办，倾向革新。1902年后，该报成为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宣传阵

地，聘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邹容、吴稚晖为撰稿人，该报因宣传革命思想，受到社会特别是东南学界的重视。所发表的文章如《驳康有为政见书》、《革命军》及《客民篇》等最为激烈。驳康文中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令部记”等语，《革命军》中有“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刮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等，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来自上海滩的革命宣传惊动了清廷。6月21日，紫禁城向沿海沿江各省都抚发布谕旨：“查有上海创立爱国学社，招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特令查禁密拿。”工部局立即着手拘捕陈范、章太炎、邹容等7人。7月1日，拘捕完毕。7月7日下午2时《苏报》被工部局正式查封，一切财产没收。封报时，当天的《苏报》已经出版，报上发表了章太炎被捕后所写的《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一文，以激昂的文字表达了反清革命的意志。

《苏报》案的审判在上海进行，因上海是“租界”，外国人和清政府对《苏报》案的处置态度相反，清政府以出卖沪宁铁路敷设权为代价，引渡章、邹两人进京处决，租界当局拒绝引渡。8月5日，英国首相巴尔富在伦敦下议院宣布，他已电令驻华公使：“按照西方法律，个人有言论自由，此案不能判决，《苏报》馆的人不能交于华人审判。”以《申报》为首的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载文章猛烈抨击没有现代法制的封建王朝。经过7次艰难的审判，最后判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两年，罚做苦工，期满驱逐出境，不准在租界逗留，时间是1904年5月21日。1905年2月，邹容不耐折磨死于狱中，年仅21岁。1912年初，孙中山在南京就任大总统，为表彰邹容对建立中华民国的功绩，赠与“大将军”的荣衔。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后东渡日本。此后，邹容的《革命军》开始风靡全国，再版20多次，发行量达100多万册。

——邵飘萍被枪决

民国初年，著名的新闻记者邵飘萍临死前4天在报上刊登了一则《飘萍启事》：“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以后无论如何攻击，不欲再有所言。”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请愿群众在天安门集会后游行遭段祺瑞执政府枪杀，死40余人，伤数百人。第二天，《申报》、《京报》发表“国务院门前之屠杀”、“日英露骨之主张”、“可为强有力之政府矣”等时评，给运动以舆论上的支持，北京政府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3月26日，邵飘萍被政府通缉；4月22日被判死刑。就在全中国各界积极营救时，北京政府在4月24日凌晨5时将其枪决，枪决后，面对前来营救的上万人上竟没有一个正式的理由。

邵飘萍，1912年在故乡杭州与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不久，杭辛斋加入政界，报纸由邵飘萍独立负责，他站在进步一面，揭斥袁世凯政府的种种阴谋。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失败后，《汉民日报》被封，他东渡日本，习政法，并于课余创办通信社，投寄国内报纸，内容多为揭露日本军阀侵略野心（特别是“二十一条”）唤起国民注意。

1916年袁世凯于帝制失败后死，飘萍应《申报》之聘，回国担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时年32岁。他是个风趣机敏，擅长言语交际，时刻都生活在角色中的记者。上达政府首脑，下至仆役百姓，无不乐于与之为友。他的目光时常探入视为禁区的政府内阁。1917年初，府院矛盾激化，在是否对德断交并宣战问题上，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争执不下。3月4日，段不辞而别出走天津，黎元洪被迫妥协，段于3月7日23时回到北京。邵飘萍闻讯于23时30分赶到车站，人已散尽。他立即换乘汽车，直奔段的官邸，见大门紧闭，连连鸣车。警卫开门不愿放行，他坚持让警卫禀报，称有要事相告，段竟欣然接见，与他谈到凌晨3时。飘萍出官邸直奔印刷厂，将与段的谈话内容插入要闻版当天见报。在《申报》任特派记者的两年时间里，他写了250多篇、22万余字的“北京特别通信”，请看·

篇关于国会议员开会的报道：

“缺席既多，逃席又众……竟以罚金限制之。反观之，则诸君之不得已而不缺席、逃席者，为金而已。间日来坐数小时，而年受六千之岁费，试问诸君将何以对国家，何以对国民也？”

《申报》的“北京特别通信”在上海引起反响，应读者要求，由原一二百字专电，加长至两千余字。1918年飘萍创办编译社，向《申报》和北京各报提供编译的新闻消息，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垄断中国新闻网的格局。同年创立《京报》和新闻学研究会。其时，“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他连续在《京报》上发了三次特刊，一个月时间内，撰写了二十余篇评论，支持运动的开展。

飘萍主张“独立办报”，主张新闻工作者应“艰苦卓绝”；应该“虽幽囚受辱而安之若素”；应“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新闻学总论》第47～48页）。为使报纸坚持“独立、民主”的立场，他强调新闻记者要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成为《京报》工作人员的座右铭。从事新闻工作的14年中，他4次被捕。

1916～1926年间，他为《申报》所写的“北京特别通信”和为《甲寅日刊》、《京报》等所写的专题通讯，涉及北洋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对这一时期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如张勋复辟、马厂誓师、对德断交和参战问题、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二七罢工、五卅运动、直皖战争、历届内阁更迭，都作过详尽的报道。他的这些报道联接起来，便是一部记录这一时期北京政坛的长篇历史画卷。他创办的《京报》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因发行量大，利润丰厚，创刊两年就自建了两层楼的馆舍，这是当时北京新闻界惟一的一家。

飘萍之死引起全国愤慨，各界纷纷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及悼念活动，报界在显要位置刊登飘萍被杀真相，如《民国日报》的“飘萍竟被枪毙”，《申报》的“哭飘萍并告国人”，《大公报》的“飘萍君横

遭惨死之真因”等。

邵飘萍从事新闻工作近 20 年，所发各类新闻稿件 300 多万字，如《邵飘萍新闻通讯集》。他是所在的那个时代公认的名记者。

——报界老板史量才死于非命

1934 年 11 月下午 1 点半，当时杭州的季节最好，风和日丽，比较适合长途旅行。这一天，从杭州西边一座背山面水中西合璧的别墅内，开出一辆轿车来。驶过湖滨，便折入城区，然后从清泰门出了杭州城，驶上沪杭国道，向上海方向急驰而去。

轿车是上海报界巨子史量才的自备汽车。汽车底盘很重，行驶时十分稳当；车的外罩、玻璃都比一般的车厚实。内行人一望即知这是一辆“保险汽车”。

车内算司机满满坐着 6 个人。史量才及夫人，他们的儿子和一位同学，另一位是史量才夫人的侄女。车飞快地跑着，很快进入了海宁县地界。车内的 6 个人做梦也没想到，前方路上，正有一幕血肉横飞的惨剧在等待着他们。距离翁家埠两三华里的公路边上，一辆 1929 式别克牌黑色敞篷车，斜横在公路当中。车旁站着几个身着黑色长衫，头戴“铜盆帽”的大汉。似乎是他们的车出了故障，正在检修。史量才的司机继续向前开，两车距离只剩十余米时，忽听那辆车旁一个人吹了下口哨，几名大汉一跳分散开，对着史量才的车亮出手枪，数枪齐发，子弹如雨，击破了汽车的前胎，打碎了厚实的挡风玻璃，也击中了司机，汽车顿时停下来。史量才和儿子忙跳下车，沿另一侧田埂竭力跑去，匪徒立刻追了过去。跑着跑着史便和儿子跑散了，匪徒在一个干枯的小池塘找到了史量才，对准他的头部开了一枪，他被当场击毙，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等史太太带着警察赶到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

史量才于光天化日之下，被追杀于沪杭国道的消息，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国内各大报作了迅速的反映。国民党当局也对此表示震怒，案发当天，蒋介石电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报载史量才

先生在海宁被刺殒命。应严缉凶犯，负责根究。如其家属在杭，应妥为切实保护，并代中正慰问。”

这是一起民国时期著名的谋杀案，死者是上海《申报》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生于1878年，清末曾考中秀才，很快对“新学”发生兴趣，便逐渐抛弃传统的“旧学”，进入杭州蚕业学校，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毕业后来到上海，先在南洋中学教书，然后自己开办了一所女子蚕业学校。1913年，他以12万元巨资，买下《申报》。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非凡的管理才能，对《申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其迅速走上了现代化、企业化、商业化的道路。在他接手时，《申报》的发行量只有7000份，到1931年达15万份。1921年后，又陆续创办了中南银行、五州药房、中华书局、民生纱厂，还以100多万巨资先后收买了《时事新报》和《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报业大王，在新闻舆论界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杀害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凶手来自何方呢？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都没能成立。国民党政府想把这起凶案往“仇杀”方面引，CC派特务、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对记者大放厥词：“暴徒在沪杭路候史已数日，当为有组织有纪律之暗杀。惟史氏素无政治关系，谅是一种仇杀无疑。”（《申报》1934年11月16日报道）。

而真正下令暗杀史量才的是蒋介石。奉命执行这一计划的是复兴社头目戴笠，直接凶手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海行动组长赵理君。由于史量才乘坐的是“保险汽车”，所以特务一律选用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手枪，以便保证成功。但是，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害史量才呢？

史量才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办报宗旨，并勉励同仁：“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的势力压迫之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当袁世凯帝制自为，史量才发表文章予以揭露抨击。袁曾派人持重金贿赂，遭到断然拒绝。

对国民党的统治，《申报》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1931年“九一

八”事变后,《申报》如实报道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使沈阳失陷的情况,呼吁人民起来抗战。9月23日,《申报》发表“国人乎迅猛醒奋起”的时评,指出“我退至山海关,日亦逼至山海关,设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而日人仍节节进逼,我将其始终退让而毫不抵抗耶?”表达了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不满。

1932年1月28日,19路军全体将领奋起抗战。《申报》发表时评予以声援。为支援上海抗战,史量才发起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被推为会长。他慷慨陈词:“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得保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我虽年近花甲,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在舆论声援的同时,又捐献巨款,组织收容所,创办“国民伤兵医院”。

因蒋介石不抵抗政策,19路军被迫撤退。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史量才非常愤怒,拒绝参加蒋介石在庐山主持的“国难会议”。汪精卫派人专程赴沪向其示意,希望能与政府合作,被严辞拒绝。

东北沦陷,华北危机,蒋介石仍采取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连续对共产党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这种对内屠杀对外屈膝的政策,引起全国的愤慨,《申报》连续发表“剿匪时评”,认为政治黑暗,“虽无共党煽惑,紊乱绝不可免。历史上之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以及袁世凯时代白朗之乱,即其例证,故今日之剿匪为扬汤止沸,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乃为釜底抽薪”。

1932年6月29日上午,由CC派首领朱家骅推荐的政客段锡朋,直上南京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学生涌到校长室向段提出质询,段申斥学生,并先动手捉拿学生,引起公愤,被学生撕破长衫,伤及脸、胸部。国民党行政院宣布解散中央大学,并逮捕学生60多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中大毆段学潮”。当天晚上,国民党为掩盖事实,防止事态扩大,由教育部门召集各报驻宁记者,散发印稿一份,请各报照此发布消息。但在中央大学的《申报》特约记者钱之

生,在7月1日的《申报》教育栏发表了“中大风潮原因”一文,披露了真相“学潮起因是经费积欠甚巨,开学时教员只领到月薪三成,朱家骅(原中大校长)离任时又挪用水灾捐款3万元,师生与朱积怨甚深,段锡朋到任时,学生以其为朱替身,发泄不满”。此文发表后,教育部门声明,《申报》“报载失实”,极力加以辩解,转移读者注意力。7月3日,《申报》又发表“中大学潮评议”文,“以号称地大物博之国家而竟无法维持一最高学府之经费,使教授不能安心于其所学,此则政府不能辞其咎者也”。这些报道大大刺痛了CC派,朱加骅把《申报》的这些文章寄给了日理万机的蒋介石,宣称:“上海报阅史量才利用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这非常不利于党国。”蒋介石大怒,立即红笔批上“《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字。从此,《申报》除在上海租界发行,国内其他地区严禁投递。史量才不得不设法谋求解禁。经疏通,蒋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申报》的时评改变态度;二、撤换总编辑陈彬和;三、由国民党宣传部派人指导。史量才表示,前两个条件可以考虑,最后的一条不能接受。《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未接受政府津贴,政府定要派员指导,宁肯停刊。蒋碍于社会影响,只好允许《申报》恢复邮递。蒋以为这次“下马威”会让史量才“清醒”一些,但史却加强了与宋庆龄、杨杏佛等民主人士的联系,参与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在同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以记者身份,坚决拥护民主同盟提出的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主张,并严正抗议《申报》被禁止邮递达一月之久,认为用如此高压手段,侵犯出版自由,实是前所未有的荒谬之举。他还抗议江苏省主席枪杀《江声日报》记者刘煜生的行径,在《申报》刊登廖承志辩护律师的声明,这些活动使蒋介石深感不安,终于给军统下达了暗杀史量才的手谕。1932年、1934年《申报》及“民国四大谋杀案”、“上海史”作了报道和记述。

一 大公报之“尖兵”

《大公报》聚集了近代中国报界许多名记者。如范长江、杨刚、彭子冈、徐盈、萧乾等。范长江，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人。他出生在一个由小康遁入困顿的家庭，很早就萌生了“读书救国”的理想。去过延安，写“陕北之行”长篇通讯。他不满于《大公报》的“四不”方针，抗战开始不久，总编辑张季鸾要他以“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为题，撰写社论。范长江在该文中公然与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针锋相对，与张季鸾产生抵牾。这样，1938年10月，范长江脱离《大公报》，并且在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刚，女性，原名杨季微，又名杨缤，出身封建大家，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于1939年9月受聘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是带着“赤化”《大公报》的目的的。她对抗战胜利以后《大公报》言论转变起了很大作用。1949年1月，杨刚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领导天津《大公报》的工作，并把《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同年4月，她又随军南下，接管了上海《大公报》。建国以后，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三四十年来《大公报》记者有“两江”、“两刚”之说。“两江”者范长江与孟秋江，“两刚”则指的是杨刚和彭子冈。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的彭子冈，她的新闻生涯是在上海《妇女生活》杂志社开始的，鲁迅先生逝世时，《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向彭子冈约稿，彭子冈所写的出殡日特写，马上给她带来了第一次声誉。1936年11月，“七君子”案发生以后，彭子冈假冒史良的表妹，获准进女监探望史良。不久，史良的慷慨陈词就在《妇女生活》上发表。

《大公报》时期的彭子冈最关注中下层妇女和儿童的命运，大量记录了抗战时期重庆各阶层妇女的境遇和风貌。彭子冈文笔泼辣大胆，而又懂得斗争策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局面趋于紧张。彭子冈约了另一位女记者，跑到飞机场等新闻。有一天，她们发现末班飞机降落在机场，孔祥熙的老婆宋蔼龄带着几条洋

狗走下舷梯,而王××在机场接家眷却失望而归,两位女记者马上写了国民党飞机运狗不运人的新闻,自然遭到当局扣发。她们灵机一动,把新闻分割成三条:“孔夫人由港抵渝”、“王××接眷失望”、“重庆发现喝牛奶的洋狗”。每一条都不涉及政治,轻松过关。但见报后,并排在一起的三条新闻却给了当局以沉重的打击。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47年时曾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我回顾几十年国内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的广大读者欢迎,成为舆论重镇。它的销数不必是最大的,但代表公众意见,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他并且认为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的新记《大公报》就起到这种作用。

——为了新闻自由而付出生命者

中国封建传统如漫漫长夜,极大地制约了自由精神的发展。而作为舶来品的新闻事业信奉的言论自由精神,自然同这一传统相抵触。这种抵触常常是激烈的,不少的新闻工作者,为之付出了生命。

林白水,福建省闽侯县人,1874年1月(清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

1903年冬天,林白水与蔡元培、刘师培等人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大量刊登沙俄侵华的消息。1904年3月,《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林白水任主笔。

1921年,奉鲁军阀控制北京后,新闻检查横行,言论受到钳制。稍有不慎,即有杀头危险。林白水没有惧怕,他在新办的《社会日报》撰文说:“军阀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还说,凡有天良的记者,应该替老百姓说话,哪有去献媚军阀的道理。他说:“时至今日,若犹以讨赤为言,兵连祸结,则赤党之洪水猛兽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言语激烈,毫无顾忌。有人劝告他,不要因言论招祸,他回答说:“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

1926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发表“官僚之运气”一文,揭了奉鲁军阀张宗昌与潘复的老底。潘、张两人原系赌友,由于潘的介绍,张宗昌得到张作霖的提拔。为了酬报旧恩,张宗昌聘潘为山东军署总参议,并成了他的“智囊”。林白水把他们的关系比为“肾囊之于睾丸”。杀人不眨眼的张宗昌、潘复恼羞成怒,暴跳如雷,下令立即逮捕林白水。

8月6日1时,张宗昌派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多人到《社会日报》社,王琦谎称张宗昌有事要面见林白水,挟林白水到宪兵司令部。到后,王琦立即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以“通敌有据”的莫须有罪名判林白水以死罪。林白水挥笔写下遗书:“我生平不做亏心事,天必佑我家也!”

林白水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好友杨度和曾任《亚细亚日报》主编的薛大可立即跑去向张宗昌求情。开始张宗昌不允许。薛大可见情迫势急,屈膝跪下不起,涕泪纵横,一再恳求给林白水减罪。张宗昌把“着即枪决”改为“犹予执行”,由杨度草拟命令。但命令从张宗昌处送到警察厅,又从警察厅转到宪兵司令部,这时已经5时多了,而在30分钟之前,林白水已被押至天桥刑场。他身穿夏布大褂,外罩青色背心,白发蓬松,挺然而立。军法官命林白水面朝南,砰然一声,一代报人英勇就义!终年54岁。

继林白水、邵飘萍、史量才以后,储安平成为最后一个捍卫新闻自由的报人。

第七章 “权力”的异化

1. 记者的生财之道

——我是一名记者

用你的行动告诉众人：我是一名记者。

这是一句听起来很响亮的话，想象力丰富的人，眼前会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激动人心的图景：一个手持照相机或话筒的人，冒着炮火，钻进硝烟里，耳边是惊天动地的枪弹声，可是，这个人似乎听不到这充满死亡的声响，也看不见脚下的一具具尸体，他只顾不停地拍照、奔跑，然后蜷在战壕里用一支短短的铅笔，以无法抑制的激情，用生命书写战地报道——我是一名记者，你對自己说。因为，你英勇无畏的行为和强烈的敬业精神已经向你证明了这一切。但是作者还是忍不住说出来：同样是一个手持照相机或者笔的人，他满身是汗，匆忙钻进一个会场，这是某公司在开新闻发布会，然后匆匆寻一个座位坐下，忙不迭地和旁边的人聊起来。显然，他们非常熟悉，这个新闻圈是如此之小，他们经常碰面。这次他们的谈话依旧是一贯的主题：今天的红包有多大，300元还是500元，或者“一本”（1000元）。这是他到此的重要目的。回去之后，他只要把今天的回忆用近百字描述出来就行。这种情况在中国的记者圈里如此盛行，俗称“赶会”。当然，这种新闻发布会缺乏足够的新闻性，但是厂家又需要这一家家的媒体告诉老百姓他们的产品，厂家有金

钱，而记者代表媒体，金钱和媒体，达成了天衣无缝的组合。于是会上发的一个个红包成了一些记者最原始也最具诱惑力的驱动力。天下难道有这样容易吃的午餐吗？甚至连你的稿子厂家都为你准备好了。于是，他为这种游戏陶醉了，他甚至会在一天中从这里跑到那里，马不停蹄地从一家新闻发布会到另一家。于是，第二天把那些千篇一律的稿子在报纸的某个版面上登出来。当然，版面不同，价格也是不同的。在这个过程中，他用他的行为同样告诉你：我是记者。

对于中国的记者来讲，“我是记者”这句话多少有点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来。因为，他的行动实在有点让人难为情。又于是，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也是始终缠绕在中国新闻圈内的问题：有偿新闻。

… 你的金钱，我的新闻

1878年，当后来的报业大王普利策创办《邮电报》的时候，他曾规定该报的办报方针是：不为党派服务，而为人民服务，不屈服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利益。但是，当我们面对自己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就不得不对这一切加以深思了。

不屈从商业利益，在今天的中国新闻界简直难以想象。中国新闻业的成长并没有脱离商业的利益。在企业界和新闻界之间，几乎就相当于我们熟悉的一切商业交易一样，你付出金钱，我付出我的“权力”。而且这一切又加了一条极富中国特色的名字：有偿新闻。新闻讲究的是公正性和客观性，一旦加上有偿这个定语，它还有何公正性和客观性可言。无法相信，我们的记者已经修炼到“拿人的，手不短”的程度。拿人钱财，不是为人消灾，而是替人发财。可以毫不怀疑地说，有偿新闻在中国已经构成了一个普遍严重的现象，在相当一部分记者的收入中占有极重的比例。一位北京记者坦言，他每个月跑会的红包是两千元左右，这在北京的记者中尚属一般性的收入。他的一些不辞辛劳的同行，由一个会到另一个会，马不停

蹄地奔波,可以给他带来每月五千元的收入。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当然是报道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的折扣。从另一方面,企业通过金钱打开新闻界的大门,不仅找到了一条比做广告省钱的方法,而且可以有力量对新闻界施加影响了。

每个企业都设有公关部门和广告部门。这些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和这些形形色色的媒体打交道。企业界与新闻界构成利益同盟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一个想要说话而且有钱,一个可以说话但是没钱,二者很容易组合到一起,并且产生如胶似漆的情感。

某著名的国内饮料公司部门经理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主持没完没了的发布会,还要应付一个个记者自动上门的服务。有记者大言不惭地说:我给你1000字的版面,你给我1000元钱。这种交易通常好做,因为各取所需。

这种有偿新闻最常用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半遮半掩式 报纸或者电视用企业专版、经济报道等栏目直接向企业和地方收取费用,并称之为新闻报道。这种宣传方式是一种典型的软广告。费用也是最巨额的。在企业界每个从事宣传的部门都熟悉这种做法,但是这种软性广告的效果也比赤裸裸的广告更能树立企业形象。于是,双方就达成交易。这种交易多少还带有一点羞涩的成分,在半遮半掩的状态下完成。

赤裸裸式 这种情况是,来自各报的记者把他们能够使用的版面当作与企业交易的筹码,与企业进行钱与稿的交易,每家报纸的收费高达数千元。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每篇稿子上千元,一稿发十家报纸不过几万元,比广告费用低廉得多。在《经济日报》做的一份调查中显示:有些企业的广告费只有几万十几万元,但是招待费却高达10倍以上,其中大部分花在有偿新闻上。这种情况下,记者与企业赤裸裸地面对,赤裸裸地交易,然后赤裸裸地高兴。

幕后交易式 “洛阳纸贵”并不是昨天的故事,而且在今天,不仅仅洛阳的纸贵。记者们似乎都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他

们收受企业吹捧自己的稿子,然后非但不付出稿费,反而是厂家付给他们稿费。稿费的高低,要依据稿子发的快慢和篇幅的大小而定。某大型企业广告部负责人坦言道:这种稿子的报酬是每千字500元到1000元不等,甚至高达几千元……

中国记者利用这些办法迅速让自己的腰包充实起来。这种场景不禁让人想起流行在新闻界的一个笑话。80年代初,北京某经济类报纸接到一则来自读者的征婚启事。这对于当时来说是件新鲜事,编辑们不知如何处理这篇不伦不类的稿子。但是,他们还是把它发表了,之外还给征婚人寄去了稿费。当然,现在的报纸从业者早不这么蠢,他们会为这一小块征婚启事的面积可以换来的价值而去争夺客户。

——不是我不明白

公关在中国一直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的公关公司早已把自己的利益和记者的利益牢牢地拴在一起。礼品和红包是他们之间屡试不爽的沟通桥梁。当改革的大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外部的眼光时,国外的公关公司也进入了中国。但是这种企业与新闻记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让国外的同行们很不理解。他们在中国企业的新闻发布会上不知如何处理一件件礼品、一包包土特产或一只只昂贵的手表,更被那一份份红包搞得狼狈不堪不知所措,显然,老外的智力水平不低,他们在明白中国人的办事方法之后,终于可以泰然自若地面对这一切,收下礼品,并把它们转给中国同行。

想凭借漂亮的创意和强大的财力分中国的公关公司一杯羹的国外同行,最终虽然入乡随俗,但是,这种典型的中国式操作,给他们带来两个致命的危险:一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说服外国企业客户在正常的公关预算外添上中国记者的礼品费用和发稿报酬,只好从自己的利润中支付这笔开支。二是按照国际惯例,公关公司花钱行贿新闻界将酿成丑闻,如果被公布会导致公司信誉毁于一旦。因此,在这样的利弊权衡之后,他们得出了一个见效慢但是保险的办

法,在中国推展国际同行的公关规则,促使中国客户及记者接受国际概念,他们不要花更大的气力和本钱。

显然,一开始中国记者对这一切还缺乏足够的准备。参加国外公关公司的新闻发布会,是一张简单的“谢”卡,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或者是一项简单但是有趣的参观。这些东西对中国记者来说,实在是有些清淡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国内企业的发布会,它们是一堆礼品,一个红包,然后就催他们发稿。这些东西,虽然是赤裸裸了一些,但是真的很实惠。

而且,中国的记者对于新闻缺乏足够的兴趣,新闻对于中国记者来讲是可有可无的,相对新闻,邀请信和红包是最重要的。于是,和国外的记者不同,中国记者不用抢新闻,他们是坐等别人的邀请。而且要看红包的厚度和招待宴席的档次。在中国,记者是大爷,是需要别人邀请和礼遇的,而且还要有交通费。“你能请到我,是你的荣幸,我给你发稿,是看在红包的面子上的”,这些成了一些“记者”的准则。他们忽视了规范化的公关活动是不允许和新闻界有任何不清楚的交易的。

在1996年4月的一天,美国博雅公关公司为美国一家企业操作了一次公关活动,地点选在京城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贵宾楼。活动的内容是参观那家美国企业赞助的中国民居展览。一场丰富的文化快餐饱了眼福,一顿丰盛的自助餐饱了口福,但记者们仍旧明显地表现出意犹未尽;他们在等待礼品或者红包。于是在贵宾楼的大厅里出现了一幅滑稽的景象,在公司的负责人一再宣称公关活动结束后,他们仍没有离去,他们在焦急地等待,但是又没有人拉下脸去问个究竟,他们哪里知道,国外的公关公司是不懂这一套的。最后,这些记者大爷们终于还是悻悻地离去了。这是一次典型的西方公关模式,民居展览无疑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效果实在是可怜的,请来的记者很少报道,让人扫兴。没有红包的记者,当然缺乏足够的刺激动力,他们厌恶这种没有油水的公关。你这个

公司到底怎样,这与我无关,中国记者们关心的是他们的腰包。

面对中国记者的胃口,国外的公司常常心生疑惑,在给与不给之间徘徊。曾经有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那一次,有两家外国公关公司在同一家饭店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坚持不送红包的一家公司经理突然发现隔壁有“红色炸弹”,经理再也坚持不住了,他连忙请示总经理:是否我们也送红包。

这个故事让国外的公司尴尬,也让我们的记者尴尬,面对我们习惯称的“银弹新闻”,我们的新闻记者表现出惨淡的职业道德和浅薄的分析能力。仅仅一个红包可以收买他们说话的方向。

“直言不讳地写出我所看到的世界”,这是一个新闻记者的天职。但是面对有偿新闻,这种天职显然丧失了他们的责任。尽管媒介受到商业的压力,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都不罕见,即使在标榜极端自由主义的西方新闻体制中也大量存在。在那里,企业巨头成为一家报纸或者电视栏目的财源支持者,但是他们也很少可以直接干预新闻节目的制作,因为一旦传出企业与新闻媒体勾结的丑闻,将会对该媒体与企业带来名誉上的巨大伤害,并会引起官司上纠纷。但是,在中国,显然我们的媒体在胃口很小的情况下,或许只有几百元钱就出卖了自己的尊严和自己所在媒体的严肃性。新闻的要求是具有实效性,但是翻开中国的报纸,那些一栏栏关于产品的展销会具有怎样的实效性呢,在没有任何观点的几百字稿件背后,是“记者”在数几百元钞票的得意神情。

就是这样一些人,先是出卖了自己的职业道德,然后出卖了自己媒介的严肃性,接着廉价处理中国记者的整体形象。而这些出卖的价格只有几百元。“防火防盗防记者”,这是一些地方出现的“三防”顺口溜。当年孔子感慨苛政猛于虎,如今有人感慨记者猛于火、盗了。这些堪与天灾人祸比美的记者大爷们,热衷于参加各种招持会、产品发布会,写那些招待单位已经提供的消息,白吃白喝白拿。原广播电影电视部纪检组曾经搜集并转发两封来自广东的群众来

信。一封署名“省内一批中小企业”的诉苦道：一些记者在打着采访的名义热衷于吃喝，热衷于新闻发布会，眼睛盯着广告和回扣，有的甚至撕下脸皮，直接索要“报道费”和“采访费”，甚至还有一张新闻价格表，收费标准由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另一封读者来信列举了社会上流传的“金元记者”、“乞丐记者”、“豺狼虎报”、“两霸一报”的说法。甚至还有一首关于“几等记者”的新民谣，以在不同的地区以相类似的版本出现。企业的产品发布会养活了中国记者，而不是正义的声音呼唤记者，这是一群嘴软口软的记者。

有偿新闻已经成为中国新闻界纠缠不清的症结。软性广告在报纸中随处可见。除了上述的诸多弊病以外，有偿新闻也是对媒体运作本身的一种伤害。新闻和广告原是两种全然不同的东西。新闻的目的在于传播信息和还原真实的世界，而广告在于推销产品、营造一种并非完全真实的商业幻影。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可能是一些记者最善于使用的招术。

它们之间的区别至少表现在如下方面：

目标不同 新闻是最新的消息，广告是推销商品。

对象不同 新闻，面向整个社会的受众，对象范围广大。而广告，面对一个特定的年龄、性别、职业的范围。

角度不同 新闻，要求客观，及时，公正，具有不可粉饰性，是一种不可掺杂水分的非宣传品。但是，广告，是一种主观设计，是广告客户的自我宣传，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精心策划并采用各种艺术形式。

时效性不同 新闻贵在于新，因新闻的生命周期很短。广告的生命周期长，可以反复出现。

付费不同 新闻，是突发事件的无偿报道，而且新闻媒介要根据稿件的新闻价值和字数，付给作者和被采访者一定的稿酬。广告，是反过来付费的，每一则广告都要缴纳广告费。

根据这些分析，我们不难看到，有偿新闻已经成为一种变形的

隐形广告行为。这种变形甚至“变性”让中国的记者也变成一个业余的广告人。当新闻变成一种广告行为的时候,这种新闻的价值就可以预见了。

某报曾以大篇幅报道一位厂长的“先进事迹”。滑稽的是,报道出来后,连厂长本人都认为报道并不可信,私下对好友说“我给了报社很多钱”。不久,报纸又刊登了另一家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经验的文章。主管部门拿着报纸对厂长说向他们好好学习。厂长对此不以为然,回答说:“得了吧,谁知道他们是不是花钱买来的。”

新闻是花钱买来的,这实在是让读者无法接受。想想吧,每天你打开并且信以为真的白纸黑字,竟然是用钱买来的。企业与新闻界之间的相互利用无非是一种物质利益间的等价或者不等价交换。给予记者礼品红包及三包服务,已经成了被采访单位的公关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拿了人家的手短,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信条。大多数新闻记者拿到他们渴望的东西之后,对于新闻本身便丧失了足够的兴趣,更不愿去对报道对象进行深入的调查,甚至出卖自己的报道权。唐山市某公司经理因投机倒把罪被捕,办案人员发现,他曾用17万元,先后请了2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为他编排内容失实的电视专题节目,撰写近10万多字的吹捧文章。就在东窗事发的当天晚上,他还急请北京某报的资深记者直赴唐山,炮制出一篇吹捧报道,并且迅速见报,通过此举向办案部门施加压力。

新闻与金钱的交易在沈太福的长城公司集资案中得到了高强度的释放。这场巨大的骗局,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更让整个新闻界的黑暗得到了相当的展现。

企业手中的钱,新闻记者的笔,在你情我愿的情况下,结成了不可告人的关系。如果,银弹实在够多,那么一些新闻记者很愿意出卖一下自己,尽管公正与客观是新闻的贞洁,但是面对钞票,这贞洁又算得了什么。而且如果我们的企业出手不凡的话,新闻界甚

至愿意让自己投入更多的情感,虽然这种情感是逢场作戏。

在这短短的几年内,新闻界在金钱的驱动下,爆发了几场大规模的充满了感情色彩的混战。娃哈哈果奶、华旗果茶等产品伴随着新闻界的炒作而大起大落。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文字,直接诱惑着消费市场。而新闻记者在此混战之中,也充分表现出水性杨花朝秦暮楚巧舌如簧的本色。昨天这些产品还在天国徘徊,今天就可能被打入地狱。这种前后不一缺乏事实根据的新闻,让读者产生怎样的一种心理影响?

或许中国新闻界的权威萧乾先生的话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我如今对传媒的某些报道(尤其是厂家或产品)完全失去兴趣。每当看到这类报道,我心里想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厂家为那条报道究竟掏了多少钱。”

——红包的历史

中国的新闻史并不长,有偿新闻直到1910年才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出现。有趣的是,第一位有偿新闻的主演并不是记者,而是著名小说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当时的报纸《时报》用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吴的文章“还我灵魂汁”及一份药品介绍信。吴用一支生花妙笔并以身试药,吹捧一种几乎毫无疗效的药品,说喝五瓶便由思维迟钝变得神智清醒。这则半新闻半广告式文章的价值是300块大洋和一条性命。因为吴在文章发表3个月后,命丧黄泉。其实,这也并不能算标准的有偿新闻,它更像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名人广告。这件事在当时的报界轰动一时,传为丑闻。

民国时期并没有形或规模化的有偿新闻,除了缺乏经济基础以外,当时的报界也有强烈的自律精神。因为当时的报业,几乎都属于私人投资性质,所以有偿新闻这样的丑闻会直接给他们带来丧失读者的危险。

而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由于高度的统一集中机制和贫困的物质条件,造就了病态的新闻模式。这种情况,虽然杜绝

了有偿新闻,但同时,它也忽视了新闻最重要的前提:新闻记者的职业化和独立自主。

在中国,有偿新闻的正式登场始于1983年,而开此先河的是某大报。该报负责人后来回忆说:那年该报开辟了一块刊登商品求购之类消息的信息专版,向提供信息的厂家适量收费。这个专版由当时的两个部门提供并经营,收入用来提高部门人员的福利,每人每个月可从中分得十几元。一个月后,这位负责人下令把这块专版停止了,不知是源于上面的压力,还是什么其他原因。他分析说:“这种做法带来两个方面的弊病,一是新闻的真实性有失控的可能,二是影响报社内各部门之间的团结,这是一个教训,我当时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检讨。”当然,这种停办并非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自律精神,反而体验到一种报端保守的怯懦的情绪。从此开始,连广告都不敢做的中国新闻界开始出现了有偿新闻。此后的有偿新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84年前后,是有偿新闻的初级阶段。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新闻与广告不分,表现为有偿专版和有偿信息。一些产业报道长篇大论地刊登介绍企业及产品的专版。有的报纸向驻地记者分配这种任务,当时的这种报道企业的记者被称作“饭票新闻记者”。

1987年前后,有偿新闻有了大幅度的发展。不仅新闻与广告不分的问题依旧,记者在采访活动中收受钱财的风气开始盛行,利用采访拉广告的现象也不断出现。领取红包,在当时还处于静悄悄的情况。1992年,这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关键一年。中国人的脑筋一下子开阔了,新闻发布会成为企业与新闻界沟通的黄金桥梁。从此,中国记者红包的黄金时代到来。“新闻穴头”应运而生,给记者发红包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以至于,记者对于红包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有,而上升到到底有多厚的高标准严要求上。北京某著名地方报纸的记者,常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对话如下:

这里有个新闻发布会，您来参加吗？

在哪儿，是不是太远了。

有个五百的包，如果您方便，就来一趟。

算了，你给送来吧，我给你发个几百字……

现在的记者，流行的是有会互相通知，有钱大家一起赚。这是他们之间的协议。

——你的道德在哪里？

这不可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尽管它听起来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他利用了人民的信任并且毫不惋惜地出卖了他记者的良心。

故事的发生地点是江西一个偏僻的县城，当地一要员的公子打死了当地一居民的儿子。这种衙内欺辱贫民的事情在旧中国并不新鲜。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这种事件不厌其烦地上演着，只不过衙内们没有当年的高衙内有名罢了，尽管手段越发毒辣。这种事情对于聪明或者说习惯忍辱负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忍口气就算了，因为，蚂蚁终究是无法撼动大树的。在上告屡经失败之后，他想到了一个著名的新闻栏目。几年来，在电视画面里，这个新闻栏目已经帮助了很多得不到帮助的老百姓伸张了正义，他平时最喜欢看的栏目就是它，那些手持摄像机的人或许可以帮助自己。他就开始和这个栏目联系。这个著名的栏目真的很重视这个事件，于是迅速派了一个记者去核实情况。事情到了这里，似乎一切都充满了希望。但是，就在这位类似“钦差大臣”的记者尚没有进入这个偏僻的县城时，记者接到了那位打死人的衙内送来的 10 万元钞票。面对这些白花花的银子，这位记者大爷就打道回府了，这件事情也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这个轻而易举地 10 万元后面是一个记者的职业道德和良心，这二者孰重孰轻呢？

新闻充当执法机构，这是中国一个时期的奇特现象。每天从早到晚，在中央电视台的门口都坐着一排排满脸风尘和沧桑的人，他

们的衣着和表情明显地告诉你他来自外地。他们是一群上访的群众。在他们心中,中央电视台的人就像青天大老爷,说起话来比当地的那些凶恶的官员更加有威严。著名新闻评述栏目《焦点访谈》就是他们心目中正义的力量。

显然,中国的新闻记者还不能够人人都做到《焦点访谈》所能达到的境界,尽管这是对一个记者起码的职业道德要求。

——出场费:中国新闻记者到底值多少?

一位资深人士在一篇《记者“出场费”与新闻“含金量”》文章中,对于这种说法显然表示不满,但是这的确已经成为刺激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的主要动力。这位业内著名记者是这样叙述的:

记者“出场费”的说法曾令我大吃一惊。我认为这种说法显然是夸大了。它很容易使人们将记者的采访与歌星、影星们的出场演出混为一谈。其实,记者们在采访中得到的经济报酬除极特殊的情况外都较微薄,绝不能与大款歌星动辄上千上万的收入相提并论。

不过,这种说法倒也多少道出了今天新闻界的一些真实,这就是说,有些记者的采访是以能否得到经济上的收益为前提的,有些被采访单位是不让前去采访的记者空手而归的。

早些年,记者在采访中得到酬劳,不过是些小小的纪念品,如圆珠笔、名片盒、领带夹、手提包等等。一位新华社的女记者曾对我半开玩笑地说,她正在收藏采访中得到的各式圆珠笔,也许有一天能办个博览会。

近几年情况大大不同了。记者们得到的礼品,由纪念而趋于实用,由低档而趋于高档,由实物而趋于现金。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曾就此作过一次调查,调查报告中说:“记者以‘劳务费’、‘误餐费’、‘车马费’等名义收受金额,一次少则50元,多则200元、500元。给记者的礼品,已由一般纪念品向高价值物品发展,如有的赠送金项链、金戒指、家具、BP机,以及安装电话、防盗

门、解决住房、用车并为其办私事等。”

安装电话、解决住房之类的厚爱，是极少数记者能够享受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例外。这种例外之中，必定隐含着记者与赠与者之间某种秘而不宣的特殊感情和特殊交换。可以说，大多数记者绝对没有这种福分，即使有了这样的机会，恐怕也未必有多少记者胆敢领受，因为那住房那电话那家具那BP机绝不是摆在大街上可以随随便便拣回的，也不会是人家毫无目的白白相送的，那里面往往意味着一种诱惑一种收买，也意味着一种投靠一种出卖，而这种买卖具有极大风险。

随波逐流地跟着同行们一道领取由信封装着的百元现钞，如果这也算作“出场费”的话，在记者群中则是司空见惯。各种各样的产品鉴定、商品展销、工程剪彩等新闻发布活动，这两年都专门辟出了宣传费用，其中也包括记者的酬金。这似乎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惯例，如果没有，倒是会被人见怪了。

有人曾经这样讽刺说，有的记者每天早晨要走上阳台凭高四眺，哪儿升起气球就往哪儿奔。因为升气球的地方不是开业就是闭幕，自然有油水可捞，只要亮出记者证就可分得一杯羹。这样的描述显然具有文学性的夸张。不过，记者们早上来到办公室，如果能够发现桌子上摆着一个硬邦邦的信封，顿时就会眼睛一亮：准是一封请柬了。而后他们就撕开信封抽出请柬来，扫一眼邀请单位和发布活动的名称，有经验的记者立时就可以揣度出这封请柬具有多大经济价值。有的请柬则比较含蓄地写邀：“请勿转让他人。”有时候则是事先电话里打了招呼的：“你一定来啊。不方便就打的，由这电报销。到时候给你个信封，意思意思。”

请柬的多少，各个新闻单位不大一样。越是影响大的新闻单位，越是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新闻单位，收的请柬就越多。四川一位记者在新华社某处参加培训，似乎对那里的请柬看花了眼，回到省里，他感慨地说：“新华社收到的各种发布会的请柬，有时多得

大家只能挑选着去。我在那儿3个月也捞了2000多元。”这短短一句话具有极大的爆炸力,人们会问:如果是一个正式记者,一年里会得到多少呢?有趣的是他使用了一个“捞”字,看来把“出场费”认作了非正常收入的外快,很有一点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的口气在里面。

不过,有了这种典型例子,并不能因此否认“出场费”的普遍存在。不同类型的会议、不同类型的单位、不同类型的活动,情况有所不同。“出场费”的价格,也没有统一标准。有人说,有些新闻发布活动的记者“出场费”给到了1000元,据作者所掌握的情况看,这如果不是猜测也绝对是例外,一般情况都是三五百元而已,也有仅仅给三十五十的,也有不给钱只管饭的,也有既不给钱也不管饭的。当然“出场费”的多少与记者和新闻单位的身价也有关系。如果是全国性大报的记者,有时会受到特别的关照。如果是电视台的记者,那就更会得到额外的恩宠。对此,记者们心照不宣。相对来说,文字记者比较容易满足,电视台记者有时会讨价还价。他那个画面是更值钱的。值多少钱呢?一条新闻要几百元到几千元吧。地处北京的某电视台4个记者到北京“荣宝斋”画店采访,收取“误餐费”400元,受到台里的处理。那是1991年的事了,此后的价码逐渐增高。就我知道的情况,某台一条新闻,记者就收了3000元。

分发“出场费”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多在新闻发布活动之前就事先塞给有关记者。这种情况又分为两种,一是在往新闻单位分送请柬的时候就分头塞给信封,一是事先把有关参与报道的记者召集一块小酌一番,送上礼品、新闻稿和信封,结结实实地打个招呼:“明天的活动各位务必出席啊。”这种情形,就很有点“请”记者出场的意思了。有在发布会开始前记者签到时分发的,新闻记者的请柬一般有别于其他来宾的请柬,新闻记者的到场有专门人员接待。大家的礼品袋看上去都一模一样,但记者拿到的袋里多放着两件东西,一件是新闻稿,一件是信封。有经验的老记者会不露声色地把

那信封塞进自己的皮包,若无其事地大大方方穿梭于熟人之间。初出茅庐的新记者则禁不住要时时伸出手摸一摸那个信封,想弄清楚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一旦看到了面额,心里便会咯噔一下,整个会议期间都心潮起伏,不知道该将这些钱作如何处理,盘算着该对新闻发布者作何种报答。也有在活动结束时才分发“出场费”的,如果是这样,一般情况下事先都有人嘱咐记者:“散会以后留下来有事商量。”商量的事情,无非是如何保证发出这次活动的报道。保证的措施之一就是分给每人一个信封,这很可能是组织者有意使出的手腕,意在牵制记者们能坚持听完详尽的介绍,而不要拿到钱就拂袖而去。有时候,记者为此空等了一场,他们耐着性子坚持到最后本来希望得到点表示,却不料曲终人散无人照应,这时候,就多少生出些失落感了。

——呐喊:仅仅有喊声是不够的

1996年5月10日,北京,一周末。记者圈里如同发生了什​​么大事,各种聚会的话题都不由自主集中在“中宣部5.7通知”上。这个通知尽管很简短,但是它似乎不同于他们已经习惯和漠视的通知,它关系到这些记者的切身利益。这个通知源于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光春5月7日的一个讲话,其主旨是,记者采访不能由被采访单位出赞助费,新闻报道不许收宣传费,禁止用新闻形式进行企业形象的广告宣传等等。第二天,中央各大报均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个讲话。此后几天,各家新闻单位纷纷行动,制定出本单位的具体规定。

通知发布以后,立竿见影。各新闻单位开始清查“挂牌栏目”,打算清剿这些企业出钱赞助的新闻栏目。很多记者纷纷拒绝企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各种有偿新闻在媒介上锐减。按常规,每个周末是新闻界与企业界“沟通”的千金良宵,但是在这个周末,大多数变为记者间的单纯聚会,将企业家排除在外,不带他们玩。

这段文字是1996年第10期《三联生活周刊》所发《银弹攻关

——《中国企业界与新闻界的黑箱操作》一文中所描述的情景。到了世纪末的今天，我们回头看这段文字时候，竟然有几分滑稽之感。因为，周围的记者和企业家之间的金钱与新闻游戏已经越玩越大了，伴随着物价的上涨，红包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了。你OK，我OK，是如今记者与企业之间的秘而不宣的协议。

这种通知或者讲话在报刊上不断重复着，每次风吹来的时候，这种黑箱操作就暂停一段时间，但是在风声过后，就春风吹又生了。有偿新闻，像一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野草，只要严寒过去，就可以茁壮成长。

其实关于有偿新闻的反思在我国的新闻界一直像常青树一样不败。这种影响甚至超出了中国本土，伴随太平洋的海水飘到了美国。1993年4月23日，纽约华文报纸《纽约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大陆记者生财有道》。1993年，正是我国有偿新闻大举出现的一年，至今有记者充满深情地回忆从1992年开始的有偿新闻的黄金时代。由于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市场经济在我国中的地位，于是我国企业似乎在一瞬间明白了，市场对它们意味着什么。而那些可以说话的记者，对它们又意味着什么。于是，互相给对方市场，成了那时流行的方法，而且红包的厚度实在可观。我们接着回到那篇业内著名记者写的文章：他过去的一大堆记者朋友，如今都已是商人气派，或津津乐道炒股票怎样发财，或策划起公关公司拉广告，或大谈稿子的含金量，在报纸上为企业发一篇稿子该拿多少钱。作者列举了他听到的一些情况，忍不住感慨道：像这种不论三七二十一，拿新闻作钱换猪肉的做法，在全世界恐怕都不多见。

1993年5月10日，台湾《联合报》刊登文章《记者不耐清贫，金元新闻风行大陆》，大谈我国有偿新闻的惊人之举。而海外其他媒体，也对此纷纷作出反响，对于我国同行的做法，它们表现出极大的不理解 and 悲耻感，文字极尽嘲讽谐谑之能。

对这一轮的海外媒体轰击，首先有感觉的是几个已经退休的

老记者,他们抱着“不能眼看着长期奋斗的新闻工作事业遭到败坏而无动于衷”的决心,在5月下旬,由钟沛瑶、戴邦等10名老新闻工作者集体上书中央,强烈呼吁铲除有偿新闻这个怪胎,用他们已经苍老的嗓音大声疾呼:新闻事业正在滑向拜金主义的沼泽。

于是,有呼吁必然有反应,不管这种反应是否真的有效。由中宣部、中国记者协会和新闻出版署组成的专访小组,到北京的11家企业了解对新闻界的反应。在一系列调研活动的基础上,中宣部于6月中旬召开了整整一天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会议的结果第二天出现在中国的大报上,与会的20家主要新闻单位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有偿新闻在中国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会议进行的两个议题:一是继续推进新闻改革,二是加强新闻队伍建设问题。

然后,新闻界开始了一贯的做法。整个新闻界利用自己评论别人的阵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各家大报铺天盖地对有偿新闻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无情的批判嘲讽。但是,这种批判毕竟是针对着整个新闻界,而非个人的,集体犯错误,是法不责众的,当一个风潮面对一个集体到来时,身处其中的个人其实并不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深刻检讨错误,表示改正就行了。

但可笑的是,当一些记者在抱怨自己与有偿新闻无关,那只是一小部分记者的所为,并败坏了他们的形象时,中国的有偿新闻风却愈刮愈烈,红包越来越厚。而对于有偿新闻的批评和学习,也越来越流于形式,原因为什么,我们都很清楚。其实对于有偿新闻的呼吁并非始于1993年的海外媒体的评说。早在80年代初,中宣部就曾制定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守则。1987年,新闻界对有偿新闻的批评在言辞上已经相当激烈。到了1991年1月,由中国记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并公布了新闻职业道德规定。当时的中宣部新闻局局长说:当时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有两项原则却是非常明确的,一是不得以新闻或者版面作交易,二是新闻活动和经营活动要严格分开。但是原则仅仅是原则,它不具有

法律效力,也不具有强制执行的能力,充其量只能算是软框框,而这些软性的东西是不具备任何实用效力的。

到了1993年以后,有偿新闻成了每年新闻界会议的一个必备菜肴和主要菜肴。翻开报纸,你可以很容易看到这样的标题:“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深入展开禁止有偿新闻的工作”。可是这些标题仅仅只是表面文章罢了。

199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新闻出版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发出《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该文件制定了如下规定:

一、新闻单位采集、编辑、发表新闻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费用。新闻工作者不得以任何名义向报道对象索要财物,不得接受采访报道对象以任何名义提供的钱物、有价证券、信用卡等。

二、新闻工作者不得以任何名义向采访报道对象借用、试用车辆、住房、家用电器、通信工具等物品。

三、新闻工作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和企业开业、产品上市及其他庆典活动,不得索取和接受各种形式的礼金。

四、新闻单位在职记者、编辑不得在其他企事业单位兼职以获得报酬。未经本单位领导批准,不得接受其他新闻单位的兼职记者、特约记者或特约撰稿人。

五、新闻工作者个人不得擅自组团进行采访和报道活动。

六、新闻工作者在采访活动中不得提出工作以外个人生活方面的特殊要求,严禁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

七、新闻工作者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要求他人为自己办私事,严禁采取“公开曝光”、“编入内参”等方面要挟他人达到个人目的。

八、新闻报道与广告必须加以严格区别,新闻报道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为企业或产品做广告。凡收费用的专版、专刊、专稿、专栏等均属广告,必须有广告标识,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

九、新闻报道与赞助必须严格区分，不得利用采访和发表新闻报道拉赞助。新闻单位必须把各种形式的赞助费用，或因举办征文、竞赛、专题活动而得到的协办经费，纳入本单位财务统一管理、合理使用、定期审计。在得到赞助或协办的栏目、节目，只可刊登赞助单位的名称，不得以文字图像等形式宣传赞助或协办单位的形象和产品。

十、新闻报道与经营活动必须严格分开。新闻单位应由专职人员从事广告等经营业务，不得向编采部门下达经营创收任务。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和其他经营活动。

除了这十条有些雷同但是详细的规定以外，该文件还规定了一旦犯规的惩罚办法。但是，不论其情节轻重，惩罚办法不外乎批评教育，党纪政纪处分。这些惩罚显然缺乏足够的权威性。而在一些文件中，多次指出新闻记者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但是，社会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又怎样监督，没有具体规定。于是，这一界限的模糊，再次使这些文件成为一种虚设的东西。

今天，随便哪一个记者看到这十条规定，都会哑然失笑。“鲜明的态度，坚定的决心”，这是配合当时的《新民晚报》根据《禁止有偿新闻的规定》而配发的评论文章，这十个字或许是中国新闻记者对于有偿新闻的最好概括，只不过，这十条是不全的，应该再加上“永远的不改”，就会是完全的描述了。

——他山之石比较硬

一位我国新闻出版署的人士在一篇文章中说：尽管有偿新闻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但这个怪胎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腹中躁动，仍让人始料不及。

他对于这句话的解释是，有偿新闻在西方的新闻界中是一个重要现象。他认为有偿新闻几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新闻传播中的伴生物。文章引用了马克思的话：英国所有的报纸，都是一种商品，只要自己的商品不被损害，无论陈列在哪里都是毫无关系

的。文章中接着写到：广播电视的出现，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有偿新闻达到空前泛滥的程度。

为了证明这句话，作者举例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的一句话：有无数例证，说明美国的电视公司与厂商相互勾结，主要目的是为了推销广告利益而欺骗大众。

对于李普曼的一句情绪之言，并不了解美国新闻法的作者却把它作为批判美国新闻界的有偿新闻的证据，实在有点荒唐。尽管商业元素在美国的新闻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商业本身却从未能真正主导美国的新闻。

事实情况是这样的：在美国，所谓的有偿新闻并非是报社记者向厂家客户要钱卖版面，而是花钱买新闻，买突发消息。美国的有偿新闻一般只限于小报和电视娱乐节目，严肃的大报是不搞有偿新闻的（是不是与中国的现象截然相反）。

美国的小报往往版面较小，主要探听小道消息、名人的趣闻轶事、丑闻等。小报通常摆在超级市场销售，读者大多数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市民。而对小报出钱卖版面的做法，美国的新闻评论界历来是一片谴责之声，认为这种用钱买来的新闻是垃圾新闻，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而且严重损害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原则。对小报这种做法最严厉的批评来自美国院校讲授新闻学的教授、学者们，他们在讲授新闻时根本不讲这些小报，认为这种报纸不属于他们认为的新闻报道的范畴，干脆把它们从新闻报纸的定义中开除出去。和美国一些小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严肃的权威报纸，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它们既没有卖版面而赚钱的，也没有花钱买新闻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报纸的编辑层层叠叠审核筛选新闻的制度相当严格，使有利益成分广告式样的东西无法掺杂进入新闻版面，更重要的是美国有些报纸对记者作出严格的规定。例如，《纽约时报》每个周末都有一版介绍餐馆饭菜哪里的好，负责报道餐馆的记者必须经常去纽约各

种餐馆吃饭品尝，纽约餐馆成千上万，竞争十分激烈，哪家被《纽约时报》报道了就等于被宣称是最好的餐馆，是最好的广告，餐馆的老板巴不得天天能免费招待记者。但是《纽约时报》为了保证报道的客观和公正性，严格规定，这种吃饭必须自己付费，然后凭收据到报社报销，不准接受餐馆的免费招待，哪怕是一瓶汽水也不可以。

一位来华访问的美国新闻记者，有一次报道了一场保龄球赛，管理球场的老板送来了四瓶葡萄酒。这个举动当时让这位美国记者非常吃惊，感到不舒服，随后就把葡萄酒送了回去。对于自己的行为，她认为是一种职业的习惯，她说：在美国，记者组织制定了职业道德规范，不同的报社也有类似的规定，一些大报的规定非常严格。她提到《纽约时报》不允许记者收报道对象一分钱。除了我们上文提到了餐馆的问题，《纽约时报》的体育记者为了采访比赛，进场的门票都是在报社报销的。如果免费，就拒绝报道，必须同普通观众一样。《纽约时报》认为，只有当记者和普通观众一样买票，坐在相同的地方，报道才能具有相对客观的角度和感受，这种客观和公正是《纽约时报》多年来所一直追求的，也是赖以生存的基础。因为在美国，《纽约时报》就意味着公正、客观和严肃。

在一个世纪前被马克思嘲讽为“所有的报纸，都是一种商品，只要自己的商品不被损害，无论陈列在哪里都是毫无关系的”的英国新闻界其实对于有偿新闻同样给予有效的监督。一位来自英国新闻中心的研究者曾经在私下说过，由于经济和媒体之间的密切联系，新闻记者不可能完全排除有偿新闻的诱惑。但是，有偿新闻在英国往往是偷偷进行的，因为记者们都知道，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在英国，记者收受贿赂是采用“黄信封”的方式，如果被发现，必然遭受来自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如果消息让报社老板知道，那么就请你走人。

在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前，矗立着世界新闻的先驱者普利策的

一尊铜像，面色严峻清冷。这个人在80多年前，用自己的150万美元和对于正义的执着建立了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新闻学院，他希望这座院校能够传播他的关于新闻的理念。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记者说道：“只有最高尚的理想，最严谨追求真理的热望，最正确的丰富的知识，以及最忠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将新闻事业从商业利益的臣属，自私自利的追求，以及社会利益的敌对上拯救出来。”商业的广告性和新闻的严肃性是无法混同的水和油，必须加以严格区分。一切受利益驱动的新闻都缺乏真正的可靠性。这为现代西方新闻界所坚信。这一点也并非所谓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是世界全体记者所应该共同遵守的准则。

——追寻清水源头

没有人愿意出卖自己，几乎每一名刚出道的记者都在幻想自己能够像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一样穿梭于光荣与梦想之间。但是，在中国这块土壤上，这种梦想很快就会被一种由内到外散发出的臭气所污染，并迅速习惯这种高强度的污染，并以此为乐。

体制问题，这是一个中国新闻界无法逃避、但在不久的将来必须面对的问题，不管它有多么令人痛苦。当然，凭空评论一个体制问题是缺乏任何可信度的，简单地把情绪发泄到“体制不行”这四个字上，是对中国的新闻界缺乏任何帮助的。所以，我们还是从世界新闻的起源开始回顾整个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参照世界新闻制度的缓慢成熟过程来慢慢感受我们的新闻体制的弊病在何处。

——西方新闻人的原则是自由主义

西方新闻媒介可以是老板的私人资产，但记者所坚持的公正不一定是老板对付政治势力的工具，只有记者——坚持与向往公正的记者才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才是西方新闻从业原则的捍卫者。

从1665年起，世界上第一张近代意义上的报纸《牛津公报》在英国诞生起，西方新闻业已经走过了300多年历程。其间，经历了不新的变故与曲折。到今天，新闻力量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日常生

活和国家力量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它是除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外国家力量中的第四支柱,是西方新闻学者对于新闻在国家事务的角色的定位。

而在这 300 年间,自由主义思想始终在西方的新闻业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1644 年,以写出名著《失乐园》生花妙笔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诗人约翰·弥尔顿写出了气势磅礴的政论文章《论出版自由》,这短短的几万字文章给整个世界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弥尔顿认为,每个人都有将自己的思想诉诸社会的自由权利。他大声疾呼道: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一个首要部分。必须不受限制地了解各种不同观点、意见和思想。真理是通过各种观点的自由竞争和公开辩论获得的,不是通过权利赐予的,人的本性必然选择真理。弥尔顿的理论发现了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两个基本准则:“意见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

启蒙主义时期,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洛克的三权分立的基础上阐述了言论自由对维护社会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要防止滥用权力,除了必须以权力约束外,还必须看到舆论可以作为一种权力形式而对权力机构实行约束。而发挥舆论力量的前途必须实行言论自由。孟德斯鸠是最早提出言论自由对于社会的监督与左右的思想家之一,这种思想对于后来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这些自由主义的理论最早和最成功彻底的实践者就是当时一个刚诞生的国家——美国。1789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其中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就这样赫然写着: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这条宪法有力地确保了美国这个新生国家的庞大体制的健康发展,也造就了世界上最成功的新闻事业。

关于新闻自由最典型的解释包括:不受批准自由出版报刊,即

第四种权力

不必向政府申请营业执照或交付保证金,在政治、经济上不受限制,人人都拥有出版权;不受任何形式的新闻出版审查,可以发布任何新闻和发表任何意见;不受限制地自由接近新闻源。

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一直致力于争取和探讨新闻自由与政府、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并确立了如下原则:

报刊不受政府的干涉。报刊和政府的关系是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主张,政府不得采取任何措施来干涉、收买或控制报刊。政府的惟一职责是采取措施来保护新闻自由,为新闻媒介的采访和发布新闻提供种种方便。

报刊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从权力相互制衡的原则上出发,认为除了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之间具有相互制约的关系外,公正的舆论无疑是约束权力的另一种权力。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把新闻自由的实践看作是探索美国民主政治体制如何有效运行的伟大尝试。他反复指出:人民的意见是各级政府的基础。人民是统治者的惟一监督者。要使人民永远关心国事。假如他们一旦不关心公共事务了,那么你和我,以及国会和州议会法官和州长,都要变成豺狼了。人民通过报刊作为中介来监督政府。杰斐逊的这种思想后来演变为美国新闻制度中最重要的准则:报刊是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国家第四势力或第四种权力。

“意见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理论”是指人民让各党各派都利用报刊充分自由地表达各自的意见,是西方新闻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内容。试图用权威压制言论自由是不合理的。压制人们的言论或思想使之不能自由地表达,必然是一种对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智慧的掠夺。所以必须允许人们通过报刊进行真理和错误之间的讨论,不管正确与否。杰斐逊甚至说:“事实已经证明,当报刊不敢犯错误的时候,它就是软弱无力的。”

对事实的信念,新闻报道的目的不是向公众灌输某种标准的

观点,而是客观反映现实,让人们对外部世界形成独立的见解。公众报刊向读者提供的最崇高的服务是鼓励他们形成独立的见解。为了使新闻报道满足不同政治立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的个体需要,客观地向公众提供事实是新闻报道最高标准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

二次大战之后,一种新的新闻概念“知晓权”由美国著名记者肯特·库伯提出。知晓权是指社会民众对于上层建筑包括政府行为的了解情况。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知晓权是新闻自由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由于西方民众和学者的不断争取,新闻自由在西方世界已成为一个不可撼动的理论。新闻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公正无私和传播真理的角色。

1948年,现代传播学奠基人拉斯威尔在《社会传播与结构》一书中提出了新闻媒介的三大功能。一是监视环境。这是新闻媒介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情景,再现周围世界的原貌及重要发展的功能。传播学界的重要人物施拉姆曾经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新闻媒介是社会雷达。社会犹如一个有机的生物体,必须时刻监视周围的环境以确保生存的需要。在发挥这个功能的时候,新闻媒介经常向我们发出某些即将到来的危险预告,向我们提供有关经济、政治与社会的重要新闻,帮助我们确定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在这一方面,著名的《泰晤士报》曾经有过出色表现。1929年,它根据各种迹象在数月前就预示了经济大衰退的即将到来。早在1936年,该报的新闻评论文章就提醒英国公众注意德国法西斯正在预谋一场战争。二是联系社会。这是指新闻媒介将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环节、各类因素整合为一个有机体,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应付环境的挑战的功能。三是传递文化。这是新闻媒介将社会成员共同积累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经验、价值观与道德规范等从社会的老成员那里传递给新来者,表现与活跃社会的文化传统。

由于自由主义在西方新闻界的主导作用,使得西方的新闻媒

介主要属于私人控制的状态。在英、美、德、法等国家,90%以上的报纸是私人创办的,在美国,私营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总数的93%,私营电视台占全国电视台总数的76%。由于媒介属于私人控制,所以读者成为新闻媒介生存的主要支持力。所以,媒介必须提供一种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才能够长期和有效地赢得读者的信任。西方很多著名报纸更以监督政府和引导舆论为己任,对于新闻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进行大力的颂扬。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准则使这种自由和私有的新闻体制为整个西方新闻界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相对于西方的新闻体制,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国家在新闻体制和理论上显出相对的僵化。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尽管20年来,随着我国国门的打开与改革的深入,我国的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旧格局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打破。“公费办报,公费订报,只生不灭,优劣全包”是我们的新闻业面临的大问题。

旧的报业结构,严重妨碍了报纸在市场上展开竞争。一个不需要优胜劣汰的环境,必然像没有活水的池塘一样,容易滋生腐败和恶臭。没有竞争,没有生存的压力,于是,新闻信誉,记者的名声还算得了什么呢。新闻是一种产业,这已经是一个必须承认的概念。而任何产业的发展必须依靠一种健康和充满活力的竞争状态。这种竞争状态也必然会要求新闻记者具有相应的职业水准和道德。一位资深记者承认:那种成群结队地赶新闻发布会领红包、搭帮结伙靠红包采访的现象,正是新闻竞争不发达的表现。它致使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退化。如果报纸在真正意义上展开竞争,为争取市场和读者的信任而努力,那么,很自然会感受达尔文的自然进化法则,优秀、公正、客观等具有新闻性的媒介将保留下来,而那些品质低劣靠有偿新闻的媒介必然垮台。在这种生死存亡之时,记者与媒介之间必将会成为统一的一体,所谓“同呼吸共命运”。当这种良性

的竞争形成之时,报社对于记者的要求将不仅仅只是能写就可以了,“公正、客观、廉洁”等良好的职业道德将被视作一个记者最基本的条件,他还要接受多方面的专业上的选拔。成长为一个正式的新闻记者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

除了外部竞争环境的缺乏,一个媒介的内部机制不完善也同样带来记者对于职业道德的淡薄。记者在自己单位往往被分成三等。一是住旅店的,二是把本职当作第二职业的,三是老实肯干却是毫无创造的。这些人在统一的新闻体制下,都过得很舒服。一些记者依靠有偿新闻致富,但是对于这些,监督部门却没有相应的措施。僵化的用人制度,无法剔除不适应新闻工作的庸才,看起来风光的总编辑,可能连清洁工、门卫都难以胜任。

有偿新闻的存在还与我国陈旧的报道方式有关。计划经济与宣传需要对企业 and 经济进行乐观和夸大的宣传。具体企业也需要这种宣传。于是,新闻记者成了各个企业竞相拉拢的对象。这种状态必然成为有偿新闻的客观条件。

某家大报曾用大版篇幅报道北京某饭店盈利的通讯,这让外国同行相当不理解。在他们看来,饭店盈利哪里算得上新闻,不盈利办它干什么,只有破产,才算得是新闻。国外著名的报纸都尽力回避具体企业的行为和产品,经济报道注重于宏观分析,即使有少数具体企业或产品的新闻,那首先是取决于读者是否会感兴趣。而我们的报纸,靠企业提供的宣传材料编成的新闻实在太多了,几乎没有宏观分析的文章。××日报经济部主任自己承认:刚毕业的学生一天到晚忙于赶场写“饭票新闻”,这种新闻体制必然造就低水准与低素质的记者。

新闻体制改革,是一个我们必须面临的问题。一潭死水,必然需要新鲜的活水来冲击。但是,矛盾往往不是简单的。随着市场意识深入,我国的新闻媒介,不得不面对双重的尴尬。一方面是,旧有的体制意识和新闻意识还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遭受市场

的压力。

由于市场经济机制已经开始强行把新闻媒介投入市场,面对汹涌的商业潮水,新闻媒介一下子表现出缺乏经验和不知所措,开始把一概明确分工的工作混合在一起。这种错乱的分工直接刺激了有偿新闻的出现。

在一次由几位省报总编辑参加的座谈会上,谈到报纸如何走向市场。一位总编辑讲了他们的做法——各部门办经营实体;记者站独立注册兴办公司,每个部门承担创收指标。另一位同行立刻提出异议:采编单位参与创收,如何避免有偿新闻。结果这位总编辑振振有词地回答: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时代把报社推向市场,报社就得把记者推进市场,让他们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游泳。我首先考虑的是生存,几百人的大摊子啊。

把创收的任务交给采编部门,但是它们没有注册资格无法创办实体,而刊登广告是属于广告部门的权力。拉赞助子是成为新闻报导部门的出路。某电视台曾规定了每个部门的创收项目。在新闻部是这样规定的:开业、定货、展销三种可以收费,每次300元至500元;可拍5分钟以下的新闻专题,每个收费4000至5000元;可采取创办“窗口”及系列报道方式收费……该电视台还规定,这些创收利润60%用于各部发展事业,3%用于业务联系费,2%作为个人奖励……

为完成创收任务和满足自我生存需要,记者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寻找新闻和记录新闻,更重要的是去拉到广告。海南一家被查封的报纸《海南科技报》曾经发过几百个记者证件,这几百个证件的拥有者中,除了少量需要写报道外,大部分是用来像猎犬一样灵敏地寻找广告生意的。

先生存,后发展,这是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过去靠公众的税收来养活的报社,今天要养活自己了。报社面对市场的挑战,严重感到了来自市场的真实寒冷。从1988年起,纸价暴涨,发行费用骤

增,发行大战迭起……一系列西方新闻界熟悉的战争在我们的报业这边看来是如此的令人吃惊。在温室中成长,没有任何性格和能力的国内报社,在面对这种真实寒冷的时候,开始为自己的出路打算。于是,有偿新闻成为摆脱困境的一条最有效和最迅速、当然也是最短视的方法。出卖版面,出卖文字,这种一本万利的途径不需要任何技能就可以做得到。其实,在看起来最要面子的人们骨子里却流淌着“笑贫不笑娼”的血液。况且,出卖版面和那种古老而兴旺的职业比起来,仍旧是可以让人接受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古老的生存哲学今天演变成了“靠版面吃版面”。

针对这种情况,新闻出版署曾经在《报纸经营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严禁以新闻形式刊登广告”。1992年1月,新闻出版署报纸管理司抽查全国一百家报纸的版面约400张,根据最保守的记录,发现明显搞有偿新闻的报纸有10家,计21个整版面。整版整版地介绍厂家的厂长和产品,是最常见的方法。

“事出无奈”,这是新闻媒介的一片诉苦声中最响亮的声音。由于政府的拨款不足,新闻媒介的运作所需要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需要自筹。靠提高质量,扩大发行,吸引广告,这才是一条健康的道路,但是似乎远水解不了近渴。等到发行量上去的那一天,大家可能都已经被海水淹死了。所以,有偿新闻成了一条捷径,明知出卖版面的弊端和记者去拉广告的短处,但是,面对这一切,报社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况且,钱来了,生活改善了,到这时,谁还管这样做是否正确。但是,这种短期的效应是不能够长久的。只有做好新闻本身,提高报纸质量,吸引读者,才能真正获得长久的成功和发展。

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获知,已经有了相当一批报纸靠自身壮大的做法取得了成功。如我国,较早进入广告额超亿元的中国报业有《广州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羊城晚报》、《解放日报》、《南方日报》、《北京日报》(含《北京晚报》)、《经济日报》、《深圳特区

报》等等。

——公开“天机”：广告是靠不住的？

1998年山东的秦池已不怎么样了。但在1997年，秦池如日中天。1997年11月11日《中国经营报》消息，临朐的“胸”字以前许多人都不认识，但是现在已不一样了，因为秦池就在那里。中央电视台三次广告招标，秦池两次夺得“标王”，两次产生巨大的轰动。短短三年，它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发展成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于是人们按流行的说法将秦池单独归为一个“秦池现象”。1997年由于中央电视台不再允许白酒企业参与竞标，秦池就此也将远离“标王”的风景。新的“标王”能否续写新的神话，谁也不敢预测。但是，这一年围绕秦池的纷争太多，回顾秦池和“秦池现象”，我们也许总该记住点什么。机会常常是转瞬即逝的。1995年，山东孔府宴酒第一次夺得“标王”，当年效益就增长了5倍，但第二年，“标王”就被秦池拿走了，当年，秦池的效益增长幅度也是5倍。美国著名的战将巴顿将军说：“应不失时机地占领周围的制高点，并且坚守之”。这句话许多人都赞同，但商场如战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秦池便是把夺取中央电视台的“标王”当作占领“制高点”。有些事情常常就是说怪不怪，说不怪也怪。中央电视台广告部主任说：“当年的‘标王’孔府宴酒今年连来都没来。”其言下之意是，孔府宴酒失去了机会，从此也就风景不再了。秦池在自己利润只有6000万元时，就预支自己下一年的广告费3.2亿，这在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而明细人早就知道中央电视台不可能确保提供的广告时间，也就是说，秦池也不必出足3.2亿就已经确保了“标王”地位，这就是这场游戏个中的奥妙。然而，这个奥妙在中央电视台取消白酒招标资格之前，可谓天机不可泄露。秦池某方面成功了，这毋庸置疑。但这一年，秦池坎坎坷坷也遭致了太多的诘难。承受诘难的压力，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关“秦池现象”的话题可能就此将离我们越来越远，走出“标

王”光环的秦池还能继续造就辉煌吗?也许每个人都想知道下一个结果。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秦池亏损严重,回天无力——一个广告“神话”的终结,仅仅证明传媒是靠不住的,广告做不好,是要丢市场的,甚至把老本也要赔掉的。

——舆论监督部门更需舆论监督

1995年11月,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的罗辑对传媒谈到,中国新闻机构考虑到宣传的负面效应,很少利用新闻的特点直接去调查揭露领导干部中的贪污受贿问题,见诸报端的总是已成定局的案例。这等于承认了中国的新闻传媒在反映民众意见方面有相当局限。这种情况下,新闻传媒总在事件出现之前让人感到是一种对当前“形势大好”的误导。以监督为己任的新闻界也面临着更高级的舆论监督、执法监督和社会监督。

1998年夏秋之交,中国正死守大堤,严防洪水的时候,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却是克林顿与前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克林顿非常老实地承认错误,声称自己欺骗了国会、家庭和美国人民。此时美国的传媒大肆报道了克林顿丑闻,虽然检察官和法官没有对克林顿进行最后的定论,但克林顿已经老实承认错误,可见美国舆论的力量。如果等到最后定论,传媒才开始发挥作用,那么克林顿还会主动老实地承认吗?克林顿不是一个老实的人,但他的对手也不是一个老实的对手,所以监督才有了被监督,法才能保证神圣不可侵犯。

基于传媒对新闻线索的重视和读者对新闻媒介作用的尊重、信赖,本书决定披露这封寄自一家新闻单位并散发于各有关领导和新闻单位的情况反映信。后来此事经执法部门严查,对违法单位及责任人作了极其严厉的处罚。此前,某计算机报社长因受贿被判有期徒刑。本书认为这是一份很有研究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并对真实性作了详细了解,对当事人当事单位作了技术性地化名处理,出于对事不对人、重现象轻结论的考虑,可以作一例子,分析问题,

第四种权力

抑或治病救人,避免类似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有关单位请勿对号入座。

尊敬的各级单位及新闻单位:

我们是新世纪服务报社的工作人员,至今已为《新世纪服务报》工作6年有余(其建报7年之久),可以说是一群老报人了。但随着本地报业市场的迅猛发展,报纸盈利了,效益增加了,可《新世纪服务报》上下,从领导到中层干部都各自捞钱、掠夺原本属于国家资源的行为越来越离谱了,各种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我们仅仅拿社长兼总编辑××来反映一切。

首先是经营问题。××本人对报纸的经营运作一窍不通,在他的领导下,《新世纪服务报》的经营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向各类公司出让版面,让其承包(即出卖报纸版面),而且是把版面承包给个人和亲信。1995年以来,该报不断向主管单位申请扩版,每周扩版达320版,可自己又没有能力和实力去做,就把扩了的版面承包出去,借此经营方式得以发财致富。用××的话说就是“地多还愁没人种吗?”“我有山头,有旗帜,还怕没有人跟我。”于是就靠《新世纪服务报》的官办牌子,几年经营下来,富甲一方(作者语:这种经营方式按经济学的解释就是“权力寻租”,自己根本不用工作,就是靠政策吃饭,不投资净获利。可见权力是可怕的腐蚀剂,没有它不能腐蚀的)。

众所周知,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严令禁止把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报纸承包给商业经营公司和个人。因为公司和个人本着不同目的利用国家资源谋取个人利益,甚至会不顾国家法律法规,不顾社会影响。而《新世纪服务报》不仅把广告承揽权、广告证明权、广告发布权承包给个人和公司,尤为严重的是连新闻版面的稿件撰写权也一并包归个人、公司,报社不加以控制。举例1.1997年底,某广告公司承包房地产版,按照有关广告法规规定没有广告许可证的不允许刊登,可这家公司无论有没有广告许可证照样发

布,3个月发布40余条,惹来官司并造成极坏影响后,公司负责人携未交的包版款逃逸,至今欠报社23万元,不了了之。例2.1997年底由外省人承包的家具版,不按标准报价单收费,强行发布低价位的广告,自毁市场,到其主要负责人要卷款外逃时,被几经忠告的社长××仍视而不见,结果是当事人拿着16万元欠款依然在外逍遥。后来,外省人又将此广告转包给另一个外地来京人员,继续用转租的权力赚钱。面对这些人的长期拖欠,社长怎么不敢追究呢?还不是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该报有位承包人,将广告款攥在自己手里,先吃差价,后吃广告额18%的劳务提成。有位主编,大发有偿新闻,自己声称这是关系稿,是没有效益的,将“软广告”的款额私自收下,拒绝上交。更令人吃惊的是该主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暗渡陈仓,与一社会闲杂人员合谋到处骗广告客户,于一节日期间私自印刷了一期《新世纪服务报》特刊,私收客户2.8万元,这张“报”并未随《新世纪服务报》正常发行,完全是蒙蔽客户。而真正代理、承包这个特刊的金玉其外广告公司知道情况后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报社主要负责人××不主张查,他认为这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行为,可以内部解决(其实就是不了了之)。由于监管不力,上行下效,有些部门权力掌握者收取一婚纱摄影公司广告费1.9万元,却向报社上缴4000元,如此差价,如此寻租,到了不用掩人耳目的地步。还有一次,某主编对要求发布新闻的单位和个人索要人民币5000元。社长获悉后竟说这属“灰色收入”。

不言而喻,这是一笔笔交易。××袒护这些当事人,不仅他们经常送礼给××,而××本人也是如此,他自己也经常参加新闻发布会,吃、喝、拿、要,所谓的“红包”、“误餐费”、“车马费”都要,“钱是大大的好”,不厌其烦地“走穴”,不把办报放在眼里。甚至有下属的活动他也当仁不让地抢过来,获即得利益。试想,经常参加会议拿红包的领导干部能干好工作吗?这个人还频频抢部下小喽罗的

好事，争着拉广告，他的广告客户“某饮料”，常年给他送钱，他不允许报社任何人接触，自己大量发表软性广告文章和硬广告，却未向报社交一分钱，而实际上好处费5万元自己尽收腰包（有钱的日子不亦快哉？）。

按如此管理，现在全报社上下一条心“搞钱”，疯狂钱版交易，几个领导各有摊位，明争暗夺，表面互不来往，暗地互相拆台，社内同事成为冤家不在少数，他们在一起上蒙下骗，甚至打架斗殴的事都有发生。1997年按照所签上百份包版合同，本该达到5000万元的广告费，竟回收不到1000万元。社领导××对外谎称“流水5000万元”。看来吹牛不缴税就有人敢于大吹特吹，而且丝毫不费力气。

这种经营方式，不仅是因为××不懂业务，更因为××对钱的“偏爱”，从××选拔“人才”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各包版公司要想得到“价格非常非常便宜”的版面——不管多么便宜都是有可能的，关键要送礼。最大的包版公司西天广告在1997年7月送给××一台手提电脑、一部日本兄弟牌传真机，总价值2万多元。第二大包版公司金玉其外广告公司在1997年8月出资送××夫妇赴新马泰旅游，价值近万元。其他公司有送电器和手机的，有送食品饮料的，有送金卡和银卡的，大到上万的现金，小到水果蔬菜，××家里几乎天天丰收，送礼排队。难道就没有人提意见吗？这就是用人的学问了。只要看出这些干部不够“过硬”就大肆排挤。《新世纪服务报》原创办人因不满混乱经营提出意见竟被挤走。主要原因是：创办之初××就要把《新世纪服务报》办成自己家的金库，让财务报销自己妻子的医药费和差旅费。接着又来了一位治理整顿的领导先生，他提出32项振兴计划后很快被赶走了。现在剩下的干部第一不能对现状有什么看法，第二也多多少少下下水收收礼；第三是自身送礼或帮××要礼，而且这不仅仅是考核干部的标准，也是考核职员的标准。这样下来，有了“主子”的榜样力量，有了“主子”的

合“法”保护,作为职员的如果违法违纪或者不缴、少缴个人收入调节税,也是不允许的,要小范围解决。如果你有点正义感或说了真话,那就先做工作,后调离。这样搞得人人自危,当面就得表忠心,喊口号,全报社上下像是在搞个人崇拜,假得不能再假了,完全形式主义。在新调来的干部中,有的人来之前是社会闲杂人员,到了报社竟成了掌权者,收入高而不缴税,他们很会如鱼得水,组成小圈子,高喊××为“核心”,××竟很坦然地接受了。再看财务问题,创业7年,每到年底开除一名主管会计。因为一到年底,就要缴广告收入所得税,××就玩命绞尽脑汁,偷漏税收,谁会相信一个单位流水几千万,缴税却几十万……遗憾的是在领导也弯下腰敛钱的时候,也便到了快没有钱的时候。终于,这家单位被税务机关稽查大队给予处罚1000多万元,××像一颗大树轰然倒下。看来,“舆论监督部门更需舆论监督,未雨绸缪无终时。”

——有偿新闻到何时?

记得在一次新闻与市场经济的研讨会上,《南京日报》的一位副总编辑在发言中,对有偿新闻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南京日报》一年创收2000万元,我们靠什么,靠的是报纸受欢迎,读者多了,大批广告客户来了。靠有偿新闻能够挣到这样多吗?所以坚决不能给有偿新闻以合法地位。

他理直气壮地说这些虽然多少给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但是这的确是中国新闻界的惟一出路。对于报业如何和其他行业一样在竞争和独立中成长,我们或许可以参照西方的新闻体制和媒介的管理模式。

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发表以来的300年,经过不断的调整探索,西方国家已经确立了相对的新闻媒体体制和管理模式。西方各国的新闻媒介存在着三种所有制形式,即私有制,公有制,国有制。

我们仅说明一下私有媒介。这种媒介完全由资本家私人独资

第四种权力

或者股份制。如美国的三大广播公司 ABC、NBC、CBS,英国独立广播公司 IBA。西方各国的重要报纸,如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的《泰晤士报》,日本的《朝日新闻》等等,都是私营性质。私营的新闻媒介有以下特点:

1. 依托财团。大多数私营媒介都有财团的背景,像美国的三大广播公司和摩根财团关系十分密切。

2. 以赢利为目的。私营媒介的最高目标是赢利,赢利是所有私营媒介的基本方针。同其他产业一样,新闻也是一种产业,所以新闻机构是按照规范的商业原则进行操作。商业化,是它的巨大特征。

3. 广告是主要收入来源。这种观念始于上个世纪的一位著名美国报人。所以,无论电视台、电台还是报纸,其主要收入都是广告收入。私营报纸的发行印刷成本都基本高于销售价格,比如《纽约时报》的周末版厚达几百页,纸张费用远高于销售价格。所以广告收入成为支撑报纸发展的主要动力。

4. 以读者为中心。因为属于私营性质,所以新闻媒介为自己负责。而广告客户只会选择收视率高的节目和受欢迎的报纸。因此,报纸的一切工作中心是以读者为本,加之私营媒介的运行机制相对灵活得多,不断推陈出新。而且,由于有广大读者的监督,新闻媒介总是力争使自己的新闻节目及时迅速,报道面宽且有深度。

5. 肩负第四力量。私营媒介往往以“民众的代表”、“舆论代表”、“国家第四力量”的身份出现。为了争取受众,私营媒介直接代表民间抨击政府的纲领和政策,尤其对政府的丑闻不遗余力地揭露,比如著名的“水门事件”,就是由《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一手揭露的。由于独立负责,立场观点不受政府制约,新闻评论具有深度和广度,私人媒介往往在公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至于公营媒介和国营媒介,在西方国家的媒介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分量,而且言论主要代表官方立场,缺乏吸引力。

在私营媒介中,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负责媒介的财政预算,任命媒介的负责人和确定媒介的基本方针。在私营媒介中,经营权与编辑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禁止经理干涉编辑的自由,是西方严肃报纸的一贯准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办报模式。

关于这一点,美国报业巨子普利策早在1904年就曾指出:商业主义在报业经营中具有合法地位,但它仅限于经理部。如果商业主义侵犯了编辑权,那么它便成为必然的堕落与危险。

按照普利策的观点,中国的报纸几乎都处于这种堕落和危险之中。

——穷则思变

穷则思变,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这句话用在中国记者身上也同样适用。没有人愿意随便把自己放在可以出卖的行列,而且是在对方出价并不高的情况下。往往是在为生活所迫的情况下,出卖才可以成立。

如果高薪养廉的命题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低薪直接促使了中国记者把手伸到企业的口袋里。

时间是1998年,张×,北京一家地方报纸的记者。类似相当数量的北京记者,他惟一的不同是来自于外地。混在北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已经跳了几家报社。他和朋友租了一套房子,每个人每月一千元左右。可是,他在报社的基本工资也只有1500元,再加上稿费不过两千多。这是一个让他尴尬的工资,交了一半房租,剩下了仅仅够维持基本的生活,至于一些其他的活动,用这些微薄的薪水是无法达到的。

于是,他就必须要赶会,每次会议100元的红包至少可以解一下燃眉之急。这个年月,钱多是不会刺手的。于是,他就必须不停赶会,四处奔波,寻找财源,这似乎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

这是混在北京的记者中常见的现象。生存的压力,使得记者们放弃了我们所想象的那种职业习惯和职业道德。

第四种权力

睁开眼睛,参照世界其他各国记者的收入水平,中国记者的收入水平是属于低档次的。西方记者的收入在社会整体中属于中上层。美国报界著名记者的年薪可以达到10万美元以上,而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更可以高达几百万美元。法国的高级记者月基本工资是15000法郎,见习记者的月收入也达到8000法郎以上。即使是港台记者,其收入也一般是中国大陆记者的10倍以上。

如果把新闻产业看作与其他产业一样的话,新闻记者的表面收入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当表面的收入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灰色收入,隐形收入便开始茁壮成长了。根据常识,有偿新闻与记者本身所处的经济状态是有着必然联系的。

高收入吸引优秀的人才,而优秀的人才为行业本身带来更大的收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道理。美国最杰出的专栏作家李普曼接受《华盛顿邮报》聘用的条件是:年薪10万美元,并且一直保留终身,并负担其遗孀的费用。中国的一位记者问一位美国同行为什么在采访中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敬业精神。结果回答相当有意思:“只要不怕死,就能成名记者,只要成了名记者,就能发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不应该带贬义,人是由利益刺激的,不管对于什么职业,这都很正常。

收入高,也必然带来职业的严格审核制度。美国新闻记者的审核制度,在我们看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

——中国记者的收入状况

中国记者收入高不高?一项社会调查显示:1137元是全体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月平均收入,它确实高于同期全国城镇职工人均817元的水平。但调查发现,在不同的城市,收入也大大的不同,有的月收入可高达9000元,有的月收入仅在100元以下。在被访者中,收入最高的与收入最低的相差达200倍。那么,人们传说中的灰色收入呢?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自述说,没有任何本单位以外的收入。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天壤之别,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承认

他们确实拿过红包,而且有时候一笔外快可以达到 3000 元以上。

记者也有令人吃惊的“腐败”?身处第一线的记者,在这次调查中承认,职业道德的问题确实普遍存在,具体表现是:接受被采访单位的招待用餐;用自己的版面或节目时间段联系赞助;为自己的单位联系广告业务;接受新闻来源单位赠送的礼品;替一些企业当“枪手”打击另一家企业,获取暴利;要挟给一些企业曝光,不让曝光就交钱。还有一些新闻工作者为企业担任顾问、公关和宣传工作,在企业兼职的现象,也被认为是普遍的。有趣的是,很多人之所以违背职业道德和做人准则,并非因其不知。近八成的被访者都可以很明晰地说出,哪些行为不太合乎职业道德。上述所列多种具体表现,莫不在其中,他们显然是明知故犯。调查者认为,这意味着问题出在更为深刻的媒介运作机制方面,而这一深层的原因得不到解决,所有关于职业道德的宣传、教育充其量不过是“治标之术”,无治本之力。

2. 假新闻势不可挡

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梁不正塌下来。这个真伪难辨的世界没有透明度,假新闻公然过街,未见人人喊打。

中国假新闻不再触目惊心:玩弄新闻的是一流骗子,二流骗子和三流骗子。

我假,谁奈我何?

准确,准确,再准确。这是普利策在本世纪初对他的《世界报》的编辑记者经常重复的一句话。这三个单调一致的单词,其实构成了新闻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正确性。

——又是一个小保姆的故事:新三毛的传说

这是 1995 年冬天,广州城冒出一个自称“新三毛”的歌星。1995 年 4 月,“新三毛”穿一身藏袍,手拿一串佛珠,风尘仆仆地来到广州。自称是“来自新疆的歌手,到花城登台献艺”。

为了向人们表白与证实他的身份,他带来了一大堆报纸、杂

志,那上面有关于他的文字与图片的报道。另外还有一部长达 20 万字的自传体打印样稿,题为《“新三毛”流浪记》,据称那是他 18 岁辉煌人生的“忠实记录”。

据纸、杂志上关于“新三毛”文章、图片,与眼前活生生的“实物”对号入座,确属一入,令你深信不疑。

摆在面前的是新疆出版、全国发行的《华夏少年》杂志、《新晨》杂志,上面各有一篇题目相同署名不同的文章:《赤足天使新三毛》。另一期《华夏少年》封二封三为图片专题报道:《新三毛风采》。看完这些图片与文字,翻开厚实的电脑清样稿“纪实小说”,或许你会对版前这位“赤足天使新三毛”肃然起敬而惊叹“英雄自古出少年”。以下就是这些文章的最精彩内容摘要:

18 岁的“新三毛”,3 岁识字,5 岁写诗,6 岁走上舞台表演,9 岁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作品,10 岁在电视剧《格萨尔王》中扮演少年时代的格萨尔王,11 岁随青海省歌舞团出访欧亚各国;12 岁便出版了 20 万字小说《冬天的孩子》……

他曾涉足美国、俄罗斯、荷兰、法国、日本、新加坡、埃及和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并与王洛宾、张乐平、贾平凹以及台湾的齐秦、三毛、琼瑶等有过神秘交往……被称为“赤足天使”、“草原神鹰”、“神童”、“中国西部好少年”、“全国十佳少年”,是名副其实的诗人、作家、记者,是属于全世界的影视歌全栖明星!

在这辉煌的背后,命运又是对他如此不公:他的第一声啼哭是以妈妈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才获得了闯入这个世界的资格。12 岁,他出版了 20 万字的小小说《冬天里的孩子》时,和他相依为命的爸爸去世了,他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这种充满煌情味道的自述和介绍,在市场竞争激烈、渴望刺激的广州立刻引起了极大影响。各家娱乐公司的老板对这样送货上门的“名人”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充满了兴趣。各公司纷纷大开招聘之门。一些大发慈悲的好人慷慨解囊,捐资借款给他拍 MTV,

灌制磁带，一出手就是成千上万。

而这时候已经发达了的广州传媒，更是不愿放弃这个可能会带来销路的新闻点，新闻记者的鼻子几乎全都凑了过来，来嗅一嗅来自草原的味道。他们对于这“新三毛”的一切充满传奇色彩的描述，毫无犹豫地就相信了。热心的记者编辑在看完其动人的业绩后，都在自己刊物的黄金版面上大幅刊用、大块转载“新三毛”送来的照片与文章。迄今为止，国内不下 30 家报刊“炒作”“新三毛”。其中广州便有 10 多家，还未包括电台、电视台。

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带着记者的满腔深情和信誓旦旦的口气为“新三毛”呐喊：“总有一天，‘新三毛’的歌和他传奇的故事会让我们大吃一惊！不信，走着瞧！”……

这样煽情并不负责任的报道在我国的新闻界大鸣大放以后，我们在等着瞧，在等着大吃一惊，结果，我们真的大吃一惊。

“新三毛”是一个江湖骗子。就在“新三毛”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的第五个年头，人们在广州发现了这个神话其中的可疑之处。有一次，一位朋友在“新三毛”的抽屉里，偶然发现了他的家信，信中称他的母亲很想念他，要他回家看望一下母亲。继而，“新三毛”平常不肯拿出来给人看的身份证被发现，其年龄为 22 岁（实为 24 岁），不是 18 岁；从与“新三毛”的交往中，朋友发觉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并无什么高深造诣，是个平庸之辈；“新三毛”的言行诡秘，自相矛盾：一会儿说他父亲是某省委领导，母亲是某歌舞团演员，一会儿又说他是“格萨尔王”的后裔；他的本名一会儿叫李德宏，一会儿又叫“格萨·毛”；一会儿又说他的姑母在美国，一会儿又说在台湾……

更为严重的是，有几个好心人听说他要筹集资金拍 MTV，借了钱给他，却一直没有看到 MTV 的播出，而借款到了日期，他却避而不见，拒绝偿还。还哄骗说到北京向姑母借钱……

“新三毛”的形迹越来越可疑。为了揭开个中奥秘，使真相大白

于天下,以防更多的人受骗,一位新闻记者于1996年5月下旬的一天,从广州束装出发,跋山涉水,历时月余,行程万里之遥,几经辗转,深入不毛之地,终于找到了“新三毛”的出生地——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南门峡乡东沟村,进行了为期四天的采访,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互助土族自治县位于西宁市东北角,祁连山的南侧,海拔约4000米以上,抬头可望见山顶的积雪。这里清早仍可以看到地上洁白的冰霜。村上年轻的小伙子带领记者到了三毛家。

接下来的·一切令人除了感到震惊,更感到了被愚弄的滑稽感。“新三毛”的父亲没有去世,他好好地活着。名叫李世友,精明,清瘦,是个典型的农民。李世友60岁,老伴(“新三毛”的母亲)名叫何占秀,59岁,因老夫妻关系不和睦,已分居两年了,现何占秀随出嫁的三个女儿生活。而李世友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叫“新三毛”,他只说自己的儿子叫李德宏。李世友因三个女儿不在身边,老伴出走,李德宏(“新三毛”)又不回家,生活孤苦无依。晚上,老人还找来“新三毛”的堂兄李德泰来陪客,并委托李德泰给“新三毛”写了一封信。老人还用颤抖的手在信的末尾加上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李德宏你快回来 李世友 6月9日”李世友家为汉族,世代种田,与格萨尔王毫无关系。可是在“新三毛”的身上,找不到他父亲那种坦诚质朴农民气质。而东沟村的马村长只知道李世友,不知道李德宏,更不知道“新三毛”那辉煌的经历。村上与“新三毛”在一起读过书的同学以及老师,对于报纸上所吹嘘的这段履历,大为不解。小时候,他们天天在一起,没有看出他有什么特别,只知道“新三毛”在初中毕业时,弄到了一个“全国十佳少年”的证书,然后凭那本证书,进入了“哈尔滨艺术学校”。在“新三毛”就读的南门峡中学,老师对于这个现在的神话人物记忆犹新。他有两件事情最闻名:第一,靠抄写别人的作品使文章见报;第二,初中毕业时,他曾给当时的青海省教育厅厅长写过一封信,声称自己写的文章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但父母双亡,成了孤儿,请求厅长解决读书问题。

厅长委派秘书去核实情况。当时学校的老师只图把一个学生培养出来,就出具了“情况属实”的证明。那时候,厅长亲自出面,将李德宏保送至“哈尔滨艺术学校”学习。关于以后的事情,老师不太清楚,只听说他入学后,读了不到一年时间,便拜了李教授为干爹,以后到新疆不知干什么去了。

为了弄清“新三毛”与王洛宾的关系,记者来到乌鲁木齐。王洛宾已于1996年3月14日去世。6月中旬,在新疆为其举行的逝世百日纪念活动中,王洛宾的儿子王海成与《西部歌王》的作者李桦对于所谓的“新三毛与王洛宾的奇缘”表现出极大的愤怒。李桦回忆到,前两年有个叫作“新三毛”的年轻人找到他,说看了他的《西部歌王》后,很想面见王洛宾老人,要李桦引荐。出于礼貌,王洛宾与“新三毛”合了一次影。1996年春天,在王洛宾病中,“新三毛”再次来到新疆,在死磨硬泡之下,得到了王洛宾的住院地址。王海成对于这一切更是表现出了无法忍受的反感。他介绍,春节期间,这个叫“新三毛”的,穿了一身藏袍,要见在病榻之上的王洛宾,被他撵走。后来,“新三毛”捏造事实,说王洛宾拍电报,要他来新疆过春节,到飞机场迎接他,为他谱写歌曲等,纯属编造。至于“新三毛”采取剪贴拼凑的方法而炮制的与台湾作家三毛的合影,胡乱编造的与其他名人有交往,以及出国演出的请柬,漏洞百出,无中生有,不值一提。

这是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是一个农家少年一手炮制出来的传奇。但是,这个传奇却在一个号称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的国家里漂亮精彩轰动地上演了几年时间,并且感染了相当多虔诚善良缺乏思考能力的读者。1996年2月,广州某杂志在刊登《新三毛与三毛、王洛宾的奇缘》一文后,该杂志编辑部就收到了数封寻求“新三毛”地址、要求与“新三毛”结友的信函。清远市扶贫开发区一位女学生来信写到:我来信的目的是想认识新三毛。新三毛的事迹,他的18个春秋都使我深受感动。我想认识他,想给他写信,想

和他交个朋友……这种信件,这种善良而单纯的人在肯定了媒介大炒新三毛之时呈几何数量出现,他们轻易地相信了这个煽情的故事,轻易地相信了一场表演,但是在他们相信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轻信了中国的传媒。

他们以为那些白纸黑字的东西就代表真实,那些印刷在漂亮的报纸和杂志上的照片和声情并茂的描写就是可信的。然后,他们就为媒介营造的幻境而感动,然后就表现出传统的中国人的那种愚蠢和善良,还有商人般精明的眼光,出钱出力或者出感情,然后,他们就像进行了一次股票的短线投资一样,等待着巨大的收益。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那些媒介依旧在天花乱坠地吹出那个美丽的肥皂泡。

最后,肥皂泡被简单地捅破了,原因是有一个记者去亲身到新三毛的故乡看了一下。这么简单的举动,就戳穿了这么绚丽的泡沫。这看起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和意犹未尽。

——现代术士如何水变油

这是另一个由山野村夫和一群缺乏任何科学常识和调查能力的新闻记者创作的现代神话。在十余年间,中国第五大发明和王洪成这个名字占据了大报小报的主题。

王洪成,43岁,中等身材,表情多变。本应接受教育的年代,王洪成总共接受了四年小学教育,期间却因淘气和考试不及格,被两次开除。他养过猪,学过木匠,在创造神话前是哈尔滨公共汽车公司的一名驾驶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名合格的初中毕业生。他号称自学成才,经过数度实验于1984年3月隆重推出自己的新发明——水基燃料。如果凭空说水能变油,恐怕谁也无法相信。但是发明家王洪成用离奇的表演,确实令观众叹为观止。一瓶清水,只加一滴母液,摇晃几下,用不了几分钟,就配置出所谓的“水基燃料”,点燃它就可烈火熊熊,用它替代汽油来开车更加有力量。据说热值可达16410大卡/公斤。此项逼真的现代魔术表演,历经十余

年而不衰，观众数以万计，足见其诱惑力之大。只是，在不冷静和缺乏理性的时代，王洪成居然成功了，大报小报无限献媚，吹捧，几乎全球之水都可以变成油。后来，没有丧失良知的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和作了大胆报道的《南方周末》。随着院士和记者的揭露，司法介入，终于使凭借“水变油”愚弄百姓和科学的王洪成得到应有的惩罚。

——气功师有了“喉舌”

科学与民主，是当年陈独秀在中国“五四”时期提出的切中中国要害的口号。今天，民主虽然无法再提，可怜的是科学竟也消失殆尽。缺乏科学的严谨精神，这是中国记者的弊病。其实不仅仅是缺乏科学精神，而是缺乏最基本的科学常识，所以一群科盲的中国记者，在制造出了“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王洪成后，中国新闻界多少有点意犹未尽，继续在科盲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于是，中国当代的“华佗”出场了，带着满身的大师的霸气。他住在传说中大侠出没的终南山，开了一家能治百病的医院，他叫胡万林，一个再世的神医。1998年特刊《环球青年》这样评价胡万林（注：以下对话是经多次采访合成，因为胡万林太忙，对话每每被各种事情打断。限于篇幅，对话作过压缩）：

记者（《深圳风采周刊》冉记者）：你看病时远远地盯病人一眼，就开了药方，是不是有特异功能，或者说是“透视”功能？

胡万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理解：生命是一种力量的显示，每个生命放射出一种力量，也是生命的信息。当我通过意念用自己的生命力去捕捉病人的生命力，双方汇成一个焦点时，我就能感受到病人体内的变化，看出是哪个部位出了毛病。所以，我一直倡导，要认识生命力，捕捉生命力，培植生命力。

记：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胡：这说明你没有好好读过我的书，你得读书和研究。

记：人的各种疾病是怎么产生的？

胡：人体内发生的一些疾病都是因气血不调导致。古人认为，万病尽因阴阳不调所致。阴重生寒，热重生炙。除人为的疾病外，其余都是气血与气候所致。万病生于气，气分内气和外气，外气中含有湿、热、寒、毒、温等因素。疾病就是外气和内气斗争而产生的。外气总是要袭击内气。大气中有害气体含量很高，内气总要进行全面抵御和反抗，因情绪不稳，内气受挫，外气则乘机而入，疾病就产生了。

记：为什么有的医生治不好病？

胡：我认为：一是对病的认识不准，误识病症，错论病理；二是方法手段不行；三是不识药性，用药不对路。为什么顽症、绝症、不治之症越来越多？我认为：一是新病的发病率高；二是我们的治疗技术跟不上；三是中草药医生“二手货”太多，估计病症，大概用药……与这位记者类似，中国的新闻界似乎都陷入了这种煽情的怪圈，他们把中国人眼中级别最高的热烈词语毫不保留地赠送给这位大师。《深圳风采》、《文艺报》、《作家文摘》、《生活时报》、《今晚报》、《新民晚报》、《劳动报》、《金陵晚报》、《燕赵都市报》、《河南日报》、《福州晚报》、作家出版社，都曾陷入了这场热气腾腾的爆炒之中。

如1998年10月2日的《生活时报》在不引人注意处刊发记者从河南传来的消息：曾被媒体“包围”的“神医”胡万林最近落户河南商丘。经河南省商丘市卫生局发文批准，胡万林作为主治医师现正式在河南商丘卫达医院挂牌坐诊。《生活时报》记者认为“胡万林有多年行医经验，可熟悉、掌握中药1300多种，创建了‘运动医学’理论。他采用特殊配方和服药方式，快速摧毁旧的生命基础，快速培植新的生命规律，从而治愈了许多疑难症和绝症。在卫达医院开诊典礼上，儿童脑瘫患者家长、红斑狼疮、精神分裂症、自闭症、聋哑症等病患者进行了治愈后的现身说法。据悉胡万林之所以选址河南商丘，是考虑商丘地处中原、交通方便，消费水平较低，且附近

有亳州药都和中草药资源。这家媒体还保留了咨询电话。

似乎只有《南方周末》一家报纸对此产生了疑问,但很快就被淹没在喧嚣之中,并且不断被唾骂。不过,1998年11月16日《北京市场报》发表了另一种真实的说法:谁说“神医”失踪了?胡万林“卧底”北京。报道开头就证实,名贯江湖的“大师”、“神医”胡万林,现在就住在北京。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名誉理事南文政先生,胡万林肯定是在北京,而且是在一家医院尽自己的专长,一边给癌症病人治病,一边进修,向专家学习。在此之前,据说胡万林经常来北京,特别是在陕西终南山医院被取缔和商丘卫达医院“10.1”死人事件发生以后。

早在胡万林坐诊的陕西终南山医院被当地警方依法取缔后,胡万林就到了北京,并于5月10日参加一个由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中国气功科学》杂志主办的座谈会,会上,他说“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敢于做一个研究中华医学的勇敢的战士”。为胡万林做了大量广告宣传的柯云路到会发言,称“我们要证明胡万林是好猫”。当天,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司马南宣布“悬赏100万元”,准备颁发给有特异功能者。至此,胡万林、司马南京城交锋到了最高潮。随后,胡万林再次“神秘地消失”。因著《发现黄帝内经》一书、称胡万林为“当代神医”的柯云路再一次成为新闻界关注的“主角”,评论家鄢烈山认为“柯云路涉嫌共同犯罪”。始终与胡万林站在一起的柯云路对此评论不愿多表态。对胡万林较为知情的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管谦介绍,胡万林“执业”的河南卫达医院已有人来京,并带来一份关于“国际文化经济促进代表团到商丘卫达医院考察学习”的材料。材料称“以荷兰籍华人王琰博士为团长的国际文化经济促进代表团是慕胡万林大师大名才专门前来考察学习的”。这个代表团还将邀请胡万林去国外开一个名为“第三届世界亚裔传统医学大会”。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名誉理事南文政说,如果国内没法坐诊,胡万林就要到国外去,有不少地方邀请他去。东

欧、西欧及全球现在都在报道、关注胡万林生命医学的研究和治疗现象,介绍胡万林的材料已经上了国际互联网。由此可见,胡万林香得很。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失踪”在北京的胡万林不愿声张,行动相当保密。

请看胡万林因“故”出走背景:河南省商丘市卫达医院举行胡万林坐诊典礼是在1998年9月26日上午11点,胡万林出现在主席台上。会议主持人在典礼上对与会者和新闻界宣布“正式开诊”。当地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出席,有市委办公室的刘主任、组织部办公室的段主任、市纪检会办公室的刘主任、卫生局郑丙钦局长等,还有卫生防疫站的领导及北京的老朋友柯云路。

5天后正是10月1日,门诊病人何素云病发,医治无效死于卫达医院。10月2日,死者的儿子付磊聚集在医院要求出具死亡证明,当时有争斗现象发生,卫达医院一片混乱。10月5日,胡万林来到北京。之后,据说胡万林惦记那里的病人,又于10月9日回到商丘卫达医院。

中国气功科学研究所的知情者介绍,到了商丘,出乎胡万林意料的是他受到监视。但又出乎人们意料的是,10月17日,胡万林单独走出商丘,前往北京。紧接着,胡万林在卫达医院行医5天死1人已成为新闻界的关注焦点。

为了找到胡万林,记者特拨通柯云路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柯云路的夫人罗雪珂,她说柯云路和胡万林交往时间很长,柯云路写胡万林也是因为胡万林是发扬与创新中华传统医学,胡万林脱颖而出很艰难,很坎坷。至于医院死人是很正常的事,没有医院不死人的,关键要分清责任,分清是医疗事故还是心脏病突发,分清是不是与胡万林的药有关。关键还要看死者尸检报告。当记者问起胡万林有没有获得医生执业资格证书,罗雪珂称“不好说”,她不希望媒介报道她的看法。而中国气功科学研究所名誉理事南文政则说,胡万林有医生执业资格证书,是商丘市卫生局办的,但不在胡万林

手上,商丘市卫生局担心这个证给了胡万林,胡万林会到别处去,就没法控制了,再说,商丘卫达医院与胡万林签订了合同。当记者追踪卫达医院院长刘文春询问情况,刘的手机及电话却无法接通。

看来,胡万林为了行医,不知叩了多少家医院的大门。好不容易碰上这家卫达医院,可好景不到5天就“被迫”走出,不知下一步胡万林要走什么棋?是先获得医生执业资格证书,还是再找一家医院继续行医?

我国《刑法》第336条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害,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令人不解的是胡万林的老朋友柯云路公开说胡万林是“当代大师”、“当代华佗”、“当代模范”、“胡万林将在中华医学史上有光辉的一页”、“胡万林是了不起的,商丘市地方领导和卫生部门是了不起的、患者信任胡万林大师也是了不起的”,并表示“今后还要写他,继续对他支持”。1999年1月,从上海传来消息,胡万林被警方拘留。

中国的新闻界怎么了,屡次被这种缺乏科学常识的新闻所骗,并且还乐在其中。而受害最深的是中国的民众,他们当真对胡万林产生了顶礼膜拜的心态,在黑压压的人群中,胡万林俨然一副天使下凡的样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一条古老的准则,希望中国的新闻界能够明了这句话。即使制造假新闻,也应该朝高级的方向发展,而不要在这种常识性错误中,左右摇摆。

——“打假”新闻与新闻打假

中国新闻传媒有个极大的漏洞,即假新闻年年翻新,层出不穷,大有“后浪推前浪”之势。有些假新闻公然过街,并无人喊打,不知何故,莫非中国新闻有假由来已久?或者说职能部门失职而没有觉察?1998年7月间,《北京青年报》上介绍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在广大新闻界和广大读者中,对假新闻人人喊打的日子还未真正来

到。

例子是说河南郑州《大河报》记者刘昌武5月22日报道“全国打假办副主任叶柏林说‘王海们’无权打假”，到6月下旬已有数十家中央及各地媒体转发同一报道，一时引起各方争论，一些商家纷纷持报拒绝“王海们”，称“你们蹦达不了多久了，政府很快会把你们抓起来法办”，浙江的“王海”本可指望依据“消法”得到一笔假货赔偿，可报道一出，商场和工商管理部门只好暂停执法。消息传出至7月初，包括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在内的大媒体播发评论和质疑文章，其中倾向性明显一边倒：王海有权打假。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消法”起草者之一何山十分支持王海和“消法”第49条规定，他肯定“王海知假购假获得加倍赔偿是合法合理合道德的”。7月14日，《北京青年报》记者收到全国打假办刘汉其巡视员签发标有“可发，叶柏林已阅”字样的传真声明：“叶柏林说，我对‘王海现象’完整的看法有三点：第一，打假是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行为，企业、个人是起协调作用；第二，对王海打假我从来是支持的，这是一种社会打假、群众监督，是协助政府打假；第三，有些人浑水摸鱼，超出‘消法’规定索赔，这是我不赞成的。1998年3月，我在南京参加一个打击伪劣手机电池的会议。此后有四位记者采访过我，当时我讲了一些对王海打假的看法，我绝对没说过‘王海们’，无权打假，那些报道未经我看过，对此我一概不予认可。”而传播“叶柏林说‘王海们’无权打假新闻的《大河报》记者刘昌武说，这篇报道是根据参加南京打假会议的省技术监督局带回来的材料写出的新闻，并未采访过叶柏林副主任。但他同时表示，文中所述没有任何自己添加的东西。作为这则不实新闻的点评人，我感到刘记者的这个解释有点不明不白：其一，叶柏林副主任已声明自己绝对没说过“王海们”无权打假，而且是从来支持王海打假的。其二，《大河报》记者也没采访过叶柏林副主任，“王海们”无权打假的新闻又是《大河报》首发，那么，怎么就没有人承认他犯了一个没核实没采访就

发布新闻的错误呢？难道今天的记者就这样听风说雨？这则假新闻的始作俑者应负什么责任？叶柏林副主任是否应该起诉《大河报》等涉嫌制造和转发假新闻的新闻单位侵犯其名誉权而索赔？新闻主管和行政执法部门是否应该对传播假新闻者秉公处罚？

现在，一个清晰的结论已经得出，“全国打假办负责人说‘王海们’无权打假”是假新闻，但其对新闻媒介的重创是猛烈的，误导了商家和读者，也严重伤害了全国打假办的名誉，侵犯了叶柏林副主任的名誉权，理应依法处理，新闻界的编辑和记者们也应对此引以为戒。

——刘晓庆与克林顿的×级关系

这是一个容易让人误会的标题，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男人正在为他的所作所为而焦头烂额之时而接受世界媒体一轮又一轮的轰炸，因此他也不可能与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女人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尽管，他声称在与希拉里婚后有过上百次的外遇。

这是无聊的中国记者和媒介在穷极无聊时为这个从来闲不住的中国名女人编造的一个无聊的故事。在《戏剧电影报》第807期头版头条以《刘晓庆又爆新闻》为题报道：美国总统将在白宫亲自给刘晓庆颁发‘杰出演员最高荣誉奖’。美国方面已经派人至香港某电视台，通知刘晓庆。刘晓庆对此很高兴，并且认为自己完全应该得这个奖。

这篇报道充分发挥了中国人无端的推测能力，把这个无中生有的故事，描写得绘声绘色。不久，不甘寂寞的另一家报纸《成都晚报》又出现“颁奖纯属骗局”的报道，文章说：“据港台媒体报道，原先打算颁奖给刘晓庆的是旧金山的一个华人组织，可是该组织的主席已在7月23日前3天被联邦调查局以14项违反金融法规的罪名逮捕，筹款委员会随即被取消。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白宫一直表示克林顿总统从未答应出席类似什么筹款会，更不可能给什么明星颁奖。刘晓庆于7月21日赴美，得知这一骗局内幕时，十

分扫兴地打道回国。”这两篇看起来都是如此真实可信的报道在中国的新闻圈里很是风行一时，而一时间，刘晓庆顺理成章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和百姓饭后的谈资。但是不久，这两则前后不同的被无数家报纸转载的消息被证明是虚假的。

刘晓庆的经纪人靖军对媒介澄清道：“刘晓庆赴美领奖被骗空手而归”的报道是一篇假新闻，因为：一是刘晓庆因忙于筹拍电视连续剧《火烧阿房宫》并未赴美；二是领奖确有其事，是由香港著名美容师郑明明代领。奖牌有普通杂志大小，黑底金字，用印刷体英文写着：亚洲、美洲成就奖 刘晓庆 表彰其杰出的领导才能。得奖通知是由美国方面用传真发来的，因《火烧阿房宫》9月开机，在此前一个月作为这部电视剧的投资人之一和女主角的刘晓庆无暇赴美，就电告美国方面，对颁奖表示感谢，并告知他们将委托郑明明代为领奖。

这次颁奖是美国大选前民主党举行的一次大型 party，主要目的是为克林顿竞选总统造声势。据估计，为刘晓庆颁发此奖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华人感到克林顿政府的重视，有利于拉拢一部分华人选票，而非克林顿特别欣赏刘晓庆的演技。此次颁奖得主有科学界的知名人士，而演艺界仅刘晓庆一人。

华西某报的新闻是不是有点虚假？因为刘晓庆的7月护照根本没有赴美记录。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则新闻是由两个待业青年报道出来的。华西某报的编辑在很轻易地刊登这则消息后，又很轻易地就找到了这两个报道来源者，然后很轻易地澄清事实。然后，该报很传统地登出了两个青年的一份检查，扮演了一下正义形象。

——谁来给体育传媒打假

体育与新闻之间，似乎是最世界上最强大的商业伙伴。每四年一度的足球世界杯让世界各国的各家媒体都狠狠地捞上一笔，让各国的记者使劲忙活一下。体育赛事的不断出现和变化，为记者提供

了一份永不枯竭的新闻材料。

但是,仅仅依靠体育的新闻性本身还是不够的,中国记者在渴望巨大轰动效应的同时开始创造新闻。

在1998年的世界杯上,中国队虽然没能最终进入世界杯32强,但随着别人的足球之战愈演愈烈,我们不甘寂寞的新闻界也将假新闻之风愈演愈烈。

开幕式是最大的假新闻。本世纪最后一次足球盛大典礼尚未拉开帷幕之时,中国媒体有关开幕式的内容报道便铺天盖地而来。而其中对于开幕式五彩缤纷的内容报道,更是使中国人在6月12日晚上便早早地等候在电视机前。但是,演出却令绝大多数国人失望,因为它与国内媒体天花乱坠的语言所激发起的联想,相去甚远。

其实,那天开幕式的内容也仅限于观众所看到的。观众们之所以感到气愤,主要原因是国内媒体理解和报道的错误。世界杯组委会对本届世界杯安排了一次庆祝活动,一次正规的开幕式。显然浮躁的心态和发稿的压力,使中国记者难以有进一步调查核实的耐心,于是,一篇假新闻在想当然的情况下出笼了,而人云亦云的惯性让这一假新闻在国内媒体上大面积泛滥。也就是说,国内媒体对于开幕式内容的报道,实际上介绍的是开幕式前一天举行的世界杯庆祝活动。

内地媒体闹出的这个笑话引起了相当同行的关注。《明报》在开幕式前,便对内地媒体对开幕式报道有误进行了报道,只是内地媒体在得知自己的失误后敷衍过去。这条假新闻的受害者——中国观众便稀里糊涂地以为是那插播的广告挡住了他们的眼福。

如果说这种因为理解错误而造成的假新闻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生编硬造的假新闻就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意大利和智利队那场比赛的主裁判尼日尔人查迪欧在此场比赛后被国际足联勒令“卷铺盖走人”的消息堪称本届世界杯赛中最让人当真的假新闻。

在意大利和智利的小组赛后,国内不知从哪里编造出来了上面所说的那条新闻,作者在世界杯赛间近乎全天候关注世界三大通讯社有关世界杯的外电报道,当作者从他人嘴中得知这一消息后,惊出一身冷汗,以为自己漏过了一条重要的世界杯消息。当作者查外电却并未发现这条消息后,又不禁感慨中国记者的能干,因为三大通讯社对本届世界杯赛的报道投入了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力量,但他们却让单兵作战的中国记者得到如此重要的消息。

几天后,记者从外电的报道中了解此事的真相,才明白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假新闻。事实的真相是,国际足联在意智之战后,绝没有让查迪欧回家。他本人也是在数天之后,才对新闻界说当他将点球判给意大利后,就意识到自己的裁判生涯将从此结束。而国际足联对他的态度也只是希望他少说话,没有将他逐出世界杯的意思。由此看来,这条新闻只能是中国记者坐在家中守着电视机编造出来的。

除了上面两条明显的弥天大谎,在本次世界杯的报道中,零星星的假新闻更是随处可见。许多报纸都在每场比赛之后刊登教练评球或球员之类的文章。但细心的人发现,每场比赛同一教练在同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话,在不同的中国报纸上会变成意思大相径庭的文字。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语言之间的障碍。本次前往法国采访的中国记者能用英语进行独立采访的人少之又少,而懂法语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能将新闻发布会现场原汁原味地发回国内者更少,中国体育记者的外语水平实在堪忧。

在本次世界杯报道中,许多媒体所谓的“本报特派记者”、“本报法国巴黎专电”……大多数纯属子虚乌有。愈演愈烈的世界杯赛新闻大战中掺杂了如此之多的假新闻,实在让人感到担心。在此之前,甲A的新闻大战中就屡有假新闻出现。世界杯大战中假新闻迭出,使人不得不对中国体育新闻界的未来发展产生一丝忧虑。如果我们继续用这些假新闻来哗众取宠的话,是不是早晚会有一天,

读者会忍无可忍，揭竿而起。

“国脚如不能进军世界杯，中国足协高级官员将辞职以谢国人。”这是1996年在国内众多媒体上的轰动新闻，但是不幸的是，新闻的主角中国足协对此持否定态度。1996年8月，四川某报向全国各地关系单位发了一份传真，上面刊登了一篇该报记者的报道，文章颇具吸引力，主要内容是讲述如果国家足球队不能进军法兰西世界杯的话，那么中国足协高级官员将全体辞职下台，并煞有介事地透露此消息的来源是一个中国足协的秘密会议。

应该说这篇文章轰动了新闻界，并广为转发。众所周知，中国足球搞了这么多年，依然屡战屡败，令广大球迷十分失望。这篇带有激愤色彩的文章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共鸣。但是这篇文章发表后，却令中国足协置身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中国足球根本不具备进入世界杯的绝对实力，这篇文章不是加油，而是在逼迫。得知此消息后，中国足协对该文章发动了强大的反击，并通过当地的宣传部门查证此事的来龙去脉。而最后的查证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据说，此文的作者在去中国足协采访时，在电梯上遇到一高一矮两人，高者说：“我看世界杯如果中国再不出线的话，中国足协的领导人应该辞职。”矮者回答说：“没说的，据说有此动议。”

这位记者老兄在听完电梯上不知为谁的高谈阔论后，如获至宝，回到驻地后连夜赶写出文章。该文无论在足球界还是新闻界都引起了混乱，最后受到当地宣传部门的严厉批评。而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很多媒体报道高峰东亚四强赛前“失踪”了，但前卫寰岛队却郑重辟谣。这类小道消息层出不穷，中国人道听途说的本领在这个领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98甲A首轮结束后的3月24日，来自广州一家专业体育报《羊城体育报》的一则消息震动了足坛内外。这则名为《“首尾”之战有弦音》、署名为“肖晓”的消息称：“广州松日俱乐部的一位负责人在首轮松日0:2负于万达队后，向广州新闻单位投诉当值主裁判陆俊收受万达队20万现

金,从而判罚点球令松日队失利,并造成其他误判,希望新闻界能够给予曝光。”

这则消息在足协准备大力进行“打假”而且各俱乐部和裁判员刚刚作出公平竞赛的承诺之际传开,不啻为爆炸性新闻。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涉嫌者竟是连续三年“金哨”、“金笛”奖获得者的陆俊。受中国足协指派,曾在赴河南新乡执法甲B联赛河南建业队上海浦东队比赛后回京的陆俊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自从报道发表后,我家电话就没有停过,也不知道那些朋友是从何处搞来的电话。”陆俊表示,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好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名誉。一开始,一些媒体对于松日对万达的比赛所作的报道还都是局限在技术范畴内,他愿意对不同观点进行讨论。但是《羊城体育报》说他接受万达俱乐部的20万元现金的新闻,指责他违背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和中国足协的有关法规,而这样的行为是违法行为。这样的指责已经严重玷污了他的人格。陆俊准备把此事付诸法律。1998年12月12日,在北京海淀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一些大电视台进行庭审现场直播。至于谁是谁非,时间会给一个公正的结论。

可以说,随着体育传媒事业的急剧发展,媒介所需要的信息量迅速增大,体育新闻带动了报刊与广播电视的发展,也带来了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报道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抢独家新闻,做特色报道成为各家传媒战胜对手的有力武器。由于传媒的迅速扩充,体育记者的队伍发展迅速,相应的培训却严重缺乏,这些迅速扩充的体育记者中,对于新闻本身的要求没有准确或者根本没有任何了解。工作量加大,而体育编辑的水准的问题,也是造成虚假新闻的一个重要原因。假新闻已经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声誉,败坏了新闻公正客观的真实性,体育传媒打假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自由撰稿人靠假名扬天下

这是发生在媒体的一出精彩假戏,戏剧牵扯到散文作家余秋

雨与著名演员马兰。

1998年8月6日的《羊城晚报》“娱乐世界”发表了余秋雨的一篇题为《一个劝告》的文章。他很客气地劝告一个署名孙敏的作者不要说不真实的话。

近一段时间,孙敏在全国10余家报刊发表了《余秋雨和马兰》一文。余秋雨多次读到此文,而孙敏与他 and 马兰素不相识,也没有采访过他们二人,文章所写纯为子虚乌有,有的刊登过该文的报刊已向余秋雨道歉。但前几日,余秋雨在上海一家杂志上再见此文,终于忍不住操笔给此文作者写了一封劝告信。余说:您的文章写了一些生活琐事,全为我们说好话,口气十分善意,这是应该感谢的。但这些事,我们作为当事人怎么有很大一部分都不知道呢?有的虽有影子却大相径庭。我估计你是道听途说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写出来的。据上海另一家杂志编辑告诉我他们也收到了您的这篇稿子,曾打长途电话向您核实这篇稿件,您说您是在大街上遇到我的,我站在街道的路边对您说的,而且还同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同时请您发表。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当然我也不排除您遇到一个骗子或精神病患者的可能,而他的外貌又与照片上的我非常相像。

余秋雨的话委婉而尖刻,而这场戏的导演,这位深刻了解余秋雨与马兰生活细节的孙敏是怎样一个人呢?孙敏自称有“三大特异功能”,说余秋雨已给他打来电话,说是“误会”。又说,我没有采访余秋雨,但采访过马兰,是今年在安徽的一次笔会上。马兰很忙,每天要接受两三个记者的采访,记不得他是有可能的……说有10%的合理想象是给余秋雨一个下台的机会。当初《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他,这个记者写的过火。我并没有想向余秋雨挑战,尽管余秋雨是名人,我也是名人。结果余秋雨否认了这种说法。

孙敏还自我介绍说,他是“中国第一自由撰稿人”。自1988年开始,他在全世界报刊发表了5800万字的作品,每天约写一两万

字,投往全世界一万多家报刊,每月可以收到稿费2至5万元。他的全国编辑朋友就有2万多人,都给他寄报刊,他专门用一个房间堆放这些报刊。许多电影制片厂都向他约稿,北影、西影、上影都正在拍他的作品。有的杂志一期发他8篇文章,有的报刊一二三版都发他的文章。

孙敏还说他在重庆的三大传闻:其一,全国至少有100名女编辑暗恋他;其二,他有4位女秘书;其三,他将出国。孙敏说这些传闻都不确实,他已结婚,他身高1.80米,挺英俊。至于出国,尽管英、法等国家多次邀请他进行文化交流,但忙于国内事业,没去……这种明目张胆的胡说八道竟然堂而皇之地在一些合法刊物上出现,中国的这些编辑是干什么的?

——长城集团集资丑闻臭了新闻界

新闻界人士吴海民先生在其著的新闻出版系列丛书引言说“一等记者卖情报,二等记者炒股票,三等记者奔商潮,四等记者拉广告,五等记者会上泡,六等记者编文抄,七等记者搞投靠……末等记者写报道。”这是流传在民间的著名的民谣。

实际上对新闻事业危害最大的是有偿新闻。1992年6月27日《科技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既假又有偿新闻“长篇通讯《二十天集资二千万》,记者孙树兴”,第一个小标题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创举”。编者按:长城公司的做法“能从社会获得过去从未有过的大范围、高强度、高速度的补充……取得了突破性成功。”《中国财经报》1992年7月11日头版头条:孙树兴采写的长篇通讯“20天2000万说明了什么?”附有短评“筹集科研经费的好办法”,短评称:“这是1000万科技人员盼了不知多少年的事!……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使城乡群众手里的巨额存款有个新出路……人们将投入过去难得见到的热情。”《科技日报》1992年8月8日一版发表记者孙树兴的消息:“国家科委领导盛赞长城集团技术转让新方式”。同日《科技日报》第三版整版,头条是孙树兴的长篇通讯“筑起我们新的

长城——长城集团公司两个月来的巨大进展”，右下角是沈太福的大幅工作照，其余版面均为各地对长城集资方式的赞扬。《光明日报》1992年7月3日头版消息：“长城集团力克科技转化难关”。《金融时报》1992年7月31日头版消息：“长城集团筹资海南”。《经济日报》扩大版1992年7月8日头版通讯：“‘长城’伸向海南”。《海口晚报》1992年7月16日头版专访：“长城产业，充满希望的事业——记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在琼一席谈”。文中写道，李效时专程来海南长城科技产业公司视察时说：“长城公司充满勃勃生机，是大有希望的……我从深圳到广州，到海南，宣传了一路长城……长城公司开发的节能70%的调速电机，是含金量很高的技术产品，可以说是一场电机革命……”值得注意的是，《科技日报》上还刊登了长城公司一则一千余字的“启事”，题目是“请告交款地点和截止日期”。它以长城公司回答群众来信的方式，详细介绍了各地集资地点的地址、邮编、电话、联系人姓名等。这则“启事”最后写了这么一段文字：“最近两个月内的有关报纸，集中报道了长城机电科技产业集团公司及‘5028成果’，也可供大家参阅。这些报纸主要有：《人民日报》（1992年7月6日）、《经济日报》（1992年7月8日）、《光明日报》（1992年7月3日）、《中国财经报》（1992年7月11日）、《解放军报》（1992年7月15日）、《农民日报》（1992年7月15日）、《文摘报》（1992年7月9日）、《北京晚报》（1992年7月18日）、原《中国技术监督报》（1992年7月15日）、《中国专利报》（1992年7月22日）、《中国物资报》（1992年7月15日）、《金融时报》（1992年7月31日）和《科技日报》（1992年6月27日）等。”

细读这份“报刊汇编”，至今让人感到震惊是沈太福如此重视新闻宣传并如此细心地收集各报篇章，惊异于竟有如此之多的新闻媒介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制造如此集中的宣传攻势，也惊异于竟有如此之多的记者如此钟情于“长城”并发表如此之多的溢美之

词。本来是一个从事经济诈骗的犯罪分子，却被新闻记者吹成一个改革者，一个先进典型；本来是一种非法活动，却被我们党的报纸说成是“令人振奋的创举”、“充满希望的事业”、“为了千百万父老兄弟”、“是中国科技产业的一个创造”。报道中夸大之辞随处可见，把一种假定轻巧地变成肯定，把一个未知数变成计算结果，如有的报道把沈太福的所谓技术成果说成“按最低应用价值计，每年可节电400亿度”，“国内外潜在市场有数百亿”。报道中失实随处可见，如有篇报道说长城公司1992年共生产电机447台，产值达2.25亿元。但现在我们知道，该公司在近一年时间里只出售电机60台，价值仅600万元。这种夸大其辞的失实报道，无疑是在毫无原则地宣扬长城公司的“经营业绩”，自然大大增强了其集资的“吸引力”。许多投资者不正是看了这些报纸上的文字才踊跃加入到慷慨解囊的队伍中去的吗？

毫无疑问，这是新闻舆论的严重误导。一些记者参与报道，大概是缺乏必要的经济知识和深入的调查采访。但对有些记者来说，就不完全是如此了，他们是拿了沈太福的钱的。沈太福说了这样一句话：“为各类宣传和广告，我们耗资已逾千万。”在这里，他是把广告和宣传分开说的。广告本身就是宣传，而这里的宣传显然具有特定的含义。做广告是要花钱的，这不言自明；至于宣传要花钱，则是另一笔不明不白的费用。沈太福把“宣传”放在广告前面，可见宣传费用不在少数。那么，这一大笔宣传费用是给谁的，又是怎样给的呢？如果不是大骗局彻底败露，这笔费用恐怕永远不为世人知晓。现在好了，法官们在追查阶下囚沈太福的黑账，也追查到了记者们头上。原来沈太福是列着一个账单的，给了哪位记者多少，哪位主任多少，哪位总编多少，他记得一清二楚。看来这些记者们要跟着倒霉了。

位于北京市西郊的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厅里，1993年10月陆续押进了一些新闻记者。这些记者已经被逮捕了一段时间，现

在开始被法庭调查。他们被指控为接受沈太福的贿赂而发表虚假报道,受贿金额2万元至6万元不等。这些受审的记者请了自己的辩护律师,有的律师能言善辩,也许能够多少开脱一些记者的罪责;有的律师的辩护苍白无力,丝毫无助于记者减轻罪行。有的记者把从沈太福处领到的巨款说成是为其撰写广告词的合法稿酬,这也许能够减少一点受贿金额;有的记者不得已供出了自己的上司,看来这时候谁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再愿意为人代罪,而这就使涉嫌的记者队伍进一步扩大,包括个别报社负责人的入网。

从法庭调查的情况看,原来沈太福与这些记者并无深交,几个月前还互不认识。但结识得相当快,一张往返机票、一个密码手提箱和一个2000元的红包,便能吸引一批记者远赴海南岛采访其光辉业绩。由结识而到勾结,这个过程也相当快。短短几个月时间,有的记者已经成了沈太福收买下来的代言人。案情是在1994年4月披露的。在沈太福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第二天,原记者孙树兴、蔡原江被审判的情形上了电视新闻联播的画面。他们的受贿经过被简要地公开报道。

孙树兴从海南回到北京后不几天,东拼西凑地炮制出长篇通讯“20天集资2000万”。沈太福闻讯,当即购买从海南回北京的机票,当晚下飞机,从机场直接赶到科技日报社,找到孙树兴要求看看稿件。孙树兴拿出“编者按”请功,沈太福随即从身上、提包中摸出约3000元现金,塞到孙树兴的手中。

半个多月后,孙树兴和蔡原江陪同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在南方出差。沈太福火速赶到广州,住进孙树兴等人下榻的宾馆,拿出早已准备好的1万元现金分给两位记者:“你们辛苦了!来,一人5000元,权当辛苦费和一路上的零花钱。”两位记者随后促成了李效时赴海口时对长城公司的一番撑腰打气的讲话。

又是半个多月后,孙树兴在《科技日报》上发表长篇报道“用高

科技和我们百年不懈的改革开放筑起新的长城”，鼓吹长城公司非法集资的所谓“巨大进展”。文章见报的当天下午，沈太福把孙树兴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1万元钱，笑眯眯地放在桌子上。

而后，孙树兴再次为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活动呐喊助威，在多家报纸发表长文“为了千百万父老兄弟”。沈太福在他的办公室再次向孙树兴行贿1万元。此外，孙树兴还以“交通费”名义，接受沈太福贿赂1万元。

蔡原江与《中国建材报》记者张某受沈太福之托，共同撰写长文“长城产业高科技发展与‘五老’嫁接方式”，还未写好，沈太福就给两位记者一人1万元现金。当这篇长文在《科技日报》等20多家报纸先后发表后，沈太福又向他们俩各奖赏1万元。

此外，沈太福还分别奖赏孙树兴、蔡原江“皮尔·卡丹”西服一套，日本产“美能达”全自动照相机1架……从这些事实中，读者看到了什么呢？这不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上午发了报道，下午给钱奖赏；第二天印刷报纸，前一天用钱慰问；文章正在写，用钱来“加油”；文章发表后，随即用钱来“慰劳”。记者们是在一手交钱、一手交稿地卖字吗？他们的字可真是值钱呵！不，他们卖出的是新闻报道的权力，卖出的是新闻记者的良心！这一切都成了商品！

这些记者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记者”——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他原来不就是《科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吗？他在任总编辑期间，就曾为一个专版得到2万元的好处。这个专版也是商品了。他为沈太福所作的，不就是几句赞扬的话吗？几句话就得到了4万元的回报。他的话也成了商品了！

那次法庭调查以后，前往采访的权威记者与法官作了一次深谈。法官说：“其中有的记者，原来在单位就自私，不太合群，爱贪他人之功，爱占小便宜。落入此案关键是金钱在起作用。收了钱，拿了礼品，吃了宴请，玩了卡拉OK，就放弃了记者的职业道德。沈太

福给什么材料,他们原封不动抄在报道里;谈上几句情况,就来个笔下生花。他们有受骗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受贿的一面,受了贿就放弃职责和良心。有的记者后来发现沈太福云山雾罩,想脱身,但这时候已经受到贿赂,不能自拔了。现在将他们关在监狱里,是对其个体病体的治愈,也是对其他记者、对社会的教育。好好想想吧,犯罪分子要在新闻界寻找代言人,通过贿赂一个记者,就取得了一张报的宣传,取得了市场,最终取得了利润,带来滚滚财源。记者是物化了的人,记者是他们捞取钱财的手臂。

“典型的是《科技日报》主任记者孙树兴,他收受长城公司沈太福很多贿赂,而后在《科技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吹捧沈太福的报道,这在客观上起到为长城公司经济诈骗进行鼓动的作用。沈太福张口就说:‘要150万份《科技日报》!’而后将这些报纸广为散发,甚至贴在公司的大厅里头。这是利用了新闻宣传的特殊性,利用了群众读报信报的习惯性,危害很大。可以说,如果没有记者的鼓吹,就不会有那么多老百姓受骗上当。群众说:‘这不是沈太福自家的报纸,这是你们印的呀!我们不信报纸,信谁?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大报呀!’不实之辞登在报纸上比社会上的谣言厉害一千倍。底下传话速度再快,如何比得上印刷机的速度?

“我们认为这些记者的行为构成了受贿罪。在从事公务活动中用自己手中的发稿权给对方谋取利益,个人收受财物,就符合了受贿罪的条款。不能把孙树兴等人的报道,仅仅看作是个人行为的表现。他们有公务身份,有公务权力,有公务上的便利条件。虽然记者写报道有个人智力劳动的成分,但它是依附在公务权力上的。新闻行政管理干部与普通记者又有不同,他们介入此案就是更典型的受贿。对这些记者是要判的。判多少年?这要看数额加情节。不会因为你是记者,就特别关照。在法律面前,没有职业差别,人人平等,记者同样。

“孙树兴得到的钱名目很多,有加急费、加班费,个人从中提了

好几万元。这合适吗？说什么这是报社自我消化！是一种利益共有的消化！通过中介——往往是一级组织，搞受贿的公开化。这是变相的有偿服务，有偿新闻。有偿，不能一言以蔽之。谁给你有偿？你给谁有偿？记者不能越限，尤其是大限。”

“有偿，是依附在新闻上的赘生物，赘上了这么个东西，新闻的公正性还在哪里？不是偏向公正、正义、共同准则，而是偏向金钱、物质利益。这与股票市场还有什么区别？新闻还是应当追求真实、公正，不能受到任何附加物的左右和影响。谁给的钱多，就为谁说话，谬误岂不变成了真理？新闻搞有偿，法律能不能搞有偿？那还不变成了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了吗！”

这一串串资料是记录了中国记者如何出卖自己的卖身契。新闻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意义。这一长串的报纸成了沈太福的一家之言。这个轰动全国的案件给了中国新闻界丑闻的集中曝光机会，长久以来积压在中国新闻界的恶臭得到了释放，但是气味已经让人无法承受了。

收了别人的钞票，不仅仅替他发表新闻，进而篡改事实。有偿新闻和假新闻这对孪生兄弟在金钱的滋养下快乐茁壮但是病态地生长着。而这幕后的原因，更多的话是无法言说的，其实，只要参照一下西方的新闻制度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

——假新闻公然煽情

近来时有假新闻出现在传媒上，新闻事实编得有鼻子有眼。假新闻屡禁不绝，固然与报刊编辑把关不严有关，但也与出现了类似的事无章可追究责任，使造假者受不到处罚，不能惩前毖后、以儆效尤尤其有关。如果有什么事，“上面”就指示一番，而没有一部《新闻法》来规范新闻工作，既不能保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不能维护新闻工作的严肃性，假新闻这种害群之马的泛滥即是一例。苏建科、向敦厚在1998年第1期《年轻人》发表文章披露：近几个月来，一篇署名阿文的题为《良心雪耻行动》的通讯报道被国内多

家报纸刊载,该文写了湘西青年、四川某学院硕士研究生刘福军,邀请一个女医生在1994年寒假前夕去他家乡玩,在湖南岩门至山塘驿的长途客车上,六七个歹徒上车抢劫,并要劫色,把目光瞄准了女医生和末排一个漂亮女子身上。女医生由于有刘的保护而幸免于害,那个单身女子后被歹徒强暴。此后,刘福军因耻于没能见义勇为,放弃即将到手的硕士学位,离校前往案发地点找到受害女的妹妹一起去抓元凶。在麻阳,他们协助公安机关破了一起杀人案;在辰溪,他们发现一个隐藏很深的贩毒组织,报警后将其一网打尽;在秀山,他们抓获一伙文物盗贼;在怀化,他们解救了几个受辱的女青年,等等。最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配合公安,将称作“132”大案即作恶长途车上的歹徒抓到,湘西州法院将这个10人团伙的主犯魏某等判了死刑。刘失踪后,学校已于1995年6月将其除名。案破后,事迹传开,学校决定撤消原来的除名处理,并破例让他补交论文和答辩,通过后,可以发给硕士研究生文凭,并分配工作。

读了这个感人的故事后,我们的记者抱着寻找英雄的目的从长沙出发,赶往千里之外的辰溪。辰溪县是整个事件的起点,刘福军鬼义不为的地方是岩门(实际应为石门,是怀化的一个镇)至山塘驿,而山塘驿是辰溪的一个交通路口。

记者赶到辰溪公安局时,局里正开重要会议,从局长、政委到骨干力量都在。记者说明来意,没想到局长已读过该报道,而且对有关辰溪的内容很熟悉,他指着文章后面的“在辰溪,我们发现了一个隐藏很深的贩毒组织,报警后将他们一网打尽”说:“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人,也没有印象有谁协助我们破获过贩毒组织。”负责刑侦工作的熊队长从1994年起一直负责各类犯罪案件的侦破,他把文章从头至尾地看过之后说:“贩毒不同于吸毒,如果有这么一回事我一定记得。这里说的肯定是子虚乌有。”

记者的热情被劈头泼了瓢冷水,出师不利后乘上长途汽车,直

奔湘西自治州州府吉首市。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折腾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又经过一番打探,上午11时记者终于找到了自治州中级法院刑事庭的向庭长,追找英雄的热望顷刻间几乎土崩瓦解。向庭长斩钉截铁地说:“我院从1979年以来就没有判过魏姓人犯的死刑。文章开头提到的‘132’大案及表彰之事,都是不存在的。”最后,张家界和怀化地区的法院、公安人员也作了回答:1997年初春既无联合表彰之事,更不知有刘福军其人!

至此,采访者断定:这是篇虚假的报道,主人公及主要事件都是子虚乌有的。此文来自一份中南地区颇有影响的文摘报,此报注:摘自北京某大报。因此,采访者拨通了北京某大报的国内部电话,说明原委后,那边的两位编辑嘀咕了一阵,慎重地说“文章是由四川某家报纸的编辑传过去的,要我们找四川方面查询,并提供了电话号码。”后又将电话打到四川,找到了有关编辑,饶舌许久,那边仍不肯提供作者情况及“四川某学院”情况。等向他通报了调查结果后,作为一名编辑,那边才感到事态严重,答应亲自去找作者,并答应次日告之“某学院”是什么学院。第二天得到如下回答:作者不愿暴露身份,“英雄”不愿亮相,而且已经出国。原作者承认,文中人物,包括犯人,用的都是假名。作者并未到过湘西,“英雄”原型是湘西人,与作者较熟,经常向作者自叙在家乡见义勇为的故事。作者也承认,文章的主要故事情节也不真实,而是他糅合了“英雄”原型的几个自叙段子编织出来的。作者声称,动机是好的,是为了弘扬正气,而且,这样做对社会也没有害处。至于“某学院”,那边告诉我们,是四川体育学院。

最后采访者将电话打到四川体育学院研究生处,一位爽快的男上听完有关内容后,仿佛天方夜谭,大笑不已,并一连说了十几个“没有”:没有刘福军其人,没有表彰信及2000元奖金,没有研究生不知去向的事发生,更没有所谓“破例让他补交论文和答辩”。这位男士还说,十几天前已有四川某报查问过此事。

——一年之中大跌眼镜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管是新闻的整体,还是新闻的各个部分,乃至各个环节各个要素包括五个“W”,都应该是准确无误的。这是起码的常识,也是通讯员、记者、编辑所应具备的起码知识。然而近年来,新闻的真实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一些虚假新闻、失实新闻和失真情节,经过作者的精心写作、编辑的精心编排和有关负责人的精心审核,竟然堂而皇之地登上我们报纸的新闻版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急功近利,铸成大错。1993年1月12日,《深圳法制报》新春伊始就刊登一篇虚假新闻,题目为“带着对人间罪恶的切齿/她告别了令她耻辱的世界”,作者刘小狄为北京市自由撰稿人。在这个《社会·人生·法》的栏目中,作者叙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案例和法制新闻:河南开封市某印刷厂的G姑娘看到《婚姻与家庭》杂志上的一则征婚启事,于是到北京和潇洒的陈医生相见。然后,故事按照某些报刊所叙述的那种受骗、失身、卖淫的轨迹进行——G姑娘在陈医生家看录像、被占有、后被拐卖、被迫卖淫,最后自杀……此文刊发后,引起了北京《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的强烈不满和高度重视,因该刊从未刊登过这位陈医生的征婚启事,这是一种公然侵害名誉的不法行为。于是该刊主编又给深圳法制报写信,又找刘小狄本人,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面对事实,作者刘小狄不得不向《婚姻与家庭》杂志主编承认错误称:“那个征婚广告是刊登于某杂志的《婚姻与家庭》栏目,是一本社会上流行的大杂烩式的杂志,并非刊登于你们的杂志,此事与贵刊毫不相干。”后来《婚姻与家庭》杂志社又派人找刘小狄核实关于“她告别了令她耻辱的世界”一文的情况,刘小狄称:“本文的材料来源于朋友的聊天。”再问他,朋友是如何知道的,朋友是哪个单位的,刘支支吾吾地说:“我的朋友也是从他的朋友处聊天得知的。”请看,他得知于朋友的聊天,而朋友又得知于朋友的朋友的聊天。这不就是那种典型的“马路新闻”?这

样的新闻何谈其真实性？若问刘小狄，为何编造这种离奇的假新闻，用他给《婚姻与家庭》杂志主编信中的一句话说就是：“我过于急功近利，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功”与“利”，这就是刘小狄炮制假新闻的动机所在。

心虚造假，欺世盗名。利用舆论工具为自己的不良行为造舆论，这是某些人搞假新闻的另一种表现。某日，广州市司机谭某、汤某捡到两张五千元面额的存单，于是恶念顿生，拟向失主索取一笔“好处费”，但又碍于面子，便纠集龙某、刘某两个朋友一起按址前往。当找不到失主时，这四个人想把这笔巨款吞掉，次日上午，由刘某先向银行提取钞票若干，放一个“试探性气球”，若能成功，就全数取出来瓜分。然而好梦未圆，事情败露，刘某被收容审查。两个司机心中害怕，被迫交出存单。但为了掩盖和逃避“为什么24小时以后才交出存单”的责任，于是他们杜撰了一则“多方觅失主”的假新闻。这则新闻说：司机谭某、汤某驾车途中捡起路边一个塑料袋，打开一看，有各种存折、存单、债券。他俩毫不犹豫地按照袋内的地址寻找失主。而地址上的房屋正在拆建，后来他们几经周折才找到失主李某……这则假新闻《羊城晚报》等多家报道，流传很广，影响很坏。本来是“冒领巨款”，硬说是“拾金不贪”；本来是“恶劣行径”，硬说成“高尚品德”，而我们的宣传媒介又被这种不良用心所欺骗，也将“坏”说成“好”，其教训多么深刻！事后，经过群众举报和记者的调查，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本来面目。《羊城晚报》即刻发表了澄清事实真相的报道，并配发了《评一出滑稽剧》的评论，表示要吸取教训，不要被那些欺世盗名之徒所欺。

制造轰动，哗众取宠。早些时候，深圳一些报刊刊登这样一条新闻：2月25日，在深圳龙都酒楼，举办了一桌名为“龙都豪门宴”的酒席，每席不包括酒水标价为188888元港币，请客共5桌，耗资近百万元，请客的东道主是内地一家集团公司。此新闻令人大吃一惊，内地和香港的一些报刊也纷纷转载，不少报刊还发表评论。然

而经深圳有关部门调查,这却是一则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假新闻。事实是:龙都大酒楼在正式开业前,以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名义举办了一次试宴,“豪门宴”是由港方某总经理组织的。实际上,“豪门宴”每桌为 14050 港币,为什么说成 188888 港币呢?原来其目的是想以此引起“轰动效应”,为酒楼造势扬名,从而扩大影响、招徕顾客。这种造假的动机令世人眼界大开。

含糊其辞,导致虚假。1993 年 6、7 月间,《中国建材报》和《工人日报》先后登了两则“熊掌风波”的新闻。这两则新闻所写的是同一件事,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两则失实新闻竟是 1991 年一家晚报的一则假新闻的继续。1991 年 7 月 10 日,某晚报刊登了一条“错把 2000 当 20,熊掌好吃钱难付”的短消息。说的是两名女大学生,把菜谱上的每只熊掌 2000 元错看成是 20 元,吃了两只共计 4000 元,使两个学生目瞪口呆。后经了解,这完全是一则莫须有的虚假消息。1993 年初,某大学一位律师研究生对 1991 年那则假新闻进行了分析,谈了一些看法。而作为同室而居的另一位研究生杨传珍却以这次闲聊的内容为主线,经过艺术加工写成一篇新闻稿,在稿件中还用了那位律师的真名。

这则假新闻的情节是:那两位吃熊掌的女同学拿着 4000 元的发票找到工商局,指出那家饭馆出售熊掌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工商局要罚饭馆 2 万元。后来饭馆老板承认,这不是熊掌,而是牛蹄筋。最后老板退还学生 4000 元,并赔偿二人精神损失费 1000 元,还被工商局罚款 2 万元。此假新闻在《中国建材报》见报后,作者杨传珍还拿着报纸给那位一起聊天的律师看,而律师只是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老杨,你这回可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因为是朋友,也没再说什么。而后,早就认识那位律师的某市司法局的负责人任宛植,看了杨传珍的见报稿后,打电话问那位律师:“吃熊掌的学生到底是哪所大学”,那位律师则回答:“不太清楚,不知是师大是吉大的?”于是,由任宛植等二人写了又一篇假新闻《正义改写的熊掌

风波》，又登上了《工人日报》7月18日的版面。

从这两篇假新闻出笼过程看，那位律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一，他是律师，深知新闻造假的错误和后果；其二，这个故事是从他的口里分析、闲聊出来的，这个情况他自始至终是清楚的。其三，当他从《中国建材报》上看到杨传珍的假新闻后，没有严肃指出杨的错误，而是“半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话，而且“因为是朋友，也没再说什么”。难道朋友写了假新闻就不该指出么？其四，任宛植在给他打电话问这两个学生是哪个大学的时候，本来没有这么两个学生，但他仍回答说不太清楚，而且仍未制止任再次杜撰假新闻。可见，那位律师的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是造成这两篇假新闻出笼的主要原因之一。倘若他坚持原则、态度明确，假新闻就不可能一再出笼。当然，假新闻之所以出笼，根本责任是假新闻的制造者。

严格把关，认真治假。报纸上的假新闻能不能消除，关键在于报社编辑人员能否认真核实、严格把关。1993年8月初，湖北《楚天周末》编辑部收到一篇署名林华的题为《社会纪实：“黑色七月”忧思录》的来稿。这篇纪实的内容是：当年夏季高考期间，某中学副校长杨明以每套数千元的高价出售伪造的高考试卷，造成上当受骗的学生失踪和出走的严重恶果，最后案情大白，案犯杨明被逮捕法办。编辑认为，此稿虽然可用，但考虑到它所反映的事件非同小可，倘若失真，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于是编辑带着此稿驱车前往作者所在的鄂州市进行核实。他们先后到鄂州报、鄂州市教委、市政府办公室进行了调查，了解到：市公安局有个赵刚，而稿件中是马刚；旭光中学确有学生非正常死亡，但那是游泳溺水而非参加高考上当受骗而亡；第二中学也曾有副校长调离一事，然却与高考无关。事实证明这篇纪实作品是一篇改头换面、生编硬造的“失实”伪作。结果这篇假新闻被《楚天周末》的编辑“枪毙”（后作者又改头换面以《高考试卷诈骗案引起的悲剧》为题，在《北京青年报》等报纸

刊登)。可以说,《楚天周末》编辑部在杜绝和消除假新闻上,这种认真核实、严格把关,对读者对社会负责的精神值得称道。

作者造假,编者失职。1993年7月,《南方周末》在《人与法》的专栏中刊登了将近一个整版的题为“袭警案”的长文。该文作者为南昌铁路分局文联的刘玉顺(文章署名为于洋)。文章说的是三省交界处的B市发生的一起“极其恶劣令人震惊令人深思”的袭警大案:B市公安局东区派出所治安民警陈本昌,是一个利用职权敲诈勒索之徒。他早先的女朋友离他而去,被他敲诈5000元;他在聚赌现场抓赌,敲诈赌徒2000元。一次陈本昌在抓获“借种”丑剧的一对夫妇和一名司机中,共敲诈折合人民币4万多元。此后,三人为了报复,合谋将陈本昌及三岁的儿子杀死。

然而这起曲折奇特的案件,竟是作者虚构和编造出来的。为此,《南方周末》在10月1日刊登了“重要声明”,声明说:“经查,南昌铁路分局文联刘玉顺同志以于洋的笔名发表的‘袭警案’是一篇由作者虚构的文章,本报发稿前,因作者出差外地一个月而数次均无法与其联系上,认为该作者是有经验的老作者而轻率地发稿以至见报后造成不良影响。”该报同时还刊登了作者于洋致编辑部的信:“我写的‘袭警案’一文,是我根据社会上对某些公安干警违纪现象的种种传闻编写出来的,不是特指某地一个干警。”对于这样一起特大人命案,特别是公安人员犯法犯罪案,岂能不调查核实,“轻率发稿”?

10月29日,该报发表“沉痛的教训”。对刊登“袭警案”作了检查,谈了教训。这也是其他报社应汲取的教训。

以上资料引自《中国报纸月报》1993年第6期,(作者注:没有假新闻不一定就是好报纸,所以请读者宽容这些发展中的失误)。

——假的就要“严打”

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假新闻历来为群众所恶,为广大新闻工作者所戒。

新闻出版署主管的《中国报纸月报》，披露了 1993 年报纸 10 条假新闻，并把报社名称、作者大名一一予以曝光。其中一些假新闻还是相当有影响的报纸刊出的，十分令人遗憾。当然，当年的假新闻绝不止这 10 条。惟其如此，这个问题更应该引起重视。这些假新闻有什么特点呢？看一看标题，或许有助于我们探究个中的“奥秘”：“她告别了令她耻辱的世界”、“吃熊掌风波迭起”、“高考试卷诈骗案引起的悲剧”……在这些文字背后，若隐若现地显示出某些编者一个共同的“追求”——猎奇。因此称假新闻的一个特点是猎奇新闻，未尝不可。猎奇的主要原因，正如一些新闻工作者沉痛指出的：近年来报刊竞争日趋激烈，一些报刊编者社会效益观念淡薄，为追求经济效益和知名度，热衷于“热点新闻”和“轰动新闻”，从而使虚假新闻得以出笼。这是就编者而言。至于作者一面，情形就更为复杂。据了解，有的是为了出名，有的是为赚钱，有的是为了哗众取宠，有的为了挟嫌报复，有的是为制造混乱、蒙骗世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更有人是几者兼而有之。这就需要编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认真识别，严格把关。稍一疏忽，假新闻即乘隙而入，就更不要提有意纵容的情况了。

假新闻出笼，后果十分严重。无中生有的“邓小平谈新闻改革”与“中宣部关于合资办报的建议”、编造公安人员犯罪被杀的“袭警案”等假新闻在社会上流传，造成了不良政治影响，引起了一些思想混乱，有碍社会安定。“她告别了令她耻辱的世界”这一类假的“法制”、案例新闻，侵害了一些单位或个人的名誉，引起纠纷或法律诉讼，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痛苦。假新闻“两司机拾遗多方觅失主，30 万元巨款不贪占”，则系编者上当受骗，倒非为是，把冒领巨款未遂的恶劣行径美化成“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幸亏后来发现事情本来面目，在报上予以澄清，才有所挽回。不然，报纸版面岂不成了欺世盗名之徒售奸作祟的工具？这些沉痛的教训，不能不引起深思。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新闻工作,的确是一个比较新的严峻的课题,但是无论如何,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绝不能动摇的。现在有些报刊是企业性质,有些报刊兼有企业性质,大家在市场上都面临着竞争的压力,要扩大影响,要赚钱,这没有疑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新闻工作者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职责,在抓经济效益的同时决不能忘记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决不能忘记“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基本原则和职业道德。倘若把迎合某些读者的猎奇心理放在第一位,来竞争发行量,来扩大影响,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最终的结果,不但发行指标要成泡影,影响变成负面,而且还有办不下去之虞。有谁欢迎说假话、说谎话的报刊呢?

古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报而无信,又该如何呢?有鉴于此,建议新闻界也要实施质量的监督和检查,开展打假活动。在每年表彰和奖励优秀新闻的同时,也给假新闻曝一曝光。

第八章 暗箱操作 内幕曝光

既然有了新闻媒体,既然有了新闻记者,既然有了人间不平,既然有了是非公道,那么,纸里注定永远包不住火,是真金,黑夜里也能放光芒。

自然,那些危害人民与社会的蛀虫、人蛆们,也将随着新闻的有效监督而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原形毕露、丑态百出。而那些形同垄断的企业、机构的种种不合情不合理甚至天怒人怨的内幕,也势必因新闻舆论的关注而昭然若揭。

是真是假?孰恶孰善?正义的新闻给您一个公道——

1. 曝光“老大”

— 大硕鼠大口侵吞 2140 亿资产

《中国审计》杂志记者张驰、《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王烁、李勇以及《南方周末》记者刘洲伟在同一时期内皆撰文披露:自 1992 年 4 月 1 日以来,粮食系统平均每个月产生 29.7 亿元的窟窿,平均每天 1 亿元,6 年 2140 亿!于是,朱镕基总理点将 5 万审计员上阵。

在 1998 年 4 月 27 日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朱镕基总理指出这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遵循“四分开、一完善”: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

《证券市场周刊·财经》杂志披露,到 1998 年 3 月底,全国各

地的粮食贷款余额——也就是尚未收回的贷款高达 5431 亿元；而查一查国家粮库的家底，粮食库存值加起来只有 3291 亿元——两者之间，整整亏空 2140 亿元！这意味着 2140 亿元之巨的资金，或者被亏掉了，或者因挤占挪用甚至贪污腐败而去向不明！“要是不亏和不挤占这 2000 多亿元，该能办多少事！”朱镕基在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发出这番感慨。

2140 亿元，占全国粮食收购贷款总额的 39.4%！用这笔钱，可以盖 100 万个希望小学，可以建上万个工厂，甚至可以再修一个三峡工程。

为查清这 2140 亿元的准确下落，国务院决定动用审计之剑，朱镕基三次点将 5 万名审计人员厉兵秣马迅速上阵，八个部委组成的 16 个国务院检查组分赴各地督察。“不斩楼兰终不还”，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一次特大审计行动开始了！1998 年 10 月 16 日《南方周末》记者刘洲伟对此进行了报道。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1998 年 7 月 10 日，黑龙江省富锦市。面对审计署驻哈尔滨特派审计组的到来，富锦市粮食局、粮库及市政府的有关领导都拍胸脯说：“我们这疙瘩不会有问题。”

富锦市地处三江平原，是黑龙江省产粮区，富锦市粮库是黑龙江省 21 个国家粮库之一，常规存储量在 6 万吨左右。在清查中，审计组发现，这个粮库 1997 年 3 月、7 月、10 月的库存报表上显示：库存量从 3.4 万吨，突然增加到 10.6 万吨。进一步的调查还发现，当年 5 月 25 日一天出库粮食 2800 多吨。通过汽车运输发往大连，如果以每台汽车装 8 吨计算，需要 3500 多辆车，常规情况需要 3 个多月才能运完，但粮库 6 月 25 日的账上反映，销售款已然入账，两者的时间根本就对不上。种种蛛丝马迹被审计组探到，按图索骥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从 1997 年 3 月至 1998 年 3 月，富锦市粮库分 4 次集体作弊，伪造假凭证 3000 余张，造成收购国家储备 41570 吨的假象，套得农发行贷款 3967 万元，骗取国家政策性补

贴 339 万元。为了玩这个“空手道”，粮库十几名专业人员集中暗室，“流水作业”伪造票据。为达到以假乱真，他们将以前农民交粮的存根上的姓名、村屯抄写下来，编收粮数量金额，然后分盖各环节经手人名章。可谓机关算尽，煞费苦心。

对于粮库所做手脚，作为主管部门的富锦市粮食局并非不知道。1998 年 5 月，粮食局曾组织单位内部清查，发现粮库存在虚购问题，局里并未做任何处理，而且还想了个办法，让粮库将虚购的“粮食”虚销了事。被套取的 3967 万元贷款，除了购买资材、还贷之外，大部分以私人名义存入了别的银行。

发生在富锦市的事说明，在国家的粮仓里，还有这样一窝鼠，利用权力，挤占挪用粮款，丝毫不顾手持白条、满脸痛苦与怨愤的农民，也将紧缩开支、付出巨资的政府搁在一旁。但随着审计行动的日益深入，人们发现，富锦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隐藏在下面的还有数量惊人的“大老鼠”！8 月底，第一轮审计宣告结束，粮仓大窟窿终于初现端倪：从 1992 年 4 月 1 日至 1998 年 5 月 31 日，在整个粮食系统的财务挂账中，亏损挂账 1200 多亿元，挤占挪用约 800 亿元。这意味着自 1992 年 4 月 1 日以来，粮食系统平均每个月产生 29.7 亿元的窟窿，平均每天 1 个亿！粮食系统 300 万在职职工，平均每人每月能摊到近 1000 元！

与这些数字相对的，是一批批涉及金额动辄几千万、上亿元的违法案件。人们看到在这些吞食粮款的“鼠群”中，出现了三种“老鼠”，第一种就是粮食系统内部的“仓鼠”：在四川，一个县的粮食系统自 1992 年以来共挤占挪用粮款 1.57 亿元，用于盖酒楼饭店、对外投资及其他的附营业务；在吉林，一个小城市的粮食企业动用 1.6 亿粮款，购买了大批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几十年用不完的资材；在安徽，一个县的粮食系统挪用收购资金 6775 万元，不但办起宾馆、招待所、澡堂子、加油站等各种牟利的经济实体，还在黄山风景区设立了粮食局的“办事处”。为了假报粮食产量，安徽某粮站竟

在粮食入库单上写着“叶利钦上缴粮食 2000 公斤、克林顿上缴粮食 5000 公斤、刘邦、秦始皇等”……假冒触目惊心；在浙江，许多县市的粮食部门都有自己的宾馆、饭店，从二星级到四星级一应俱全；有的地方还把收购资金借给干部、职工，有的地方搞什么“节粮分流”，下岗职工每人分 2 万斤粮食，吃光分净……

盯上粮款这块“肥肉”的，还有地方政府及各个权力部门的“官鼠”：在辽宁，一个县的工商、外经和公安等部门长期借用粮库的农发行贷款 11.3 万元，最长的达 6 年，最短的也有 4 年；在内蒙古，一个县政府为解决县制酒厂无米下锅的困难，“拉郎配”将酒厂划归粮食局，消耗粮食企业资金 3100 多万元；在吉林，一些政府驻外地办事处简直把粮食部门当成了提款机，伸手即可以“借到”数百万……

粮款进入收购程序原本应当封闭支行，但令人无法相信的是，执行封闭职责的国家政策银行中也出现了偷扒粮款的“银鼠”：从 1996 年开始获准建立分支机构的农业发展银行，一年之内搞了 2000 多个分支机构，挪用 320 亿元，亏损 197 亿元。到 1997 年，这种情形有增无减，有的省级分行拿 1750 万元贷款先建酒店，有的地区分行把 1.79 亿元粮食专款贷给非粮食收购企业……初步审计分析表明，挪用粮款主要涉及个人侵吞，企业、部门挪用和政府干预占用几方面。那么粮款哪里去了呢？变成了宾馆、办公楼、职工住房，还有轿车、手机等高级消费品，以及拿去炒股，炒期货和房地产去了。亏损黑洞是怎样产生的？

除了 800 亿元的粮款被形形色色的“硕鼠”挤占挪用之外，尚有 1200 亿元挂账亏损，这一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资金黑洞是怎样产生的呢？

决策层认为，亏损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国有粮食企业降价销售，亏掉了”。按照现行政策，国有企业从农民手中买粮，所需资金均由农业发展银行提供贷款；卖粮的时候，售价是收购价加上

第四种权力

最低利润和合理费用,所谓“顺价销售”;最后粮食企业归还贷款,所赚微利用于自己开支,利息则由财政补贴。比如,一斤粮食 0.6 元钱收购上来,0.7 元钱卖掉,之后粮食企业留 0.1 元钱支付自家费用,将 0.6 元钱还给银行,这样就“搞掂”了。

可事实上企业没有照着来,却“逆向操作”:一斤粮食 0.5 元钱就卖掉,收回来的钱先补自己的亏损和费用,剩下 0.2 元钱还银行,有的甚至这 0.2 钱也不还,挂在那里吧。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 1995、1996 年两年粮食丰收,1997 年粮食多了,市场上价格降了,中央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出台政策要国有粮食企业按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保护价要高于市场价。如果此政策能够完全执行,粮源就会集中在国有粮食企业手里,以后顺价销售就不成问题。偏偏一些地方、一些企业不听话,没有严格执行政策,农民就跑到集贸市场上低价出售,一些私商低进低出,国有粮食企业粮食卖不出去,一急,也跟着降价,亏本销售,形成恶性循环,窟窿越来越大,反正亏了本由银行拿钱,吃“大锅饭”的体制加上银行失于监管,造成了“大黑洞”。

亏损原因第二个是“人多开销大,吃掉了”,国有粮食系统现有 400 万人,其中 100 万离退休,300 万在职;真正从事粮食收储工作的只有 100 万,其他 200 万人“什么业务都干”。人越多,成本越高,粮食越卖不出去。另外,大量的附营业务亏损,最终也都算到了粮食亏损账里面。

补窟窿与建市场。2140 亿元这个大窟窿,银行不能背,财政背不起,只能由国有粮食企业慢慢“消化”掉。决策层开出的药方就是“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按保护价敞开收购,顺价销售,资金封闭运行;改革国有粮食企业、精减人员。

在清查审计活动中,对被查实的案件,为数不少的地方和部门控制舆论,要“大事化小”,把群众的举报信指责为“别有用心”、“发泄不满”。据《证券市场周刊·财经》杂志披露,江西省某市粮食局

的职工,不敢把举报信直接寄给审计署举报中心,怕当地查出来被报复,而是辗转寄给了审计署在北京办的机关刊物。但更多的群众不畏权势,各地审计部门收到来自下面雪片般的举报信,仅审计署举报中心就收到 1300 多封。审计署有关人士称,这次审计清查活动效率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群众的举报。

群众有举报的权利,有追问的权利。事实上,这 2140 亿元,都是纳税人的钱,是群众存在银行的钱,他们有权追问这笔钱到哪里去了。

面对民间呼声,国务院的决心很大。对于这 2140 亿元的大窟窿,国务院要求各地粮食企业要在 5 至 10 年内消化 1992 年至今的所有亏损,为此,国家财政拿出 600 亿元资金,承担在此期间内亏损挂账的利息,挤占挪用的贷款也将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同时要求,自 1998 年 6 月份以后,国有粮食企业不允许再发生新的亏损挂账。

——剥去亚洲第一大站的华丽外衣

作为“北京的骄傲”的中国最现代化的交通枢纽——北京西站,是中国最大、技术最先进、功能最齐全的客运站,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还专门题写了站名。但是,当各类传媒对这座号称“本世纪最后的伟大工程”交口称赞之际,它的各种弊端也很快显露出来了。

首都北京,首善之区,观瞻所系,这么大一个现代化的工程,弄成这个样子,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这里有设计、施工、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资金不到位固然是原因,观念方面的问题恐怕才是症结所在。比如,工程未竣工就匆匆投入使用,在许多同志看来是很正常的,这其实是几十年来我们用“大会战”方式搞建设,搞什么“献礼”工程之类的惯常做法。北京西站存在的种种尴尬,是许多“不到位”的建设项目的一个缩影。不论主事者用意多么美好,所带来的问题发人深思。姜涛在 1997 年第 1 期《今日名流》上撰文介绍了北京西站的种种不方便之处,1997 年 1 月 31 日《南方周末》特

别转载此文。

在北京西站,接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人都有一次次这样或那样的经历。当乘车来到北京西站时,司机找不到通向地下接站大厅的道路,也看不见车站停车场地的指示标志,绕了两圈后,才见有人呼喊指挥着,将车停在附近的一个停车场,乘车人只能步行到西站主楼。而且,在西站绝对不好“打出租车”,远比几十年前就建好的老北京火车站“打车”难得多。进入大厅,面对纵横交错、上人下出的楼道、电梯和来来往往的人群,仿佛置身于迷宫,不知道路通向何方。在大厅里既没有整个车站的平面示意图,又无指示通向各个场所的路标,在记者欲找咨询台询问的一会儿工夫,就有两个人向记者问路。当我们终于找到站台人口时,离42次列车进站还差15分钟。预计几分钟的路程,却花费了半个多小时。在北京西站,由于设计、施工和管理等因素互相制约,一些设施妨碍另一些设施的功能发挥,甚至威胁到运作安全的事时有发生。此外,设计者对现代交通枢纽缺乏充分认识致使许多设施难以适应车站正常运作。

在北京西站,由各站台通向地下行包库的行包专用通道,不仅狭窄,而且坡陡,出入口太少(尤其是五、六站台),弯道照明也明显不足,有的地方甚至漆黑一片。各站台通往地下大厅行包专用通道两侧墙壁,被车刮划的痕迹很重,由上而下几乎连成一片。每个拐弯处两侧的墙壁都有被车碰撞过的痕迹。

记者了解到,北京西站到“97 香港回归”时尚未完全竣工,但西站高高耸立题有领导人字迹的阁楼却早已建成。据西站某负责人介绍:位于站房之上的十几个阁楼总造价在6000万元以上,由于没有什么实际使用价值,北京市和铁道部等单位谁都不愿出钱要这些阁楼。

在西站最令人提心吊胆的是进站大厅顶部的天棚玻璃。由于没有准确计算钢化玻璃和金属之间的导热及膨胀系数等问题,导

致玻璃天棚发生扭曲、炸裂,随时有碰伤旅客的危险。据悉,从西站运营到现在,共有一二十块玻璃掉下,砸伤8人,其中有人受重伤。客运部负责人说,车站工作人员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哪天玻璃炸裂后砸伤旅客。为了防止事故发生,大厅一度禁止通行,并临时在天棚底下安装了一个“防空网”。此举尽管起了一定保护作用,但使整个大厅不伦不类,而主要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目前,资金匮乏已成北京西站的主要问题。有消息说,在西站施工的35000名民工将近一年没有领到报酬,工程总指挥部拖欠民工的工资累计4亿元之多。民工中的大部分人都已回家,只有少量人员在工地维持,工程基本处于停工状态。预计北京西站要完成所有施工项目,最保守的估计也还需8亿人民币,也就是说西站至少存在12亿人民币的资金缺口。

据悉,目前由于资金紧张,北京西站的各施工单位都在陆续减人。依照有关文件,工程总指挥部的办公费用从对西站的总投资总额中提取,现在国家拨款日渐减少,总指挥部的办公费难以为继,只能艰苦度日。马副总指挥介绍说:西站是10大设计单位和10大施工单位共同设计和建造的,工地人数最多时达40000多人,三层作业同时进行,昼夜修建。但是,由于缺少资金,使得工程质量受到一些影响。如消防设备,到现在也未能全部配套安装。他认为北京西站的工程质量问题,原因是多方西的,其中主要是因为资金不到位,使施工达不到设计要求(本书作者特注:1998年11月,正值北京下了一场大雪,作者在北京西站南出口发现屋顶漏水严重,为防止落在地上的水乱溅,有关人就在地面上垫了一个小沙堆——好像是正在施工的工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方便了行人”)。

此间又有消息传来:亚洲第一大站的“蛀虫”被挖出,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披露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工程行贿受贿大案,北京西客站工程中的一群超级“蛀虫”陆续中箭落马。继该起行贿受贿大案之后,北京西客站工程中另一特大号“硕鼠”、原铁十六局一

处北京西客站工程指挥长杨文章又被揭去画皮、还其原形。据报道,被称为北京市“新大门”的北京西站其工程质量之低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投入营运两年多来,进站大厅顶棚玻璃接连不断地爆裂,装饰好的天花板大块脱落,门框变形开裂,管线渗水,号称 90 年代先进水平的电梯至今能运行的不到一半,所有消防系统硬件均未能投入使用。1998 年 9 月 17 日易铭在《山西青年报》采访报道了北京西站群丑之一的杨文章被挖出来的情况,贪婪的杨文章将 300 万元存款的利息 30 万元划为私有。

——提审“铁老大”和电信业

几十年来尝到由“垄断经营”带来甜头的“铁老大”,近些年却也初步品味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甜酸苦辣,并开始调整步伐,蹒跚地走向市场。

读者读了上述曝光铁路的不正常现象后,别以为新闻老与铁路过不去,其实是铁路老与自己过不去。请看作者邹漳在 1997 年 1 月 14 日《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如下:

客运列车:硬件欠“硬”,软件太“软”。初冬,在一列由北京开往苏州的空调直快硬卧车厢里,旅客纷纷议论:这列车只有优价(比非空调车增加了 60% 的票价),没有优质;上车后很难喝到开水;车上龙头坏了一半,另一半还时常断水;不少照明灯不亮,壁灯缺罩,窗帘缺环。列车长分辩说,车上设施属列车段管理,他除了及时反映外也无能为力。如果说,硬件不“硬”的问题在高价位客车中只属于特例的话,那么在正常(价格)的列车中就远非个别现象了。尽管许多车厢服役年代已久,限于资金未能按期更新,但总该有个起码的运行标准和维修时限,许多故障的排除和零部件的更换也并非难事,不能允许带“病”运行的列车贻害旅客。硬件如此,软件又如何?其实,旅客对列车服务的要求不外乎安全正点、清洁卫生、能喝上开水吃上热饭。然而,某些列车连这些简单的要求也未能达到。

深秋,在由西安开往昆明的一列特快客车上,满地的废弃物,拧开龙头却滴水全无,厕所更是不堪入目。口渴难忍的旅客,遍寻开水不得,只能掏钱买车上小贩的高价开水或饮料。知情人谓,诸多自由来往于车厢的商贩其实都是铁路职工家属,远道旅客这才悟到原来是列车内外合谋了一场“断水促销法”。

有人说,特快、直快进京客车尚且如此,普快、普客车的服务质量恐怕还要低。

就像列车的设施完好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一样,某些高价空调客车的服务质量,也从开始运行时的有口皆碑而跌至现在的怨声不绝。在一列北京至苏州直客卧铺车厢里,旅客的第一印象是烟雾缭绕、苍蝇飞舞。列车员对此的答复竟是“管不了”。而保证开水供应、定时清扫、到站锁厕所、垃圾袋装定点送下车等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纸空文。在所谓“优质优价车”上也出现这类问题,的确让人对铁路系统的管理力度产生忧虑。

令人望而生畏的餐车价格。铁路客运走向市场,餐车的承包制是一个重要手段,但它也日益显现出一个弊端:饭菜价格奇高。原来5元一盒的普通盒饭,现在已变成10元、15元不等。懂行情的旅客说,15元的盒饭(一个煮鸡蛋、几片火腿肠和一些炒白菜加米饭)成本其实只四五元,而其利润率却为200%!餐车上的饭菜价格更令工薪族生畏,最低价的一菜一汤一饭也要二三十元,有的列车干脆只卖30元以上的套餐。

平心而论,列车上餐饮的毛利率比普通饭店高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但现时列车上的食品价格也太离谱。一是常常只有一个档次,无选择余地;再者许多饭菜质价不符,有宰人之嫌。多数旅客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另谋它途,不再光顾餐车。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非良性循环:餐车就餐人数下降,用再提价或降低质量的办法弥补,就餐人数仍继续减少,这已成为许多餐车走不出的一个“怪圈”。不知谁能改变这些弊端?是否可以立法?是否保证大众传媒的有效

监督？

垄断的电信面临挑战？广电信息网络中心网络部主任方宏一说：“未来的广电电话的所有用户不用再多拿一分钱，不仅可以打市内电话，而且可以打长途。”

真正会使中国电信恐惧的时代似乎提前到来。在魔方无边的现代技术面前，还有什么“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呢？

请看《中国改革报·时代周刊》沈立钧、高昱报道电信电话的对手“广电线路电话的情况”如下：

山东淄博随着广电部门改建的有线电视光缆网联通全市，广电电话便成了市话。

淄博利用广电线路由来已久，早在 70 年代初，淄博农村就已经开始给少量居民安装“摇把子”电话。1996 年以后，随着广电部门改建的有线电视光缆网联通全市，广电电话便成了市话。广电电话安装费仅为 400 元—500 元，而且不收通话费，每月只需交 15 元—30 元线路维护费。这对用户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邮电部门坐不住了。淄博邮电局一面发函抗议广电局，一面忍痛把初装费从 2000 元降到 180 元——这是不是“跳楼价”，人们不得而知。结果出乎邮电部门的意料，降价之后两个多月，用户改投邮电网者不到 20%。原因是老百姓怕“邮老大”“秋后算账”，因此决定“宁愿吃点小亏”。

显然，在中国电信看来，对付广电这匹“黑马”要比对付“联通”更为棘手。因为广电拥有一个独立的线路网络和庞大的用户群，中国电信果用对付“联通”的办法来对付广电必定难以奏效（1998 年 3 月，国务院新内阁将原广播电影电视部的一部分信息职能连同中国电信、邮政合并到新组建的信息产业部后，不知两家如何化解矛盾）。

如今，人们已普遍形成共识，有线电视参与竞争至少可以给消费者带来两个直接好处。其一，打破邮电部门的长期垄断，迫使其

以降价应付竞争；其二，有线电视本身收费与成本价差距不大，不像邮电那样具有“暴利化”倾向。据广电信息网络中心网络部主任方宏一说，以相对价格水平看，中国电信收费价格是中国有线电视的 600 倍。通过有线电视网打电话，除了低廉的初装费外，“到那时候，所有用户不用再多拿一分钱，不仅可以打市话，而且可以打长途。”事实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透露，目前绝大多数省份的广电光缆都实现了省内联网，北京、天津、上海、山东等 14 个省市的有线电视网将于 1999 年互联互通，到 2005 年实现全国联网。

“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就是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因特网的三网结合。”方宏一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不能仅仅只是给消费者描绘诱人的通讯前景，更要为这种前景提供经济实用的保证，而这是最让人心动的。原电子部一位负责人甚至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只要国务院下个文件，允许广电部搞电话，肯定 100% 的用户都会被吸引过来。”

因为有线电视网上的电话实在太廉价。

中国电信的另一个对手是因特网电话。令中国电信头痛的新对手是“因特网络电话”。美国全球连接企业推出全球互联网电话服务，普通电话接通其值班的计算机，从日本打到美国，稍差的通话质量，收费是普通国际长途的 17%；IDT 公司的互联网电话国内长途每分钟只要 8 美分，而意大利的国际长途每分钟也只有 10 美分。美国著名研究企业 Forresber 估计，到 2004 年，美国电信企业因网络电话将损失 30 亿美元的销售收入。

虽然没有人能说得出中国电讯市场什么时候能合乎全球化潮流地对外开放，但是许多人都隐隐感觉到，这一天迟早会来到，因为中国不能不人关。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电信将如何面对即将失去垄断的现实。

——亿元偷漏税成了难言之隐？

《南方周末》记者刘洲伟给本文起的标题是“偷漏税一亿成难言之隐/恩威不服如何一洗了之”，请看1998年7月3日《南方周末》文章介绍：1998年6月10日，《经济日报》在显著版面刊登一则消息：“恩威公司两年偷漏税一个亿”。黑底白字，触目惊心。细看更觉奥妙无穷深不可测，原来举报者不是别人，乃原恩威公司副总经理荣金明。举报不久，身为四川省内江市人大代表的荣金明遭到过非法拘禁。报道说“组织者竟是恩威公司销售部副经理曾涛”，实施者是河北省公安厅的一位副处长（据说是因私人关系而动用警戒），绑架地点在北京，跨省作业，神通广大。

这则消息无异于放了一颗原子弹，迅速进入“核扩散”状态，十几家媒体竞相转载。

一个星期之后，恩威公司强烈反弹，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经济日报》“新闻侵权”，索赔1000万元。

合资：一场复杂的游戏。中外合资的好处是你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得到国内企业无法想象的优惠政策，但条件是你必须遵守“游戏规则”。若破坏规则就要出局，很简单。但事实上，这往往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游戏。

1997年12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下发了(1997)056号文，决定追补恩威公司1993—1995年少交的中央和地方税收共计106944000.57元，对其中认定为偷税性质的3998878.5元，处以一倍的罚款。罚款部分在半年内缴清，其余的可分二至三年入库。

在补税罚款清单上，有两个公司的名字，一是“恩威世亨有限公司”，一个是“恩威制药有限公司”。前者是恩威前身——成都恩威化工公司与香港世亨洋行的合资企业，成立于1990年8月28日，后者是恩威与香港商人许强的合资企业，注册时间是1993年10月。这两个公司复杂的发展过程造成了诸多意见分歧。1990年

10月23日,世亨洋行将其投资的港币150万元汇入“恩威世亨”的账号,一个星期之后,140万元港币被抽走,自此杳如黄鹤,没有再回“恩威世亨”的账号。1994年8月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这种抽资行为属于违法,世亨洋行应负主要责任,并判定“恩威世亨”合资终止,进行清算。但1998年1月8日,仲裁委第二次裁决,认为是恩威抽走了140万元港币。

恩威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不应该有两次仲裁,第二个仲裁是违法的,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消。

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分局根据假合资的举报,派员与四川省方面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恩威世亨”与“恩威制药”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税收检查和复查。1997年8月13日,国税总局稽查局检查组一位负责人通知恩威公司总裁薛永新到四川省国税局谈话,告诉他处理意见:“恩威世亨”补交1990年9月至1994年8月的所得税5700万元,“恩威制药”1993年11月至1995年5月所得税款3000万元。据称此决定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涉外司一份文件,因两次合资“外方资金不到位”不得享受合资企业税收优惠待遇。恩威公司打报告给国家税务总局,认为这个处理意见与事实不符,“恩威世亨”外方资金是按期到位的,并拿出了仲裁委员会的第一次裁决为根据,认为应是合资期间减少注册资本,而非“资金不到位”。至于“恩威制药”,1993年10月注册,1995年5月外方资金才到位——对此,恩威方面的解释是:1993年11月办理外方出资事项时,合资公司财务部经理刘正学玩忽职守,伪造57万美元银行存款证明提交验资——直到1995年1月双流县地税局接到刘正学举报,调查“恩威制药”假合资,恩威方面才察觉,于是补办合资手续,使外方在1995年5月汇入380万元港币。事情的轮廓基本上看得比较清楚了,焦点分歧在恩威公司是否为假合资上。恩威的律师覃天云说,“恩威世亨”的合资纠纷尚未澄清,企业至今不能进入资产清算,恩威公司的法人执照也未注销,这种情况怎能算假合

资？

双流县国税局曾代表国税总局对恩威公司说明意见，认为“两度合资中间有间断”，既然有间断，按法律不应享受合资税收优惠。这次恩威干脆说，认定合资企业法人资格不属税务机关的职权范围，而是外经委与工商局的事，税务机关“越俎代庖”，也就是违法！

1998年4月21日，双流县国税局开始执行国税总局的56号文件，向恩威公司递上了第一份处罚告知书，告知书说，1994—1995年期间偷税3998878.5元，处以一倍罚款。恩威表示不能接受，认为根据财务资料、海关资料，告知书也就是56号文件所列的偷税部分数据出入太大，内容严重失实。据恩威总裁薛永新说，时过半月，成都市国税局张副局长与国家税务总局人员到原告公司宣布，4月21日的这份告知书无效，要求收回文件。但薛永新拒绝交回。记者问为什么，薛说：“我当时很生气，跟他们吵了一架。”薛认为这份告知书所述内容是不清楚的，但恩威公司未能提供收回这份告知书的文件。

6月22日，双流县国税局又给恩威送上一份《税务检查初审意见书》，执行56号文件对“恩威制药”的决定，补税49624579.23元，同时声明，关于“恩威世亨”的应补税款，将另行通知。恩威公司马上复函双流县国税局，提出“恩威制药”资金迟到一年多，是犯罪分子刘正学的个人行为，不是企业行为，税务部门要谅解。如不谅解，那么认定资金是否到位，是财政部门的职能，未有任何财政部门对恩威提出异议。

恩威公司的复函里说：“税务部门个别领导至今拿不出落实的数据，下达的数据有严重出人，他们自己核实后，又自己推翻，反而利用职权要求职工承认我公司总裁薛永新指挥做假账，我们对此深感愤慨。”记者向国家税务总局和四川省国税局有关部门打电话，要求对此作出回应。但有关人士三缄其口，要记者等，等了两个星期，仍无回音。

举报人被非法拘禁。1997年8月9日,《法制日报》头版披露了恩威公司偷漏税举报人、四川省内江市人大代表荣金明被非法拘禁事件。之后,《民主与法制》杂志作了详细的报道。

荣金明现任恩威公司下属北京恩威妇女儿童保健品联合公司总经理。1997年1月17日晚,荣金明从设在北京市昌平县的工厂坐车回到住地——北京市朝阳区曙光里6号楼。刚推开车门,黑暗中突然冲出一个中年男人将荣金明紧紧抱住,另外几人冲向汽车将荣的秘书刘玉萍、司机李健强行拉出来,塞入另一辆他们自己的车中。荣见势不妙,大呼:“我是人大代表,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绑架我!”但无济于事,两名男子一左一右,将荣金明夹在座位中,并戴上了手铐。另一人开车,往河北省方向驶去。

当车到北京丰台与河北涿州交界处时,途中遇上车祸,路旁交警要求出示证件,荣金明大声呼救,却遭到一顿暴打,手铐也被紧扣入腕中,鲜血直流。18日凌晨,汽车开至石家庄市,荣金明被送到建设大街派出所,关进了拘留室,荣要求解手,看守人员说:“就拉在裤裆里吧。”直至下午1时,才有人将荣金明带到另一间小屋审讯。荣告诉他们说:“我是本届四川省内江市人大代表,希望你们出示拘捕证,否则我拒绝回答问题,对这种非法绑架并侮辱人大代表的行为,我表示强烈抗议!”荣没有得到答复,又被关进拘留室。下午3时,派出所一位所长将荣金明叫出来,说:“我们原先不知道你是人大代表,是四川省双流县要求我们抓人的,他们那边把问题说得很严重。现在考虑放你。”荣要求出示法律手续,把问题讲清楚,但未获同意。晚5时左右,派出所门外来了一辆囚车,车上跳下三个人,自称是四川省双流县公安局的,要执行任务,带走荣金明,荣再次强调自己是人大代表,对方回答:“你已经不是人大代表了,已经被罢免了。”荣金明要求看拘捕证,对方拿出一张由双流县公安局开具、双流县法院签章的逮捕证。之后,荣金明被押往石家庄火车站,上了189次列车。后来知道,对荣金明实施拘捕行动的是

河北省公安厅预审处副处长阎军和石家庄建设大街派出所的两名民警(这些公安成了什么?)。而逮捕证却是在荣金明被非法拘禁 24 小时之后,四川省双流县公安局来人出示的。据四川省内江市人大副主任田炜介绍,1997 年 1 月 20 日,也就是对荣金明拘捕的四天后,内江市人大常委会七位副主任集体接待双流县法院、双流县公安局 5 名干警。双流县法院向内江市人大代表出示了《逮捕决定书》,双流县公安局签发了《逮捕决定书》,双流县公安局签发了双公捕(97)24 号逮捕书。在此之前,双流县公安局多次派人到内江市人大常委会,要求常委会批准对荣金明的拘留,内江市人大没有批准。这次双流县公安局以诽谤罪非法开具逮捕证,未经内江市人大许可。

就在这天早上,189 次列车到达终点站重庆,荣金明被关进重庆市公安局刑警队,21 时下午 2 时,荣金明被押往双流县,途经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门前时,荣金明乘机跳下汽车,高声呼救,引来群众围观,重庆市检察院的同志将荣金明带人询问情况。荣金明向该院举报处的同志谈了有关情况,要求检察机关保护举报人,保护人大代表的合法权益。

当晚,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和四川省检察机关领导的督促下,双流县法院、公安局迫于压力,将荣金明释放。至此,荣金明被非法拘禁了 96 个小时,他的秘书刘玉萍失去人身自由 15 个小时,司机李健失去人身自由 24 小时。

谁是幕后操纵者?事情是,成都恩威集团销售部副经理曾涛通过私人关系找到河北省公安厅预审处副处长阎军,并请求他到北京帮忙抓人。阎军在没有办理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又通过私人关系率石家庄建设大街派出所的两名民警,直接参与双流县司法部门的非法拘留行动。对此,非法拘禁人大代表的犯罪嫌疑人阎军、曾涛已分别被河北、四川两省检察机关依法逮捕。

1996 年 4 月,荣金明向中共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国

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举报了成都恩威集团的一些问题。1996年8月,双流县公安局开始以诽谤罪嫌疑,要求内江市人大同意拘捕荣金明。内江市人大常委会感到案情非常复杂,询问了四川省人民检察院,该院有关负责人明确告之: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将此案移交四川省检察院负责查办,荣金明作为举报人,应受到保护。内江市人大常委会把这个意见及时转告了双流县法院和公安局,明确答复不能抓人。1996年8月,恩威集团行文免除荣金明北京恩威公司的总经理职务,但由于北京恩威公司是“恩威世亨”与全国妇联联办的企业,撤职一事未能奏效。

1996年9月12日,双流县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派人到北京冻结了北京恩威公司一账户,带走账本。20日,双流县法院几名法警冲入公司设在北京市昌平的工厂,强取印章、账本。后来这份裁定书被四川省成都市中院裁定撤消。

对于眼下新闻报道中,恩威公司销售部经理曾涛因参与共同犯罪嫌疑被检察机关逮捕,而恩威公司则被影射为“幕后指挥者”,或被认为对荣金明举报偷税案打击报复,恩威公司对此表示不满。

恩威公司认为,荣金明被非法拘禁,其缘由与原告无关,也与偷税案无关。曾涛被列为共同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未经法院审理,其犯罪是否成立,未有定论。

薛、荣恩仇录。1990年8月27日,“恩威世亨”成立之时,薛永新为总经理,荣金明为副总经理。有人透露薛荣二人创业之初曾是“难兄难弟”,当事业做大,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1992年8月14日,北京恩威公司成立,荣金明任总经理,任职书是薛永新签发的。

1996年8月,恩威集团向双流县公安局举报了荣金明侵吞公司财产一案。在此之前,恩威集团已行文将荣金明免职,但并未奏效。与此同时,荣金明写了《致全体恩威同仁的一封信》,在全国20多个办事处散发。薛永新向双流县人民法院告荣金明诽谤。

如前文叙述的那样,双流县公安局欲采取行动逮捕荣金明,未获内江市人大允许。非法拘禁事件发生后,双流县公安局和法院在向四川省人大作的情况汇报中,认为“荣金明在北京、石家庄所谓受‘绑架’‘逮捕’‘刑讯’等均与我县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无关”;“荣金明侵占公司财产事实存在,依据充分”;抓荣金明“程序合法,手续完备”。但1997年6月20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下发的一份《成都恩威集团公司举报荣金明侵吞公司财产一案的调查报告》认为:“从本案现搜集到的材料看,无证据证明荣金明侵吞北京恩威公司的财产。”

1997年3月,薛永新作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向四川省政协七届三次会议提交了第38号提案,提案中说:“我们最初是向双流县检察院举报荣金明的,法院一直不受理,后来才知道是省检察院个别负责人所为。没办法,我们又向双流县公安局举报,向双流县人民法院起诉,但同样受到检察机关个别负责人的阻碍,并再次举报荣金明侵吞公司财产。”1997年7月28日,四川省政协将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的“初查报告”转送薛永新。对此报告,恩威公司认为“检察院个别人庇护荣金明”。

荣金明的举报书中,则认为四川省有关方面个别负责人庇护薛永新,插手非法拘禁案……究竟谁是谁非,我们期待着有关部门快速查处,拨云雾而见青天。

“难言之隐”终见天日。1998年11月7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又一次曝光恩威集团偷漏税挨罚一事。同日新华社发布电讯稿,证实恩威集团偷漏税,国家税务总局权威人士介绍,恩威集团的两个合资企业享受了不该享受的税收优惠,已减免的税收应补缴,以前的欠税予以追缴,对偷税的部分除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以所偷税款1至3倍的罚款。补税、加收滞纳金、罚款合计为1.08亿元。目前成都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已对恩威集团下达了《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11月8日《中国青

年报》以“难言之隐终见天日/恩威集团补税挨罚 1.08 亿元”为题报道了此事。但受迫害人的情况如何,没有透露。

2. 官场风云

——组织部长:有钱能使磨推鬼

一个县组织部长,4 年间竟聚敛起总价 170 万元的资产——五处房产 60 余万元、存折 28 万元、出借款 70 多万元!而这位干部对获得如此巨额资产的解释,竟“理由充分”:“是朋友送的”,是“平时比较熟悉的人送的”——这位干部想声明这些钱财不是受贿而来。1998 年 4 月 4 日、8 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及《北京青年报》播发刘涛等报道如下:

县组织部长演绎现代版“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董根顺于 1993 年调任浙江温州市平阳县县委组织部长,虽然月收入不足千元,却已拥有巨额家产:五处位于繁华地段的商品房和铺面房,已支出现金 60 余万元;另有 70 多万元的出借款;检察人员还从他家的钢管里查找出 28 万元的存单。一位党的官员,拥有如此巨额财产。来路如何?

收受香烟,卖掉值十万元。董根顺的巨额财产引起纪检和反贪部门的注意。但董根顺对调查人员称:“绝大部分钱、物都是朋友送来的。如果不是朋友,单纯为某种目的,我是不会收的。”他的妻子也这样“埋怨”:“现在社会风气也不好。人家送东西来,你要是不收,就说你瞧不起他。”据调查,董根顺一家光是收到的香烟,攒到一批就卖掉一批,总共卖了十来万元。“朋友”们送这么多的香烟以及其他钱物,仅是出于友情、出于社会风气的影响吗?

使钱三万,顺利升迁到局长。董根顺所说的“朋友”,经调查其实都是平阳县机关各部门干部及镇的领导,也就是董根顺的下级。他们送钱、物给县委组织部长,用意不难理解。检察机关调查发现,董根顺收到最大的一笔行贿款出自平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杜有德。杜有德原本是副局长,1996 年组织部门考核干部时没有通

过。于是杜有德给专管干部人事工作的顶头上司董根顺部长送去3万元,让他在第二次讨论时“多多关照”。于是在1997年2月的第二次讨论中,杜有德顺利地升迁为局长。这怎么不是钱权交易?!这哪里是什么“友情”?!

感情投资还是权力投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董根顺170余万元的巨额家产只有15.3万元能被明确认定为具有明确权钱交易的目的,而其他150余万元,是来路不明的“灰色收入”。

虽说没有明确目的,但这些县乡镇领导和机关部门干部的“朋友”送些钱物,能说没有目的吗?几位送钱物者对记者说出了实情:“和组织部长搞好关系,总是有用的。”“我们这儿是小地方,不是大城市,有个人情上的事儿全都知道,不表示不好。”“有的时候董根顺部长的手下会给你打电话,说他家有什么什么事儿,就得表示表示。”有人常把请客送礼甚至行贿说成是“感情投资”,如果董根顺不是握有实权的组织部长,大家还会向他如此投资吗?说是“感情投资”,实质还不是“权力投资”。

部长的“家事”,敛财的良机。调查发现,董根顺收受他人送来的财物,多是在1996年8月和1997年2月。而这两个时间正是董部长搬家和子女上学的时期,也是按送礼者所说的“该送人情礼”的时期。问题是,一些送礼者并不想送这人情。可这个时候,董部长的手下会四处打电话,通知董部长家的某某“家事”,建议过去看看、坐坐,不送礼就真的显得不尽人情了。在平阳,组织部长董根顺的搬家、子女上学的“家事”,就成了他聚敛财产的借口和良好时机。平阳县的领导干部中,有70余人都给董根顺的“灰色收入”之增加作过“贡献”。

一万元,组织部长一定不敢收?“董根顺这个人比较贪。”温州市检察院的一位干部这样说。调查发现,上万上千的钱财董根顺会收,连一条烟两条烟这样数百元的钱财他也照收。难怪他收受的香烟积少成多能卖出、回收近10万元。

作为一名党的组织部门干部,董根顺如此“贪”,是一些人未能想到的。一位姓苏的退伍军人,他的父亲找到一位亲戚“指点迷津”:还不给送点儿什么。这位姓苏的就想,送几条烟吧。可那位局长又明确提出“再加点儿钱吧”,苏就想,送多少合适呢?索性不如1万吧,想必这么一大笔钱部长一定不敢收,会退回来的,没想到这位部长照样全收了。这样的钱董根顺却一口咬定是“朋友”送的“人情”。

顺口溜:不跑不送,不能提拔重用。党组织部门的干部,是为党的事业选拔合格干部。但董根顺甚至已有顺口溜在广大群众中流传:“不跑不送,不能提拔重用”,“跑了不白跑,送了不白送”。

董根顺自1993年就任县组织部长,不过三四年时间,就聚敛170余万元的家财,演绎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现代版。当然,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但这样的人能稳坐官椅三年之久,不能不令人深思。

——糊涂法官制造《新闻法》

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的时代,竟出现如此丑事:糊涂法官荒唐断案,本不存在的“新闻法”竟成了法院判决书中援引的律条。

众所周知,我国还没有一部叫做“新闻法”的法律,但青海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却认为有,并依此在庄严的法庭上判决了一起民事纠纷案,令人啼笑皆非。

1998年7月31日宋建华在《北京青年报》报道:1997年元月27日,《青海法制报》刊登“古稀老人该去何方”(以下简称“古”文)一文,报道了西宁礼让建筑公司经理孟宪清采取强制措施,撵走公司值班老人马正才,令老人无家可归一事。礼让建筑公司却认为马未尽职尽责,在值班期间多次丢失财物,给公司造成损失,属正当辞退,而“古”文多处报道失实,严重侵犯了礼让建筑公司的名誉权,给公司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于是上诉人民法院,控告《青海法制报》严重侵权。

礼让建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天恒在起诉书中称:《青海法制报》的报道,多处违背了我国《新闻法》的有关规定,因此要求被告立刻停止侵权行为,赔礼道歉。众所周知,我国还没有颁布出一部叫做《新闻法》的法律,就连这方面工作先人一步的广东省,其地方性法规也仅仅是草案,还未经人大常委会通过。

如果说律师当中难免有滥竽充数者的话,几个月后,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就实在令人感到啼笑皆非了。在这份编号(1997)中民初字第167号的判决书中,由审判长郭春花主审的该案一审结论为:“本院认为:被告青海法制日报社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盲目发表此报道,违背了我国《新闻法》中真实性的原则,给原告西宁礼让建筑公司造成名誉上的侵权,应承担民事责任。”

对此,《青海法制报》有关人士说:“这简直就是对神圣的法律和庄严的法庭开的一次超级玩笑。这样的判决怎么服人。”

此事一经披露,青海省地方媒体纷纷予以报道。7月20日,新华社亦发出通稿,文章最后评论说:“此案所暴露出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发稿前一天,记者电话采访到审判长郭春花,她对判案过程中出现如此疏漏的解释是:“因工作忙造成粗心大意,主要是笔误。”

据记者了解,和郭春花共同审理此案的还包括代理审判员李江红、屈江涛,书记员金飞英。按照法院的工作程序,判决书成稿后,需经审判长或副审判长核实,由主管民庭的副院长签发,此外还要经过合议庭合议,然而就是经过了这么多程序,“违背了我国新闻法”的字样依然出现在判决书中,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无独有偶,审判长郭春花“太过粗心大意”的地方还不仅仅在一个《新闻法》上。判决书中,法院一直称被告为“青海法制日报”,而事实上,该报每周只出两期,非日报,真正的名称应为《青海法制

报》。据一位了解此案的律师称：“如此简单的错误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都没被发现，使人很容易怀疑法庭对其他事实认定的可靠性。”

新接任的主管民庭的马副院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事情发生后，他已召集民庭所有人员开会深刻认识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强调今后办案一定要一丝不苟。”他认为，出现这样的错误是法院的一种耻辱。

据记者了解，审判长郭春花已作出书面检查，但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据悉，该案目前诉讼已全部结束。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指出城中区人民法院“将上诉人误写为‘青海法制日报’及‘违背我国新闻法’的提法有误”，而省高院最终改判《青海法制报》胜诉，这是新闻工作者的胜利，尽管目前没有《新闻法》。

另有关于人民法院的丑闻传出：1998年12月1—2日，《北京市场报》记者在山西运城地区永济市人民法院采访并旁听了一起审理法官做“假案”诈骗企业的大案，由运城地区检察分院反贪局侦查、运城地区永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把做假案的运城地区河津市人民法院经济庭副庭长杜国太、副院长王建福以枉法裁判罪和受贿罪推上被告席，永济市人民法院一审，证实杜、王二人做假案，参与制造假欠条、假起诉、假审理、假判决，使当事企业蒙受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焦点访谈》节目对此进行了报道。运城地区检察分院反贪局办案人士认为，像这起全假的案件，在全国尤其河津市并不少见，而贫困地区更甚。可以说，像杜国太这样知法犯法的法官，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比一般犯罪要可怕。国人应引起注意。

第四种权力

——好大喜功与南京长江大桥“结缘”

1998年7月20日《民主与法制画报》朱荣康报道,南京市1998年6月初又一次郑重向社会宣布:因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面补修的需要,6月6日、7日两天7时至13时,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外地机动货车通行……此消息一传出,在江苏省内外引起一片疑问:大桥怎么又要修啦?!

善良的南京人清清楚楚地记得:1996年8月份那一次长江大桥路面修理完工时,南京市曾十分自豪地向世人公布——提前竣工!10年内无需大修……

自从那次提前竣工后,没多久路面就“波浪”起伏,跟着修,没多久,又修,又修……几年里大桥路面似乎同“修”结下了不解之缘。没想到,这次又要修了……

善良的南京人清清楚楚地还看到:担任南京长江大桥路面修理的一位负责人在大桥桥面修理提前竣工后不久就升了官,而且现在又担任南京另一项重点项目(也同桥有关)的负责人……

南京长江大桥始建于60年代,分上下两层,下层走火车,上层走汽车,总耗资2.8亿人民币,1968年10月1日铁路桥通车,同年12月29日公路桥通车。最初设计公路桥日通过车流量1万辆,如今的大桥每6分钟就通过一列火车,每1秒钟就通过一辆汽车,公路桥日车流量已逾5万辆。这座举世闻名的大桥全长4589米,路桥宽19米,面积8万多平方米,桥面可供4辆车同时使用。由于年久失修,大桥桥面每年破损都在2万平方米以上,由于经费困难,到1996年全桥已被撞坏灯杆26根,撞损护栏45片,全桥坑、洞、“波浪”路面达1000多处。由于经费困难,到1996年,建桥28年没有进行过一次大修。大桥管理处办公室主任王忠祥曾扳着指头算过账:仅公路路面修理就得要几千万元。但是,南京长江大桥是人民的大桥,是国家的骄傲,人们呼吁对大桥非“补妆”不可,这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重视。终于在1996年夏季,全面修理南京长江

大桥公路路面的战斗打响了！其时，盛夏酷暑，烈日炎炎，施工的工人们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在工地上日夜苦干，南来北往的车辆因修路面积大，长时间堵车塞车，司机、乘客们理解、谅解，积极配合，没有怨言，都希望早日让大桥焕发青春！

整个大修原计划用半年时间。因为要保证施工质量，必须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一定的时间，这是科学。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要保质保量的半年大修时间却被一再提前，一再缩短，许多方案被一改再改。为了确保质量，技术和材料上采用了最先进的手段，如混凝土不是一般的混凝土，而是改成沥青混凝土。但是，再先进的技术，再好的材料，一旦不顾客观规律，一旦“大跃进”，一旦有“好大喜功”之嫌，后果就不堪设想。南京长江大桥管理处总工程师严斌指出：大桥大修方案被一再缩短，从半年被缩短到不到两个月，由于工期太紧，尽管路表面是好的，其实下层铺装层却没有全部更新。双曲拱桥路面大修时，按道理和正常的程序，下面的三渣填充料垫层应全部换掉，却没有换；大桥的伸缩缝部分已连续服役快30年了，早该更换新的，但为了抢时间、争速度，大修时只对损坏的伸缩缝采用填沙浆、水泥的修补措施。由于只修了面子，大桥表面上是好了，实际上却是底子薄、内里差，车子一压碾，不出问题那才叫奇迹呢！

1996年8月25日，南京长江大桥耗资2000万元修理工程，正式举行提前竣工剪彩仪式。当时竣工会上气贯长虹的豪言壮语至今仍在人们耳边回荡：仅用51天就修好了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路面！据专家鉴定，此桥10年内无需大修——掌声雷动，在烈日下竟有人掉下了激动的眼泪：真是为群众、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呀！了不起！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修大桥决策有方、指挥有方、修桥有方！隆重的剪彩仪式后，这些消息通过新闻媒介传向了世界各地……

然而，一年还没到，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面柏油层剥落波浪起

伏，路面下崩出石子，接缝处已如阶梯，大颠小颠，大坑小坑，——人们翻开日历，扳着手指：难道已过了十年？

随着群众呼声的日益高涨，南京市不得不悄无声息地进行大桥补修，一次、两次，群众也记不清修过几次了！只是对每一次大桥修理发出由衷的感叹：好大喜功，提前竣工，质量不好，这不是把国家的钱财当儿戏，这不是坑了国家吗！每次修理，都要堵车，耽误大江南北多少人的宝贵时间！真可谓怨声载道。那么，这样的责任到底应由谁来承担——是施工工人偷工减料？还是技术人员盲目冒进？还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例因《焦点访谈》曝光而引发雇用杀人

1998年3月13日，曾为朱镕基总理讲解过太昊伏羲陵渊源的河南淮阳县博物馆副馆长霍进善在书房里突然死亡，经河南周口地区公安处与河南省公安厅两级法医尸体解剖认定，系机械性窒息死亡。

4月25日，这起雇佣杀人案的雇主淮阳县大连粮管所所长池恒军落网。据他供述，其任四通粮管所所长期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曾对该所粮食霉变及鼠患问题曝过光，便怀疑此事系淮阳县局局长郝瑞端、副局长李庚海举报的结果，决定雇人杀死李庚海，不料霍进善成了这起杀人案的冤魂。这是全国第一起因《焦点访谈》曝光引发的雇佣杀人案。

霍进善是淮阳县的名人，因其博学多才、能言善辩成为县博物馆的一张王牌，仅1990年至1995年间，他就向国内外专家考察团、组、大专院技作学术报告76次，听众达百万人次。199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到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淮阳中华太昊伏羲陵庙视察，一个多小时的视察过程中，霍进善关于太昊伏羲氏画八卦、结网罟、养牺牲、定姓氏、制嫁娶、刻书契等丰功伟绩的讲解和陵庙珍贵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生动讲述，7次令总理开怀大笑，总理当

即作出决定,为淮阳县博物馆拨款 120 万元,用以修缮太昊伏羲陵,并亲自为太昊陵题字——羲皇故都(朱总理的难得一次题字)。霍进善也因之名声大振,成了淮阳县的一大功臣。霍进善的非正常死亡,震惊了整个淮阳,也震惊了整个周口地区。

4 月 15 日,霍进善之死内幕被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赵建云、副队长张宁带领的侦破小组揭开。经与河南警方联系确定,霍进善死于一起雇佣杀人案,雇主要杀的人叫李庚海,由于指认错误,霍被误杀。

3 月 29 日上午 9 点多,晋城市公安局接到报案,泽州县北义乡政府的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于 28 日晚被盗。晋城市公安局接到河南省西华县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该县皮营派出所抓获了两名盗窃汽车的犯罪嫌疑人——崔建军、贾连军,并查扣一部红色桑塔纳轿车。随后,公安人员抓捕了另一犯罪嫌疑人叶参军和他的姘妇申某。

申某交代了一个情况:“那天下午,我、参军、建军、连军、小惠 5 人到淮阳,住进一家私人旅店,第二天晚上,有两个人来到我们住的地方,把参军、连军、建军叫到一楼的一个房间,大约说了一个小时的话后就出去了,当天很晚才回来。第四天上午,连军、建军被一个人叫走了,他们来淮阳干什么,我不知道……”

4 月 15 日上午 9 点,经过艰苦审讯,犯罪嫌疑人贾连军交代了雇佣杀人案案情:“去年腊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建军家楼上坐着,建军突然问我:‘有一件事干不干?’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有一个人出 10 万元让杀一个人’。

“几天后,我和建军坐车来到焦作叶参军住处,与叶参军的姐夫孙小明(注:中介人)进行了商谈。孙小明说:我有一个不错的朋友,是河南淮阳人,一个粮站的站长,因内部矛盾和人结了仇,愿意出 10 万块钱把这个人杀了。他说雇主要求将仇人干掉后开车把尸体拉出城外,并把头割下来让其过目。我和建军觉得条件太苛刻,

没答应。孙小明便与雇主通了电话，最后委托孙小明确定杀人方案并与我们协商。孙小明说淮阳有个大湖，不行就把人弄出来扔到湖里。最后我们决定怎么简单怎么来。2月11日，我和建军专程到达郸城县孙小明家，小明给那个雇佣我们的人打了传呼，让那人过来和我们见面。第二天上午11点多，一个胖胖的三十多岁的男人进来，后面带着一个司机。孙小明介绍：这就是老池——找你们的人。小明没有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只说是个粮站当官的。

“与老池谈好条件后，我们到了淮阳，正下雨，大家便在旅店里打麻将。天刚放晴，我和建军就急急地出去找那个被指认的人。快到太昊伏羲陵庙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人从庙里出来，便跟在他后面一直进了他书房。他家里恰好没人，他一个人背对着门换衣服，我就过去用手将他嘴捂住，那人惊恐地回过身来，用嘶哑的声音哀求：‘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建军上去用手卡住他的脖子，几分钟后，他就顺着墙倒下了。为了转移视线，我们把屋内一木柜搬倒压在他脖子上，将室内物品胡乱翻动了一番，并将其身上的1000元现金全部拿走，伪造了一个盗窃杀人现场。

“我们当天逃到长治，三四天后，再次来到淮阳，还在那家旅店，我们见到了孙小明和老池，向老池要钱，他说我们杀错了人。钱没有给我们。”

1998年4月25日，犯罪嫌疑人池恒军落网。另一犯罪嫌疑人孙小明侥幸脱逃，孙小明之妻叶翠霞就擒。池恒军对巨款雇佣杀人一事供认不讳。此事经《都市青年报》李红霞于1998年5月29日率先报道，同年6月8日《法制文萃报》转载。

——骗官买官案骇人听闻：堪称当代“官场现形记”

骗子竟当上警卫科长。新华社讯：“1998年2月5日晚，已在全国各地逃窜一年多的犯罪嫌疑人、原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警卫科副科长李金涛（原名李涛），终于在安徽阜阳市被警方抓获归案，这桩令人震惊的招摇撞骗案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句不经意的问话——做贼心虚的骗子开溜。1996年8月13日晚,安徽宿州市明丽园酒店。当时任宿州市公安局警卫科副科长的李金涛在请人大吃大喝之后,结账时惹出了麻烦。他翻遍口袋还差100元,李先是要签字暂欠,后又提出押上自己的传呼机,但收款小姐不同意,这下惹恼了李金涛,他乘着酒兴开始骂人,继而动手打人,并口出狂言要让“明丽园”关门停业。店家拨通了报警电话,宿州市公安局治安民警闻讯赶来,将李金涛带到治安队,并收缴了李随身带的枪支,平息了事态。第二天,宿州市公安局纪委开始对李金涛违纪事件进行调查。8月15日上午,公安局纪委找李金涛谈话时,问起了他的简历,没想到李金涛顿时紧张起来,谎称要去“方便”,借机逃无踪影。李身为警卫科长,掌握国家一级警卫机密,因此宿州市公安局立即对其办公室和住处进行全面搜查,在确认李金涛已畏罪潜逃后对李作出除名、开除党籍、立案审查等处理。然后,由一封匿名举报信顺藤摸瓜牵出假干部案一串,早在李金涛身败名裂仓皇逃窜之前,1996年5月的一天,一封来自李的家乡太和县的匿名举报信直寄中央,引起高层组织部门关注。

《中国青年报》是这样报道的:“蒙了局长蒙市长,骗子当上副科长,老农做了回警官梦”。一个普通的农民李涛采用请客送礼等手段招摇撞骗,竟当上了宿州市公安局警卫科副科长。这起作假事件败露后,李涛潜逃1年多于1998年2月被抓获归案,有关涉案人员已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

当年44岁的李涛原是安徽太和县李兴镇孔曹村村民,曾通过关系在县公安局当了3年多临时工,后做药材生意,他经常请一些有职有权的机关干部吃喝,结成酒肉朋友。蓄谋已久的李涛先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李金涛,接着开始实施“假干部、假学历、假公安”三假身份活动。

1993年底,李通过同学刘某认识某领导。1994年元月,李涛与时任县团委干部的张毅和时任李兴镇派出所所长的耿焱一起,先

后伪造了干部履历表、干部工资级别登记表等档案资料。此后李通过原太和县第一职业高中负责校长办公室工作的汪振华等人伪造了学历证明。李兴镇派出所为李向太和县人事局出具了“李金涛同志申请调往宿州市公安局,请发函予以商调”的介绍信。原太和县人事局干部股股长宫保珍据此介绍信,擅自以太和县人事局名义给宿州市人事局开出了“县公安局李金涛”调动的干部商调函。4月李将商调函交给某单位领导宋某。宋持此函请时任宿州市市长满时瑛签批,并通过时任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王耀把商调函交由市人事局,开出了同意李调入市公安局工作的商调函。市公安局在没有考核政审的情况下同意接受。1995年,由王耀临时提议,决定将李由“北杨寨派出所民警”调任市公安局警卫科副科长。1996年8月初,李因在宿州市某酒店闹事打人被收缴枪支,后畏罪潜逃。1998年2月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抓获归案。安徽省纪委、省监察厅现已对涉案党员、干部作出处理决定:给予李涛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干部身份,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宿县地区政法委书记、原宿州市市长满时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调离政法委员会;给予原市公安局局长王耀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消宿县地区驻京办事处副主任职务处分;给予宫保珍撤消太和县人事局党组成员、县人事局副局长职务处分;给予太和县委组织部干部张毅开除党籍处分;给予耿焱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消派出所所长职务处分。

——“国家曝光”不仅仅是遏制腐败

国务院有关部门最近根据企业的举报并经核实,认定十项未经批准的评比活动为违规行为。中宣部、国家经贸委、外交部、监察部、国务院港澳办、国家工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出《关于对企业进行乱评比活动有关问题的通报》指出,近两年来我国仍有一些社团组织未经批准举办对企业的评比活动,或以推荐、排序、认定、上榜、宣传介绍、公布调查结果等形式搞变相评比活动;

一些经营性机构通过承办评比活动牟取暴利；个别在境外注册的组织到内地举办评奖活动，向企业索取高额费用；有的甚至采取瞒骗的手段引诱企业出钱买“假奖”。有关部门通报批评的十项乱评比活动为：

中国企业商誉调查委员会、中国企业商誉调查专家委员会以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中国社会学会、中国公共关系专业委员会名义主办的所谓“中国企业最佳商誉”等级确认活动；

以中国名牌商品介绍活动委员会名义，由北京铁流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经办的所谓“名牌商品”介绍活动；

以跨国公司与中国市场论坛组委会名义，由北京鹏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经办的所谓“中国市场行业第一企业”推展宣传活动；

以中国企业品牌调查委员会名义举办的所谓“中华驰名商标”认证活动；

以中国名牌事业发展评价中心名义举办的所谓“中国名牌发展奖”评选活动 and '97 市场品牌调查评价活动；

以中国市场学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联合主办，北京茂业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承办的所谓“中国公认名牌”认证公布活动；以中国城市经济研究会、中国质量管理促进会、中国调查统计事务所名义，由北京经济报社企划部、北京先导广告集团承办的所谓“中国城市主导品牌竞争力”调查发布活动；

以中国职业企业家协会、中国企业形象研究会、中国企业家周刊社、中国经济报道社（以上四家均为境外机构）的名义举办的“中国发展邮电通信行业十大功勋人物认定暨 1997 年中国十佳邮电通信企事业单位”推荐活动、“中国发展建筑业十大功勋人物认定暨 1997 年中国十佳建筑企业”推荐活动；

以美国爱因斯坦发明博览中心、香港科学院国际荣誉评选委员会、澳门科学院国际荣誉评选会名义主办，以澳门招商局、香港国际新产品展览中心名义协办，北京科先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司代理的所谓“首届国际爱因斯坦新发明、新技术(产品)博览会暨国际荣誉评奖会”、“首届李时珍医药成果及医护业绩博览会暨国际荣誉评奖会”。

其中,有两项“以中国市场学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联合主办,北京茂业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承办的所谓‘中国公认名牌’认证公布活动;以中国城市经济研究会、中国质量管理促进会、中国调查统计事务所名义,由北京经济报社企划部、北京导向广告集团承办的所谓‘中国城市主导品牌竞争力’调查发布活动;以中国职业企业家协会、中国企业形象研究会、中国企业家周刊社、中国经济报道社(以上四家均为境外机构)的名义举办的‘中国发展邮电通信行业十大功勋人物认定暨 1997 年中国十佳邮电通信企事业单位’推荐活动、‘中国发展建筑业十大功勋人物认定暨 1997 年中国十佳建筑企业’推荐活动”,是下面这个单位“做”出来的,如何厉害,且看深圳《金融早报》和广州《南方周末》的大追踪报道“是谁在向企业抛售如此荣誉——如此让人不明不白”:

《广告法》中有这么一句话,广告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然而,天津的 G 电子公司却于 1997 年 5 月份在某报上大做广告,称 G 微波炉获 1997 年首届中国家电跟踪调查微波炉行业质量满意品牌、返修最少品牌、心目中理想品牌三项第一名。其广告依据是 1997 年 3 月由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盖章”、“颁发”的荣誉证书,北京某区公证处给予了公证。

众所周知,第一只能是一个,可是,下面还有一家微波炉也获得“第一”,而且这两个第一都是同一家广告公司“策划”出来的。这家同样号称第一的一家名叫×宝的微波炉生产企业,其在广告中称获得 1997 年中国消费者品牌认知调查质量满意品牌第一名,97 购物首选品牌第一名。主办单位是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但实际操作者们与向 G“颁发”荣誉证书的实际操作者同属于一家企业。企业的全称是北京先导信息集团。

同样是微波炉产品,却同时出来两个中国级“质量满意品牌第一名”,不知这个结果是如何调查的?1997年4月21日,笔者在为G“名列第一”荣誉证书上“盖章”的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秘书长刘金生处了解到,首届中国家电跟踪调查是该协会和中央某经济类日报企业策划部一起搞的,中国家电商业协会为主办单位,具体操办者是一个名叫丁某的,是北京先导信息集团的总裁,丁某向协会交了一万元的主办单位咨询服务费。关于给第一名发荣誉证书,刘说他不知道这个事,而且从没有在荣誉证书上盖过章。当记者将盖有“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公章的荣誉证书让刘看时,刘指出上而的图章不对,不符合中国家电商业协会图章的模型,而且这个章略小,肯定不是他盖的,很有可能是把空白的章给翻印了,这是侵权行为。记者又问关于调查问卷及公证的事,刘秘书长说他没看见,也不大清楚。接着,记者前往北京某区公证处,一个姓苏的主任说关于此次调查结果的公证材料请到主办单位去查看,他还建议记者关掉采访用的录音机。而主办单位的刘金生却不清楚公证的事,再者主办单位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地处西城区,与这个区无地域关系,而且,实际操作者丁某及其公司在另一区。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丁某为什么舍近求远到某区公证处公证呢?而且,该公证处不愿公开早已公证的公证书。

既然公证的事主办单位不知道,那么,刘秘书长建议去找的名叫了某的人是否知道呢?按照刘秘书长提供的电话,记者了解到这个电话不是某经济类日报企业策划部的,而是位于北京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亚运村汇宾大厦A10层的北京日日调查有限公司。丁某为法定代表人。在另一份该企业简介中了解到,丁某任总裁的北京先导信息集团,下属有导向设计集团等16个分支机构,该企业是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又是一年一届“中国国际名牌博览会”、“中国消费品博览会”承办单位。当《中国改革报》记者前往亚运村汇宾大厦10层找丁某询问情况时,A1009室一自称姓陈的先生

说,没有人授权我跟你讲这些东西。记者又问日日调查公司是不是先导广告公司,先导广告公司与导向设计集团之间是怎么回事,陈先生肯定地说“这只是同名而已,就像长城电脑与长城葡萄酒一样。”他的意思是说这几个名称未有任何联系,可先导信息集团的简介上却明明写着它们同是一个单位,那么这位陈先生怎么就不承认呢?而且,记者看见 A1009 室(一楼有北京先导广告公司的牌子)冲出来的小姐很生气地说“你没预约,别人不会接受你采访的”,记者又问和谁预约,该小姐说找一位李小姐,可是李小姐现在不在。次日,记者打电话预约采访,对方告知李小姐去了香港。

关于丁某的采访无奈就此打住。4月28日,在中国家电商业协会采访,刘秘书长拿出一份当天收到的1997年首届中国家电跟踪调查统计结果,上有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和某区公证处的公章,结果上说1997年第3期《中国经济信息》杂志刊登调查问卷,随机抽样1000份问卷进行统计。另外,《中国新产品》杂志实施入户调查,有2000份样本进入统计分析。关于微波炉的统计是G获三项第一,而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主办的中国消费者品牌认知调查中获微波炉行业质量满意品牌第一名和'97购物首选品牌第一名的是“×宝”,“×宝”在中国家电商业协会主办的调查中却列于实际购买品牌第二名,'97购物首选品牌第二名。

名次高低成为企业吸引消费者购买其产品的法码,高则意味着生意火,效益好,所以企业求高名次甚至花钱买第一也不鲜见。可是,这次微波炉行业质量满意品牌第一名却是同一个广告公司“策划”、主办单位调查所得的两个品牌。如果这两个结果确实是两家主办单位调查出来的倒无话可说,理应尊重事实。可是,令笔者不解的是这两个调查结果和两个第一名都是丁某所在的先导集团及其子公司一手“策划”的,同一个第一,两个产品,又是同一人策划,其中“奥妙”谁来解释。

而且,当记者又一次采访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时,中国家电

商业协会刘秘书长说他 4 月 28 日刚刚收到北京日日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文字材料,而在此之前的 3 月份,名列第一的 G 企业已收到荣誉证书,并陆续在报纸上发布其名列第一的广告,北京部分商场的 G 专柜上摆出了该荣誉证书的铜制招牌,使进出商场的消费者能够一目了然。

5 月 21 日,记者又查到由丁某兼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导向广告公司在 4 月 5 日《北京经济报》上发布的广告,广告全称为“1997 年中国消费者品牌认知调查行业十强”涉及 500 多个产品及企业名称,广告上并注明“排名不分先后”。其中微波炉一项有惠×、××仕等十家品牌,没有“G”的字样,从实际排列顺序上看,×宝列首位,这与×宝所获荣誉证书上的“第一名”相符。在这个行业十强广告中,虽说“排名没有先后”,但实际排序中可以看出排首位便是获得第一名的那个品牌。如酒类,秦池列首位,在秦池的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着秦池获白酒类'97 购物首选品牌,既然首选,那么在“行业十强”中排序为第一似乎并无不妥?只是在实际排序中,茅台、西凤均排在秦池之后令人不解。此外,在美发用品类中位于前列的河南的黛丝摩丝获'97 购物首选品牌,在 VCD 类列第一的××获 5 项第一名,列空调类第一名的××获中国空调第一品牌等 3 项第一,在饮料行业获首位的×××获第一品牌,在电脑行业实际排序偏后的×××获学习机类产品 5 项指标分列第一名。除了第一名之外,值得研究的还有十佳品牌“评比”,如×××西服名列服装十佳品牌,BRM 牌轴承获机械行业十佳品牌,××牌自动包装机械获机械行业十佳品牌(其实上面只写 9 家)。无论是名列第一,还是十佳品牌,都是企业通过广告引导消费者注意的招牌。但这个招牌的获得是否有花钱买名之嫌呢?记者在北京日日调查有限公司发往北京瑞达急冻食品有限公司于经理的传真中发现,早在 1997 年 1 月 27 日,“瑞达”急冻食品就被日日调查公司调查为“急冻食品行业”较好名次获得者,传真上落款是“3·15 中国消费

者品牌认知调查暨宣传活动组委会”及“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消费者杂志编辑部”的公章,而中国消费者协会则声明该协会 1 月 21 日就退出该活动。可 1 月 27 日,该活动组委会还向企业发出此次活动方案及紧急通知的传真。传真上还写着十强品牌收费标准 38000 元,第一品牌可在收费 28 万、55 万、108 万元中选择相应的宣传方式。所谓宣传方式,即在指定的十家报纸上做广告,但收款人只有一家即日日市场调查有限公司。

钱进了北京日日市场调查公司的账户,而出钱的单位则做了名列第一的广告。一方为了出名,一方为了经营,但是这种“调查出来的第一”能否在市场中具有公正性、权威性和科学性呢?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 1996 第 10 号“通知”中说,近年来一些地区、部门、社会团体、新闻单位及民间组织无视中央规定,擅自以各种名义举办名目繁多的对企业的评比或变相评比活动(包括对企业、企业经营者、企业产品进行的评比、评选、评价、评优、展评等活动),严重干扰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增加了企业负担。许多评比活动以谋取小团体或个人经济利益为目的,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影响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助长了沽名钓誉、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社会各界对此反映强烈。因此,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通知要求正在举办的对企业的各种评比活动一律立即停止,并认真搞好清理整顿,对已收的费用要立即如数退还,新闻单位不得进行宣传报道。

然而“通知”自 1996 年 3 月 20 日下发至今一年来,对企业的乱评比有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呢?国家经贸委企业管理处薛宝祥处长认为,现在“流行”的推荐、认可、排序、公布调查结果等形式实际上都是一项变相评比,未经国家许可,国家根本不承认,都是无效的评比。在这类评比中以赢利为目的的有偿评比大多被一些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所操纵。他还说,今后除按法律规定及国务院批准的外,全国性、行业性的评比一律禁止。政府对评比的态度是,数量

要少,严格控制,确有必要的才可以搞,但须经国家经贸委审查并报请国务院批准,再者各类评比一律不得向企业收费。

真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明令而难禁止。在由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主办的“1997(首届)中国家用电器跟踪调查活动”很快有了结果,第一名也随之推出,3月31日刊登在《北京经济报》广告版上的广告显示“××冷柜、展示柜、电热水器、微波炉”荣获中国家电同行业购物首选品牌、心目中理想品牌、质量满意品牌、返修最少品牌、实际购买品牌惟一五项第一,其中还配以“××冷柜中国第一”的图案,可是同样内容的广告,出现在4月4日的《经济日报》上时,“惟一五项第一”中“惟一”和“中国第一”的字样不见了,而且广告上还有明显的涂改痕迹。既然是第一为什么这样遮遮掩掩呢?难道这其中有不少奥秘?而且微波炉类中已有G和×宝名列第一,怎么报纸上称××微波炉也荣获第一呢?这是不是故意犯的错误呢?

除了这疑点之外,另外的疑点也暴露不少,丁某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导向广告公司以北京经济报社企划部名义向北京瑞达公司发出的“首届中国市场商品用户满意质量跟踪调查组委会贺信”传真件上写着“贵单位在本次调查中名列质量满意品牌、服务满意品牌、’97指定品牌三项指标前茅,而且是在全国同行中”。贺信中又写明“进入”前10名的企业每家交纳广告费1.6万元用于广告宣传,荣获第一名的可在12万、24万、46万元之间选择一项作为广告费进行宣传。最后盖章是中国市场营销协会、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中国调查统计事务所。在中国市场营销协会,记者了解到这个传真上的公章不是该协会所盖,该协会只是在一份写有中国市场营销协会、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人民日报市场信息中心的活动方案上盖了章,当时丁某向该协会交了2万元咨询费,并签订合作协议书。可到了后来,这个方案上的×××报市场信息中心变成了中国调查统计事务所,这一点中国市场营销协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至于中国调查统计事务所的情况,记者在国家工商局了解到,这个单位未在国家工商局登记注册,是什么单位主办的或挂靠在哪里都无法知道。但有一点明确的是这份传真发自亚运村,上面的电话也是亚运村汇宾大厦的,上面的联系人也是北京导向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

4月9日,北京一家企业又收到发自亚运村自称是中国最佳企业形象调查组委会的关于调查确认1997年度中国最佳企业形象AAA级单位的函告,函告称全国拟确认中国最佳企业形象AAA级单位500家,每行业20~50家,而且其一,这次调查是在1995年1996年两届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报名从1997年1月1日起,确认方法是政府评估,由12家中央部委有关部门组或评委会,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视察申报单位,提出评价意见。其二是市场调查,通过对企业的用户进行情况了解。其三是公众评议,在新闻媒介上公开展示。最后还颁发铜牌和证书,举办中国企业形象高层论坛,由××日报出版社出版《中国最佳企业形象年鉴会——1997》大型画册。收费为每家申报企业2.8万元,收款单位是北京导向设计集团,地址为北京亚运村汇宾大厦A1008室。该活动主办单位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和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盖了公章”。

在这份传真中发现疑点最多,一是《广告法》明令禁止“最佳”一词,这里却声称以此进行广告宣传;二是十二家中央部委有关部门组织评委会不能成立,与中央严格控制各类评比活动的通知相违,应归“乱评比”;三是××日报出版社出版《中国最佳企业形象年鉴——1997》大型画册与事实不符,该社梁社长说最初与“导向”谈的是“企业形象”,不是“最佳企业形象”;四是1995年、1996年的两届调查不清楚,“导向”不接受采访,不给予解释。

写到这里,不难明白是这几项以调查为名的评比都与北京先导信息集团有关,确切地说,实际承办者和操作人员是北京先导信

息集团下属导向设计集团、北京日日市场调查有限公司、北京先导广告集团的职员组成。记者在采访中得到了证实。但是,一直令人不解的是,“先导”这样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怎么有那么大的能力打着数个带有“中国”字头的协会的名义进行有偿评比呢?是谁给其的权力,又是谁批准的,其索取的广告费用有没有到物价和工商部门备案,收费标准是否合理,理应哪些部门对其进行监督,尤其是该单位一次又一次拒绝记者采访,并用警告、利诱的手段对待记者,难道其中真有什么人在幕后保护吗?不然,怎么会令行难禁呢?

但愿这样的事能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愿有关执法部门能切实行动起来,对其进行严厉查处,但愿有关企事业单位要对各类收费并不求实的所谓评比予以抵制,但愿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能把泛滥回潮的有偿评比制止住,但愿市场经济能有一个更公正、更洁净的竞争环境和发展空间。

另外,在《南方周末》曝光此事后,这个评比集团撤离北京,以境外组织为幌子到上海继续发展这个“事业”,不料被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公安部门以涉嫌诈骗被依法取缔,责任人被拘留(令人吃惊的是,其在北京乱评比多年,居然没事)。随后,国务院曝光包括这起在内的十家“乱评比”,新华社发了通稿。

3. 拍案称奇

——新疆一民女与《人民日报》公堂“较量”

广东的省会广州市是我国新闻改革实验的前沿阵地,当地有一份不太著名的《新闻人物报》,在1997年第101期头版头条刊登长篇报道“民女状告《人民日报》胜诉”,作者为著名老杂文家、老新闻工作者冯英子。文章揭示新疆一民女状告《人民日报》的案件,拖了10年之久,终告圆满结束。《人民日报》愿意向原告奚弘致歉,并赔偿20万元,这在我国新闻史上还是“第一次”。

首先,《新闻人物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人民日报社和侵权文章作者人民日报驻新疆记者曾坤、新疆电台记者史林杰的“向奚弘

同志道歉函”(由《炎黄世界》供稿)。

人民日报社向奚弘同志致歉函内容如下：

1988年7月20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社会一角”栏目中,刊登了曾坤、史林杰采写的《喀什市建管局领导软弱无能,奚弘怠工乱告状成特殊公民》的批评报道。该文有些用词不当,对奚弘同志的人格评价造成了一定影响,给其工作、生活带来困难,精神造成痛苦。《人民日报》刊登该文不妥,负审查不严之责。对此,人民日报社谨向奚弘同志表示诚恳歉意。希望奚弘同志谅解,并赔偿和补偿奚弘同志一部分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

人民日报社

1996年12月31日

《人民日报》败诉。1997年1月2日,北京传出一个消息:拖了10年之久的“民女状告《人民日报》”案件,终于圆满结束了。民女胜诉,《人民日报》败诉。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调解的形式宣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自本调解书送达之日起,《喀什市建管局领导软弱无能,奚弘怠工乱告状成特殊公民》一文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全文或部分。

二、被告人民日报社以书面形式向原告奚弘致歉;被告曾坤、史林杰共同以书面形式向原告奚弘道歉(两份函的内容由本院审查确定,已执行)。(见附件)

三、被告人民日报社、曾坤、史林杰共同赔偿原告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人民币20万元(其中5万元已执行,另15万元于本调解书送达日起三日内付给)。

案件受理费30元,由被告曾坤、史林杰负责(本调解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交纳)。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份调解书,1月2日经双方在朝阳区人民法院签字,随后,人民日报社也付出了赔偿费用和案件受理费,长达10年的民告官案件,终于结束了。它既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精神之实现,也体现了《人民日报》有错必纠的可贵精神,在中国的法制史和新闻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民女因何告状。民女为什么要状告《人民日报》呢?这件事,要从头说起。民女奚弘,现年49岁,告状时是39岁。她原是上海的知青,1964年,怀着一颗为国家献身的热情,参加了“支新”工作,远去新疆。她先在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服务,教过书,做过会计,后来调到喀什建管局去做工会工作。做工会工作,当然要为工人排忧解难。1986年10月,她向局、市及地区工会反映喀什市建筑行业不正之风及市一建公司职工、连续4年的先进工作者黄世超被公司无故除名等事。地、市工会支持调查,力主捍卫职工合法权益,喀什市委则坚决反对,矛盾激化。黄拿不到工资,无以养家,曾欲拿枪采取过激行动。地、市工会和奚弘找一建公司、市委反复做工作,请求他们收回成命,无效。1987年11月17日晚,奚找到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反映以上问题及喀什市书记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等情况。宋汉良当即给喀什地委书记徐效成打电话,责成解决。喀什地、市两级迅即开会拟定黄世超问题的解决方案:补发工资,调出原单位。黄后来在新单位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此外,奚弘还向上反映过喀什市一建公司管理混乱、决策失误,企业严重亏损;喀什市设计室财务混乱、私分设计费等情况。对奚弘屡次告状一事,当地舆论毁誉不一,歧异甚大。有人认为奚弘是个敢说敢干不畏权势的工会干部,有人则将她视作喀什地面上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据当事人、目击者和知情人透露:198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驻新疆记者曾坤、新疆电台记者史林杰来到喀什市采访。奚弘获知曾坤对外宣称奚是喀什的“地震台”、“不安定因素”、“你们怕

我不怕!”4月23日,曾坤约见奚弘。史林杰和地委副书记陈德敏在场作陪。见面时,奚弘很不客气地说:“请两位记者出示证件。”曾坤说记者证用于买飞机票了。奚弘当场指责:“你们怎么不遵守采访纪律呢?那我就走了。”在陈的极力劝阻下,奚没有离去。随后曾、奚之间展开4个小时火药味颇浓的对话。奚弘对当地领导层的不恭之议和对记者的生硬态度,再加上奚、曾之间对不少问题的看法根本对立,这场访谈成唇枪舌剑般的论战。最后,对话者悻悻而散,7月20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社会一角》刊出记者曾坤、史林杰的署名文章:《新疆喀什建管局领导软弱无能 奚弘怠工乱告状成特殊公民》。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先把这篇文章摘要如下:

“好端端的新疆喀什市建筑管理局,一时是非难辨,人人憋气。人们说,原因一是奚弘搅和,二是局领导患‘软骨病’。”“奚弘,这个局工会一名女干事。她很少干事,到局里近两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上班时间加起来不过100来天。领导帮助她,她上告;群众批评她,她吵架。”奚弘从外县调入市区,除了那百十天班,都干什么呢?她专门告状。总之,她看谁不顺眼就告谁,宣称:‘生命不息,告状不止’。

“奚弘如此有恃无恐,除有个别人撑腰壮胆外,重要原因是喀什一些领导干部身上的‘软骨病’,这些领导普遍有这样一种想法:她到上级告了我,我批评她、处理她,就会引火烧身,落个打击报复的名声。奚弘抓住这一点,敢闯会闹。”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喀什不少领导对奚弘都有点怵。怵她强词夺理,怵她撒泼耍赖,更怵她越级上告。领导越胆怯,奚弘胆子越大。为什么对奚弘这样迁就?政纪为何对她失灵?喀什群众的质问和呼唤,却一直撑不起领导的腰杆。”

此文一出,各界哗然,全国许多报刊也纷纷转载,世人皆知新疆喀什出了个“告状专业户”。喀什市建管局当即勒令她作书面检

查,然后组织职工对她进行围攻、辱骂。1988年8月2日,喀什建管局党组织以党字(88)01号文件,“将奚弘清除出干部队伍。”她的办公桌被搬走了,到了冬天,她的烤火炉也被拆除。她气管炎复发,停工住院,单位马上停发工资。她按有关手续取转账支票支付医院医药费,单位于12月12日在《喀什日报》上刊出启事:奚弘不知去向,转账支票作废。此举使她无钱医病,被迫停止治疗。不仅如此,单位还违法扣押、私拆她的个人信件,剥夺她的选举权,取消她的调资资格,使她连续损失三级工资。1991年1月18日,单位领导竟非法拘禁奚弘两个小时。

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奚弘别无出路,也只有相信法律,依靠法律来帮助她解决问题。1988年8月中旬,她决定赴京告状。

曲折的申诉过程。1988年8月23日,奚弘离开喀什,赴北京上告。9月6日,在乌鲁木齐新疆高级法院咨询时,申诉厅徐览华对奚弘说:1988年1月15日最高法院(民)复(1988)11号批复说:本报记者文章登在本报,由本报负责;非本报记者文章登在本报,文责自负。徐建议:你可以抄下此文,去北京上诉。随后,奚找到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和建设兵团政委郭刚讲述整个情况。9月11日,郭刚派车送奚弘登机,喀什市委副书记鲁维玉陪奚弘前往,当日抵京。9月11日,奚弘前往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厅19室何宁然接待了她,介绍她去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北京高院不予接待,奚又回到何宁然处,何当即打电话给北京高院,北京高院接待了奚弘,又将她介绍给北京中院,北京中院感到为难,奚弘又回到何宁然处,何又给北京中院写信,打电话。9月15日,北京中院接待了奚弘,又于当日让她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朝阳区法院建议奚弘回新疆找法院。

9月16日,奚弘见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陈秉权。讲明情况后,奚对陈说:“我是工会干部,工人利益受害,我维护;工会干部的合法权益受到危害,由谁维护?由全总维护。您再不维护,

没人当工会干部了。”

陈点头：“对。”

陈秉权副主席让奚弘写份材料，然后说：“我给你写几句话，送乔石审阅。”

9月17日，奚弘交上材料，陈让秘书安排她住全总机关招待所。陈给新疆自治区总工会主席色以提（维吾尔族）打电话：“请派一个知道奚弘案情的干部到全总来。”9月19日，新疆总工会信访料长李学文（俄罗斯族）飞抵北京。9月25日，奚弘在鲁维玉副书记陪同下，求助律师事务所。10月5日，朝阳区法院杨彦军接收奚弘诉状。10月8日，李学文写出奚弘问题的事实和新疆总工会的看法：“坚决支持奚弘上京告状。”11日，李学文向朝阳区法院作了陈述。经北京市高、中级法院裁定，由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受理此案。12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委派全总法律部负责人边敬斋、法学硕士郭军帮奚弘诉讼。1990年1月6日，奚弘与边、郭去北京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办妥委托手续，边敬斋为奚弘的律师，郭军为奚弘的诉讼代理人。

自1989年3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立案以来，《人民日报》拒不应诉，也未交答辩状。9月14日，原告诉讼代理人郭军以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部名义赴新疆调查取证，在新疆调查40余天，取证50余份全部移交朝阳区法院。1992年4月22日，奚弘听说：由于被告不予合作，朝阳区法院难以进行此案审理。奚弘潸然泪下。当日下午，陈秉权接见了她，希望她不要泄气。4月23日，奚弘去中央党校，见到新疆兵团政委郭刚。郭说：“趁我在党校，朝阳区法院如调查，请你们来我这儿。我可以给你作证，我对你这起案子抱很大希望。”

求见倪志福。4月28日，奚弘求见倪志福。一秘书给她指点：倪正在全总大楼3楼3310室开党委会，“你咚咚敲两下门就进，不要等秘书来挡。”奚弘照此办理，径直闯入全总常委会会场。她问：

“请问哪位是倪志福主席？”倪点点头。“我是新疆工会干部，叫奚弘，我有件事求你做主。我因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权。工人的利益受到侵犯，由谁来维护？我要求你主席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临别时，倪志福向奚弘郑重保证：“组织会帮助你解决的，你放心。”5月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向倪志福递交一份报告，题为《关于工会干部奚弘诉人民日报社名誉权案情况的报告》。报告要点如下：

“志福同志：

人民日报社不经核实就于1988年7月20日第四版发表了对奚弘同志进行点名人身攻击、诽谤的文章，造成严重后果。当事人、自治区党委和工会组织对此表示不解。

1989年受全总委托，我们担任奚弘一案的诉讼代理人，1991年赴新疆进行了40余天的调查，取证50余份，已全部转交给朝阳区人民法院。我们认为，奚弘同志反映的问题属实，《人民日报》记者的报道已构成侵权，应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至今立案近四年仍毫无进展，据朝阳区人民法院承办同志介绍，主要原因是人民日报社拒不应诉，法院因其是中央党报，无可奈何。奚弘同志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人民日报》无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享有法外特权，人民法院不应姑息迁就，不依法办案，并声明将向社会、向海内外有关方面呼吁伸张正义，声明由人民日报社和朝阳区人民法院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我们认为：《人民日报》对人民法院应诉的通知拖延、抗拒近4年是违法的，有悖于《人民日报》所宣传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办事、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本原则。《人民日报》应诉，接受人民法院公正裁决，不会降低党报的威信。”

5月5日当天，这份由郭军起草、边敬斋修改、陈秉权定稿的报告，经倪志福秘书刘久光送达倪本人。事后，刘久光说：“志福主席当天批字后，6日我已亲手送到任建新手上。”5月13日，奚弘给

刘久光秘书去电话。刘说：“这事已不是你个人的事，既然已捅到高层，会有结果的，等一个月吧。”6月6日，奚弘在上海获知来自北京的消息：倪志福将报告和自己的意见转给任建新后，任看罢当即批示敦促北京高级法院，北京高院又马上敦促了朝阳区法院。

7月15日凌晨1时45分，朝阳区法院杨承启、康长庆、马书记一行3人，飞抵乌鲁木齐，迅即展开调查取证。地委书记徐效成亲自通知知情者向法院调查人员提供情况。在亲手获取40多人的证词及600多页材料之后，8月1日，杨承启一行3人飞离喀什。

《人民日报》怕丢面子。早在1989年4月1日立案后，当时的朝阳区法院康长庆就将奚弘起诉书副本寄给人民日报社。此后，朝阳区法院多次打电话，去函催《人民日报》应诉。报社不予理会。

3年后的1992年夏天，情况出现转机。8月25日，朝阳区法院民庭庭长康长庆将传票送达人民日报社，传高狄社长到法院谈话。9月8日上午9时，法定代表人、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在吴恒权（该报政法部副主任）、冯要山及社长秘书陪同下，来到朝阳区法院。在院长郑刚的办公室里，高狄社长向法院方表示：“我们一是来道歉，二是来领任务。奚弘告《人民日报》，本是前任社长（注：钱李仁）任期内发生的事，因赶上风波，没有交接。我是1991年11月25日从记者部、办公厅的报告中才知道这件事的。当时我们认为，最好让新疆自治区领导给奚弘做做工作，动员她撤诉。”“现在，我们决定应诉。我们愿接受批评，愿作检讨，也承担责任。”至此，《人民日报》已决意与奚弘法庭上见。同时，也希望化干戈为玉帛，与奚弘捐弃前嫌握手言和。

10月30日中午13时，奚弘收到朝阳区法院10月20日发出的传票。11月6日，奚弘与《喀什日报》记者张秋旺离开喀什。11月9日，朝阳区法院着手调查，被告方《人民日报》派出了他们的全权代表人方建平律师，曾坤、史林杰都到庭了。原告方边敬斋律师和代理人郭军也来了。奚弘尚未赶到。方建平表示：我受人民日报社

领导的委托前来表达这个意思——本报只承认刊登此文不妥，但不是完全侵犯名誉权。《人民日报》提议由法院调解此案。曾坤、史林杰也赞同调解。朝阳区法院副院长杨承启对边敬斋律师说：“请你给奚弘做工作，让她接受调解吧。”11月10日下午，边敬斋律师告诉奚弘昨日调解内容：《人民日报》准备给你写个书面东西，向你致歉，盖上公章，然后向你要求消除影响的单位寄去致歉信函。报社经济上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但希望你不要拿着这些东西扩散宣扬。奚弘不赞同调解，坚决要求开庭。她说：“这个时候，多少钱也不值钱了！”

终于开庭。11月12日，朝阳区法院在小法庭继续调解。原、被告全部到齐。《人民日报》全权代理人方建平出语惊人：“报社领导让我转达这个意思：我方要求开庭！”杨承启副院长当即表示：“那就开庭，马上写传票。你们（注：向方、曾、史三人）说，什么时候开庭？”方建平请求：“你给我两至三个星期，让我去新疆取证。”杨承启问：“几号可以回来？”方答：“月底。”杨：“月底太忙，那就下月初吧。12月4日你们都要来，不来，我就要缺席判决了！”边敬斋律师插言：“都5年了，我建议明天开庭。”奚弘：“法庭上没有特殊公民，也没有特殊机关，法院对《人民日报》够姑息迁就了！”杨承启让书记员王继红当场开出传票，全总领导人得知开庭信息后，打电话给新疆自治区总工会副主席阿不都热合曼·热合木拜，让他派高齐岳律师赴京助阵。方建平、曾坤、史林杰飞赴新疆取证。11月30日，高齐岳律师赶到北京，与奚弘、边敬斋、郭军等人紧急磋商开庭事宜。同日晚上，曾、史等人星夜飞回北京，准备次日出庭应诉。12月4日，公民奚弘与《人民日报》法庭交锋。《人民日报》那篇“批评报道”究竟存在什么问题，调查审查中法官和被告记者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把这段对话记录如下：

法官：你就“上班时间加起来不过100来天”作出解释。记者：“不过”表示概数。“100来天”指100以上200以下。法官：你采访

时见过奚弘的考勤表吗？记者：没有，是后来补的。法官：你文章里讲“她专门告状”。专门怎么理解？记者：我的理解就是专注地干什么事。采访中别的同志称她“告状专业户”。法官：你文章讲“她没有告倒谁，便和丈夫离了婚”。请解释一下。记者：她丈夫与她离婚的原因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她告状。法官：这是在离婚申请书上写明的原因吗？记者：那上面讲的感情破裂。法官：你将“她没有告倒谁”与离婚扯到一起，是有机的联系吗？你写文章的立意是什么？记者：当初没想每句话的立意。法官：“喀什不少领导对奚弘都有点怵。怵她强词夺理，怵她撒泼耍赖，更怵她越级上告！”这句话有根据吗？记者：她无理搅三分。法官：奚弘的做法是“撒泼耍赖”？大家批评她，她与大家吵，就叫“撒泼耍赖”？记者：我以为是。法官：文章中说她越级上告，你认为公民能不能越级上告？……

从这场法庭的对白中，《人民日报》那篇报道明显存在对奚弘的侵权行为，一经审理，真相大白，但值得注意的，这时是1992年的12月4日，已在奚弘诉讼立案的三年多以后，面由此走向最后的结案，也长长有五个多年头，人生不再，岁月几何？

深远的意义。奚弘起诉、法院立案后，《人民日报》立即面临着一个机会，同时又陷入了一种尴尬。说机会是指，《人民日报》若坦然应诉，与女公民对簿公堂，且不论胜败，单是上被告席就足以显示堂堂大报敬法守法的精神。若能这样，它的行动就是为中国高层党政机关开风气之先，也是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供一个权威的注解和令人信服的实例。说尴尬是指，《人民日报》40多年来从未在中国法庭受到指控，如果应诉后败诉，它在公众中的“声誉”，岂不受到影响。机会和尴尬，《人民日报》长久徘徊于两者之间。朝阳区法院用足了脑筋去做原告的工作，要求原告与法院配合，忍耐、再忍耐，法院一定会判决的，但是有一条，你不要到外面去传播，就是说，不要使这个案子让外面知道。

但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民女状告《人民日报》”的案

件,英国路透社于1992年12月22日发过电讯,日本的《中国导报》也在1996年6月20日作了详细报道并发表评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试金石,瞒是瞒不住的。她说:“一个社会,人人怕事,个别不怕事的人就被认为太狂。大多数人不正常,被看作正常,个别正常的人就被看作不正常。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爱国,反对腐败,追求公正平等,反对法外特权。”1997年1月2日,原告在众多领导的劝说下,最后接受了调解,她在签字时,仍然在调解的“回执”上写了不少意见。调解经双方当事人签名,法律生效之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又于1月7日向喀什市委、市政府、市总工会、市建委发出了一份《司法建议书》,除了讲调解内容之外,建议三点:一、恢复奚弘名誉;二、恢复工作,妥善安置;三、补发工资和应调工资。

至此,这个拖了10年的案子,终于在朝阳区法院的努力下,圆满结束了。这是中国新闻事业觉醒的胜利,我们从这个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案件中,能得到些什么教训呢?

——张金柱带来的连锁反应

曝光,曝光,曝光!似乎只有曝光才能显现出中国记者的良心。

是谁说张金柱栽在记者手中?张金柱已死,他撞死苏磊,是无意还是故意,他拖伤苏磊父亲苏东海,是故意还是无意?事实如何?判决如何?为什么说是栽在记者手里?如果没有曝光,张金柱会不会无罪释放?张金柱背后有没有什么人在拼命还击?首先曝光张金柱的河南《大河报》记者会不会与当地“公安”积怨在胸?

新闻界要充分尊重采访对象,不去做鸡鸣狗盗之事,所谓正义就是指光明正大,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要透明实在,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相信自己是站在历史与现实与未来都贯穿的一条线上,经得起历史与未来的考验。新闻记者是职业,就要有严格的职业道德守则,不能像一个家族一样实行“宗法”,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实行“自扫门前雪”,实行一时的炒作,实行“绝对的利己

主义”。这样下去,新闻记者也会做坏新闻,新闻也不会名副其实,新闻界就会像一些偷漏税的商业企业一样坏了名声,不但失去正义的力量,而且还毁灭了自身的价值。在众多报刊曝光张金柱的文章中,本书特选 1998 年第 4 期《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高昱的报道如下:

1998 年 1 月 12 日,震惊全国的郑州 8.24 恶性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案有了判决,被告张金柱被一审判处死刑。谁能审判张金柱?然而,对于这个众人期待的审判结果,宣判现场却有为数不少的人陷入了震惊和沉默。被告人张金柱当庭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诉。

1 月 13 日,张金柱的两位辩护律师发表公开信《张金柱罪不当诛——关于张金柱案件的紧急报告》。1 月 22 日,记者收到一份就张金柱一案的“部分刑法、刑诉法专家论证意见书”。意见书认为:“对于民愤,司法机关也应有一个理性的态度,不能因为民愤大就超越法律的规定来判刑。”是与非、善与恶、权与法、对生命的珍惜与残害,“中州血案”向世人提问——“当时轿车所过之处,都是一片惊呼,一片血迹,比电影中的恐怖镜头还要惨。”——8.24 事件目击者祁先生告诉记者。苏东海躺在河南省人民医院 4 楼急救室的病床上,呆滞的眼里没有一点光。屋外阳光灿烂,可这间朝北的病室却显得有些阴冷。苏东海的头执拗地偏向窗外。10 米远的红色平房就是医院的太平间,那里躺着他 11 岁的小儿子苏磊。已经 150 天了,苏东海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让无辜惨死的儿子真正安息。苏东海永远忘不了去年 8 月 24 日那个悲伤而恐怖的夜晚。11 岁的小苏磊在奶奶家吃过晚饭,与苏东海各骑一辆自行车一起回家。21 时 40 分,当两人行至郑州金水大道与经一路十字路口穿马路时,一辆从金水大道自西向东逆行的白色“佳美”轿车“嘭”的一声巨响撞上了苏家父子。据现场目击者事后回忆,小苏磊被车头正而撞击,弹起后重重摔在轿车的挡风玻璃上,头部将玻璃铁框撞弯,整块挡风玻璃顿时被撞碎呈蜘蛛网状。“小孩被弹起后

翻到车右侧,又被右后轮从腰腹部轧过,挣扎着站起来朝路边踉跄几步,喊了声‘阿姨,救救我’后便又一头栽倒。”证人苗进发当时正在苏家父子的右后方,是离现场最近的目击者,至今回忆起那令人心悸的一幕仍然声音哽咽:“那样子就像乡下杀鸡时一刀把头剁掉,而鸡身子又向前扑腾了几步似的。”

与此同时,苏东海被撞倒后,与苏磊的自行车一起被卷入汽车底部。肇事汽车似停非停了一下,便拖着苏东海和自行车拐上顺车道,在路人一片“停车”呼喊声中以60公里/小时的速度飞驰。身高1.86米的苏东海双腿在汽车左后轮处伸出拖在路面上,一路血迹斑斑,自行车与路面相摩擦,带出串串火花。直到肇事汽车被尾追的1辆警车、1辆工具车和3辆出租车拦截,后面已拉出一条1500米的血路。

苏磊和苏东海迅速被送往附近医院急救。5个小时后,血肉模糊的苏东海终于脱离危险,但他的伤势令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震惊:全身大面积挫伤,头部皮肤大面积缺损,15×9平方厘米的颅骨外露,6根肋骨及左侧骨连续性骨折,脑及肺部挫伤严重,左耳仅有丁点皮肉相连,双脚后跟白骨绽出,血压很低……而此时的小苏磊,在经过3个多小时抢救后,已圆睁着双眼停止了呼吸。

“5个月过去了。”而对记者,苏磊的母亲张菊花眼里又一次涌出泪水。恍恍惚惚中,张菊花又想起小苏磊临死前一天在她怀里撒娇的最后那个夜晚——“妈妈,我还没给你洗过头呢,让我给你洗洗头吧!”第二天晚上,张菊花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从儿子身上一点点消失,没能再喊上一声“妈妈”,没能再摸摸她那依旧散着清香的头发。

元月22日,在记者见到张菊花的两天前,她刚刚去太平间看过儿子。她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去经受那肝肠寸断的痛苦了。看着小苏磊黑紫色的腹部和遍布血丝的四肢,看着孩子微张的嘴唇和死不瞑目的双眼,张菊花一次次昏倒在孩子冰冷的身体上。

对张菊花和苏东海来说,小苏磊不仅是他们的命根子,也是他们之间 10 多年爱情和家庭生活的唯一结晶。孩子死前两个月,两人刚刚协商离婚。1997 年 6 月 28 日是苏磊 11 岁生日,又赶上星期六,为了让孩子高兴,两人强扮欢颜,一起陪着上街,逛公园。小苏磊兴奋地穿上省少年足球队的球衣,全然忘却了父母离异、家庭破碎的阴影。记者从张菊花手中接过那张小苏磊 11 岁生日在“二七”纪念塔下的最后留影时,苏东海依旧定定地躺在床上,一双眼睛灰暗得不见一丝光亮和生气。每次张菊花来看望,每次拿起孩子的照片,对他都是精神上最残忍的“抚慰”。这种折磨已经太多了。苏东海不是没有眼泪。8 月 26 日,连续昏迷 38 小时的苏东海一醒来就颜声询问儿子的情况,善良的人们怕他精神受刺激,开始只说孩子受了点轻伤,而后是重伤,再后来又说正在做手术……苏东海终于从前妻的探视中看出端倪,刚有好转的他又被推进抢救室,5 个多小时之后才重新脱离危险。才一醒来,苏东海就像个孩子似的哭闹着要去看儿子,拔了吊针,一骨碌从病床上扑倒在地上……9 月 27 日,苏东海终于见到了久违的儿子。小苏磊的遗体刚从冷柜里拉出,他就昏死了过去。“是我害了孩子。”平淡的语调又把苏东海拉回那个恐怖之夜,“我和孩子骑车由南向北过马路,我在右前方,他在左后方,他的前轮挨着我的后轮,每次过马路都是这样。右边没有车过来,我们过了中线,我的自行车已经快到慢行道了,我猛然看见从左边有辆车逆行而来,赶快回头招呼俺孩当心,话还没出口,汽车就撞了上来……我不该那么晚还把孩子带回去,不该光看右边,没看左边……”苏东海不善言语,高中没毕业就干起了厨师,文化程度不高,但一看就是事事为别人着想的那种老实人。当被问及伤势时,苏东海只简单地告诉记者,背部、臀部和脚后跟的擦伤已经痊愈,唯有头部损伤由于创面太大,伤口至今尚未长好,每天都需洒些珍珠粉以防化脓发炎。而据苏东海的主治医生张斌介绍,苏东海还需做开胸手术,取出因肋骨骨折而淤结的血块,但

由于他身体仍很虚弱，医疗费也迟迟没有着落，手术只能推迟进行。刚刚经受了离婚的打击，爱子又在眼前惨死，苏东海和张菊花已经一无所有，维系着他们的只有“为儿子讨回公道”的信念。1月12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金柱死刑的消息传来，病床上的苏东海只说了两个“好”字，便与在旁看护的弟弟抱头痛哭；张菊花则飞奔到花店，买了11支黄菊花，带着鲜红的判决书，又一次来到小苏磊的身边……“年初三太平间开门，我要去陪孩子过年。带上他喜欢的足球。张金柱不是又上诉了吗？孩子还躺在那儿，没有闭上眼呢。”张菊花喃喃地说。“……张金柱一审的结果，使我们感到了现代化乐章的不协调音，……我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家庭惨遭不幸后另一个家庭又遭不幸，我们正在聆听司法界充满理性的声音。”

张金柱的两位辩护人辩解。对亿万善良的人们来说，1月12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8.24恶性交通事故逃逸案被告张金柱的一审死刑判决既属期待已久，又多少来得有些突然。1997年12月3日，张金柱案首次开庭公审，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云集郑州，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保持惯有的沉默外，大小媒体均争相对庭审进行了详尽的报道。经过5个多小时的唇枪舌剑的法庭辩论，审判长宣布案子将定期再审。

这之后便是一片平静，平静得有点令人难以琢磨，直至1998年1月2日北京《生活时报》第5版一小块并不醒目的位置。透露了一则颇具爆炸性的信息：受害人委托单位河南省法律援助中心“有关人士”在接受其记者采访时明确称，张金柱不会被判死刑。这位人士解释说，撞死苏磊属于交通事故逃逸，最高判7年，拖伤苏东海但未致死，现已逐渐恢复，虽可判故意伤害罪，即使两罪并罚也不可能判死刑。据此人推断，最后判罪结果应在15年到无期徒刑。这则小消息算得上是张金柱案一审宣判前的最后也是最新一则相关报道，但就在见报当天下午，情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张金柱最终饮弹伏法，中州 8·24 血案终于落下了帷幕。也许，善良的人们对张金柱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行为切齿痛恨的同时，无不对受害人苏东海父子寄予巨大的同情。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桩惨剧发生之前，苏东海的家里早已上演了另一幕家庭破碎的悲剧。而这一家庭剧的导演者，正是无视道德良知的苏东海本人，1998 年第 8 期《家庭》杂志作者满敬报道了苏东海与张菊花结婚后养“小蜜”夏某导致他们婚姻破裂。后来就发生了儿子死在父亲偷情路上的悲剧。虽然法院最终将张金柱送上了断头台，并当庭下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被告人张金柱赔偿附带刑事诉讼代理人苏东海人民币 7 万元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菊花人民币 2.5 万元整。但张菊花没有拿到钱。尽管江西另一名苦女子胡雪梅在一场捍卫名誉权的官司中获精神损害赔偿 17 万元，而备尝丧子之痛的菊花，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但菊花没有上诉。一位北京的读者通过报社捐赠菊花 600 元；一位广州的记者将自己报道此案的稿酬 2200 元全部捐给了菊花。然而，这笔判在菊花名下的赔偿金并没有交到她的手里。据当地法院称，由于苏东海的亲属曾先后数次从公安局、法院提取医药费 8.9 万元，因此，判给两原告的 9.5 万元将直接给付上述两个单位，以清偿债务。菊花为此去找审判长：我与苏东海已经离婚，他是他，我是我，我来取法院判给我的那一份。审判长说：这个你们自己解决，我不管。你还可以告苏东海嘛，让他拿出钱来。菊花不服：苏东海并没从我这儿借钱，我凭什么告他呢？审判长最后说：总之你不要再找我！你愿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菊花只好回去，对着儿子的遗像掉泪：孩子，妈真不中用，想办点好事都办不成。

她找到了法院的领导。那位领导很负责地深入调查了解后告诉菊花，法院找过苏东海，让他拿出该给菊花的那份钱来。苏东海说，孩子是跟他过的，这笔赔偿金扣除为孩子办后事所用款额后，再与菊花平分。且不管法官的这些说法及做法有无法律依据，也不

管苏东海的算法有理无理,菊花都不愿再纠缠了。她宁愿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做彻底的输家。

——医院真相:一位七旬老人眼中的“悲剧”

1998年11月《中国青年报》爆出大医院丑闻:北京某卫生部直属医院某医学博士偷窃一死者眼珠被死者家属举报,公安介入,消息一时沸沸扬扬,香港传媒报道更甚。

1998年10月16日《南方周末》消费广场版“关注医疗服务”专栏发表编者按说:“扬英是一位70多岁的退休干部,也是老读者。我们愿意倾向于认为,他写来的这封信所披露的,只是我国医疗界个别的偶然现象。”杨英在信中最后附有这样一句话:“医疗卫生是关系到民族健康的大问题,与每个家庭、每个人息息相关,希望你们把医德医风的纠偏作为己任,则人民幸甚!”这一重任需要全社会共同肩负。另外说明一点,杨英老人担心遭“报复”,所以不愿在文中点出所涉医院名称。

过去只有江湖游医独有的诈骗患者、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已经蔓延到了“宫廷御医”(指公办医疗机构)身上。我的妻子和另一位70多岁的老妇都曾因泪囊炎住进同一个医院,入院时,两人除了眼疾之外,精神身体都很正常,行走自如。每天各挂盐水三到四大瓶,挂到八九天后,弄得奄奄一息,只好出院,住院费都在一千元左右。一个是搀扶回家,一个是用滑杆抬回去的。经过两个多月在家休息,身体才有所恢复。我的表妹有个三岁大活泼可爱的孙子,也是住进这家医院,本已病好,即将出院的当天,医生说,还是挂瓶吊针再走吧。结果盐水挂不到一半,孩子突然死了。当时只有表妹一人在场守护,正当她手足无措的时候,医务人员早把剩余的针药收走了。证据被毁,投诉无门,何况要医院的上级部门——卫生局来鉴定事故责任,那又何异于请鬼探病。表妹一家,也只好泪往肚内流,不了了之。之后,我的一个远房妹夫何某,因伤风感冒咳嗽,到这家医院求治,院方要求住院,从下午三时进院到晚

八时，连续打了五大瓶点滴，因注入的水太多，一时排泄不了，胸腹肿胀、痛苦不堪，只好手术导尿。我妻子去年因天气炎热发生尿路感染（俗称热急胀，尿频），下午五时左右到这家医院就医，经尿检，医生一时说是糖尿病，一时又说是慢性肾炎，当即开出八张化验单。该医生说，今天下班了，明天检验后来住院再开药，今天不开处方了。当时我和妻子都向医生哀求：“时时尿尿，今晚怎么过？明天一定来住院，今晚得先开点药吃”，医生十分不情愿地开了一板氟哌酸胶囊和几粒磺胺类的消炎片。回到家里吃了一次，尿急尿频症状当即消失了，时间过去一年多，再也没有复发过……

另外，许多报纸报道王海在长沙、合肥等地“治性病”一事，其中情况我们这里也不例外。每晚电视里有三到四家性病专科门诊的广告，重复出现三四次，什么阳痿、尖锐湿疣、外阴瘙痒、外阴白斑、阴虱、疥疮、脓疱疮等等，好像天下人都患了性病。这样的广告过去在公共厕所中看到，今天却堂而皇之上了党的喉舌——报纸和电视上了。如果按正常的医疗收费标准，就是我们全市的人都染上性病，恐怕也难以支撑这巨额的广告费。这种性病广告，不仅有很大的欺骗性，坑害患者，而且丑化社会（好像中国成了海毒大国），有伤风化。为什么有关部门居然听之任之，坐视不管？政府不管，单靠王海们是不可能扭转乾坤的。

——医院不知“夜的黑”

1998年11月16日《南方周末》发表署名“忧医疵”主任医师的肺腑之言：医院是人们寄托健康与生命的机构，诚然，我们的各级人民医院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事，立下了很大功劳，但为了我们今后更快的成熟，今天不说好的一面，专门挑挑医院的浮躁，可能更为有利。

一、谁是医院的首富？按知识和科技含量说，首富应是国家的三级甲等医院，但他们只是知识和科技的首富，而不是经济收入的首富。知识和科技含量最低的是基层的卫生所，但可能这卫生所的

个人人均收入是全国医院中最高的。在沿海较发达地区,据说常常可能达到人均年收入2~10万元。如此反差,其中文章很多。

二、医院是福利事业单位还是市场经济单位?按照国家的定位是二者兼而有之,但实际上不少医院把创收作为最最重要的任务。

三、内科大夫的尴尬。医院就是医治疾病的场所,其收入应该是以其主业“医”为主。现实不然,医院的收入,可能不足以糊口,尤以内科最为典型。外科有手术费、换药费等,妇科有检查费、接生费,护理有护理费、注射费等,而内科就只有由70年代的0.05元涨到如今的1.50元的门诊费了,表面看是上涨了30倍,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是赔本干的,不用说技术的含金量,光是扣除大夫的诊室房屋折旧(实际上是租金)、自来水、排污、印刷品、包括后勤人员的工资奖金等费用,每天就要扣去20例以上的门诊费收入。有传媒经常说“知识经济”,实际上各行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虽然拿手术刀的收入接近了拿剃头刀的,但是拿听诊器的还是不如拿剃头刀的和卖花生豆的。多年来形成的习惯,要改可能还会遇到很大的阻力,一些人虽然愿意花几十元去泡一次脚、烫一次发,却不愿意花1.50元挂个门诊号。

四、是谁收了回扣?常有传媒报道,一改往昔指责药房和院长,大都指责医生收取回扣,实际上这只是很小的一杯残羹。道理很简单,哪个医生开了多少处方,这是要经过药房才能查到的,其余道理也就不用了。还记得前几年的报纸电台曾报道过这样的消息,某某医院药房主任廉政,把退不回去的回扣全数存入银行,大概两年下来,就给医院职工建了一栋宿舍楼……

五、免收诊费和挂号费。诊费和挂号费虽然很少,多少还是体现了一点医生的劳动价值,但现在有的医院对此全免,有的竟公开声明“以上专家一律免收诊费和挂号费”。一些不明内情的病人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反正医院不能白养“以上专家”,最终还是要“羊毛出在羊身上”。小小的诊费哪里找不回来?这是一种错误诱

第四种权力

导,若从法律的角度去认识,可能还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六、变相承包,逼其创收。承包、废止承包、再承包、再废止,这在一些医院已经有几个回合,最后说不承包了,实际上还是承包。不少医院规定,大夫要执行“合同”,要完成创收任务,否则便拿不上或拿不全工资,在你的收入中还要扣去诊室折旧、水电费、印刷费、设备折旧费、排污费等。超收者则可按比例拿到奖金。这实质上不是承包是什么?医生能不想着法子创收?

七、鼓励医生多开“检查费”。有些医院规定,开一张CT申请单奖励10元,开一张PC检查(卫生部1998年要求停用这项检查)申请单奖励7~8元,月底还要汇总另提奖金;住院部收一个病人奖励20元,大夫每月都有收几个病人住院的定额,完不成任务者少收一个要罚10~20元,名目繁多。甚至把检查和住院申请单发到院外。因此,病人到医院没看病就先花去几百元、上千元无关无关的检查费就不足为奇了。

八、开大方用贵药。大方贵药利润多。在医院的收入中,药费部分最少也要占到70%左右,这是一种医与药本末倒置的现实;同时加剧了药品资源的浪费,抑制了技术的提高。

九、大夫的基本功弱化。病人一来,便开单检查,凭检查结果进行诊断。本来完全可以依靠物理检查确诊的常见疾病,也必须进行有关的特殊检查。这样,一来大夫省事,二来收入增加,何乐而不为?但其结果,不但大夫的技术难于进步,还要病人多掏腰包。

十、缺少耐心和爱心,拿手术当儿戏。一患者经CT检查右下肺部性感染灶,就诊于某三级甲等医院,大夫先是冷冰冰地说:“穿刺!”患者问:“穿刺能确诊吗?”医生答:“50%。”病人问:“那怎么好?”医生答:“再穿!”“要是还不能确诊呢?”“还穿!”……最后医生说:“那就开胸探查!”“开胸手术大吗?”“不大,就是去掉一根肋骨!”实际上,再简单的胸科手术,也是大手术。病人一听吓得面色煞白,待冷静下来,说什么也不敢再进这家医院,经抗炎治疗一个

多月后复查,炎症已吸收。

十一、读书无用,做学问吃亏。某老教授积数十年之经验,绞尽脑汁,夜以继日,把毕生之学术精华抽筋拔骨写成专著,准备传世。送去一问,出版社、印刷厂,哪个单位都要盈利,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投资都需作者自负,而且印成后需自找销路。再问书店,答曰:“科技书不好销,要三七开。”作者不懂再问:“是你要留三成利润吗?”答曰:“那还行!我们要七成!”“那不赔了吗?”书店经理说:“那不管,我们是搞经营的!卖不出去还要退给你,而且售后付款。”真正好的科技著作,是第一生产力的载体,是无价之宝,如果长此以往,何止医学,还将影响科学技术的总体发展,后患无穷。

十二、院内租摊。不少医院都腾出空房租给游医。号称治疗某某病的专家,他们大多自带处方保密的中成药,价钱特贵,收入与院方分成。比如游荡河南和陕西的胡万林。有的承租人所带证件明明写着“主治医师”,但看着却年纪轻轻,混熟之后得知才28岁,中技毕业两年还是好的,甚至有的什么都不是。他自己说:“我这证明,临来前卫生局说了,只在外地谋生用,回本地无效。”

十三、诊治时间太短,怎能保证医疗质量?一名20多岁的小伙,自称祖传,名之骨科,租国家医院开设按摩,用的治疗费收据,按国家按摩费的标准收费10元/每人每次,表而上无可挑剔。全凭年轻力壮,每天接诊百人以上,虽说辛苦点,一天收入可达1500元左右。按满满8小时工作量算起来,一天480分钟,给每个病人的诊断、治疗时间不过三四分钟(何况他还要人厕、聊天),每月可有2~3万元的收入与医院对半分。业内人应该知道这疗效如何保证。

十四、争上基建装修项目。不少医院争着上基建项目,实在不行也要改造暖气管道等,其中文章多多。

十五、医院升级忙坏了领导和群众。医院升级就要检查评定,但多年没有很好地强调医疗质量、病历书写质量,加上基本功的滑

坡,自然经不住检查。怎么办?只有临时抱佛脚,院长心生一计,发动群众把所有的病历重改写一遍,旧的便作废销毁。谁都知道,病历是医院的档案,是病人发病、就诊、治疗过程的真实纪录,旧的病历是什么水平就是什么水平,完全可以借此检查“东风”提高医疗和病历书写质量。然而,谁要是提出这样的意见,必会道到紧鞋带、戴眼罩之苦。

十六、是专家门诊(义诊),还是“医托?”专家门诊的主体是专家,现在有些专家门诊鱼目混珠,尤其是那些为了商业推销目的在医院门诊部、药店、街头或闹市区举办的专家咨询或义诊,有的已经使不少民众上当受骗;还有的所谓专家把病人转手介绍到什么“分院”,借以收取介绍病人的提成,俨然成了“医托”。

十七、医疗广告(尤其是“泌尿系统感染”)满天飞。近年,医疗广告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医疗单位越小广告越多,1998年广告的新景观是“男女泌尿系统感染(包括性传播疾病)”,有时竟占去报纸的半个版面,一些三级甲等大医院也奋起直追。难道中国人都得了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新闻纸都传播了什么?

十八、怪圈。唐代名医孙思邈说:“大医精诚。”也就是医术要精,心要全心全意,这与报上说的“党和国家的要求”一致。然而上述的浮躁,使医院走了样子,不少病人不敢进大医院,转而求助于基层卫生所,这可能也是一些医院不景气的原因之一。但病人到了卫生所同样有难言之苦,因为那里也在根据自己的条件,争取着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

最终结局,一方面是医院形象在受损害,另一方面吃亏上当的还是平民百姓。

更重要的是,长此以往,能不出医疗事故?

医院是神圣的殿堂,医生是比任何工作都神圣的职业,要说“人命就在我们手里”也不为过。我们卫生系统的领导干部和医生,切不要急功近利舍本逐末,两眼只盯住“孔方兄”,必须把注意力集

中到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质量、加强责任感、改善服务态度、树立“爱人”之心,如此才不愧“天使”之美誉,同时也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是该反思的时候了。

曝光。……

曝光!……

有多少人间沧桑,有多少世态炎凉,需要新闻舆论曝光:

有多少民生疾苦,有多少家国大事,呼唤新闻舆论关注!

我们不禁要问:曝光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调查显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当回答一个事实是否构成新闻时,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真假标准,其自然有明确的客观规律可供依据;二是善恶标准,它却常常缺乏鲜明的规则可以为据。面对这个困惑,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倾向是:遇到有争议的或曝光的题材时,记者必须在澄清孰是孰非后再作报道。而国外的记者惯常采用的是,记者只须在报道中保持各方的平衡即可,不作评判式结论。正是由于这个困惑,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普遍认为“真实的报道不一定公正”,但是公正的报道却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地给人以真实感。而与国外新闻媒体常常关注的焦点不同,中国新闻工作者对“质疑并批评企业的行为”、“质疑并批评政府官员的行为”、“质疑并批评社会团体的行为”的大小曝光,只认为是“有点重要”,原来他们的困惑多多。“假如国家是一条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瞭望者,他要注意来往的船只,注视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这是早期通过战争移民到美国的著名报人普利策对新闻工作者的定义。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传播媒介所流行的“超然独立于各利益集团”的职业信条,在中国也拥有半数以上的认同者。调查者认为,这显示出中国新一代的新闻人要求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和更多相对的独立意识。对于新闻的社会功能,是客观地报道事实,还是更好地宣传政策?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答案表现出希望二者能够协调一致。八成以上的被访者同意关于“新闻报道应是客观

世界的反映”的说法,但是同时,有四分之三的被访者又强调“在新闻中,事实与观点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不能排除倾向性,但能否做到公正就难说了。

对于企业和产品被媒体曝光,或许那些企业根本不必担心,因为没有多少消费者能够真正记住这些被曝光产品的牌子。得出这一结论,乃是缘于北京勺海市场调查公司 1998 年 4 月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据《钱江晚报》1998 年 4 月 16 日的一篇文章报道,调查采取电话调查方式,共调查了 208 位收看过中央电视台“3.15”晚会节目的北京市民。在晚会上,有关部门对若干类产品的品牌及型号进行了曝光,这些被曝光的产品中,有合格的,也有不合格的。为了测试消费者对电视曝光的关注度和有效度,调查选择被曝光的进口微波炉产品询问受访者:“晚会上对不合格的微波炉进行曝光,您还记得是什么牌子”、“哪种型号”、“假如您要购买微波炉,购买这些的可能性多大”、“如果不买,是不买这种型号呢?还是这种牌子的都不买呢”。调查显示,在观看晚会的观众中,有 60% 的人看了对不同类别、不同品牌以及不同型号产品的曝光,而在这些观众中,能说出被曝光牌子的仅占 12%,而能正确回答出不合格微波炉牌子的观众仅占 3%,有 18 人把“松下”误认为是不合格的微波炉品牌;另外有 5 人分别把“三洋”、“飞利浦”、“格兰仕”、“日立”记成“不合格的微波炉”品牌。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出被曝光产品的具体型号。

这样的结果表明,仅仅靠一次电视曝光远远达不到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目的,更何况曝光贪官污吏、权力机关?于是,同样可以思索,新闻媒体对其他事物的曝光披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起全社会的真正关注和审视呢?如果新闻曝光之后,没有任何“善后事宜”,而仅仅是“雨过天晴”,那么,我们是否会感到尴尬与困惑?我们又将何去何从?

我们期待着的,不仅仅只是曝光和呼吁、呐喊……

第九章 开放时代(留在后面的话)

中国的记者并不难当,收入也不低。可以不做事,只会写稿就可以了。当然,开有偿的新闻发布会,稿子都是人家写好打印好的。署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而且当官的子弟更可以当记者,有名有利,又清闲。何乐不为?你怕事可以,你无事可以,你多事也可以,总之,记者什么人都可以当,没有丢人一说。不用监督别人,也不用监督自己。吃饱找几个哥儿们逛逛歌厅就行了。但是,如果你不想这样,那么,你应该做人了,然后,你就是真正有别于上一种记者了,你就不畏困难,勇于监督,掌握第四种权力。所以,我请读者相信,做真正的记者不易,难得很。

1. 世纪末死守高尚的权力

一个人做点高尚的事并不难,难的是他不去做。

面对极其丑恶社会的一面,记者们的理想只是希望来年再高尚一点。

但是,实施高尚很艰难。作为记者的本人,最向往古人的思想境界。1998年12月初,我到了一个一年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曝光“丑闻”不止六次的地方——山西运城地区,我看到一句话,是古人舜的“歌”：“天下——人饥则我饥,天下——人寒则我寒”。我想这是古代领导人的高尚理想,现代的领导人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尤其对某些领导人来说,起码让他想一想也难。我知道,某些领导

人“不容易”，为了买官，不惜为上级当“干儿子”，不惜拿从不轻易到手的花花绿绿的“票子”上贡……唉，让他们高尚真难。也真可惜了，舜帝几千年的话白说了，老百姓也白听了。

1999年，追求正义的我们还要当记者，还继续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我们继续的是“舆论监督”，我们想让领导人知道“天下一人饥则我饥，天下一人寒则我寒”的含义，我们还想告诉一些领导人的是中国这个生存空间每天都需要新闻的发生，更需要每天新闻的传播。

我们反思以往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吓得战战兢兢的经历，认为这样不好。我想应该把“天下一人饥则我饥，天下一人寒则我寒”当作1999年世纪末记者们走向高尚的路标，不管有没有人与我们有同样的看法，但愿追求第四种权力的人们坚定地走上这条不归路。

2. 打开天窗说亮话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记者只是一个记者，一个抢新闻的人，一个坚持正义的人。记者是永远当不了官员和有钱人的。

在我国，问题是“记者只会写能发表的文章，从没有写过不能发表的文章”，这样的记者怎么能称之为记者呢？我当了四年多的记者，算是一位“老记者”了，虽然我对“老记者”一词不大恭敬，总以为比“老处女”更难听的是“老记者”，老处女就仅仅保留自己的一个“处”字，而“老记者”却把自己都卖了出去，而且不大值钱。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还记得前文所说，安徽某县税务局副局长儿子的打死人那件事吧。当时的税务局副局长根本就没让记者进县城事情就摆平了，那狗日的记者收了10万雪花银就回去了，狗日的，非常狗日的那记者，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毁记者者记者也，非读者也。现在的读者已养成这样的习惯，他不爱你，也不恨你，这才是真正的可怕。一个没人爱的记者该是怎样的记者呀？谁还会需要记者呢？记者还有出现的必要吗？

我是记者我怕谁？记者要勇敢，不怕误解，有时候要有强烈的献身和牺牲精神，记者不一定非要打抱不平，但一定要敢于说话，敢于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辞负责。在北京火车站，一位 12051 号检票员欺负旅客（包括我），我当场把他的胸卡翻过来，并牢牢记住，然后就寻求媒体支持，敬业的《北京青年报》读者来信版编辑丁国辉收到我的传真后立即转至北京火车站纠风办，我也很快得到答复，并得到 12051 号检票员及纠风办的口头道歉，12051 号检票员知道现在这个时候下岗是非常容易的。这仅仅是我曝光的一件小事，这仅仅是把我应该干的工作做好而已。他们怕乌纱帽给丢了，才会低头道歉。报界的尴尬角色可见一斑。报界怕得罪人，就把皮球踢给当事人，当事人之间的事只能不了了之，还谈什么舆论监督，还谈什么真正应得的结果。

作为记者，我们为历史书写初稿。有时，我们的报道可以改变人民的生活和事件的进程，而且我们从来没有乏味的时候，而且我们经常能遇见许多有趣的事和有趣的人。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策划人、社会学家杨东平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中国青年报》撰文说，1998 年 8 月长江洪水肆虐，四川省率先宣布自 9 月 1 日起在长江上游地区全部停止天然林砍伐并关闭木材交易市场。而事实上，该省第一大国有林场不但没有被列入禁伐范围，而且更加疯狂地大肆砍伐原始森林。由于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重庆会员的揭露，中央电视台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林区，拍摄到惨不忍睹的滥伐现场，并突破围追堵截，成功地将录像带转移出来。9 月 29 日晚，该台《经济半小时》播出此片。同日四川省政府决定 10 月 1 日起在全省范围内禁伐所有天然林。杨东平认为，我们虽然有党内的、行政的、司法的等各式各样的监督，并在一定的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监督的匮乏仍然是非常普遍的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监督主要是内部的、纵向的，因而不公开的。有关被监督的

人对信息的控制、加工和处理本身是不受监督的。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类的官样文章推挡群众的揭露、人大政协“两会”的提案乃至中央领导的批示,现在这些已成为颇为有效的“对策”,甚至成为轻车熟路的“为官之道”。然而所有的弄虚作假、腐败行为,均有一个特点:见不得人。他们最害怕的不是上级调查,而是舆论监督、新闻曝光。事实证明,在各种监督形式之中,舆论监督不仅最有效、最快捷,而且最廉价、最易于操作。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体的各种监督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种监督不应当是偶然的、一次性的,而必须是全方位、全天候的——这就有赖于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群众监督。制止原始森林乱砍乱伐、河南郑州某区公安局政委张金柱撞死人被处以极刑等案例,显示出民间力量与大众媒体结合进行舆论监督的强大威力。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新闻的出现才能验证现实的真实。否则,新闻无从谈起,一切无从谈起。

虽然干新闻,真累。虽然当记者,真累。而且,未来的记者生涯是福是祸;一切未知。凡是看过电影和电视剧的读者,大多会联想到记者的形象——胡子一大把、头发老长、背个大包、行色匆匆;没白天没黑夜、擅长伪装、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其实,这仅仅是人所共知的记者的一面。记者真正的角色是掌握第四种权力,即对社会行使监督的权力。

记者是男人的职业,就像战场上的英雄必须是男性一样——请女性不要埋怨我,男人受到崇拜是两性间的好事,就好象女性天生被男人爱一样。我曾想,哲学家尼采、叔本华、萨特是影响世界的优秀男人;我曾想,将来我准备要孩子时,如果是个男的就让他成为掌握公众舆论的优秀男人,然后相信他会爱优秀的女人,如果是个女的就让她永远爱优秀的掌握公众权力的男人。我相信这是规律,因为我认为男人只有做记者才会优秀一样。我知道我得罪了一些人,但我还是要说出来,记者就是由男人做“大”的事业。

不怕累,不怕牺牲,有哲学家的头脑和远见卓识,而且还要有条件作真正的英雄男人。这是记者的社会角色定位。

单纯、激情、勇敢、年轻是记者的优势(老记者像老处女一样难听和不足挂齿),不怕牺牲和敢于牺牲是记者成功的先决条件。目击真实对于记者来说比玩弄技巧和投机取巧重要千倍,记者的尊严就是真实,虽然不一定能得到。

记者是希望真正体现自由意志的自由职业者。而新闻界或新闻传媒的老板往往不是这样,他们是为某些特定的政治利益的需求而服务的,包括为各种权力和金钱的掌握者。

记者是靠不住的,正如美国总统是靠不住的、西方的上帝是靠不住的一样,一切无须可靠,也不会可靠,别指望中国记者能做成功什么,能或为什么,他只是舆论监督,公众目击,一直希望以公正、客观、准确、自由为准则。尽管事实上并不尽然。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时不在枷锁之中。其实,这个“人”也可以指作记者——记者是生而自由的,但无时不在“枷锁”之中。

——天理民心:看谁赢在最后,笑在最后

请拥有天理民心——新闻记者,真正能够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新闻业的“第四种权力”。要知道新闻与正义密不可分,从现实意义上说找新闻就是找正义,相信新闻就是相信正义。新闻的力量也就是正义的力量,当我们身边有了弥天大谎,有了声泪俱下的委屈,有了政治丑闻,有了不该发生的烦恼,有了无法承受的苦难,我们首先想到了新闻,虽然新闻不是法,但新闻是正义,是代表正义的大众的力量,是无法不透明的光芒,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对正义的选择。

无疑,新闻需要一种面向大众的职业道德。最近很多专业组织都正式通过了道德规范,以下这些原则是《华盛顿邮报》规范记者的标准和新闻道德。尤金·迈耶(EUGEN·MEYER)在 1933 年买下《华盛顿邮报》之后,一直由家族经营至今,而当时他就公布了

“这些原则”：报纸的首要使命是报道事实，且是尽可能查证的事实。

报纸应该报道所有得到的事实，不仅在美国，也要兼顾到全世界的重大事件。

报纸是新闻的传播者，所以应该遵守绅士奉行的庄重高雅。

报纸的报道应该老少咸宜。

报纸必须以读者乃至全体大众的利益为己任，不应该屈服于所有人的个人私利。

在追求事实的过程中，只要是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报纸必须有牺牲实质利益的准备；报纸不应该与任何利益团体挂钩，在公众服务上，必须秉持公平、自由、完整的原则报道新闻。

“采访就跟生活一样，是一趟发现之旅。”不知我们有没有想过，文学只是一门写作的艺术，其作品要让人一读再读；而新闻就不一样，新闻是要在新闻专业的世界提供许多令人兴奋且具挑战性的职业途径，为坚持正义而又热爱文字、好奇文字的青年提供各种不同的挑战和敢于牺牲的诱惑和精神。对有心加入新闻事业的朋友，只要你在坚持正义你就是这个跑道上的战士。而且你一定能赢！

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包括年轻记者，首先要学会宽容中国，理解中国，认透中国，真正热爱中国，才能有可能改变中国，建设中国。

本是前人做错了的事，今天的后人就不要再做错了，不然，后人比前人还愚蠢，还可怕。今人之所以比前人高明就是因为我们在走在他们后面，我们有条件不步他们的后尘，我们有条件看清楚他们的曲折弯路，有条件避免在同样的地方跌倒，有条件看得比他们更远。所谓路是人走出来的，但弯路也是人走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迷信路，我们要怀疑路，怀疑自己的眼光，要超越前辈，高于前辈，走前所未有的路，创一片奇迹和未来的灿烂光明。

写在后面的话：说，还是不说？

对于 1999 年初的我来说，三过家门而不入已是常事。我不敢说我很忙，但我确实是在煎熬中度过。对于出版这本书，我抱有极大的激情、自信、耐心和精力。但事实上，出版的过程愈长，我愈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事无巨细，因为我处处需要从头开始，再者出版并非“形而下”的事，并非我一人不能办的事，我知道并体验了这句“没有目标的努力往往事倍功半”所包含的哲理。

我还知道，有时候，路走得太急，容易跌交是一，错过了周边的风景是二。所以我们不能太由着自己，不能抱怨天太短，更不能不知道自己是谁。

又是星期一，我已经少有幽默，我知道工作不是为了自己，更多的是为了别人。

记得有本名为《说，还是不说》的书很好，名字意味深长，我感到：话多了，就说出来；太累了，也就不想说了。此时的我正是这样“不想多说了”，但我作为本书作者之一很想注上这么一笔：本书所引用文章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向引用文章作者付酬，联系不上的作者请见到此书后及时与本书作者联系，通讯处：北京垂杨柳邮局内 25 号信箱管爱宗收，邮编：100021，电话：63406655，无线寻呼：(010)68176688—15155，谢谢。

再者需要注明的是：本书主要参考报刊有北京《中国青年报》、

第四种权力

《北京青年报》、《中华新闻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报刊月报》，石家庄《杂文报》，广州《南方周末》、深圳《街道》、《焦点》等相关报刊；主要参考书目有普利策奖作品集《新闻与正义》，《普利策传》，普利策奖摄影作品集《黑镜头》，林达著三联出版《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张建伟著《深呼吸》，卢跃刚著《大国寡民》，吴海民著《新闻出版风云》、《金元新闻》，《新闻官司大观》及《大众传播法概要》等各公开出版物。

咎爱宗

附 媒体亲近总理 ——海外学子致朱镕基公开信

1998年第9期《南风窗》杂志刊登了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留美学子胡学华致朱镕基总理的公开信。原编者按：近日，本刊编辑部收到了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胡学华的来信，一封写给朱镕基总理的公开信。信中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出了不少建议，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和关心，对政府的信任和厚望。胡学华的建议有些暂时还不适合中国国情，但听一听并无坏处，而且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亲爱的朱镕基总理：

我，胡学华，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尤口乡，是一位留美学子，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现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到美国4年多来，我一直关心祖国的发展。今年人代会期间，适逢回国探亲，看了您的履新记者招待会，让我非常感动又感慨万千，于是就冒出了给您写信的念头，经过近几个月的反复思考，想给您提几点建议。

一、您的政府正处于转型时期，太需要钱，太需要广开财源
一个政府的腐败，往往是财政危机开始的。

为此，我建议：

1. 大量增发10~30年的长期国债。钱国家急需，国债政府可

以慢慢还,为解决那些急迫又非常棘手的问题赢得时间。凯恩斯谈到国债时说:政府是谁的政府,是老百姓的政府,国债是老百姓的政府向老百姓借钱,多借一些又有什么不可呢?目前我国国债余额占 GNP 的比重太低,太有余地。1997 年底,我国国债余额为 5400 亿元,占 GNP 比重 6.8%,而西方发达国家占 50%以上。

2. 改革税制,让税务局的征收手段现代化,把该收的税收上来。美国人最怕的不是警察,也不是州长、总统,而是税务官。因为税务局的电脑监控网络无处不存,无孔不入,时时刻刻监控着你的银行账户和钱袋,你就老老实实地交税吧。反观我们的税务机关,还是手工作业方式,工商、银行、海关、法院、公安、边检和税务局,基本上老死不相往来,数据和资源也不能共享,让人可以从从容容逃税而习以为常。

3. 由中央政府开办六合彩,全国电脑连网销售,不设头奖限额。其中 35%作为政府六合彩税,50%还奖,15%作为销售费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一定的比例分成。如果加上中彩者个人所得税,政府收入超过 40%,同时又可解决几十万人的就业机会,多好的一件事!我估计,六合彩每年可给政府带来 500 亿元~1000 亿元的收入。在美国,我有一段时间专门研究过美国的博彩业,发现六合彩是博彩业中所有博弈游戏里负面成分最小的,至少比烟草的负面作用要小许多。我想政府能允许烟草业存在,也应允许六合彩这一无烟工业的存在。西方人认为:六合彩是无痛税收。美国人有一句名言:Onedollar,Onedream(一块美金,一个梦想),就是形容六合彩业的。其实六合彩还有轻微鸦片作用,可以安定社会,它让每一个购买六合彩的人一年 365 天充满梦想。

4. 政府有了钱,解决问题时尽可能采用经济手段,而尽可能不采用非经济手段。比如军人转业安置问题。如果能采用一次性经济补偿手段,就没有必要采用强制安置手段,在各级政府部门设置一个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公室,又养一批人,腐败和不公正问题也

由此滋生。

5. 政府有了钱,就应按市场价格向公务员购买劳动,这是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我在一本关于您的传记上看到,您的月薪才2000元。2000元连套像样的西装都买不到。为什么跨国公司能花几十万元年薪请一个中国区总经理,我们就能不给政府最高官员百万年薪呢?要知道,总理这么一个职位,笔头稍一松就可能是几千万几亿元化作流水,而我们却用几千元月薪去打发,心里是不是觉得不踏实?总理也要养家糊口,也有个人应酬,也有私人需要,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不能长时间以低于市场经济标准的价格向道德水平参差不齐的几千万公务员购买劳动的。它带来的后果大致有三:(1)便宜没好货,政府请了一批平庸的公务员。(2)腐败。表面工资很低,背后有免费住房、公车、公费旅游等隐性收入,甚至有灰色收入,权钱交易的腐败收入。(3)全体公务员一辈子学孔繁森,无私奉献。但你让他学一时可以,学一辈子就靠不住了。即使他想学,他的妻子儿女未必想让他学,因为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而这需要经济基础。所以希望您的政府大量精减机构,社会能办好的事情政府不管。同时也要裁减公务员,两个人的活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资一个人拿,让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接近于市场价格,同时让隐性收入透明化、货币化。但光是高薪不能养廉,还需要建立起反腐机制,让公务员搞腐败的风险远大于收益。

二、尽快改革我们的教育体制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里有四大强国主张: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中最核心的是人尽其才。只要人尽其才,其他“三尽”不尽而尽。

美国的强大和它的教育体制的先进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没有全国统一教材,它的教材是五花八门的。也没有一个强大到无所不管的教委,从幼儿园管到博士后,从高校课程专业设置再管

到招生计划。相反,它把教育自主权下放到每一个教育主体。所以每个美国大学都各有特色,各有专长领域,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万紫千红。而我国千百万中学生每年都读着一样的中学课文,做着一样的数学题,实验着一样的物理化学实验,写作文是一样的格式,引用着同一段鲁迅的话,背着一样的名言警句,同样的思维方式,高考着同样的试题。马克思理论中学学了,大学又要学,研究生还要学,这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这难道不是我们教育的悲哀?

我们的教育制度,是计划经济下形成而且至今较少触动的最坚固堡垒,到了向它开战的时候了!中山大学王珣章校长感慨地说:“作为校长,我无权开除一个教职工。职工多过教工,你也无可奈何。”

为此,我建议:

1. 打破国家教委(编注:现已改为教育部)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办学体制,放开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包括大学、研究生院。

2. 把教育自主权下放到各个教育主体,国家教委只管普及义务教育和宏观教育政策。

3. 放弃文凭要国家教委认可的做法,由社会、市场和社会中介机构去认可。每年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对各个学校的办学专业、水平作出评比,排出名次,向社会公开,以供社会选择、参考。美国的大学每年各个专业的办学水平排名和综合排名全由社会中介机构评估,所以各个大学的专业排名和综合排名每年都在变动,这样每个大学都有压力,因为教学质量不好,就招不到生源,也就生存不下去。

4. 取消全国统一教材,中学教材由各省自定,大学教材由大学自定,中学毕业考试由各省自行组织。

5. 取消全国高考,代之以各个大学根据自己的特点组织教授团进行春秋两季招生。招生采用笔试和面试的办法,既可以从应届

毕业生中招,又可以从社会成员中招。这样就不会形成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应试教育也就没有市场。全国所有大学向全国人民开放,不问年龄、出身、民族,只要竞争过关,就是你70岁,也一样上大学。组织教授团也可以克服招生中的腐败现象。

6. 农业大学应以培养农村干部、科技骨干为主,免试入学,因为培养他们,他们最后会回到农村,改变农村面貌。农业大学应改变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办法。而我们每年的农大毕业生,却没有几个回到农村,都是以考上大学作为跳龙门的跳板,结果是农村人才严重失血。

7. 在中小学开设国情教育、环境保护课程。

三、建立起财富二次分配体制,开征利息税、遗产税、股票交易所所得税,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体系。

市场经济的必然后果是“马太效应”,贫富分化,赢者通吃。“资本主义”不灭的原因就在于通过国家强制,以利息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了财富二次分配体制。它让市场经济竞争下的弱者得到了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和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邓小平同志所讲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指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即:居者有其屋,能接受免费公共教育和医疗保障,基本生活需求能得到满足。在通往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提供免费公共教育更伟大的步骤。反观我们的国家,一次分配已放开,基尼系数已达0.4以上,已超过一些发达国家,而财富二次分配体制远未建立。利息税、遗产税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征收得太差,远未达到调节贫富的目的。有不少机构和大户在股票市场上翻云弄雨,操纵市场,大把赚钱,而股票交易所所得税居然未开征。社会保障体制也远未建立起来,而根本就把8亿农民排除在外。日本在1895年已普及小学教育,而我们到今天都远未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

我建议:

1. 应尽快开征利息税,累进征收,存款越高,税率越高。这样不仅能向富人多征税,也能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扩大有效需求。

2. 应尽快开征遗产税,也是累进征收。死亡是对富豪最好的非暴力剥夺。

3. 应开征股票交易所得税,但这对股市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应在条件较为成熟的时候开征。

4. 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体系。建议以个人强制申报制代替以前的代征制。

如一个业已工作的成年人到每年指定日期前未申报个人所得税,政府可停办有关个人事务手续,如禁止出国、停办私人公司注册和房地产过户等。为了完善以上税制,配套改革要跟上,主要是实行金融实名制、固定资产登记制。银行、税务、海关、边检、工商、公安、法院、房地产管理局和证券交易登记中心要建立起互联网的数据电脑共率系统,个人以身份证号码为检索依据,法人以法人代码号为检索依据。这样,个人所得税才能把该收的收上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才有财力保障。同时也要改革户口制度,建立起以个人工作地、居住地和个人所得税交纳地为依据的户口制度,个人身份证、法人代码证应有条形码,以便检索。

四、关于国企改革

美国几乎没有国企,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见国企多少和国家强大与否没有关系。一个万能的无所不包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低效率的政府。

建议政府首先加快退出完全竞争和过度竞争领域的速度,在适当的时候也要渐渐退出像石化、汽车、钢铁、铁路等寡头垄断领域,在退出这些领域时要尤其小心,以免留下空档让外国跨国公司形成垄断,因为中国民营企业并未真正成长和成熟起来,还需要时间,还无法担当参与国际激烈竞争的使命。治疗国企病的最简单办法就是逐步非国有化,把国有企业改造成非国有企业、私营企

业、股份制企业：先退出过度竞争领域，再退出完全竞争领域，然后退出不完全竞争领域、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领域；其中要适当保留少数国有企业，在涉及国家命脉的战略性领域里存在与发展。

五、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其实是经济民主，其本质是在所有经济领域允许一切经济成分展开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竞争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不言自明，建立在经济民主之上的上层建筑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为上层建筑的运行和维护成本最终要由经济基础来承担。所以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对经济发展尤其重要。

为此，我建议：

1.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人民代表应精简，专职化，并配备必要办公条件。像全国人大，几千人，好像很有代表性，但一年开不了几次会，开会也很难深入研究和解决问题。许多人大代表是退下来的干部，年龄偏大，不适合全日制工作。人大几千人开会也只能是发发言，举举手，没办法真正研究和解决一些棘手和全局性的问题。而像美国的参议院，参议员不过 100 人，每人都配备办公室，有秘书和咨询研究机构，天天开会，研究很多问题，众议员也不过 300 多人。有句话很形象地概括了我们的人大制度：政府是老鼠，需要受监督，是专业的；而人大是猫，来监督，却是业余的。

2. 改革法院管辖制度，实行陪审团制度。建议建立中央法院和地方法院两套系统，凡是跨省区的案件，由中央法院管辖，地方案件由地方法院管辖。这样地方保护主义才没有制度基础。针对司法腐败问题，可实行陪审团制度。收买一个人容易，收买一群人难。法官主持审理，陪审团决断。不过这存在一个如何提高司法效率的问题。

3. 扩大选举民主，在选举各级政府领导人时，尤其是第一把手时不应实行等额选举，而应实行差额选举。这样才能形成公开、公

正、公平竞争的风气,我们的政府才能人才辈出。

4. 进入知识经济年代,对传播知识的新闻出版业不应再实行总量控制的计划经济,而应全面放开。信息公路的高速发展表明:谁掌握信息,谁就能拥有未来,因为信息是决策的基础。美国这几年的高速发展就表明美国业已成为世界信息生产中心、信息出口大国、文化输出大国。像《泰坦尼克号》一部电影就卖了20亿美元,而全球Internet网络更是由美国人控制,连取个域名都要向美国人申请。我在美国曾碰到中山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王宾,我问他对美国有何感想,他就说:“一句话,你只有无可奈何地看它在下个世纪继续称王称霸。”所以,对于社会信息,知识传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新闻、出版业要全面放开,优先发展。在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允许中国国内的多种资本形式进入文化传播业,使我们自己先强大起来;对那些靠财政拨款、强制性摊派式订阅而活着的传媒应逐步“断奶”,自由竞争。比如可先开办几家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的股份制出版社、杂志社。一些报业集团可以像美国《读者文摘》一样上市发行股票。还可开办一家股份制的中国电视台,免得中央电视台没有竞争对手太孤独。鼓励电信、计算机、传媒、软件、网络、影视、娱乐等不同门类、地区的企业相互兼并、融合,形成中国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

5. 要在各行业各领域建立起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这是美国强大的最根本原因。在市场经济领域,要鼓励竞争,反对通过不正当手段形成垄断。在上层建筑领域也要公开竞选。“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是封建制度下的名言。人才能否脱颖而出就看你有没有公开竞争的制度。像克林顿是多少次竞选出来的总统,像泰森是千万次残酷拳王争霸战杀出来的拳王,像比尔·盖茨,也是市场竞争浴血出来的电脑大王。所以美国社会是由少数精英统治,不过这少数精英统治是建立在竞争机制之上,它给予每一个人一把向上爬的梯子。人尽其才的根本在于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制度

的建立。

所以我建议：中央部委机关招收公务员，应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不问出身、户口，而不应仅在北京招聘或仅在大学生中招聘。各省机关招收公务员同样应而向全省甚至全国招聘。全国人大要尽快通过《政务公开法》、《公平竞争法》和《政府采购法》。目前，中国的改革已深及我们制度的灵魂深处，即意识形态、法律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逃避不是办法，应勇敢地、开放地前进，没有退路。路当然要一步一步走，但不能原地踏步，或为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举步不前。

近日看到克林顿访问中国的 CNN 新闻。克林顿的轻松之态其实是一种制度的轻松，而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也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累积了太长时间，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头。这正是“人治”的悲哀处。朱总理，您个人承受的实在太多了！

20 世纪留给中国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中国越发展，其受到人口和资源的制约就越紧迫，所有中国人对此都要有清醒的认识。既要有爱国之心，更要有报国之技。

祝中国的改革走好！祝我们的国家人才辈出、繁荣昌盛！

祝中国在 21 世纪傲然屹立，得到全世界的尊重和敬仰！

胡学华 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谨以此书献给 2 1 世纪 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

作者 =

页数 = 3 9 7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 序一我们的基本立场 & 卢跃刚
- 序二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 余杰
- 序三世纪末的沉思 & 骆爽
- 呐喊无声胜有声——写在前面的话 & 咎爱宗
- 第一章法治必行
 - 非“法”新闻引发官司
 - 1 迎接新闻法治时代
 - 2 舆论监督，势在必行
 - 3 记者的法制保障
 - 新闻体制改革及舆论监督、司法公正
 - 4 寻找真实
 - 批评报道招致开除公职
 - 笔与“老虎”的较量
 - 5 新闻官司
 - 打赢官司的一步
 - 侵害谁的权力
 - 材料失实谁负责？
 - 照片引发的是非
- 第二章新闻正义
 - 1 包国军假新闻案的背后
 - 2 艰难的采访
 - 云南电视台记者采访遭围攻
 - 掌权者“守土有责”
 - 不宜夸大新闻舆论监督作用？
 - 3 保护自己
 - 批评的不是时候？
 - 《焦点访谈》记者襄阳被打内幕
 - 自由撰稿人反腐被捕
 - 4 正义属于谁
 - 新闻承受的尴尬
- 第三章中外新闻洞察
 - 1 何为先于一切的目标
 - 从《焦点访谈》与《南方周末》想到的
 - 新闻立法，来一次深呼吸
 - 从审批制到登记制，路有多长
 - 第四种权力：舆论也需要监督吗？
 - 2 点破美国精神
 - 杰斐逊：对自由的困惑与坚守
 - 自由与安全，哪一个更重要
 - 自由的界限在哪里：诽谤罪与隐私权
 - 报道权利与公正审判

- 永远的先驱者普利策
- 恩怨难辩：新闻与情报

第四章职业化进程与良知

1 势利记者批判

- 现在的记者形象
- 真正的无冕之王
- 人民记者是不是无冕之王？
- “钱”途光明 正义无踪
- 并非历史的笑话

2 焦点问题：中国一年仅有 3 6 5 个？

- 新闻岂能靠策划创收 & (1
- 记者不要造神话
- 美国记者与政府的关系 & (1
- 记者要学会报道 & (1

3 体制内记者和“内参”外的声音

- 新闻人语：你怕不怕警察
- 体制外的“记者”吐真言
- 自由撰稿人之正义
- 对舆论监督的可操作性的质疑
- 如何避免官司“骚扰”？
- 文责谁负
- 专家比记者看得更清楚
- 历史上的光荣与梦想
- 寄给新闻界的真实声音
- 想生存发展，就要把自己变得丑恶？

4 怀念 8 0 年代的新闻

- 深入采访不容易
- 新闻要讲清什么
- 也能工作在别处
- 不要逼记者制造新闻
- 让记者“跑”起来
- 敢为市场的“清道夫”
- 办报与市场
- 反应迟钝为哪般

第五章改革尖兵

- 发现名记者

1 《南方周末》记者勇敢

2 良知死了吗？

3 记者与作家都是干嘛的？

- 《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和“法
- 卢跃刚岂止是“记录历史”？
- 不了了之的新闻透视：法律面前的交锋
- 良知与没有良知的较量：指控权力犯罪

4 为民请命的新华社记者

- 猪头税里出政绩
- 从邓州谋杀村民案到郑州“大肚子”信箱

——解国记身世

5 直面人生的戴煌

第六章近代报人报业

1 启蒙派报人：王韬、梁启超及其他

2 革命派报人和报纸

3 元老记者于佑任

4 “无冕之王”血谏民国——昨天的名记者

——杨乃武鲜为人知的“文字之祸”

——1939年的“国际间谍案”

——蒋介石“永不录用”的陈德徵

——陈其美被杀

——《苏报》案：邹容屈死狱中

——邵飘萍被枪决

——报界老板史量才死于非命

——大公报之“尖兵”

——为了新闻而付出生命者

第七章“权力”的异化

1 记者的生财之道

——我是一个记者

——你的金钱，我的新闻

——不是我不明白

——红包的历史

——你的道德在哪里？

——出场费：中国新闻记者到底值多少？

——呐喊：仅仅有喊声是不够的

——他山之石比较硬

——追寻清水源头

——西方新闻人的原则是自由主义

——公开“天机”：广告是靠不住的？

——舆论监督部门更需舆论监督

——有偿新闻到何时？

——穷则思变

——中国记者的收入状况

2 假新闻势不可挡

——又是一个小保姆的故事：新三毛的传说

——现代术士如何水变油

——气功师有了“喉舌”

——“打假”新闻与新闻打假

——刘晓庆与克林顿的×级关系

——谁来给体育传媒打假

——自由撰稿人靠假名扬天下

——长城集团集资丑闻臭了新闻界

——假新闻公然煽情

——一年之中大跌眼镜

——假的就要“严打”

第八章暗箱操作 内幕曝光

1 曝光“老大”

- 硕鼠大口侵吞 2 1 4 0 亿资产
- 剥去亚洲第一大站的华丽外衣
- 提审“铁老大”和电信业
- 亿元偷漏税成了难言之隐？

2 官场风云

- 组织部长：有钱能使磨推鬼
- 糊涂法官制造《新闻法》
- 好大喜功与南京长江大桥“结缘”
- 首例因《焦点访谈》曝光而引发雇佣杀人
- 骗官买官案骇人听闻：堪称当代“官场现形记”
- “国家曝光”不仅仅是遏制腐败

3 拍案称奇

- 新疆一民女与《人民日报》公堂“较量”
- 张金柱带来的连锁反应
- 医院真相：一位七旬老人眼中的医德医风
- 医院不知“夜的黑”

第九章 开放时代

1 世纪末死守高尚的权力

2 打开天窗说亮话

3 天理民心——看谁赢在最后，笑在最后

写在后面的话：说，还是不说？

附媒体亲近总理

- 海外学子致朱镕基公开信